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印度总理尼赫鲁



尼赫鲁

印度总理

一、早年纪事

普拉雅是一座古老神秘的印度小城，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600 年以前，它的重要首先在于位置特殊，位于恒河和朱本拿河这两大圣河的文汇处。古代传说还有第三条河萨拉斯瓦提河在此汇流，不过它仅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之中。戒日王将普拉雅定为他的陪都之一，在这里四处封地，他本人每隔五年便来此地向穷苦人分发一次财物。然而那个时代，即使上层阶级的生活也并非总是无忧无虑，不少人来到这里，站在年代久远的无果树下冥想，随后纵身跳入滚滚奔流的河水中自杀身亡。古代神庙的遗迹现在依然存留在那里，它曾是世代人们顶礼膜拜的重要场所，目睹了千年的风风雨雨。

普拉雅也像许多其他古代世界的中心一样，多少世纪早已是一片残垣颓壁，满目废墟。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在 16 世纪巡视了大河汇流处，建起一座新城，命名阿拉哈巴德，意为“真主之城”。恒河被誉为一部流动的印度历史，远古的雅利安人在公元前 3500 年就看见了这条河，他们赞叹过它难以抗拒的魅力。在印度的神话中，恒河发源于大神湿婆的头顶，湿婆显然是喜马拉雅山脉的象征。古希腊的武士曾在亚力山大大帝率领下入侵印度，但遭到当地的统治者昌德拉芨多的殊死抵抗，两军血战的地方就离现今的阿拉哈巴德不远。

这座城市有它独特的韵味，它接待来自次大陆各地的朝觐者。人们到这里朝拜是为了获得精神和肉体上的纯洁。随着英国人的到来，阿拉哈巴德也与所有英属印度的城镇一样分成旧城和现代的“新区”，城中有城。旧城区住着普通百姓，这里有熙熙攘攘的集市和每日价乱哄哄的噪音。乡村离旧城不远，即使住在城里也能嗅到那里散发出的质朴气息。旧城是穷人的庇居地，但也有一些富人宁愿偶尔呆在那里品味传统的简单生活。

新、旧城区的对比异常明显。旧城区很少有人照管，其中最贫困的地段则完全没有人理，那里没有一条好路，几乎全是狭窄的陋巷，灯光昏暗，没有像样的下水道或卫生设施，人们耐心地忍受着这些不便，很少抱怨，当然即使抱怨也无济于事。“新区”中住着本地大大小小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们中有英国官员和生意人，也有上流社会的印度人、中产阶级人士、地方官吏等。从旧城征收的市政收入比从“新区”征的多，但用于后者的开销却远远超过市区开支，由于“新区”占地宽阔，需要修更多的道路，必须得到维修、清扫，供水和照明，那里的下水道、供水系统和卫生设施要普及得多。

富人区内任何一家的大事小事很容易传开。1889 年 11 月 14 日这天，阿拉哈巴德“新区”的一幢屋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尼赫鲁家族多了一个男孩，贾瓦哈拉尔降生了。几个月后，人们将新生儿送到一次隆重的庆典上，用一支旧秤为他称重，秤杆上挂的不是普通的秤砣，而是粮食，称完后主人便将粮食分发给穷人，这是一个不知沿袭了多少代的古老风俗。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拥在他家邸室外祝福和接受免费款待的人数更多了。

尼赫鲁家族源于古老的克什米尔婆罗门谱系，属于最高的印度教种姓，相当富有。他们本可能永远留在北方，但一位叫拉杰·考尔的祖先改变了家族的命运。1716 年，一度强大辉煌的莫卧儿帝国已开始走向衰落，但皇帝仍然能像过去那样施恩布德。当时的统治者是一位平庸无能的王公，但喜欢结交地方名流，他邀请考尔移居德里附近，并将靠近运河的一幢房产和周围的土地授予这个来自克什米尔的移民家族。“运河”一词在乌尔都语就读“勒

哈尔”，考尔一家也像其他王室封臣那样以居处的特征命名称家族为“勒哈尔”，后来转音成了“尼赫鲁”。忘却旧姓并非表示对过去有何怨恨，克什米尔出生的人从来就认为那里是人间天堂。尼赫鲁一家从没有忘记他们的克什米尔出身，他家的社交圈子里出入的人几乎都是来自克什米尔的名门望族。

19世纪后半期的印度相对比较平静，全国的政治生活主要集中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三大城市，但由于印度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政治活动也开始在其他地区兴起。1885年，一位叫欧文的英国开明绅士创建了近代印度的第一个政党国大党，鼓励印度人敦促英国统治者推行民主改革，让他们积极参与本国的政治。国大党的成立成为印度近代政治意识的肇始，律师等城市的中产阶级也步人这一行列。到贾瓦哈拉尔出生的时代，国大党已经发展壮大，但与普通人民仍保持着遥远的距离。

贾瓦哈拉尔是他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与第二个妻子生下的孩子。莫蒂拉尔20岁时曾从拉合尔娶回一位克什米尔妇女，但她生下一子后便很快病死了，他们的儿子不久也随母亲归天。莫蒂拉尔再一次结婚，这次他选中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拉合尔少女，婚前家人叫她萨苏，婚后易名斯瓦鲁普拉尼，搬入当时仍由莫蒂拉尔年迈的母亲操持的尼赫鲁家庭。她与婆婆的关系不甚融洽，时常发生矛盾，几乎每一次都是媳妇忍让了事。这对年轻夫妇对贾瓦哈拉尔的出世满怀欣喜，少不了万般溺爱。童年时代的他从母亲那里经常听到那永远也讲不完的克什米尔：那儿的烹饪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那儿的女人是印度最美的，她们更像是从高加索山那边飞来的仙女，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宜人气候和壮丽景色。斯瓦鲁普拉尼总爱对幼小的贾瓦哈拉尔说：“克什米尔是印度北方一处神奇无穷的山地，山顶上白雪皑皑，下面是美丽辽阔的原野，开满郁金香和各种各样绚丽的花朵，我们克什米尔人从来就是一个骄傲和古老的民族。”

莫蒂拉尔从他兄长那里接替下一份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业，经常忙得不可开交，贾瓦哈拉尔10岁以前大都是在家庭教师、保姆、仆人和他母亲的陪伴下度过的。莫蒂拉尔厌弃传统的印度教礼仪，而妻子却是个虔诚的婆罗门，她从不讲英语，并总要贾瓦哈拉尔与她一同笃信宗教，参拜神秘祭祀，小尼赫鲁却常在父亲的鼓励下嘲弄母亲的迷信，他喜欢模仿父亲大模大样的神态，慢慢养成了见惯不惊、目空一切的习惯。这在母亲看来既好笑又痛心。

贾瓦哈拉尔的童年是孤独的，11岁以前他一直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几乎与大人们呆在一起。家族在阿拉哈巴德的邸宅有一个诱人的名称——“欢乐宫”，它是一幢漂亮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庭院占地宽敞，花草蔓生，楼台四周都有大阳台，圆柱、拱门和阳台气势壮观，平台屋顶经过名家的精心设计，落落大方。建筑高处有一个小圆顶，顶棚下方是一个精致的观景台，每当夏日日暮时分，过往者能看到院内的全景：玫瑰盛开的花园，修葺一新的草坪，齐根平整的糙球坪和网球场。“欢乐宫”内还有一湾游泳池，这类设施在人们眼中是阿拉哈巴德最了不起的新奇玩意儿。每夜在硕大的泛光灯照射下，“欢乐宫”的富豪尽显，邻里们都知道莫蒂拉尔定是家门兴旺，事业红火。

尼赫鲁家庭的氛围具有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大英帝国的那位女王已死去好几年了，但宗主国发生的变化总要晚一段时间才能让英属印度适应。贾瓦哈拉尔的英语教师是一位叫布鲁克斯的年轻人，他是著名的安妮·柏

桑特夫人的得意门生。柏桑特夫人是当时一位杰出的社会改革家，因在伦敦东区发起反贫困运动而名声大振，她也与肖伯纳同是费边社的核心成员。不过，柏桑特夫人也有其另外一面，她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深受本世纪初流行的神智论思想的影响。神智论因研究外星现象、神灵启示和预言应验，在有神秘主义传统的印度引起了轰动。布鲁克斯本人也是一位神智学家，他的信仰给他的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次当布鲁克斯滔滔不绝地讲解感受“伟大精神”的欢愉时，贾瓦哈拉尔看到父亲的前额起了深深的皱纹。莫蒂拉尔清清喉咙，突然打断布鲁克斯说：“我知道，布鲁克斯先生，你能培养我儿子的丰富想像力，嗯，那样并无害处。不过与其用激情指导生活，我更宁愿他学会用理智指导生活，这样他的想像力才不致妨碍他认识现实。”布鲁克斯没有什么可说，只得表示赞同。

莫蒂拉尔也像那个时代许多与他地位相同的印度自由派人士一样，是一位国大党人。国大党内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裂痕当时尚未公开，但已初见端倪。温和派的领袖葛卡勒和瑙罗吉将自己的政治要求限制在社会改革的范围内，热衷于消除童婚、反对种姓隔离和对寡妇再婚的禁律。激进派由提拉克领导，他能言善辩，擅长演说，赞成走向街头向殖民政权示威。他不愿看到国大党变成一个只会恳求、请愿和让步的乞求者的政党。两派的政治性辩论大多是在私宅的客厅内展开的，一遇这种时候，贾瓦哈拉尔总是用惊奇和钦羡的目光观察着他的父亲及其朋友们。

父亲偶尔会在喝下几杯葡萄酒后放声狂笑。贾瓦哈拉尔记得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喝酒时便跑到母亲身边，大呼父亲是一个酒鬼。毫无疑问，莫蒂拉尔在他儿子的生活中是主宰一切的角色，他是一位我行我素、武断专横的长者，加上脾气不好，从不能容忍家中任何人不服从他的权威，当然也没有谁会那么做。对小尼赫鲁来说，父亲的严厉和专制是他早年生活中最受压抑的一面，他甚至觉得自己被单独囚禁在牢笼中。

身不由己的孤独培养起贾瓦哈拉尔博览群书的兴趣，他的阅读习惯后来持续了整个一生。他求知欲极强，读起书来如饥似渴，很小就读过卡罗尔、吉卜林、柯兰·道尔、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的作品，稍后又读了威尔斯的传奇小说。布鲁克斯在读书方面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想知道神智学是否真掌握着打开宇宙奥秘的钥匙，尽管答案总是否定的，可有些事却老是萦绕在他心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常常受到不断重复的梦幻的惊扰：

“我梦想星体，幻想着飞到老远的地方去。这种不用机器高飞天空的梦幻，在我一生中的确时常出现。这种梦有时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好像广阔的田野横在我的下面。我不知道近代阐释梦的学者如弗洛伊德等人怎样解释这种梦。”

尼赫鲁当时已快到青春期，可以将他这类梦境解释为他被唤起的情欲，但同类梦的延续远远超出了他的少年时代。在梦中他总不用机器飞行，而是像古希腊或印度教神话中的众神，自由翱翔在广阔的天空，俯察下界的芸芸众生。难怪后来有人把他天空飞行的梦境解释为对权力和政治的渴求。贾瓦哈拉尔几年后真地去了柏林的特蒙伯霍夫机场观看飞机着陆表演，他与莫蒂拉尔两人当时被这一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惊得目瞪口呆。

在许多方面比他的梦更说明问题的是一件真实的往事，他在后来写成的

《自传》中作了记述。发生的事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属印度上流社会大家庭中可说是司空见惯，但它还是给这位少年的心灵上留下惊恐的感受：

“现在还记得父亲曾经有一次对我大发脾气，当时我只有五、六岁。有一天我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支自来水笔，我眼红了。我心里打算父亲不会同时用两支笔，因此我就拿走了一支。后来我看见他到处找那支笔，想起自己所干的事，不由得害怕起来，可是我没有招认。后来发现是我拿走了那支笔，父亲大发雷霆，把我痛打一顿，我感到深刻的痛苦和惭愧，跑到母亲那儿去，她用各种油膏接连在我身上擦了好几天。虽然父亲这次处罚了我，但是我并不怀恨在心。我当时认为这种处罚有道理，不过太重些。我对于他的尊敬和钦佩虽然还像过去那样强烈，可是其中却带有一种恐惧心理。”

家庭生活从来就被看作是逃避内心痛苦和世态炎凉的庇难所，不过尼赫鲁的描绘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莫蒂拉尔论天性不算是一个虐待狂和冷酷的人，他宠爱自己的独生子。贾瓦哈拉尔受到的暴力威吓实际上不过是传统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它象征着传统社会中有顽强生命力的家长权威和长辈的支配地位。暴力和高压因素始终在家族内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它们有时公开有时隐蔽，往往给受害者感情上留下无意识的创伤，即使他们的肉体痛苦已经消失，受压抑的心灵仍会残留过去的愤懑和怨气。当然，这类心理上的后遗症因人而异。贾瓦哈拉尔对他父亲的爱慕发自内心，可他也无法让自己消除那种难以理喻的矛盾情愫。

1905年，贾瓦哈拉尔年满15岁，这时他已多了一个4岁的妹妹维贾拉克希米，他很喜欢妹妹，不过她作为一个上下不离的伙伴还年龄稍小。他成天仍乐意呆在父亲的书房里读书，后来又养成读报的习惯。这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日本的胜利在贾瓦哈拉尔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痕，他头脑中也充满各种新奇的念头。他从报上得知，俄国出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对俄国专制政权的溃败感到欢欣鼓舞。列宁和托洛茨基清楚地认识到俄国的战败敲响了沙皇制度的丧钟，俄国人民目睹了专制制度的腐朽，也看到沙皇并非战无不胜，于是他们开始准备推翻政权的起义。1905年发生了一场流产的革命，它实际上是1917年那场震撼世界的革命的彩排。少年尼赫鲁与列宁等俄国革命家对日俄战争意义的理解当然完全不同，他萌生出一种朦胧的民族主义爱国激情：

“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热情。我每天等着看报上的新消息。我买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书，并且读了其中的一部分。我对于日本的历史弄不清楚，可是喜欢古代日本武士道的故事以及小泉八云美妙的散文。民族主义思想充满了我的心怀。我念念不忘印度和亚洲摆脱欧洲的束缚，取得自由。我梦想着勋绩，我拿着剑，为印度而战，为印度的自由而效力。”

贾瓦哈拉尔的整个生活也在发生变化。莫蒂拉尔急于送儿子去国外接受教育，他托一位颇有名望的英国友人帮忙，终于为儿子谋得一张哈罗公学的录取通知。他认定这对贾瓦哈拉尔是再好不过的安排，一名年纪轻轻的印度孩子有资格就读一所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公立学校，的确是一件光耀门庭的体

面事。斯瓦鲁普拉尼碰巧又怀孕了，身体老是不舒服，莫蒂拉尔正巧又要去巴黎办理公务，他提议借送贾瓦哈拉尔入学的机会偕妻子去欧洲作一次短期游访。一个月后，小尼赫鲁在父母的伴送下进了哈罗公学。哈罗公学建于1572年，能在此读书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这里曾先后走出过四位大英帝国的首相，他们是皮特、帕麦斯敦、鲍德温和温斯顿·丘吉尔。

在异邦送别儿子多少令莫蒂拉尔夫妇有些伤感，贾瓦哈拉尔毕竟要远离亲人独立生活了。莫蒂拉尔旅欧回国后在一封给儿子的信中谈起他的离别感受：“我们留给你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或许也是在未来另一个世界中所拥有的最珍贵财富。将它给你并不困难，因为仅靠我一年的收入就能做到。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你成为我们期望之中真正的人。让你留在我们身边，留给你一笔金钱财富，而只让你接受很少的教育或根本不受教育，这样做极其自私，我甚至想说这是犯罪。直到我必须与你分别，我才发现是那么地爱你。”贾瓦哈拉尔的回信也同样动人：“我亲爱的父亲，我多么希望再靠近你的身旁。但愿日子会过得更快，给我带来再见到你时的幸福时光。”

斯瓦鲁普拉尼从欧洲回来后不久便生下一个男婴，生日正好与贾瓦哈拉尔同月同日，远在异国的哥哥高兴得难以自抑，连忙给家里写回一封信，但他的贺信还未送到父母手中，婴儿就夭折了。莫蒂拉尔夫妇异常伤心，从此对他们的小尼赫鲁又多了一层珍爱。

尼赫鲁在哈罗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他很快便对乏味单调的住读生活感到厌倦。他后来写道：“我从来不曾一个人生活在陌生的人群中过。我感到孤单而且想家。”从他这一时期的照片上看，他穿上校服时显得极不自在，用下垂的手忸忸不安地抓住自己的硬边草帽，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最使他受不了的是孤独，那难以排遣的寂寞时时攫住他不放。管事是学校里的唯一女性，可她在他心目中绝不可能取代一位印度母性的地位。他在《自传》中用一些奇怪的话描述当时的感受：“我不是一个真正能适应这种生活的人”；“我总有一种不能完全跟他们打成一片的感觉。”

在当时所有的英国公立学校中，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情绪随处可见，毕竟这时大英帝国正值顶峰。尼赫鲁曾有一段短时期倾向反犹太主义，还想成为团体中的一员。尽管他未讲任何具体的事情，但他回忆录中那些闪烁其词的只言片语足以表明他认为设法去迎合潮流是理所当然的：“不久我也不自觉地认为抱有反犹太的情绪是应该的。”在学校里，他像过去那样从文学和历史中寻找乐趣，他也爱好各种运动，特别是板球，还喜欢象棋中蕴涵的缜密规则。直到两年后离开哈罗时，他对那里的兴趣仍极其有限，事实上他对自己离开哈罗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学校的传统要求学生必须对离校显得伤心，他强制自己流下了几滴眼泪，不过却“不了解离开哈罗感到难过的心情真实到什么程度”。他是自愿离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向往一个更大的天地——大学，他写道：“不知怎样我觉得哈罗落后了。我羡慕大学。哈罗这个地方似乎太小，思想没有发展的余地。我要到大学更广阔的环境中去。”

多年以后，尼赫鲁作为印度总理重返哈罗。当时他接受了访问母校的邀请，大概是因他那不可救药的多愁善感使然，也可能是他渴望有一个雪耻的机会。从一张访问时的照片上看到：尼赫鲁一身典型的印度式打扮，身穿紧身裤和长外套，头戴甘地帽，他从列队欢迎的哈罗校友中间走过，欢迎者手挥大礼帽高唱“只因你是个快活伙伴”的校歌，他向他们挥手致意表示感谢，但他的眼睛却不正视他们而是凝视着远方，神情若有所思，他仿佛忆起过去

在这里受到的冷淡接待，难以掩饰因今非昔比而产生出的自负。

在哈罗读书期间，尼赫鲁从不忘了解印度国内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定期从印度出版的报刊上得到消息，密切关注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虽然兴趣还主要来自乡土感情和求知欲，但他的民族感也在日益增强。甚至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已习惯坐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年长的堂兄们讲他们如何与英国人打交道的事了：“我听成年的堂兄们谈话，不能全部听懂。他们的谈话常常涉及英国人以及欧亚混血种人对待印度人所表现的那种神气活现的、带有侮辱意味的态度。他们说印度人不能容忍这种态度，而应起来反对。”他尤其佩服和喜欢其中一位，因为后者敢公开蔑视英国人的盛气凌人，专找机会与他们对着干。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虽然尼赫鲁从小就在大家族的荫护下生活长大，但绝不可能对这一可悲的现实视而不见。他的家庭教师布鲁克斯时常尖刻地抱怨种族主义，对自己英国同胞的庸俗习气大加嘲讽。尼赫鲁尽管那时还无法充分理解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已开始体会到政治对抗的气氛。他的父亲从不反对以批判的眼光认识问题，却并不想让他过分关心政治。莫蒂拉尔总对儿子说：必须永远忠于大英帝国。

不过就连莫蒂拉尔本人也逐渐对这种忠诚失去了信心，与殖民当局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905年，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独断专行地决定将孟加拉省一分为二。寇松分治孟加拉的动机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孟加拉人政治意识强，不服管束，最难使政府放心，印度其他地方的不安定势力都受孟加拉的感召。他也注意到，孟加拉人认为自己在德行、见识和文化素养上并不比英国人差，至少也可与他们平起平坐。寇松分割孟加拉实际上就是要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开。他狡猾地利用了穆斯林农民对信奉印度教的地主阶层的反抗心理，公开表明他对孟加拉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敌意。寇松的决定引出了本可避免的动乱，孟加拉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抵制英货，愤怒的群众将大批英国货投入熊熊烈焰中化为灰烬。

。

分割孟加拉是件全国性的大事，它唤起了印度民众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激情，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孟加拉的局势，大家一致认为，寇松的决定大谬不然。但在扭转局势采取的方法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莫蒂拉尔指责建立自治政府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而著名的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却率先发起抵制英货运动，提倡使用国货。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早就对殖民政府利用权力阻挠印度企业的发展深怀不满，马上行动起来响应提拉克的倡议。身在英国的尼赫鲁认真注意着这场辩论，尽管他父亲在多封信中生动地对他历数激进派的毛病，但他始终同情提拉克一派，不赞同父亲的政治见解。他后来回忆说：对于抵制外货运动，“我们在欧洲的印度人全都感到激动。我们差不多没有例外全都是提拉克派，或者照新党在印度的称呼，是极端派。”1907年，国大党在苏拉特举行一年一度的例会，提拉克与温和派领袖葛卡勒及各自的追随者争执不下，最后不欢而散，分道扬镳。尼赫鲁写信给他父亲，明确支持提拉克，莫蒂拉尔大为震惊，结果身体还闹出了点小病。

在英国，自由党在1906年赢得选举胜利，新政府的第一批举措就包括解除寇松的职务，他们认为他的傲慢专横激怒了印度人，给英国带来了麻烦。寇松离职前在加尔各答大学对一大帮印度最有政治觉悟的学生说：“自由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想事实终会证明这一说法完全正

确。”英国派来接替寇松的是明托勋爵，一位与他的前任迥然不同的人物，他更愿意听取印度人的抱怨，对温和派的改革要求作出更积极的反应。明托与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勋爵一道制订了一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印度立法议会的选举制度。但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一场骗局。选举安排实行了穆斯林“分片选举”的原则，有专门为穆斯林保留的席位，其他教派的候选人不得与之竞争。这一方案与寇松的计划相比更为巧妙，最后的结果却如出一辙：分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孟加拉广泛流传着一份题为“谁在统治我们？”的传单，有人把它寄给尼赫鲁，他读得热血沸腾，文章与他自己心中腾起的民族主义激情交相呼应，最使他激动的是下面这段话，完全像一篇印度的《独立宣言》：

“这些窃贼真能当我们的统治者吗？他们摧毁了我们
的手工业，夺去了我们的织工和铁匠的生计，输入无以数
计他们本国的商品，在我们的市场上卖给我们的人们，他
们偷窃我们的财富，夺走我们人民的生命。那些掠夺我们
田野中的收成，带给我们饥饿、热病、瘟疫和厄运的人真
能当我们的统治者吗？那些强加于我们沉重的租赋的外国
人真能当我们的统治者吗？弟兄们，你们越有忍耐力，那
些背信弃义的人对你们的压迫就会越重。我们必须自己站
立起来，寻找前途。难道毫无办法拯救自己吗？我们地球
上的所有人都是弟兄。他们不劳而获，用我们的膏脂养肥
他们自己，他们吸尽了我们的血肉。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
忍受？”

尼赫鲁现在开始相信印度再也不能继续忍耐下去了。接到父亲的来信总是件高兴事，但信也给他带来思想上的烦恼。莫蒂拉尔在其中一封信中对印度学生的过激思想大发感慨，认为他们从过去被动地接受教育变为积极地参与国内政治活动不是件值得提倡的事。他对儿子诉苦说：学生们总是吵吵闹闹，粗暴地打断温和派人士的讲演，讲演者因言论不合听众的口味而当场受到侮辱，甚至连他本人也因与学生们见解不同而被轰下台过。尼赫鲁对他父亲遇到的麻烦表示同情，但也毫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吵吵闹闹的痞子作风自然不讨人喜欢，不过它却给了西方人一记耳光，表现出我们某种程度的独立。”

尼赫鲁这时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苦恼，不知是该马上回国还是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他希望将来能成为政府中的一名文官，但莫蒂拉尔却另有考虑，坚持要儿子选择律师作为将来的职业。尼赫鲁的两位表兄这时已从英国回国，当了英属政府的文官，因此再要他也走人那一个世人向往的行列已没有什么新鲜可言。父亲觉得儿子也应像他自己一样当一名受人敬重的律师，阿拉哈巴德的高等法院里难道能没有一个尼赫鲁家族的人吗，那岂不是成了咄咄怪事。

这对莫蒂拉尔来说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问题，他盼望子承父业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尼赫鲁又一次与自己的意愿相违，十分勉强地接受了父亲的意见，但他坚持要先读取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很快他便进了剑桥著名的三一学院。大学生活比他事先料想的要愉快得多，他分得一间糟得不能再糟的房间，光线灰暗，往里朝向一个小天井，不过他并不太在意，他毕竟已是 18 岁的大人了，生活正在对他展开丰富多采的一面。他把自己此时对生活的态

度归为“享乐型”：“我带着得意的神气在剑桥的庭院里和窄狭的街巷中走来走去，一遇见熟人就满心喜欢。”他对那段充满情趣的生活有着美好的记忆：

“我并不苦恼，因为要打定主意的时候还很远。同时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愉快，各方面的活动范围一天比一天广，要做的事很多，要看的东西也很多，许多新的道路需要探索。在漫长的冬夜，我们坐在火炉边，从容不迫地讨论各种问题，直到深夜炉火快要熄灭了，我们才哆嗦着上床去睡。有时在讨论问题时因为争论起劲，讲话不免慷慨激昂，然而这也只是装模作样而已。我们对于各种人生问题，采取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态度，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问题还不是现实问题，我们还没有卷入世界大漩涡里。”

不过剑桥的生活也有另外内容。尼赫鲁仍然保持着对印度国内局势的关心，他与其他印度学生组织了一个专门讨论政治问题的团体。当然这类团体难免不沾染一些英国学院派那种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作风，不过也使他有不少机会与更多杰出的人士打交道。在这里他见到了专程来访的葛卡勒等国大党领导人。1907年，尼赫鲁与他的堂兄作伴首次游访了爱尔兰，他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他深切同情饱受英国欺凌的爱尔兰人民，也很容易发现自己的祖国与爱尔兰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大英帝国是它们的共同敌人。他高兴地听说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新芬党”正与印度的国大党一样在争论斗争的策略，但激进派在爱尔兰已占绝对上风。他满怀兴奋地写信告诉莫蒂拉尔：“你听说过爱尔兰的新芬党吗？它是一场最引人注目的运动，很像我们印度的所谓极端派运动，他们的政策不是乞求施舍，而是用武力夺取政权。”

尼赫鲁在剑桥一边学习几何、植物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一边坚持不懈地培养课外兴趣。他从不放松对历史和文学的学习，读了肖伯纳、尼采和哈维洛克·艾里斯的不少著作。他在公众场合宁可多听少说，不过他也发现辩论会非常有趣，参加了三一学院的“闲聊与演讲”辩论俱乐部。俱乐部有一条规矩，凡是整个学期发言少的会员应被罚款，尼赫鲁不得不多次缴付这类罚款。这甚至影响到他后来的言谈风格，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讲话时总显得温和克制，不易激动，很少刻意去制造气氛，哗众取宠。

剑桥当时还有不少别的印度学生，尼赫鲁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一帮与他非亲非故的熟人。他发现这些海外同胞中盛行两种倾向：一种人喜欢高谈阔论，擅长辩论，中间大多数人以后都当了英属印度政府的文官；另一种人更不易接近，但显得更有信念和思想，他们的气质与风格，与贾瓦哈拉尔没有什么两样，他在这帮年轻人中找到了温暖和友情，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他的终身密友和国大党的重要人物，当然也有些人成了他的政治对手。

尼赫鲁离开剑桥后来到伦敦，进入一家有名的法学协会进修。他对学习法律毫无兴趣，觉得它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他后来写道：“学法律花不了多大时间。我经过几次律师考试，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他在伦敦花了些时间尽享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座国际都会的各种生活情趣。他偶遇一些哈罗出身的英国相识，他们一道沉湎于各式各样的恶作剧：赌博，狂饮，狎妓，在疯狂的纵乐中消磨时光。尽管莫蒂拉尔给他的钱很多，但他还是常常感到手头拮据。为他负担费用的父亲生怕他学坏了，从遥远的阿拉哈巴德

写信警告他行为不可越轨。尼赫鲁后来自责反省说：“这种安适的、无意义的生活对我没一点好处。我早年的热忱开始消沉，只有一种东西似乎在发展，那就是我的自高自大。”但他迟到的自省并不能带给当时那位焦心的父亲些许安慰。

尼赫鲁终于厌烦了无所事事的生活，停止了纵情享乐，但他又开始对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妙前景感到无比烦恼。自到英国以来，他在个人关系问题上始终未能解决好传统与现代观的矛盾，他头脑灌满了各种现代思想和时髦观念，但内心深处却是另一码事，对这一切完全没有把握。母亲和姨母们在他离家赴欧时直截了当对他说，只要他保证不爱上一位英国女人或与她结婚，她们就能提前原谅他的全部过失。她们向他灌输的形象是那些荡游街头巷尾、勾魂作祟、随时准备扑向天真无邪的青春少年的吮血女巫。更令他不解的是，就连他父亲那样公认的现代派人士也附合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莫蒂拉尔后来更坚决地谈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向儿子承认自己无法容忍“杂种”或“欧亚混种”孩子的事实，警告他说，如果那种倒楣事发生在他家里，别指望他能对自己的孙子产生感情。

尼赫鲁没有对这些观念表示异议，只感到迷惑不解，并不懂父母为何对此事的态度如此固执。他正值青春期，满脑子都是异性偶像，就如与他相仿年纪的男孩爱做的那样，他恋慕在聚会上见到的那些美貌的克什米尔女孩，偶然间触碰到她们的皓臂和纤纤玉手，都会使他感受到强烈的愉悦，兴奋不已，事后总留给他一种缠绵久驻的快感，然后他又靠丰富的想象力把感觉扩张放大，以至难以忘怀。尼赫鲁迫于压力，在离家之前答应将来娶一位克什米尔姑娘为妻。至于当时印度教礼俗中禁止的不同种姓间的通婚，他父母倒并不怎样在乎。

他到英国还不足一年，父母就已忙着为他物色新娘。1910年到1912年是他在英国度过的最后两年，他只要一想到结婚就头昏脑胀，躁动不安。他有许多事情缠身，但总觉得父亲在远方严厉地盯着自己，于是干脆什么都懒得去做。他与父母在婚姻问题上的意见交锋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不相容，伦敦与阿拉哈巴德之间邮件往返的间隔更短了。尼赫鲁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双方相互没有爱就决不应该结婚，我认为，一个人若只因生儿育女就去结婚是一桩罪恶，也就毁掉了他的一生。”

尼赫鲁在接到一张父亲为他相中的女孩的照片后，写信对父亲说：“您正在为我挑选女友，让她一直等待我的归期，这种方式一点也不富于浪漫情调。您老是指望我与一张像片谈情说爱，那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你送来照片上的女孩也许很不错，但我很难说从照片上就倾心于她。”

莫蒂拉尔察觉到儿子的抗争，收回了那张照片，但又在来信中对他在德里见到的姑娘大加赞美，那女孩只有12岁，他认为年龄只算是次要问题，一位旧式郎中也让莫蒂拉尔相信她是尼赫鲁的理想配偶，年龄的差异从健康角度看完美无缺。这场远隔重洋的争执搞得尼赫鲁心烦意乱，他现在只能设法拖延时间。他在从国外寄回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至于那位德里的姑娘，对我来说肯定太小。我比她大将近十岁，年龄悬殊太大，在她18岁以前我不可能与她结婚，那就得等上六、七年。我不在乎等，毕竟我现在还不想结婚。”

1912年夏天，尼赫鲁取得律师资格，几周后离开英伦回国。很多年后他不无自嘲挖苦地评论那个时候的自己：“一个自以为是的书呆子”。

二、政治少壮派

家人一大早就在等候尼赫鲁的归来，他受到每个人的欢迎。他又多了一个妹妹克里希娜，离家时她还没有出生。斯瓦鲁普拉尼也很久日子没有见到儿子了，她看到他已长大成人，变得相貌堂堂，他的额发即使长得最好时也不多，现在看上去又少了一些，凸出的前额更为明显。阿拉哈巴德的闷热酷暑令人无法忍受，全家人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避暑胜地莫苏里。刚到家的几周内尼赫鲁简直被捧成了社会名流，家人惊愕不已地听他讲述国外见闻。只有莫蒂拉尔例外，他掩饰住因儿子归来的得意，觉得有必要提一些尖锐的问题来打断尼赫鲁滔滔不绝的独侃。尼赫鲁也详细询问他走后发生的每一件事：家庭闲话、共同的朋友、政治，直到他打听够了才开始想到自己的前途。

尼赫鲁就职于他父亲呆过的本地区高等法院，担任法庭律师。他工作起来十分卖力，总是仔细研究接到的每一例诉状，详尽向客户们提问。他当总理后说，他那时的踏实程度足以让后来印度政府中的文官们汗颜。他的工作风格是埋头苦干而避免抛头露面，最初在法庭上他相当害羞，但不久便掌握了雄辩这门艺术，尽量利用每一次可以临场发挥的机会。莫蒂拉尔认真在一旁观察，但从不干涉，他最高兴和骄傲的是自己的儿子终于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而且还是接父亲的班。当年轻的尼赫鲁第一次领到一张 500 卢比支票的报酬时，莫蒂拉尔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你爸爸的第一份薪水才不过 5 卢比呢！我那时要是像你今天这么走运就好了。”

尼赫鲁对父亲的这些赞美话却不敢苟同，他逐渐发现法庭内的气氛及周围的环境死气沉沉，很消磨人的意志，每天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越来越让他忍受不了，无论是去律师图书馆还是俱乐部，见到的总是些旧面孔，“一再讨论着几个往往与律师事务有关的老问题。这种气氛对于知识没有推动作用”；“与高级职员们同坐在一起，听他们喋喋不休地谈升职、请假规则、调职以及琐碎的官场丑闻，比这更无聊的生活经历是少有的。”他实在害怕沉闷枯燥的工作会窒息自己生命中的任何一点火花。

他决定参加订于 1912 年 12 月召开的国大党的某一次年会。提拉克当时还在狱中，其追随者被大会拒之门外，会议代表清一色全是温和派人士，代表的社会背景是有产阶级。尼赫鲁并不欣赏代表们时髦的欧洲款式服装或装腔作势地去模仿欧洲人的言谈举止，也讨厌国大党内的一言堂风气。会上完全没有政治紧迫感，没有辩论，倒很像一帮旨趣相投者的一次社交聚会，他不由得毫无保留地对父亲发了一通批评：“这简直是上流社会的社交，清谈政治家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莫蒂拉尔劝他对现实要有更多的耐性，劝告对他当然毫无用处。尼赫鲁最感震惊和无法容忍的是英国殖民者无视印度人的起码尊严，居然连建立自治政府也不愿认真考虑。

尼赫鲁绝望之余回到书斋，只有书才是永不使他失落的老伙伴。他重读了罗素的《宗教与科学》和《自由人的膜拜》，罗素这位统治阶级的叛逆以其锋芒毕露的无神论深深地吸引住他。尼赫鲁常常寻思：罗素这位英国古老统治家族的后人怎么会变成一位无神论者、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呢？在孜孜不倦读书的同时，他也密切注视世界风云的变幻。意大利对土耳其的进攻疏远了它与印度穆斯林的关系，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也就是伊斯兰世界的教主哈里发。意土之间的战火迅速扩大，1912 年爆发了巴尔干战争。印度的穆斯林支持土耳其，他们组织捐款并打算派出医疗队，但还没来得及

这样做战争就升级了。争夺巴尔干的局部冲突演成一场持续四年之久、充满血腥的世界大战。这是一场世界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原料产地的不义战争。印度虽然远离战场，但却不能避免战争冲突。鉴于印度与英国在民族感情上的对立，许多印度人同情德国是不足为怪的。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对德国抱有任何美好的幻想。对穆斯林来说，只因为德国是土耳其的盟国；而其他印度人只不过是恪守了一句民族主义味十足的格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正如尼赫鲁当时的看法，“这是弱者借刀杀人的报仇思想。我们大多数印度人对这次战争的看法，抱着错综复杂的心情。”他对这场世界战争没有太大兴趣，但对法国人民和法国文化深感同情，认为它们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也有不少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呼吁印度人在战争中支持英国，他们以为对大英帝国的效忠会换来改革的回报，就连饱受6年铁窗之苦刚出狱的提拉克也鼓动支持英国。结果印度尽心尽责，为战争输送了大量炮灰，一百多万印度士兵在中东、非洲、伊朗和阿富汗作战，满载工业原料的货轮不断从印度的港

口启航驶往欧洲，铁矿砂、云母、硝石的出口价之低达到荒唐的程度。印度羽翼未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迅速发展，“钢铁大王”塔塔为修建近东战线的铁路供应了大量铁轨，为印度独立后的重工业发展奠定了早期的基础。忍饥挨饿的农民看到他们辛勤劳作收获的小麦、稻米、黄麻、茶叶和椰干以最低的价卖给英国，同时印度的赋税都翻了一倍。连不少英国政治家都承认，如果没有印度的帮助，战争至少会大大延长。

印度人民的朋友、深受尼赫鲁爱戴的柏桑特夫人大声疾呼：“如果与英国人作战的南非布尔人那样蓬勃向上的民族能获得自由，那么正在为英国而战的印度人现在也理应获得自由。”呼声没有得到殖民政府的响应，于是柏桑特夫人与提拉克在1916年4月分别创建了自治同盟，他们的楷模便是当时也正在争取自治的爱尔兰。“自治”的含义就是要建立独立的议会来决定本国的未来。尼赫鲁加入了两个同盟，终于找到了他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团体。英国殖民当局起初对同盟有些不以为然，以为它们不过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单独组织，不会对政治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然而提拉克却将同盟的大门向农民、工人和商人敞开，许多新成员完全蔑视国大党软弱无力的宪政主义纲领。血气方刚的同盟成员与殖民政府的军警发生了多次街头冲突，成功地夺得武器，这下当局惊慌失措了，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但提拉克深受人民拥戴，英国人担心逮捕他会

23

引起广泛反对，因此他们只逮捕了包括柏桑特夫人在内的自治同盟的其他领导人，禁止学生参加以同盟名义组织的任何集会或聚会。

印度的政治生活正步入一个新阶段。镇压自治同盟引起国大党温和派内部的重新分化，莫蒂拉尔·尼赫鲁因他相知甚深的柏桑特夫人被捕而受到很大震动，她经常造访尼赫鲁家族在阿拉哈巴德的邪宅“欢乐宫”，是他们全家的朋友。莫蒂拉尔这时也加入了自治同盟，明言温和派不可能引导印度实现自治，不过他仍然与同盟内受提拉克鼓动的更激进一翼明显保持着距离。

就在这些轰轰烈烈的事件过程中，尼赫鲁的婚姻大事又被提了出来。父母两人都觉得他毕竟已满26岁，该成家立业了。姑娘家住德里，名叫卡麦拉·考拉，刚16岁，她与尼赫鲁同样出身于克什米尔的婆罗门家庭，这门亲事完全符合历来的正统观念。尼赫鲁顿时感到自己陷入一个全然不能摆脱的

困境，最终十分勉强地答应了婚事。他过去一直坚信，爱是婚姻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眼下这门婚事毫无疑问是缺少爱的。他的小妹克里希娜这样描绘新娘卡麦拉：“她刚刚成年，长得非常可爱，苗条，比一般的印度女孩高些，有着典型的克什米尔血统婆罗门的白净肤色，她有一头暗褐色的秀发和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性情极其温柔娴静……反正她是我认识和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之一。”

婚礼事先作过精心准备，在德里持续热闹了九天，按照古老的印度风俗，夫家在新娘家附近扎起一座婚礼营地，随后庆典又在阿拉哈巴德的“欢乐宫”中持续了几周。新婚之夜，一对新人到营地外漫步，想从夜空中找出北极星，照古代印度教的说法，北极星是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象征。尼赫鲁在整个那段时间老是无法摆脱矛盾压力的折磨，这些年来他接受的是世界主义和现代观的熏陶，对落后倒退的传统陋习深怀敌意，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理性本应使他毅然反抗这场闹剧。卡麦拉在这件事上无从选择，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女性一样，在婚嫁大事上只能绝对服从父母。尼赫鲁本可以抗争，他却不愿那样做，因为它将意味着与他的父亲关系破裂，也会深深伤害母亲的感情，他受不了自己给他们带来的极度不快。这一时期莫蒂拉尔在政治上与他的距离拉近了，“父亲当时还准备继续向前进，即令跟他温和派中的老朋友闹翻了也在所不惜。”因此他可能觉得自己在婚姻问题上作出点牺牲也是值得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家庭的团结都应该维护，这也是他父亲一贯强调的原则。他后来在那本著名的《自传》中并没有涉及他那段时期个人生活的窘迫处境，压抑了内心的烦恼，没对这件事作任何解释，谈及他的婚姻的那一章也不过两页，想必他对此是感到极度痛苦的。那一章的标题是“结婚和喜马拉雅山中的探险”，与结婚真正有关的内容只用一句话带过：“1916年我在德里城结婚，那天正是印度的立春节。”在他这部自传体著作中，此段话肯定是所有涉及重大个人事件的记述中最短的，甚至连卡麦拉的名字都不提。后来当她死后，尼赫鲁对妻子大加赞誉，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疏漏，于是在《自传》的扉页上题词：“献给已与世长辞的卡麦拉。”

同一时期，世界大战正接近尾声，但就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消息传来：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年以后德国及其盟国战败投降。这两大事件以其截然不同的方式振兴了印度的政治生活。十月革命是世界性的事件，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对它表现出难以想像的兴奋和激动，他们屏住呼吸细读列宁签署的通告：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宣布放弃沙皇政府对别国的一切领土要求。苏维埃俄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托洛茨基打开档案馆之门，公布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秘密协定，揭露它们决定在战后瓜分世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听到后无不惊讶。

1917年11月对尼赫鲁家族来说也具有特殊的意义。11月19日，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降生了。卡麦拉婚后一直遵从印度教的礼俗在德里与自己的父母同住，时常感到寂寞，急于生一个孩子。她与尼赫鲁家其他女性的关系处得并不好，总觉得在自家母亲身边会减轻生育过程中身体和心情的不适。但莫蒂拉尔不同意她的离开，他的第一个孙子理所当然要在“欢乐宫”出生。他打心里喜欢这位他亲自选定的儿媳，卡麦拉屈从他的慈爱压力改变了主意。英迪拉的出生为尼赫鲁带来欣喜，直到后来他还总拿她的生日与那个特别年代的关系开玩笑，逗她说她与俄国革命同岁。

除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外，另一个重要事件更直接地影响到印度。土耳其

在大战中是德国的盟国，战败后投降。全世界的穆斯林对土耳其战后受到的待遇大鸣不平，特别是推翻哈里发被看作成帝国主义最卑劣的背信弃义。印度穆斯林为此发起了基拉法运动，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恢复哈里发以往的荣耀。这一运动对印度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数量众多的印度穆斯林人口在政治上的首次觉醒，他们的觉悟注定会为印度的民族主义加入新生力量，也将给印度的政治前景带来错综复杂的问题。由于英国在欧洲对推翻伊斯兰教教主表现得最积极，因此基拉法运动的目标主要指向它，印度也就成为一个敏感的地区，当时的形势极为紧张。

国大党这时已脱离某些温和派人物的控制，制订出与基拉法运动联合行动的重要决议。负责制订决议的人是刚从南非归来，因在那里领导民众不服从运动而大名鼎鼎的圣雄甘地。甘地认为，如果要在印度全面开展民族运动，就应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团结看得至关重要。民族主义者马上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殖民政府在1918年发表蒙塔古一切姆斯福德报告，提出一套新方案，表示将继续改革，但它离自治的目标仍很遥远。

国大党1918年9月在孟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上述报告提出的建议，结果党内再次出现分裂，温和派打算接受那些提议，但党内绝大多数人坚决反对。尼赫鲁父子这次站到了同一边。莫蒂拉尔从孟买返回阿拉哈巴德后，开始赞助一家独立发行的报纸，抵制温和派喉舌《导报》的影响。尼赫鲁对他父亲在政治上的转变感到由衷的欣慰和理解，事后的回忆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某些性格特点：

“父亲本来就不满意温和派的哲学，他发生了内心斗争。他非绝对看清了没有其他的路可走的时候，总不肯改变立场。每前进一步，对于他总是一种苦闷的内心斗争。经过这样内心斗争，他向前跨进了一步，就不会走回头路。他并不是凭一时的热情，而是由于理智上的认识，才采取了前进的步骤。因此一旦采取了前进的步骤后，他的自尊心就阻止他回头看了。”

尼赫鲁正式结束了他的律师行道，决定腾出全部时间投入政治。他在《自传》中解释了放弃这一诱人职业的原因：“我干这种职业，无非因为没有其他的事可干。然而我却日益觉得要把社会工作，尤其是那种引起我的积极性的社会工作跟律师业调和起来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时间和精力问题。”即使如此，尼赫鲁在经济方面也并不窘迫，况且他这时的生活观也决不允许他挥霍浪费，全家人都住在私宅中，生计保障完全没有困难。

1919年3月，英国政府批准了“罗拉特法”，其中规定殖民当局拘捕和镇压印度人的权力不受限制，逮捕和审讯都可不依法定手续进行。甘地事先曾呼吁英国不要通过该法，但英方置若罔闻。甘地不得已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号召举行总罢业抵制新法的实施，强调行动主要包括请愿和绝食。同一月的30日被定为“全国行动日”，但国大党在最后关头推迟了罢业，重定4月6日为行动日。然而在德里、阿拉哈巴德、拉合尔、木尔坦等一些主要城市及许多小城镇，人民却不想再等待下去，他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罢业，接着又组织示威集会。几天之内，愈演愈烈的总罢业使印度的主要城市陷于瘫痪，旁遮普发生了大规模暴力冲突，当局动用了军队，宣布实施军事戒严，并在街上向示威者开枪，大肆逮捕集会参加者，整座城市变成为一座庞大的监狱。国内其他地区也都在流传英国人如何羞辱和拷打旁遮普的民族主义者的消

息。

英国政府感到不得不组成一个正式委员会来调查此事。委员会由 5 名英国人和 3 名印度人组成，人选全由伦敦方面提出。这对民族情绪高涨的印度来说无异于往伤口上抹盐。国大党提出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他们的代表，有权听取全体证人的证词，保证按法律办事，一旦要求被拒绝，印度就将抵制委员会。国大党的要求果然遭到拒绝，于是号召人民抵制英方的调查。国大党成立了自己的专门调查小组，负责了解事件真相和救济受害者。

国大党的调查组包括甘地、莫蒂拉尔、达斯和另两位来自孟买的律师。达斯是加尔各答的名律师，年轻的尼赫鲁就分配在他手下，协助调查最严重的阿姆利则惨案。他们早早地到达旁遮普的阿姆利则城，在当地国大党支持者的陪同下遍访全城，人们向他们讲述了罢业示威的情况：罢工工人朝着邮局、银行、火车站和商店进发，突然间街头出现许多标语，号召人民反对“罗拉特法”，鼓动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人“团结起来，扫除欧洲的黄毛猴”，城市在上午 10 点钟曾控制在人民手里，但全副武装的英国军队赶到那里，攻占城市，血腥镇压起义，以后几天发生了大屠杀。人们向尼赫鲁等人讲述他们受到的侮辱和伤害。尼赫鲁在记录过程中深受震动，多次忍不住落下眼泪。事后他写下自己的观点：“当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生动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多么残酷无道，它已经腐蚀了英国上层阶级的灵魂。”他与其他成员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很有成绩。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大屠杀期间有近四百人丧生，1200 人受伤，而国大党的调查却证明这两项数字都须再翻三倍。印度和世界为此震惊了。

惨案调查活动对尼赫鲁触动极深，不仅对他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心理上的折磨足以在将来许多年中深化他对殖民主义和暴力的认识。他在《自传》中还记述了调查期间从阿姆利则赶往德里时在夜行车上发生的一幕：

“我走进的车厢差不多全挤满了人。除一个上铺外，所有的铺位都躺着人。我就爬上那空着的上铺。第二天早晨，我发现同车厢的旅客全是军官，他们大声谈天，我禁不住偷听。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洋洋得意地用粗暴的声音大发议论，不久我发现他就是屠杀事件的指挥官，他讲述他在阿姆利则的经历，他指出他怎样把全城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我听了他的谈话，看到他那凶残的神情，不由得大吃一惊。”

制造惨案的屠夫与未来的印度总理在同一车厢内旅行，这也许是富有戏剧性的不幸事件。尼赫鲁的脾气不如他父亲那么火爆，他当时必须以最大的克制力保持沉默，他也深深感到被迫缄口不语的耻辱，难熬的痛苦在折磨着他，只有受异族压迫的民族的国民才能深切体会其中的辛酸。

1920 年是鼓舞人心的一年，国大党在甘地的倡议和领导下开展了不合作运动。不合作运动也称公民不服从运动，它要求印度人在各个领域内拒绝与英国统治者合作，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政府雇员辞职，全体市民拒买英国商品。不合作运动的方式却强调非暴力。运动实际上是甘地以前在南非领导的民权斗争在印度的翻版，但规模和影响远非过去所能相比。莫蒂拉尔现在也脱下他早已穿惯的洋装，与其他律师一道拒绝与法庭打交道，而是积极替自治政府作宣传。这场运动是甘地和国大党对人民的愤怒情绪的

及时响应，因为旁遮普的流血惨案引起了舆论的明显转变，民众的义愤在到处燃烧。但是甘地要求运动严格恪守非暴力的原则，他决心要在主张暴力斗争者与主张渐进改革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不册派别找出共同的结合部。甘地赞成马上动员人民走上街头，但他坚持必须采取非暴力的手段，主要要达到示威者自己主动走进监狱的目的。他对温和派说：这场运动需要施加一种实质性压力，要争取最终实现自治政府。国大党内有些重要人物因不同意他的战略而脱离出去。

这个时期被认作是印度政治生活中甘地时代的开始。许许多多印度人，尤其是青年人和普通百姓迅速聚集到他的身边，尼赫鲁也与甘地有了直接接触，某种意义上说成了他们之间个人友谊的开始。甘地闪光的个性魅力是不容怀疑的。尼赫鲁后来这样描述他对甘地的初始印象：

“甘地用他最有威信的调子讲话，讲得很好。他很谦虚，可是很明确、坚定。他说话柔和动听，可又十分坚决、诚恳。他的两眼温和而深沉，流露出一种坚强的精力和决心。甘地不喜欢笼笼统统的大目标，他喜欢把问题提得具体、明确。他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人物，他有时所讲的话几乎是一般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跟他很熟悉，认识他是一个伟大的、奇特的人物，一位杰出的领袖。我们相信他，至少暂时让他完全自由行事。甘地在处理问题时，从来不重视从理智方面去考虑问题，而是强调品格和诚心。他培养了印度人的品格和骨气，而且在这方面获得惊人的成功。”

尼赫鲁以少有的兴趣和热情投身甘地领导的运动，他希望到全国各地去走走看看，亲自了解运动的民众基础，他决定从自己的家乡联合省做起。他在众多的群众集会上讲演，与农民工人们见面，热情鼓励学生，劝说公职人员辞职。他差不多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于政治活动，“我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放在运动上，其他许多人也像我一样。我抛弃了其他的社会关系，疏远了老朋友，书也很少看。报纸呢，也只有遇到与手头的工作有关的时候才翻一下，我本来经常阅读当时出版的书籍，注意国际时事的发展，现在可忙不过来了。尽管我的家庭观念很强，但我几乎忘掉了我的家庭，忘掉了我的妻子和女儿。”

殖民当局为了全力搞垮国大党的运动，邀请当时的英国威尔士亲王爱德华访问印度，满以为世界将看到忠顺的印度臣民会欢迎大英帝国亲王殿下到来，从而证明不听话的国大党只是一小撮人。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1921年11月开会，尼赫鲁坚决主张抵制欢迎王室成员来访的一切活动，他的激烈观点获得普遍赞同。当爱德华年底抵达孟买时，那里便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发生了街头冲突。相比之下，加尔各答和阿拉哈巴德显得温和些，但也变成冷冷清清的死城，绝大多数印度人呆在家中闭门不出。这位未来的温莎公爵极为狼狈，大光其火，总督下不了台，发誓要给示威者一点厉害。当亲王还由土邦王公陪伴着在迈索尔密林中射猎老虎之时，大规模逮捕行动已在各主要城市开始了。各省国大党的领导人和重要工作者纷纷被捕，其中相当多人是自愿去坐牢的，年底的某天，尼赫鲁父子同时被捕入狱，他俩都拒绝与法庭合作，否认自己有罪和法庭有权审讯他们。这对莫蒂拉尔来说简直是一件奇异的经历，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担任出庭律师已近30年，现在他却

要与法庭作对。他们两人被判 6 个月监禁，关入勒克瑙监狱。但政府没有逮捕甘地，他们知道那样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混乱。甘地仍在外面的既定策略领导不合作运动。

尼赫鲁进监狱不久，听说外面的形势起了变化，甘地已取消和平抵抗运动，原因是某地发生了一起与运动主旨背离的暴力事件。乔里乔拉是北印度的一个小镇，在当地农民的示威活动中，警察用武器向示威者开火，激起公愤，忿怒的群众将警察赶回警所，在屋顶点了一把火，结果困在里边的警察全部烧死。指挥这次行动的 3 名国大党志愿人员事后遭到逮捕，被法庭判处绞刑。在暴力事件之后，甘地单方面下令停止运动，苦口婆心地劝说国大党机构迅速照办。许多国大党人对运动戛然而止感到愤怒和失望。尼赫鲁虽然崇拜甘地，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甘地的思路和举止：

“我们日益增长的希望幻灭了，这种心理反响是意料中的事。停止运动的理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更使我们苦恼……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吗？如果说这是个别暴力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哲学和技术一定有缺点。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保证不发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必须使 3 亿多印度人受了关于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训练后才能前进吗？”

但在当时情况下，甘地的确比尼赫鲁更能洞察问题的要害所在，他极为担心运动失去控制，超出预先制订的非暴力和民族主义的轨道，变成面目全非的怪物。甘地清楚：如果农民运动成为主流，工人们就会开始为本阶级的需要而行动，那就会大大削弱运动的民族主义特征，因此来个紧急刹车比放任其失去控制更有好处。也正是在那起暴力事件后，农民的自发性问题开始搅得甘地坐卧不安，他关注的并不是农民怎样参加斗争，而是如何有效地实行社会自律。在事件之前不久的一次群众集会上，甘地还向农民提出“四禁律”：不赌博、不酗酒、不吸毒、不嫖妓，此外他们对他们别无要求。

为了使国大党和人民对他的独特策略心悦诚服，甘地在 1920 年写了一篇以“武力政策”为题的文章，其中不厌其详、深入浅出地阐述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我并不是因为印度衰弱才号召印度实行非暴力主义，而正是因为认识了印度的力量我才号召印度这样做。我要印度认识它自己有一个不会灭亡的灵魂，尽管在物质方面有弱点，却能够取得胜利，抵抗整个世界的物质综合力量。”文章显然写得非常及时，得到强烈的反响。

尼赫鲁为文章中雄辩的甘地式逻辑和火一般的言辞所折服，在《自传》中大段引用该文，表明他在思想上对甘地的信服压倒了对其具体策略的疑虑，内心深处的矛盾并不能减弱他对甘地人格力量的信任，甚至认为应无条件地跟着甘地走：“他的话朴实、简明；他的声音和姿态冷静、明确、不动感情。然而这冷冰冰的外表后面却有火一般的热情。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开动了我们的脑筋。甘地所指出的道路是辛苦困难的，但那是一条勇敢的道路，可以达到自由的目标。”尼赫鲁对某些不理解的作法并不是没有问号，但“这是非暴力方法本身的过失还是甘地对这种方法的解释有毛病呢？总之，甘地是非暴力方法的创造者和发起人，关于这种方法的解释，谁比他更高明呢？如果没有甘地，还会有我们的运动吗？”

尼赫鲁于1922年3月出狱，他的父亲也在几个月后开释。但尼赫鲁不久又再度被捕，判了一年半的监禁，罪名是“煽动暴乱”。他将法庭上的被告席变成了谴责统治者的讲坛：“威吓和恐怖行为成了政府的主要工具，他们设法用这些方式控制人民，镇压群众的不满。难道他们还指望能慢慢向人民灌输对异族统治者的感情，或是将人民变作其帝国主义统治的效忠工具吗？感情和忠诚需要发自内心，它们不可能从市场上买到，更不可能在刺刀威逼下强取。”

尼赫鲁的健康状况在狱中慢慢变坏，他受到胸闷和失眠的困扰、不得已督促自己戒了烟，坚持每日练习瑜伽和健身，包括倒立半小时，他后来常夸耀这是铁窗生活练出来的绝招。他也把自己变成了个素食主义者。这一类自我疗法有助于改善健康。一旦他感到轻松下来，又重新恢复了大量阅读的嗜好。白天他研究历史，卡莱尔、屈威廉、威尔斯、勃朗特、鲁斯金、罗曼·罗兰的著作几乎占了他的全部时间；在秋风萧瑟的夜晚，他全神贯注地沉浸在文学作品之中，读泰戈尔的诗歌和小说，读莎士比亚和肖伯纳的戏剧，读雨果、阿伦·坡的小说以及菲兹杰拉德翻译的古波斯诗人奥马尔·卡雅姆的韵文。不久他又将兴趣转向浪漫主义诗人，读拜伦、济慈、丁尼生和雪莱的诗歌，其中不少诗篇已是重读。他特别偏爱雪莱，时常大段背诵和引用他的诗句，这位鞭挞专制、讴歌自由的英国诗人的作品与他终身相伴。

他在狱中度过8个月，1923年1月重新获释。释放他的原因显而易见，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再将他关在牢中已没有什么意义，尼赫鲁在这个重要的时期一直与政治隔绝，出狱后只能向莫蒂拉尔打听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直到精疲力尽才坐下来思考严峻的现实。他相信运动已经寿终正寝，也开始懂得决定群众运动兴衰起伏的严酷规律。当高潮时期，人民时刻准备实现神话般的奇迹，他们能迅速掌握新事物，接受新观念，甚至能在政治上超越他们看来过于谨小慎微、因循守旧的领导者，一旦运动没有成功而转入低潮，绝大部分人就得倚靠政治性组织，如果像国大党那样的政党不能及时将大家团结起来，人民的斗志就会涣散，感到无依无靠，只得重新回到冷淡麻木的状态中去。

国大党这时的状况也不尽人意。不合作运动的失败使温和派重占了上风，国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大减少了，甘地的意见受到抵制，“理想没有了，代替理想的只是争权夺利的把戏，各派互相竞争以求控制国大党，他们所用的方法正是那种使敏感的人提起政治就摇头的方法。”

尼赫鲁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受运动低潮的左右，他对国大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深感厌恶，认为加强对人民的政治教育、密切与大众的联系是党的当务之急。他虽然希望甘地能考虑爱尔兰新芬党式的暴力抵抗方式，但又觉得“不管别人对这件事怎样想法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最后还得听从甘地的意见。甘地是这个运动的创始人，因此人们认为在细节方面必须让甘地自由处理。”

不久，尼赫鲁在那布哈的贾托小城又遭逮捕。英国人为了维护自身在各土邦的地位，严禁国大党在土邦地区进行政治活动。这次他被锁上手铐，送往以条件恶劣著称的当地监狱。“我们3个人在那布哈监狱里被关在一个最脏、最不卫生的牢房里，牢房狭小而潮湿，天花板很低，我们伸手可及。晚上睡在地板上，我常常惊醒，发现老鼠从我们脸上跑过。”经提审后他又被判两年半的监禁，不过地方当局最后撤销了对他和其他人的判决，将他们逐出该邦地界，他回家后完全病倒了，经家庭医生诊断是得了伤寒病，它肯定

是在监牢中感染上的。他病得很重，甚至无法出席该省国大党的大会，但他的书面发言还是在会议代表手中广泛传阅。他在这篇发言中声明：国大党唯一有意义的目标是使印度实现完全彻底的独立。

尼赫鲁比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斗争必定迟早卷土重来，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况且，除非坚持不懈地共同施加压力，否则殖民主义绝不会主动让步。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有自由，尼赫鲁对此坚信不移。但他尚不敢肯定的是，假如甘地还会像几年前那样一遇有人超离正轨就命令停止运动，那他会作出什么反应，那时结果又会如何。

1924年初，尼赫鲁随同家人来到孟买近郊海边一处风光绮丽的休假地茹湖，可他去那里并不是为了休憩，而是要与甘地讨论一些问题。甘地在运动失败后被抓，判了6年徒刑，后来因体弱病重，当局不得不将他保外就医。这时他正在茹湖海滨疗养。就加深个人友情而论，他俩的晤谈非常令人满意，不过就政治上的效果看，尼赫鲁却有点失望：甘地并没有清除萦绕在他心头的疑云，“甘地像平常那样不肯考虑将来，制定出长期纲领。他要我们继续耐心地替人民做事情，为实现国大党建设性的社会改革纲领而努力，等待时机进行积极活动。”

卡麦拉在1925年底生下一个早产儿，小英迪拉一直盼着有个弟弟，但不幸的是婴儿刚出世两天便死了。卡麦拉本人也染上肺结核，医生建议她去国外旅行治疗，莫蒂拉尔和贾瓦哈拉尔也相信去国外疗养有利于她恢复健康。1926年3月，尼赫鲁夫妇与他们9岁的女儿英迪拉从孟买启程取海道前往欧洲。

三、面对圣雄

尼赫鲁即将面临他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十年，他在这十年中的决定和行动不久将来的印度政治定下基调，也奠定了他在国大党和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他也面对极为痛苦的选择，必须重新对自己的政治战略进行全盘思考，他开始了一场既尊奉甘地而又暗暗与之较劲，从而赢得国大党灵魂的艰苦努力，这场师生和朋友之间的较量结果实质性地影响了印度次大陆的前途。

这是他 13 年之后重返欧洲。13 年不算是一段太长的时间，但世界和印度都在迅速地变化，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悉心研究和参加国内自由斗争的实践，他早已不再是剑桥三一学院中的那位文静腼腆、不善社交的住读生了，他对欧洲的早年记忆已经淡忘，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职业政治家。

客轮先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泊岸，尼赫鲁一家下船后直接取道去瑞士的日内瓦，他们在距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租下一套便宜的公寓、安顿下来准备长住。卡麦拉很快开始接受她的长期治疗，尼赫鲁早已习惯于某种政治活动的风格和节奏，讨厌无所事事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悠闲自在对他犹如一种消受不起的沉沦。虽已是早春时节，但厚厚的积雪还未消融，他学会了冰上运动，特别对滑雪有浓厚兴趣。但他仍感到坐卧不安。恰巧这一年的初夏他的小妹克里希娜也从印度来到日内瓦，帮忙照顾卡麦拉。尼赫鲁便有机会到附近其他地方作短期旅行。

冬天临近了，卡麦拉的病情越来越糟，医生建议把她送往阿尔卑斯山麓的一个疗养胜地。但家庭开支成了问题，尼赫鲁难以开口向别人借钱，迫不得已变卖掉卡麦拉的珠宝首饰。莫蒂拉尔从印度得知儿子的窘迫处境，给他们汇来一些经费。尼赫鲁夫妇和克里希娜一同来到山区疗养地，英迪拉被送入一所瑞士学校读书。尼赫鲁的心境也显出了少有的平静：“我们住在山顶上，冬天到处是雪，我觉得跟印度和欧洲完全隔绝。印度和印度所发生的事情似乎特别隔得远。我是一个站在很远地方的旁观者，我阅读、观察、注意事变的发展，注视新欧洲的政治、经济以及自由得多的人类关系，并设法了解这些问题。”

不久卡麦拉的健康有了好转，尼赫鲁抽空出发去德国柏林访见印度的政治流亡者，在那里他见到不少共产党人。其中一位名叫乔托的青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俩坐在一起通宵达旦地讨论德国、苏联和中国的局势，然后又转回印度的话题上。乔托毕业于牛津大学，信仰马克思主义，长年在海外流亡而且生活贫困，但他性格乐观，对故国印度怀有深厚感情。尼赫鲁对他很有好感，在他印象中，“没有一个流亡者能够逃避一般流亡者的毛病，这就是马志尼所说的心灵的创伤。”乔托很少谈到甘地，他长篇大论地向尼赫鲁论证印度的唯一出路是革命，后者听得十分耐心。乔托对他说，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使印度达到现代化，道德规劝不可能摧毁种姓制度，需要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尼赫鲁听得连连点头，觉得这些言论很能激发人的思想，与国大党内那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形成鲜明的对比。

尼赫鲁从乔托那里得知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一次国际性大会，会上将组建世界反帝大同盟。乔托极力动员他出席这次会议，但尼赫鲁是一位纪律性很强的国大党员，决定参加会议之前事先征得党内领导人的同意。在乔托的帮助下，一封邀请信发往印度，国大党当时正在高哈蒂召开年会，会上一致赞

同派出本党的代表团参加布鲁塞尔大会。尼赫鲁经提名成为代表，他接到一张 500 英镑的支票作为盘缠。他于 1927 年 2 月初抵达布鲁塞尔，积极参加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他也为当地急进的报纸投稿，起草了一篇关于印度问题的决议，结尾的话是：“印度国大党将继续相信，印度民族运动的行动纲领的基础是使印度的农民、工人获得彻底的解放，否则决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这次世界进步力量广泛参加的大会于 2 月中旬隆重召开。十天的会议议程安排得紧紧凑凑，尼赫鲁累得筋疲力尽，他写信对一位朋友说：伙食非常糟糕，没有一点时间休息。尽管如此，会议在某些方面还是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亲自观察到欧洲与殖民地国家民族运动在团结奋斗上存在的弱点，有助于他认识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问题，也使他对西方劳工内部的冲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尼赫鲁在会上见到不少来自阿拉伯地区、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经人引见，他见了一位名叫阮爱国的越南青年，这位瘦弱斯文的青年避免公开露面，显得紧张不安，总觉得有情报机关的特务在盯他的梢。不过尼赫鲁对他印象根深。富有戏剧性的是他俩 1954 年又在德里重逢，这时一位是享有世界盛誉的印度总理，另一位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广受尊重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不过后者早已改了另一个名字——胡志明。

正在进行大革命的中国也派出代表出席布鲁塞尔大会，受到与会其他国家的关注。尼赫鲁在会上可能没与中国代表建立个人友谊，但他后来以热情的赞赏和客观的分析谈到中国代表开会的情况，也反映出他对当时中国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最活跃的是中国国民党左派人物。当时国民党正在全国占上风，旧的封建主义分子完全垮了，甚至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放弃过去那种作威作福和盛气凌人的态度。中国的统一和自由，似乎很快就会实现，而不能够再拖延下去。国民党由于胜利而洋洋得意，但是国民党认识自己前面的困难，想利用国际宣传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也许是国民党的左派，跟国外的共产党人和近乎共产党的人合作，强调这种宣传，借此提高中国在海外的地位，并加强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那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分裂成一些互相竞争、敌意很深的小派别，在表面上还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样子。”

尼赫鲁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令国大党领导层困惑不安，他们感到他在接受共产国际的诱导方面走得太远了。莫蒂拉尔也有类似担忧。其实这至少也是部分事实，尼赫鲁后来思想中逐渐定形的反帝反殖、倾向社会主义的立场都可以从这次会上找到某些根源。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同情第三国际领导的劳工运动。我自然而然地怀着善意，转向共产主义，因为尽管共产主义有缺点，至少它不骗人，它不是帝国主义。这不是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对于共产主义的优点知道得不多，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而这些认识以及在俄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了极大的注意。”

莫蒂拉尔来到欧洲，希望证实国大党对尼赫鲁的指责属无中生有，至少不完全是事实。父子俩在威尼斯见面，尼赫鲁并不掩饰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接近，但向父亲保证绝不会变成一位莫斯科的代言人。莫蒂拉尔相信了，儿子乘机劝父亲接受苏联的邀请，参加 192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

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尼赫鲁父子一同从柏林乘火车来到莫斯科，同行的还有卡麦拉和克里希娜。可他们错过了盛大的庆典，尽管只有三、四天时间逗留，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强烈地吸引了他们。尼赫鲁称这次短暂的游历是“走马观花，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使我们充分认识新俄国，但是它给我们今后阅读书报提供了背景知识。苏联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缺点，却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而且苏联似乎给全世界带来了希望。”他俩的头脑中装满了关于苏联的新鲜印象，匆匆踏上回返祖国的路程。

欧洲之行让尼赫鲁获益匪浅，除了日内瓦的休养和参加布鲁塞尔大会外，他还去了欧洲不少国家，亲自目睹欧洲的社会变动和政治发展的现状，见到许多旅居海外的印度人，广泛结交朋友，其中不少与他保持着终生的联系。他感到自己仿佛恢复了生机，过去那些令他烦恼的内心矛盾和低落情绪暂时消除了。“我的眼界比以前更广阔了，我看到，民族主义似乎过于狭窄，不能解决问题。政治自由和独立当然十分需要，不过它们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步骤而已。没有社会自由，社会和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机构，无论国家和个人都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我自己感觉到对世界上的事情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了，对于当前的世界，不管它怎样变化多端，比以前更能掌握。”

他们乘坐的海轮于12月在南印度的马德拉斯靠岸。国大党的一次年会正在这里召开，尼赫鲁径直前往会场，他在会上直接提出一份要求摆脱英国统治、实现彻底独立的提纲。他的提纲获得广泛赞同并被写入正式决议，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主要的争论围绕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西蒙调查团的问题。西蒙调查团由7名英国人组成，他们受英国政府委派来印度调查殖民地的政治体制，就所需进行的改革提出可行建议。尼赫鲁并不奇怪代表团中有英国工党议员，他对工党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早有预感，但最使他气愤的是自诩印度之友的英国工党居然没坚持要求在调查团中安排印度代表。其中一位工党议员克莱门特·艾德礼后来继丘吉尔之后出任英国首相。他曾在东印度公司办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因此被看作是有“印度背景”的人。国大党决定抵制西蒙调查团，而且得到党内温和派的支持和合作。以这一内容为主题的政治活动在几天内迅速开展起来了，调查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成千上万抗议者“西蒙滚回去”的愤怒吼声，连完全不懂英语的百姓都学会了这几个词。人民的抗议活动搅得调查团寝食不安，殖民当局对民众的反应大为震怒，决定动用武力。

当调查团访问勒克瑞时，尼赫鲁正在那里领导一次大规模群众示威，不过他们没遇上调查团，却遭遇了一队全副武装的骑警。骑警冲入游行队伍，警棍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身上，尼赫鲁的头上也重重挨了两下，打得他头昏眼花，倒在地上血流不止，几乎失去了知觉。他当时愤慨到了极点，后来却平静地写道：“我很容易把我面前的警官拉下马来，我自己骑上去。但是长期训练和纪律制止了我，我的手动也不动，只有在被打时用手保护我自己的脸。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方面任何进攻的表示，就会引起惨剧，使我们许多人遭受枪杀。”尼赫鲁将挨打的经历写得很详细，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对他的震动很大，它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也使他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事实：“在这次事件中，甚至当我挨打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白，我自觉地研究我的思想感情。”

尼赫鲁遭警棍猛击的同一天，拉合尔也发生了流血事件。一名英国警察殴打领头示威的老资格民族主义活动家拉吉巴特·拉伊，他倒在街头，很快

便因伤势过重死去。拉伊是深受人民爱戴的人物，他的去世震动了全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几天后，一位叫巴格特·辛格的活跃分子与朋友将两枚自制炸弹悄悄放入制宪会议大厅，但炸弹没有引起伤亡。他声称此举的目的是“唤醒印度，为死去的拉伊报仇。”他原以为炸弹爆炸会点燃全印反英总起义的导火索，然而估计失误，预期中的大起义并未发生。他被送进法庭判了死刑。尼赫鲁曾去狱中探视他。“巴格特·辛格有一张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面孔，非常冷静、沉着，似乎没有一点儿愤怒的样子。”辛格利用在狱中的时间读书，写了一本以“为无神论辩护”为题的小册子。他研究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写信对朋友说，他终于明白了恐怖主义是错误的，印度需要的是更细致更复杂的斗争。尽管如此，但他拒绝讲出这些话，也不乞求殖民政府的宽恕，只是希望自己毫无愧疚地去死。尼赫鲁看来他实际做到了这点，一夜之间成了民族英雄，人们编出一首又一首赞美他的歌曲。在国大党内，学生和农民要求发起一场运动挽救辛格的生命，但甘地对此无动于衷。全国各地的人们在问：甘地为何这时连举手之劳都不愿付出，为何这位非暴力的热心倡导者、这位能原谅一切有罪之人的圣人不去全力保护一个人免受国家暴力的摧残？

其实所有这些问题早有答案。尼赫鲁是最先理解甘地的动机的人：这位圣人是一位无情的政治家，他对如何实现独立有一种认定不变的观点，决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成为它的障碍。甘地从一开始就认为，通过谈判使英国人退出印度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也就是以和平形式向独立过渡。在这一问题上甘地完全恪守教条。

尼赫鲁在上次赴欧之前曾因疑虑和看不清前途而忧心忡忡，但通过在国外期间与朋友们的讨论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对印度正日益严重的教派分裂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认识，也开始思考一种新的战略，他希望与那些无条件追随甘地的人有所不同。他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避免穆斯林将正在进行的民族运动看成是一场单纯的印度教运动？在柏林，乔托对甘地热心利用印度教神话鼓励大众的做法极尽讽刺挖苦，他说，甘地是在迎合长期遗留下来的落后心理，就算目的和动机正确，怎么能让人民团结在宗教象征的周围呢？尼赫鲁是一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接受这一类观点并无困难。他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大党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治组织，形式上介于运动与政党之间，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造是不可能成气候的。

那么对于甘地本人呢？尼赫鲁无疑思考得最多，因为他对印度的影响力最大。尼赫鲁总设想与甘地进行辩论。在他眼里，甘地是“一个伟大的农民，以农民的眼光去观察事物，以农民的蒙昧去对待人生的某些方面。”而印度毕竟是农民的印度，因此甘地对他的印度了如指掌，感应着它最微弱的脉动，能够准确地、几乎是本能地判断形势，并且擅长在最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他也许在任何其他国家只会不合潮流，但印度却显然能理解，至少崇敬这样一位具有玄妙晦奥的宗教气质，大谈罪孽、拯救、容忍、非暴力的人。”这一评价其实只能说部分正确。与其说甘地是一位农民，不如说他是一位深具智慧的政治家。他是一位极其聪颖和精明的政治领袖，对许多问题的打算和处理在尼赫鲁之上，但一旦问题涉及到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他就显得一筹莫展。尼赫鲁问他：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是否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独立自由？能从他那里得到的唯一答案只是些讳莫如深的

含糊表述。

面对印度人对西蒙调查团的强烈抵制，英国开始相信摆门面的虚假措施已不再有效，于是考虑提出一些更实在具体的改革方案。殖民政府的总督请甘地前去协商。经过谈判，伦敦方面决定召开一次圆桌会议。1931年，印度代表前往英国参加圆桌会议。然而代表们的代表性却引起很大的争议，与会者中有不少王公贵族的代表，他们衣着华丽，珠光宝气；有效忠大英帝国的骑士，那些为殖民当局效犬马之劳、现在却要急于分一杯羹的印度人。代表国大党出席会议的只有甘地，他的山羊胡和缠腰布成了伦敦社交界的无聊话题和政治攻击的素材，丘吉尔甚至讥讽他是“半裸的苦行僧”。但不管那些低级趣味的笑话如何难听，支配整个会议的人却是甘地，其余的人不过是

可有可无的陪衬而已。伦敦圆桌会议标志着英国与印度国大党第一次真正坐下来讨论印度的前途。印度固然是一个文化、宗教和政治上杂色纷呈的次大陆，但甘地在30年代无可争辩地是印度的基本象征。

莫汗达斯·甘地1869年出生于印度古吉拉特的一个商人家庭，家族属于印度教中等种姓，“甘地”的字面含义指“杂货商”，表明该家族许多代以来就一直经商。但甘地的祖父却官运亨通，当了印度西部的弹丸小邦浦尔班德尔的王公手下的首相。首相的职务是世袭的，于是甘地的父亲继承了这一职位，后来又传给甘地的长兄。1888年，甘地到英国学习法律，他那时对一切都玩世不恭，行为方式完全像一位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典型的英国人，纵情享乐，挥霍无度。一位他的熟人曾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见到他，形容他是“一个花花公子、纵情声色者和纨绔子弟，一个对穿着比对学习的兴趣更大的学生”。1891年甘地回到印度，考律师和教师都不能及格，他的家庭一度对他失去信心。这时南非的一家商行正好需要一名年轻的法律助理，他这才得到一份工作。

1893年甘地去了南非，在那里度过他20年漫长光阴。他重新思考自己以前的信条和那些深信不疑的事，迷上托尔斯泰并坚持与之通信，从与后者的书信交往中学得了将来用于对付强大敌人的政治武器——非暴力。他也组织发起“坚持真理”运动，反对南非当局强加给印度侨民的非人道限制，在这一领域他的成功成为他以后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声誉鹊起、叱咤风云的重要资本。甘地起初的行动表明他相信大英帝国的利益至上，他只反对帝国内的所有臣民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甘地头脑清醒，态度诚挚，他解释自己世界观的转变时从不企图隐瞒过去，这与他的某些弟子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坦率承认自己以前总以为是大英帝国的臣民，曾多次不遗余力为帝国政府效劳，直到后来看透了殖民主义的本质，他才真正觉悟起来。

在南非，甘地也养成了一种对欧洲文明的反感。在他眼中，一切罪恶的渊藪与其说是西方殖民主义，不如说是工业化本身。他哀叹西方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宗教祈祷的时间越来越少是人类的堕落，反复强调他的敌意并不是针对英国，而是针对现代文明。他极端地主张推翻工业化社会的“整个机制”，说：“假如我们印度人在现代方式的基础上取代英国人的统治，除了能保住一些财富不流往英国外，印度的情况绝不会更好。况且那样印度人也只能是拾取欧美的牙慧而已。”

甘地1915年从南非归来，时年46岁。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旅行交往，悉心观察印度，随后孜孜不倦地向人民昭示一种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宁愿将印度教的史前社会加以理想化，宣称大同社会曾在印度历

史上存在。其实就印度历史本身而言，要将事实与神话划分清楚是不可能的。尼赫鲁认为甘地的乌托邦是非进步的历史观，对他仇视都市和工业文明的怪癖更是不屑一顾。他仿佛觉得甘地表达出来的不仅是种人生态度，而也强烈支配着后者的政治策略。甘地返印之初，殖民当局对他的态度也很矛盾，他们一会儿捧他是著名的南非领袖，一位真诚的印度圣人，一会儿又骂他是非常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其实甘地他不可能变成一位布尔什维克。但他是一节连结新印度和旧印度的必不可少的链环；是一位能保证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的旗手，再也不可能找出另一个像他那样的角色了。尼赫鲁尽管批评甘地的政治策略，但却赞叹他以其特殊形式对印度的政治发展的影响：

“个性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东西，是一种能够控制人们灵魂的奇异力量，而甘地却有这种丰富的力量，对于所有前来接近他的人，他时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他吸引人们，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理智上的信服使人们和他接近，并使他们和他接合在一起。他们不同意他的人生观，甚至他的许多理想。人们往往是不了解他的，但是他所建议采取的行动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并在理智上能为人民了解和领会。一种带着道义光芒的勇敢而有效的行动，不论对于人们的理智和感情，都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他一步步地使我们信服行动的正义性。我们追随着他，虽然，我们并不接受他的哲学。”

甘地用农村来对付大城市，从而使他成了印度民众政治中的主要权力经纪人。正因为他拥有无限强大的政治能量，他总喜欢突发奇想并热衷于及时行动。他嘲弄对手也嘲笑自己，甚至他的嘲弄也成为人们对他深怀好感的一个原因。著名诗人和国大党领导人索拉吉尼·奈杜不顾及甘地的圣雄形象，评论他既非耶稣也非佛陀，而是一只米老鼠。她就这样半友爱、半嘲弄地称呼他，甘地也索性答应得干脆。但一次这位诗人当着他的面向国大党领导班子抱怨“我们正在劳命伤财地让甘地安守贫困”。甘地听了很不高兴。

在尼赫鲁眼中，甘地的伟大在于他作为政治家和群众领袖所具有的轻车熟路、尽善尽美的技巧。人们总将他描绘成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一个没有黑子的太阳，一位超离政治的污泥浊水之外、一贯正确的领袖。尼赫鲁并不愿简单地信服这些观点，他认为，甘地既充分反映了印度贫苦农民的渴望，同时又抑制、淡化他们的需要。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对乔里乔拉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例子，甘地自信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或缺的调解者，从而决定了他的政治策略必然是曲折迂回的。一旦透过笼罩在他周身的圣光，站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位有忏悔癖好的领袖人物。按尼赫鲁的说法，宗教是甘地的唯一致命弱点，使他成了所有重世俗轻宗教的民族主义者的障碍。诚然，甘地厌恶野蛮的印度教教派主义，也远离其他宗教派别的政治狂热，可说是一位极其宽容的仁爱之士。但他坚持用宗教象征主义去吸引和发动农民阶级，这就给印度寻找一条世俗主义的发展道路增加了更多困难。甘地在一封致国外朋友的信中解释他的信条说：“我的气质不属于政治型，而是属于宗教型。我参与了政治，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每一部分都不能与宗教分离，而政治几乎在每一点上都对印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绝对必要的是将英国人与我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建立在一个完美的基础之上，我将全力以赴、尽我所能来实现这一过程。”

甘地这种出乎意外的坦诚需要进一步说明。他所讲的“完美的基础”包括两件事：一，英国有计划、有秩序地退出印度；二，印度在英国退出后保持经济生活的连续性。因而甘地早就为民族主义运动划定了极限。他赞成将运动放在首要位置，但对运动过程的重视超过了运动的目标。他爱说一句话：殖民政府的问题也同样是殖民地国家的问题，因此决定性的任务是重视解决问题的技巧，不要不到位但也别过头。在这方面，他与尼赫鲁的矛盾和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英国人也经常被甘地变幻莫测的战术搞得昏头转向，但他们深知，一旦决定让印度和平地实现独立，甘地的重要性将不可估量。他们对自身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心中有数，也知道他们不可能永远呆在那里。甘地对英国人并非没有吸引力，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后者知道他并不赞同社会主义，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也没太大的兴趣。但甘地也因此而遇到难题。他知道，印度本土的上层阶级与英国人站在一条线上，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对抗农民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那些封建阶层并不是一帮愚昧无知的人，他们预料到殖民当局会被迫与民族主义者打交道，因而担心自己在最后解决方案中受到冷落，毕竟他们押上了一切赌注来维系殖民统治，自然需要当局保证他们在将来的利益。

甘地抨击地主阶级，但很少公开维护贫困农民的阶级利益。自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止以来，付地显得愈益落伍了。时过境迁，他在20年代初设想的只是对殖民主义者空放几枪，让后者作出让步，但运动却相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他停止了运动，但结果却是一场失败，后来花了6年时间才重使群众恢复了活力。甘地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再出现同样的情形，维持国大党的团结将是头等重要的事，这面他用来集合众人的大旗绝不能倒下。他也知道，一旦运动失控，形势就会将尼赫鲁这样的新一代领袖推到运动的前列，那结局就会与他事先设定的完全不同。因此在这一时期，他需要尼赫鲁支持他自己的政治策略，甚至认为它必不可少。这成了他始终放不下的一桩心事。

尼赫鲁与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两位巨人，他俩在各方面迥然不同。尼赫鲁是一位克什米尔婆罗门的叛逆，唾弃一切宗教的清规戒律，甘地是一位古吉拉特商业家族的不肖子孙，先怀疑一切，玩世不恭，尔后又皈依了正统观念；尼赫鲁是哈罗和剑桥培养出来的杰作，曾长期在英国人的监狱中经受磨难，而甘地很大程度上是印度教社会传统的产儿，只是因在南非的奇特经历才学会了他的政治；甘地认为宗教在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尼赫鲁却将宗教看作是印度必须消灭的大敌，对它的姑息只会将印度引向毁灭。假如英国殖民主义果真像马克思和约翰·穆勒所希望的那样，重塑印度，改造乡村，建立近代交通设施，推广普及教育，那么传统和现代化的对抗本可以大大减弱。但英国人故意不致力于改造落后的乡村，也不愿意推广大众教育，感兴趣的只是造就出一个能勾通统治者与亿万被统治者的中间阶级，这些人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而在趣味、观念和举止上却是英国人。实际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

长期以来，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是最具殖民特征的三个城市，也是印度政治生活最活跃的地区，尽管殖民者强制实施了种族隔离政策，新兴的印度中产阶级仍在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这些人人都像过去的莫蒂拉尔那样持温和派立场，他们相信终有一天能靠稳健的妥协方式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起初他们对甘地的行为大惑不解，面面相觑，为什么他下那么大的功夫

在农村发动农民？为何非要把政治搞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他们甚至连请他来喝上一杯都不可能，更谈不上与他志同道合。他们对甘地完全抱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并喜欢与英国权贵一道恶意取笑他。有人风趣他说，英国人取笑甘地时，笑得越响的保证是这些高等印度人。直到后来他们才发现甘地与尼赫鲁的纲领和政策并不完全一致，当尼赫鲁无所顾忌地提出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造方案时，甘地却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于是他们将尼赫鲁视为更危险的对头，也开始扭扭怩怩地说甘地的好话。然而这批人的数量和影响毕竟日益减弱，新

一代民族主义者正成长起来，他们已在掂量和寻找他们行动中的真正楷模。

尼赫鲁与甘地在观念上的冲突表现在不少方面。甘地认为，印度的西化已够深了，教育也不缺，不应无止境地向这些方面发展。但他忘了，他是通过英语的媒介才第一次读了《薄伽梵歌》和其他印度古代宗教经典。尼赫鲁是大众教育的真正倡导者，他想让每一个印度人都能读懂罗素的书。甘地希望回到古代印度教所宣扬的人间天堂“罗摩的世界”，他对这一信念直言不讳，他向往的是一个没有机器、只有村庄的田园牧歌般的社会。尼赫鲁反诘道：印度难道还能倒退回原始的农业状态吗？他丝毫也无法容忍愚昧，尤其是当愚昧与非理性混在一起的时候，他总会对之大加嘲讽和蔑视。甚至连甘地也不能阻止他的冷嘲热讽，只能尽力安慰尼赫鲁攻击的受害者。一次，尼赫鲁拜访甘地一家。甘地的妻子巴依知道他行将被捕，不无好意地说：“愿神保佑你！”尼赫鲁听后大笑：“神在哪里，巴依？他仿佛永远昏睡不醒！”巴依对他的回答大惊失色。在旁的甘地却显得一本正经，抿着嘴暗自发笑，劝他的妻子别在这件不可能有结果的事上争论。他了解尼赫鲁在这类问题上毫不妥协的固执。

甘地赞扬印度传统村社生活中的自给自足和安贫乐道，谴责工业化是近代社会的万恶之源，他赋予织机和土布极为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喜欢谈论“穷人的上帝”，坚信神必然眷顾穷人。尼赫鲁则对他的这种信念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在歌颂贫困。尼赫鲁提出怀疑：“上帝特别是穷人的上帝，穷人是上帝的骄子。我想这是一般的宗教态度。我不能了解这种态度，在我看来，穷困似乎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应当反对和消灭，而不应加以鼓励。”

尼赫鲁在对工业化的态度问题上无法回避与甘地的争论。他常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赞词：“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甘地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大谈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毁。每逢此时，尼赫鲁便会将甘地的态度归结为“神秘主义”，他们最后总是同意各自保留意见。其实尼赫鲁也不赞同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震动了欧美，劳动人民大量失业，生产萧条，社会动荡。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印度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将是灾难性的。他心目中的进步是让印度脱胎换骨，彻底更新，通过民族的独立和正确的发展计划来实现自身的繁荣富强。

1928年的国大党主席是莫蒂拉尔。第二年，鉴于新的斗争高潮即将到来，各地代表一致推举甘地担任主席。其实不论在位与否，甘地一直是国大党的“太上主席”和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但这一次他坚决不接受提名，而是提议由尼赫鲁接他父亲的班。他的动机是让尼赫鲁充分参加国大党最高领导

层的工作，也可借机制约他本人的活动，防止这位少壮派政治家的立场过分左倾。尼赫鲁很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职位。虽然他已当了6年的全印度大党委员会总书记，由于只负责日常具体工作，他与国大党最高层之间始终存在隔阂，总觉得让他担任主席只是别人别有用心的一种施舍：

“我以前很少感到过像这次选举时所感受的那种苦恼和被侮辱的心情。这并不是因为我不认为当选主席的光荣，这是一种很大的光荣，假如我是在正常情况下当选，我将大为高兴。可是这次当选，我走的不是大门，甚至不是旁门，而是暗门，使大家莫名其妙地选举了我。他们硬着头皮，像不得不吃药一样，接受了我。我的自尊心受伤了，我几乎想拒不接受。幸好我压制了自己没有出丑，我带着沉重的心情静悄悄地走开了。”

但无论如何，担任国大党的主席是一件荣耀的大事。父亲对儿子能接自己的主席职务异常兴奋，毕竟这种父子政治家的现象在国大党内是不多见的。何况尼赫鲁当时才40岁。尼赫鲁尽管对出任主席显得有些勉强，但他打定主意，一待时机成熟，他就会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就职演讲。他等待的时机即将出现，它就是计划在年底召开的国大党拉合尔年会。结果他的讲话唤起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激情，使英国当局陷入一片惶恐之中。

拉合尔年会于1929年12月底召开，它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时正值该地一年中气候最好的季节，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尼赫鲁到拉合尔时像英雄般受到群众欢迎。他在会上作了就职发言，他的讲话在国大党有史以来的历届主席中是最激进和最不妥协的一篇。国大党在这次会上理直气壮地宣布，它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印度的彻底独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时就连与会代表都惊慌不安地互相探询：尼赫鲁是否太过头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甘地，“大家都知道真正决定要由甘地来作。”甘地向他们确认了这条国大党奉行的新路线：不再谈改革或自治政府，而是努力奋斗实现彻底独立。除极少数人投票反对外，年会最后通过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案，批准了争取独立所需采用的行动纲领。

甘地虽然认可尼赫鲁在拉合尔年会上的权威发言人地位，但并不赞成他讲话中的某些社会性内容。尼赫鲁在奋力呼吁争取彻底独立的同时，也向代表们讲了一番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必要性。他这个时期特别关注劳工问题和社会主义，不久前刚参加了全印总工会大会并当选为该组织的下届主席，因此他在年会上提出由工人控制工厂和向农民分配土地。他的话平静而坚决：“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决不信任王公贵族，更不信任产生现代工业贵族的任何社会。富人手中所握的对人们生杀予夺的权力比旧时代的王公更甚，他们的方式也比过去那些封建贵族更具掠夺性。”

社会主义在当时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但许多人对它与政治独立之间的联系了解不深。尼赫鲁1927年底刚从欧洲回国时，就注意到社会主义已在印度流行，但人们对它的认识既肤浅又模糊，其中既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观念，也有西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苏联国内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苏联执行的五年计划加强了印度的社会主义倾向。”尼赫鲁承认自己算不上印度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事实上我相当落后，我只是痛苦地、一步一趋地向前进，而同时许多其他人则勇往直前，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一阶段，尼赫鲁几乎每次讲话都把政治独立

和社会自由相提并论，强调政治独立是实现社会自由的必要条件，而社会自由则是独立的基本保证。他尤其重视在知识分子和国大党工作者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甘地一如既往，坚信非暴力的原则四海皆准，万无一失，是改善印度现状的唯一可行办法。尼赫鲁不由对它的“四海皆准”提出质疑：“这种方法的实行和成功需要一种特别有效的氛围，如果外面的情况不适合的话，就不能够试用这种办法。”他在拉合尔年会上对非暴力的解释与甘地的观点明显不同：“国大党既没有开展暴力活动的物质条件，也没有训练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个别的和偶尔的暴力只是出于绝望。但是假如国大党或印度民族在将来任何时候得出只有暴力手段才能使我们摆脱奴役状态的结论，那我们毫无疑问会采用暴力手段。暴力不好，但遭受奴役更要糟糕得多。”

当代表们从刹那间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便对尼赫鲁的讲演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的激情高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929年最后一天的午夜钟声敲过，新的一年迎来了，印度国大党一致赞同为彻底独立而奋斗。多年以后尼赫鲁重访已划归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城时，动情地忆起当年那次意义深远的年会，说：“那年尽管我们还没有获得事实上的独立，但至少我们的心灵从此赢得了自由。”

国大党也通过投票宣布每年1月26日为印度独立日，确定了象征独立的三色旗，号召印度全体人民宣誓起来斗争，直到迎来最后的独立。同时也号召国大党人退出殖民政府的制宪会议和地方立法机构。

拉合尔会议闭幕后，尼赫鲁父子回到故乡阿拉哈巴德，正赶上印度一年一度的正月赛会。地处恒河之滨的阿城是印度著名的圣地，全国各地数十万印度教信徒纷纷赶往这里朝圣。目睹那么多的人在恒河岸边流连忘返，尼赫鲁心中却在问自己：“我不知道他们对于进行和平抵抗与和平直接行动的号召会有什么反应。”联想到刚结束的拉合尔大会的行动纲领，眼前这幅画面足以使他的想像力超越宗教信仰本身：

“几千年来，他们的祖先和他们为了信仰从印度的各个角落到恒河去洗澡，这种信仰力量多么强大！难道他们不能够把这种充沛的力量分一部分去进行政治和经济行动，以求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难道他们心里所注意的只是宗教仪式和传统而不想一想其他的问题？当然，我知道这些其他问题是存在着的，多少年都在酝酿。”他又发出进一步的疑问，对于蕴藏着巨大行动潜力的群众，“思想传播的范围有多大？他们后面有多大的力量？他们有多少能力进行有组织的行动？有多强的持久力？”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想弄清这些问题。

无论尼赫鲁本人对出乎预料地当选国大党主席的看法如何，这的确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在拉合尔年会上的表现即使一部分人增加了对他的不放心，也巩固了人们对他更新国大党的厚望。他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号召力越来越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更是把他看成传奇式的英雄。作为一位有事业感的政治人物，他很难对大众的欢呼和赞誉无动于衷，也很容易在那些发自内心的崇拜或违心的恭维面前飘飘然起来。后来在监狱中，尼赫鲁以他那特有的自省和远离政治漩涡时的冷静剖析了当时的矛盾心态：

“我因群众对我的英雄崇拜而自豪吗？我不高兴这种英雄崇拜，而且想逃避它。但是我已习以为常。真正完全没有人崇拜我时，我又觉得若有所失。这真是一种患得患

失的心理，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不过总的说起来，群众满足了我某些内心的要求。一想到我能够影响群众，推动群众采取行动，我就觉得我有威信，可以左右群众，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取得权力的意志。”

回到“欢乐宫”与家人团聚总能给他带来轻松的感觉，除了政治以外，家人相聚时总有许多愉快有趣的话题。亲朋好友常来这里走动，他们也用尼赫鲁日益看涨的个人声望同他开玩笑，给他取些冠冕堂皇的称呼，如引申“贾瓦哈拉尔”的含义称他“印度的珍宝”，又如“牺牲的象征”；连女儿英迪拉也与他开这类玩笑。不过没有理由责备尼赫鲁对功名的虚荣心，他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人们的赞誉和风风火火的社会活动只能触及他的表面，他的内心却思考着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我真正的斗争是在我的内心里。是思想、欲望与忠诚的斗争，是潜伏的内心跟外面环境的斗争，是内心所追求的东西没有得到满足。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战场，各种势力互相竞争。我想逃避这种苦境，我努力追求和谐与平衡。为了这个目的，我急于采取行动。这就使我稍稍感到安静；外面的斗争减轻了内心斗争的压力。”

四、求索自由

1930年1月26日，是拉合尔会议选定的印度独立日。用尼赫鲁的话说，这天是印度民族的心灵赢得自由的起点。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民众集会，国大党在其中起到积极的领导组织作用。人们向着象征独立的三色旗庄严宣誓：“我们认为享受自由，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并且拥有生产必需品，以便有充分发展的机会，这是印度人民不容侵犯的权利。我们也认为如果政府剥夺了人民的这种权利，压迫人民，那么人民就有权更动这个政府，或者打倒这个政府。在印度的英国政府不仅剥夺了印度人民的这种权利，而且把自己建立在剥削群众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精神方面摧残印度。因此我们认为印度必须跟英国断绝关系，完全独立。”甘地善于观察群众情绪的变化，擅长准确地掌握行动时机。他显然从独立日活动中获得灵感和动力，决定借这股东风迎来不合作运动的新一轮高潮。

3月里晴朗的一天清晨，人们见一位袒臂跣足的老人，在一大帮追随者的簇拥下，从沙巴马蒂出发，步行向西海岸方向行进。消息迅速地传播开了。老人手持柱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步履平稳，神情沉静。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队列，很快便形成了上万人的大军。这位老人就是甘地，他正在亲自拉开新一次不合作抵抗运动的序幕。殖民政府不久前刚颁布了旨在维护英国对食盐的生产、销售实行垄断的盐法，规定对造私盐者课以重税。盐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基本生活，因此甘地决定以抵制盐法作为突破口。“盐”转眼间变成一个具有魔力的词，一个有力量的词。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当时正在阿默达巴德开会，他们大惑不解，“不容易把民族斗争和盐这个普通东西相联系。”但运动的领导人甘地却心中有数。

半月后一天傍晚，甘地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海边的一个小村落丹地扎营。人们忘记了旅程奔波的疲惫，通宵达旦进行祈祷。天刚破晓，甘地便来到海边，涉足海中取水，然后在岸边架锅点火，象征性地从海水中熬出一小撮盐。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旁观看这一充满戏剧色彩的全过程。甘地的行动标志着破坏盐法的开始，人们到处都在抵制去商店买盐，而是用蒸发锅自制食盐，大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是制盐，并且发明出不少奇奇怪怪的制盐方法。

尼赫鲁全家都是甘地抵制盐法运动的参与者，但尼赫鲁坚信仅抵制盐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加快斗争的节奏。英国总督埃尔文下令大逮捕。尼赫鲁几天内就参加了数十次群众集会，对着数十万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向人民宣布：“正在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民族解放斗争，不支持我们便是对自己祖国的背叛。”他年迈的母亲以及他妻子和两个妹妹都参加了阿拉哈巴德的运动，卡麦拉表现出异常出色的组织才能，尼赫鲁对此既惊喜又紧张不安，不过他还来不及与她和其他人多谈便在几天后被捕了。官方以破坏盐法的罪名判他半年监禁，他被押往内尼监狱。运动这时真正具有了全国性规模。在与阿富汗接壤的白沙瓦，警察用机关枪向示威者扫射；孟买举行了大罢工和大示威；在加尔各答，群众与袭击“非法”食盐加工厂的警察展开搏斗；在广阔的乡村，处处涌动着反抗英国统治的愤怒情绪。

埃尔文总督是一位笃信宗教的人，他对记者说，在宣布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为非法组织之前，他曾祈求上帝的帮助。自称也与上帝相通的甘地不无幽默地讽刺说：“真遗憾上帝竟为他出了一个如此糟糕的主意！”甘地本人也在5月初被捕。莫蒂拉尔在同狱中的尼赫鲁商量后，决定将“欢乐宫”私宅

捐给国大党，易名“独立宫”。在紧随而来的大规模不合作运动中，这所房屋便成了救护负伤的国大党志愿人员的医院。莫蒂拉尔在附近另买了一所小得多的住宅。不久他也被捕下狱。结果，真的运动高潮尚未到来之时，甘地，尼赫鲁父子及其他不少国大党领导人就已身陷囹圄。

内尼监狱的牢房非常潮湿，正逢雨季来临，莫蒂拉尔的气喘病更重了，有几天他甚至觉得呼吸困难。尼赫鲁可以照顾他，但条件十分恶劣。外面的运动方兴未艾，殖民当局完全可能无限期地关押他们，那样一来莫蒂拉尔只会病死狱中。埃尔文总督用印籍中间人重新与狱中的甘地和尼赫鲁谈判。尼赫鲁在甘地的压力下同意重开谈局，但坚持应以承认印度有权脱离大英帝国为前提条件。如果当局同意释放全部政治犯，撤消颁布的所有禁令，国大党就答应中止运动。然而双方话不投机，谈判很快便收场了。

莫蒂拉尔由于健康继续恶化不久被释出狱。尼赫鲁在关押近半年后也获得自由，他回到阿拉哈巴德家中，只见着卡麦拉一人，原来其他人都陪莫蒂拉尔到莫苏里养病去了。卡麦拉已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丈夫，重见他时悲喜交集，泣不成声。这位弱女子深爱并敬重她的丈夫，一直苦苦等待他的归来，分离对她来说简直是无法承受的巨大痛苦。尼赫鲁只在家中呆了一天又重新上路，他打算先去莫苏里探望父亲，然后去出席一次重要的民众集会。一家人见面了，这次轮到了母亲高兴得落下眼泪。全家很长时间没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了。那天，尼赫鲁与英迪拉一道逗玩，晚上他又与父亲促膝长谈。父子俩这时的关系已相当亲近，家务，朋友，政治，学识，几乎无话不谈。尼赫鲁并没有料到这是他们间最后一次认真长谈。尽管后来他又见过父亲，但莫蒂拉尔的病情已经加重，他们再也不能交谈了。

离开莫苏里后，尼赫鲁与卡麦拉一道回阿拉哈巴德参加民众大集会，刚一下车就接到一纸官方通知，禁止他公开发表任何讲话。他并不把禁令放在眼里，在民众大会上慷慨陈词，直抒胸臆，建议农民抗拒缴纳全部地租和赋税。回家途中他又被警察抓了，法庭以“煽动骚乱”的罪名判处他两年单独囚禁。11月14日是尼赫鲁的生日，印度各地纷纷集会强烈要求政府释放他。1931年来临了。新年第一天，他在狱中听说妻子也已入狱，她被捕时宣布她为能步丈夫后尘而深感骄傲。1月26日，印度各地的民族主义者隆重集会纪念独立日一周年，宣誓继续坚持斗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尼赫鲁对以往监狱生活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这一次单独囚禁对他是一个新的考验。从外部轰轰烈烈的运动突然转入冷清的牢房，他不能不感到寂寞难耐和疲惫不堪。夜晚，他聆听铁窗之外隐隐发出的任何响动，仰望繁星灿烂的夜空，启动自己长于想像的头脑，从星辰运行中得到慰藉。为了振奋自己的情绪，他争取到白天去院内天井活动的权利，抓紧作一些体力锻炼。他也从不定期获得的刊物上零零碎碎地了解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并读了不少书。后来他又获许每天用手纺机劳动五、六个小时，他称这“抚慰了我内心的狂热躁动”。他对身心失去自由的反思源于深刻的个人体验：

“单独囚禁，即使是短期的，也是极其痛苦的事情；

如果延长到好几年，简直令人不寒而栗，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心灵慢慢地、持续不断地颓丧下去，最后濒于疯狂；脸上流露出一种丧魂落魄的神色，或者像一个饱受惊吓的动物那样，满脸带着恐惧的表情。这是一步一步地摧毁精神，慢慢地肢解心灵。即使一个人度过了这一关，他也变

得反常，绝对不适合在世界上生存下去。”

英国政府担心形势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下令释放所有在押的国大党领导人，也决定施加一切压力开始新一轮谈判。尼赫鲁一回家便看到父亲躺卧病榻之上。莫蒂拉尔的日子已不多了，几天前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还对甘地说：“圣雄，我不久就要离你们而去，来不及看到独立自由了，但我深知你们已经胜利，印度不久就将获得自由。”尼赫鲁不顾他本人的反对，1*

道别。几天后莫蒂拉尔死在那里，他的遗体用国大党的三色旗包裹，安放在恒河岸边一堆檀香木上，尼赫鲁亲自举起火把点燃了火葬的柴堆，甘地在仪式上作了简短动人的演讲。

莫蒂拉尔并非死于意外，但还是给尼赫鲁带来不小的精神打击。随着岁月流逝，父子俩无论是个人感情还是政治见解都越来越接近。父亲对儿子在印度的声望与日俱增感到由衷的欣慰，以至发展到完全容不得别人对尼赫鲁有一点批评的程度。尽管他俩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相互关系明显在年复一年地加深，父亲的专制与儿子的孝顺早已是遥远的往事，他俩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有时他们甚至相互倚赖，都觉从对方的存在中获益匪浅。父亲的死无疑给尼赫鲁生活中留下一大块谁也无法填补的空白。甘地在某些方面犹如尼赫鲁的教父，但还是不能代替莫蒂拉尔在他心中的位置。

另一个打击也接踵而来。甘地答应在德里与英国总督谈判，并答应以国大党唯一代表的身份赴伦敦解释国大党关于实现独立的观点，而国大党却一无所获。尼赫鲁也去了德里，几周内几乎每天都与甘地一起讨论些问题，但与总督的会晤只有甘地一人能参加。尼赫鲁经常在清晨陪甘地散步，同时也讨论和争执许多问题。他发现自己与圣雄在民主政治、农民问题和社会改革方案上的看法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又觉得：“虽然我们可能更合乎逻辑，但甘地比我们更了解印度。一个能博得这种热烈拥护和爱戴的人，本身必定具有某种符合群众需要和愿望的东西。”眼前最重要的是运动本身的问题，其他辩论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日。他对甘地与对手谈判的才能是从不怀疑的，更没有理由不信任甘地对民族运动和国大党的忠诚：

65

*

y*

“当他亲自去同对他抱有敌意的人们周旋时，他获得多次的胜利；令人惊讶的是，他纯粹依靠性格的魅力将一个敌对者争取过来。许多对他批评和嘲笑的人也为他这种性格所感化，而变得对他崇拜，即使继续对他抨击，但其中也不再有任何嘲弄的意思。”

甘地与埃尔文谈判的结果终于出来了，但双方达成的协议却让尼赫鲁失望。他们谈到大英帝国陛下管制下的立宪机构，但丝毫不提完全独立。实现彻底独立的目标大大打了折扣，而不合作运动则因协议的达成必须停止。尼

赫鲁真有点沮丧和生气，他称这是对那些整整一年来坚持参加斗争者的背叛。甘地试图利用自己的个人威信和与尼赫鲁的友谊来消除后者的苦闷，反复申明他并没有放弃原则而是采取迂回战术。尼赫鲁却认定甘地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他的不安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感到在他的身上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因素。虽然我们14年来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然而我对于这种因素却一点也不能理解，这使我感到十分担忧。他承认在他身上确实存在着这种未知的因素，并且表示自己无法加以控制，同时也难以预测它的后果。”但协议已是既成事实，其他人不同意也无可奈何，推翻协议、与甘地公开决裂在当时看来也无济于事。甘地自导自演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不合作运动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第二年的国大党卡拉奇年会批准了甘地签署的协议。尼赫鲁难掩自己的灰心丧气，会后便携全家去岛国锡兰度假。他早就想自己能从得不到半刻安宁的印度抽身出去一段时间。他们在岛上住了整整一月，游览了各处的风景点和历史胜迹。尽管尼赫鲁不信宗教，但锡兰的佛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也许从其中获得了短暂的解脱：“释迦佛一直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这种吸引力，我觉得难以分析。但是，这不是宗教方面的吸引力，我对佛教的教义并不感兴趣。吸引我的是他的人格，正如基督的人格非常吸引我一样。”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也回忆说：“去那儿之前，父亲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事。”尼赫鲁一家在岛上度假，他本人的心绪却难以平静，他不断在头脑里与甘地展开辩论，设想他能从甘地那里得到的一切可能答复。最后他得出结论：与甘地之间的冲突似已无法避免。他认为，这位老人政治上保守落后，行动上太注重个人的作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好不到哪儿去。

尼赫鲁及时赶回印度为去伦敦参加圆桌会议的甘地送行。不合作运动的余波还未消退，特别乡村地区的情况更是如此。甘地重开谈判的决定在孟加拉激起了恐怖活动的浪潮，年轻人决心以某种激烈的形式表达他们对政治的失望。殖民当局继续使用高压手段对付农民的闹事，成千上万的佃户因拒绝缴纳租赋而被逐出他们世代代耕种的土地。尼赫鲁和国大党尽管希望当甘地不在国内时尽量避免与政府发生冲突，回避危机，但还是出了问题。一天，一份电报传到正在伦敦开会的甘地手中，告知他农村的形势非常紧张，一触即发。但甘地回答说他无能为力，建议国大党必要时相机采取措施。

甘地不久从伦敦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这时印度的许多地区仍在骚动不安，英国当局害怕甘地的出现会重新点燃政治动乱的火苗。尼赫鲁也被一项新的禁令困在阿拉哈巴德，但他拒绝服从对行动自由的限制，搭乘火车去孟买出席一次国大党工作会议。火车一靠站，他便与其他国大党领导人一同遭到扣押。那天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刚回国的甘地要求会晤总督讨论危机，但后者拒绝了。尼赫鲁不像其他人那么乐观，他预料到殖民当局的强硬：“难道印度民族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归根结底，两个无法调和的东西——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能够缩小到个人一时的私见么？难道两种历史力量的冲突能够给彼此的微笑和相互的礼貌所消灭么？”国大党顿时号召恢复民众不合作运动，但得到的呼应极其微弱。审判之后，尼赫鲁被处两年监禁。在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中，甘地与当时任国大党主席的右翼领导人萨达尔·巴特儿也被投入监狱。殖民当局的报复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尼赫鲁的两个妹妹也被抓入牢中，他的家族捐给国大党的“独立宫”以及他的私人汽车也遭查禁、没

收。

尼赫鲁又开始体味漫长、孤寂的铁窗生活。在狱中，他重新拥有了学习和研究的时间，他写道：监狱好比“一所最好的大学，不过你得知道如何上课”。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对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失去自由使他更产生出通过观察自然来感受生命的冲动。令他欣喜的是，从监牢中可眺望到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雪峰，这大大排解了他心中的寂苦悒郁。他注意大自然的四季交替：冬季菩提树的枯叶剥落，留下光秃秃的枝桠，春日一到又长出茂密的新叶，在和煦的阳光下摇曳闪烁；绵绵秋雨驱走了炎暑，给沉闷的牢房透人一阵阵清悠的凉爽。他从这一切中感受到一种充满动感的神秘氤氲。他也观察可能见到、接触到的一切大小动物，注视它们爬行、蠕动和飞翔，满足他天性中喜爱动物的一面。他甚至将这些观察上升到政治感的高度：“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动物来作为它们野心或性格的象征。……如果印度教徒，由于庇护他的动物是母牛的缘故，而变得和善并采取非暴力主义的态度，那同样也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

他设法获得看书和读报的“特权”，尽管书刊审查制度很严，他还是弄到不少好书。他觉得看小说易使自己心神涣散，干脆坚持阅读乏味的理论书籍。不久他发现写作比单纯读书更能充实监狱中的生活，于是便开始写作。在这段蹲监牢的时间中，他给女儿英迪拉定期写信，与她分享他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和认识，每封一个主题：“我给我女儿一系列的按照我的历史顺序撰写的信件，在我整整两年的刑期内，一直使我忙碌着。这些信件的写作对于维持我心智的健全，有很大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我生活在我描写的过去事迹中，几乎忘却了监狱环境。”这批珍贵的信件后来集册出版，题为《世界历史一瞥》。

监外传来的消息不时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他注意到偶然事件在不断发生，但不见有组织的统一行动。他又一次对自己的国大党深感失望。一天他接到一封寄自阿拉哈巴德的信函，看了才发现是恐吓信。那里刚举行了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纪念周活动，尼赫鲁家的女性都涌跃参加活动，走在示威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瘦弱的老妪，身穿白色棉制莎丽。途中她遭到警察乱棍的毒打，直到一位警官认出她来才将她从地上扶起用车送回家中。她就是尼赫鲁的母亲斯瓦鲁普拉尼。他以为她已毙命棒下，那几天在牢房中踱来踱去，心情坏到了极点。不过她没有死，待伤情慢慢好转后，她振作起来去狱中探望她的儿子。母子再见给了他安慰，但他看到她头上缠着绷带时又难掩自己的气愤。他对她没多提这件事，但它却促使他真正怀疑甘地非暴力政策的有效性：“我无法忘怀我那年老体弱的母亲满身血污地倒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的情景。我不敢肯定，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我将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我的非暴力主义究竟会使我忍受到多大程度？”

经过这段时期的铁窗生活，尼赫鲁对国大党的弱点看得更清楚了，对党的斗争策略的批评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认为，历史正在迅速向前推进，国大党必须彻底改变那种交替使用施加压力和让步妥协的两手战略，改为一种义无反顾的单向战略：毫不手软地施以压力，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甘地在伦敦未能争取到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这更证明了尼赫鲁的新观点是正确的。

尼赫鲁在1933年8月获释出狱。他先去勒克瑙城探望生病的母亲，然后去浦那见正在那里休养的甘地。甘地的身体因其几度绝食而受到极大的损伤，看上去形容枯槁，精神不振。半年前他在贱民选举权问题上与英殖民政

府发生尖锐矛盾，决定“绝食至死”。尼赫鲁看来他这样做并不值得，并对他为了一个枝节问题而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深感不快：“这对于我们的自由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不会使人们至少暂时忘记了更重大的问题吗？”他甚至以为可能再见不到甘地了。后来英方被迫作了些让步，甘地才停止绝食。几个月后，甘地又开始了为时 21 天的绝食。尚在狱中的尼赫鲁仍不完全清楚甘地的具体意图，但他绝不愿伤害后者的感情，只得接受事实，写去一封充满友情和敬意的信。然而，尼赫鲁对绝食作为政治策略的合理性却加深了怀疑，这甚至进而突出了他与甘地之间的分歧：

“我觉得我跟甘地在精神上一天比一天更疏远，虽然我在感情上十分钦佩他。他的政治活动常常由一种不犯错误的本能支配着。他对于行动有很敏锐的判断力，可是这种信仰方法是训练一个民族的正确方法吗？也许暂时可以生效，但时间长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他的结论显得有点悲观：“很难预料他在紧急关头会转向哪方面，但是不管他何去何从，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我们看来，甘地也许会走错路，可是总是一条直路。跟他一起工作当然很好，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只得分道扬镳。”

他俩在浦那谈了几个小时，尼赫鲁承认他对局势感到焦虑不安，他告诉甘地：除非人民知道我们正在斗争的目标，否则他们就会感到厌倦。甘地力图使他镇静下来，说：“走那么远干吗？对我来说，每一次能走出正确的一步就够了。”尼赫鲁耐心地解释自己的看法，强调头等重要的是教育民众，让他们自行觉悟起来。他直截了当地说：国大党必须宣布它的目标是在自由的印度消灭阶级特权。甘地对此没表示异议，只是不断重申：“它必须通过演变，而不是强制来实现。”尼赫鲁失望了。在他的记忆中，历史上从来找不出一个有产者自愿放弃自身特权的事例。这次谈话也像过去多次那样，结束并非因为他们达成一致，而是必须要处理另一些当务之急。甘地在等待时机，他知道英国政府已经发表了关于印度问题的白皮书，其中答应给予印度省区自治，这表明他的逐步进展的判断没有错。尼赫鲁却非常武断地表示对此安排不必认真考虑。

这一阶段，尼赫鲁也密切注视着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研究处于政治、经济转变中的国际形势。他的认识带着明显的世界主义特征：“在考虑世界上的困难和冲突时，我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我自己个人的和我国民族的苦难。我有时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我生在世界历史上这种伟大的革命时代。在即将到来的伟大变革中，我也许不得不在我自己的国家里起一点作用。”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深感忧虑，而西方民主国家不能有效地抵制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事实只会增强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任。他相信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都与印度直接相关：“印度的问题和斗争变成了整个世界局势演变中的一部分，是各国国内和国际间政治与经济势力所进行的大斗争的组成部分。在这场斗争中，我与日俱增地同情共产党方面。”

尼赫鲁对社会主义和苏联一直怀有好感，特别是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比之于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选择。面对弥漫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的大规模经济不景气的惶恐和法西斯主义的阴云，他感到马克思主义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哲学替我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就我而言，历史有了新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历史大放光明，历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和目的的，虽然不是自觉的。”他对苏联的好印象则主要来自对一种新制度和经济迅速

发展的赞美：“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和它所树立的榜样，在暗淡的、凄凉的世界里是一种光明的、令人兴奋的现象。”但同时他也看出苏联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弊病，赞成不盲目地仿效苏联。

不过，虽然尼赫鲁和某些国大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表示认同，但国大党与印度共产党在行动上保持着距离。在他眼中，印共完全听莫斯科发号施令，唯其马首是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的独立斗争不利。苏联直到这时仍对有些问题拿不准意见，譬如印度国大党是否是一个反帝组织，印度的资产阶级是否会反对英国、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或充当运动的坚强后盾，等等。今天回过头看，假如印度共产党能制订一种一以贯之的积极路线，假如他们能在20年代底和30年代与国大党携手合作，历史有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局。尼赫鲁当时虽然极为同情马克思主义，但对苏联尚有很大保留。1932年至1936年期间是他政治上最激进的时期，当时苏联国内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处于西方所称的“斯大林化时期”，因此他注意与莫斯科保持距离并批评苏联制度的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他批评苏联主要有四点理由：一，他不喜欢苏联实行的强制性管辖制度；二，他强烈反感苏联无视个人自由和文化上的自由；三，他与共产国际信奉的具有半宗教性质的教条主义格格不入；四，他对印共只听命苏联，不作独立性思考这点很有成见。他其实与不少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从不怀疑他们的正直和忠诚，也喜欢同他们一起交谈和争论问题，但难以信服他们千篇一律、人口一词的观点。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听起来刺耳，而是因为其过分投合莫斯科的基调。因此，尼赫鲁即使在他政治上最偏激的时期也很少赞同印度共产党的主张。

1933年，尼赫鲁写了一篇题为《印度何去何从？》的小册子，其中对印度的前途问题作了清楚的回答：印度“毫无疑问将走向社会和经济平等这一人类的伟大目标，消灭一国对另一国的剥削和阶级剥削，在国际合作的社会主义世界联盟的框架内实现民族自由。”但是英国当局提出的方案却大相径庭，许多方面都离他的希望、计划和梦想相去甚远。英国议会于1935年通过“印度政府组织法”，准备开始启动实施自治政府的过程。该法案提出在全印度成人普选的基础上实行省区自治，但土邦地区排除在外；中央政府依然牢牢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实际上只是允许印度人分享一部分权力。它仿佛是说，如果印度民族主义者接受了这块胡萝卜，细细咀嚼并慢慢消化，那么就有更多的胡萝卜到手。甘地赞成立即表态接受，尼赫鲁却马上表示反对，两人在这一问题上互不相让。尼赫鲁申明：英国拟议中的联邦结构不可能使印度达到真正的进步，印度人民的代表得不到任何机会干预或修改由英国人控制的行政体制，体制的变更仍是由英国议会说了算，结果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一句话，国家的主权仍然不在印度人手中。因此“印度政府组织法”是无法接受的，国大党对此只有一种选择：实行彻底抵制。

尼赫鲁的立场得到国大党左派的支持，但这时他又一次锒铛入狱，不能将自己的观点有效地付诸行动。他重新获释是因为卡麦拉再度病重，他获准去欧洲看望在那里休养的妻子。与此同时，他写完《自传》的初稿。这部书稿几乎全是在牢中写成的。英迪拉这时已长成一一位大姑娘，到了该上大学的时候，母女俩一直在国外相依为命。尼赫鲁获释后马上赶往柏林与她们会合。

见到妻子病容满面、憔悴不堪，他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知道救治的希望已十分渺茫，她离死神不远了。自他俩结婚以来，尼赫鲁给予她的时间实在太少，尽管妻子对偶像般的丈夫要求得不多，但他总感到欠她太多，为

此深怀愧疚，特别是在这个即将与妻子作最后诀别的时刻。父女俩照顾卡麦拉去瑞士的洛桑作最后的诊疗，但她不忍他们将全部心思花在她久病不愈的身体上，催促她的丈夫去为他的《自传》找一家出版商，安排英迪拉进大学读书。尼赫鲁这一次顺从了她。英迪拉先进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伯明敦学院，后来又进牛津大学的索莫维尔女子学院。英国一家著名的出版社也同意出版尼赫鲁的《自传》。不幸的是那本书还在排版，卡麦拉便平静安详地死去了，尼赫鲁和英迪拉守在她的灵床前。时为 1936 年 3 月。尼赫鲁的《自传》也于当年出版，一年中重印 9 次，以后又相继再版了十余次。《自传》的出版发行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良好的反响，极大地有助于他个人声望的加强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事业。在尼赫鲁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印度的发现》中，他专为亡妻写下一章，其中多是对卡麦拉的追思和怀念，犹如一篇优美的散文：

“她从来不曾完全失掉那种少女的神气，在她成长为妇人的时候，她的眼神深邃而含有热情的火焰，给人的印象是一汪平静的池水，其中蕴藏着的却是怒吼的狂风暴雨。她不是那种现代妇女的类型，没有现代妇女的习气和稍欠稳重的姿态，然而她很容易接受现代的生活方式。但她根本上是一个印度姑娘。……即使她企图这样做，她大概也做不像。我所遇到的人很少能对我产生像她所给予我的那种真挚的印象。”

他怀着失去妻子的忧伤准备返回祖国，但在归国途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托人给他带信，希望能在罗马与他见面。尼赫鲁对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本人绝无好感，且当时意大利正在侵略埃塞俄比亚，他担心对方希望见面有明显的政治宣传目的，因此拒绝了。但他乘的班机必须在罗马停留，墨索里尼仍不死心，又派人来请，但他还是坚决找理由拒绝了与这位独裁者的会面，今后者极为尴尬。

尼赫鲁 1936 年 1 月还在伦敦作短期访问时，就听消息说他又被选为国大党本年度主席。国大党的年会预定 4 月在勒克瑙召开。党内的社会主义团体认为对他敲警钟的时候到了。沙已·鲍斯是一位来自孟加拉的国大党左派领袖，也是印度民族运动中正在上升的一颗新星，他告诫尼赫鲁说：有人正期望你在印度推行国大党右翼的政治路线，应该谨慎加以提防，党必须毫不妥协地抵制殖民政府，阻止国大党人接受政府职位的趋向，让党真正能走上一条新路。社会各界也都盛传：甘地打算利用尼赫鲁之手来割除社会主义这个赘疣。尼赫鲁注意到所有这些现象，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他据理力争自己提出的取代“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另一革命性方案。他指出：印度需要的不是权力分享，而是经全体国民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倘若接受英国炮制的“组织法”，无异于与殖民主义同流合污，承认英国对印度的继续统治和对中央政权的绝对控制：民选立宪议会则表明从英国人手中取得自由和民主，彻底实现印度的民族自决。反对任何妥协的时机已经成熟，接受殖民政府的职聘只会掉进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他反复为自己的论点辩护，言必有中：英国绝不会自愿地拱手交出政权，只有国大党随时准备战斗，动员大众朝着既定目标前进，这一目的才能达到；只有当英国人面对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大革命时，印度才可能得到自身的主权议会。不足为怪，他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言辞并不能轻易地打动国大党右翼，甚至甘地也难表信服。尼赫鲁曾公开谈到要分道扬镳，但还是经不起甘地的好言相慰，事到；临头又改变了主

意，决定在年会上再作较量。

在勒克瑞年会上，尼赫鲁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烈的讲演，阐明他对形势的看法。他在发言中高度赞美社会主义对印度未来的意义，但它也注定成了他无加保留倾向这一社会制度的最后绝唱：“我相信，解决世界和印度的各种问题的唯一——关键出路在于社会主义，我用这个词并不是指它模糊的人道主义含意，而是就它科学和经济的意义而言。但社会主义不止是一种经济学说，它也是一种生活哲学。这点也深深地吸引了我。除了社会主义以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可能消除贫困，消除大规模失业，消除堕落和消除印度人民的受奴役状态的途径。它包括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广泛的革命性变革，消灭大地主和资本家阶级，消灭封建和专制的印度土邦王公制度。”

尼赫鲁在年会上提出两项决议案，第一项是抵制英国的“印度政府组织法”，反对代表们在只负“无权责任”的情况下接受政府职位；第二项要求接纳工会和农民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但党内的右翼占了上风，他的第一项提议遭到无情的否决，后一项被有保留地接受了，年会最后批准国大党通过选举参加省区政府的决定。尼赫鲁对会议结果气得绷紧了脸一言不发，甘地只得对他抚慰有加，夸奖他顾全大局。他的确显得无可奈何，只能在要么分裂要么被迫与党内右翼握手言和这两条路之间作出选择。国大党内不少社会主义者厌恶地离开了组织，尼赫鲁这下却成为那些与他观点截然不同者的俘虏。忍辱负重对他来说并非易事，但他认定不能破坏民族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目标。

直到这时，尼赫鲁始终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卫道士而感到骄傲和鼓舞。他经常对成千上万人民大众讲话，深谙与大量听众感情勾通的艺术。有一次，他一定要他的听众们思考他们自身的利益所在。人们在讲台下不断地高呼：“印度母亲万岁！”他叫他们停下来，会场一片沉寂，接着他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印度母亲？她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他们起初惊得哑口无言，他们去那里不就是为了聆听这位师尊的谆谆诲训和对他欢呼喝彩吗？现在他们突然发现他真是一位奇怪的领袖，竟要听他们的意见。尼赫鲁坚持要他们回答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参加集会的绝大部分是农民，逐渐有些人开始敲拍他们坐着的地面，低声说：“她在这里，这就是印度母亲！”尼赫鲁又听到不少类似的回答，这时他再次打断他们说：“不，你们错了，印度母亲并不是大地，她就是你们大家的团结，你们就是印度！”全体听众顿时反应过来，向他发出雷鸣一般的欢呼。

他那天的表演确实气壮山河，他向成千上万国大党人及他们的同情者申明，殖民主义统治与印度的独立之间绝没有中间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也绝不存在停靠点，天上没有上帝，地上没有救世主。他一针见血地说：只要是教派主义，无论是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一种容易受心术不正者利用的邪恶之物。

有人戏称他在英国人面前维护甘地的尊严，在甘地面前维护马克思的尊严。其实应说他既维护民族主义的纲领，又维护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旗帜鲜明。但他意识到，印度这时正处在最关键的十字路口，他必须结束与甘地的论战，将甘地奉为民族运动的最高领袖。是的，他尽可以怀疑甘地的策略，但最终还是得服从；他不能改变甘地的理论，但却可以在实践中使它改头换面。理论和实践迟早都将相互推动，而通常只有实践才是无所不能、强大无比的。

数年前当尼赫鲁还关在内尼监狱的高墙内时，他对妹妹克里希娜写信谈对未来的憧憬，“我不停地想像一座魔力无穷的城市，那里到处都是梦幻般的城堡，鲜花绚丽的苑园，奔流不息的小溪，那里充满美好和幸福，完全免除了我们这个令人悲哀的世界所遭受的一切罪恶。只有到那时，人民的日常生活才变成一种长久、欢愉的进取，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我渴望建起这座魔幻之城，驱散我们身边的一切丑恶和悲哀。”但在勒克瑙年会上，他的这一宏大梦想到了尽头，他当时还相信只是暂时隐匿理想，回到现实，但历史将无情地磨蚀、淡化他的社会主义情结。

勒克瑙年会的结果出乎尼赫鲁意外，他既苦恼又无力回天。他同时也对国大党内根深蒂固并愈益明朗化的派别之争感到厌倦。他给甘地写信表示希望辞职，但对印度国内外局势的思考又一次使他改变主意。国大党尽管同意参加选举，但拒绝了英国根据“印度政府组织法”强加于印度的新宪法。对尼赫鲁而言，这次殖民统治下的选举活动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他在短短几个月内行程数万英里，使用了几乎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从最现代化的飞机到最原始的骆驼、有时甚至步行。他先后对两千多万的群众发表演说，集会听他讲话的听众人数常常超过十万。国大党在大多数省的选举中赢得胜利，他的个人魅力和努力起了很大作用。选举旅行也让尼赫鲁本人更多更深地了解了自己国家的现实，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不无裨益：

“我看到了我自己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尽管情况复杂，差别很多，可是却具有异中有同的印度特点。我注视那带着友谊神情望着我的千百万人，我设法了解他们心中想些什么。我对印度的地方看得越多，我就越感觉我对于印度的美丽和多样性知道得太少，需要我去了解的事情就越多。”

在尼赫鲁为国大党竞选而奔走全国的旅程中，他顺道到了不少古代圣地，瞻仰文明遗迹。他对考古学家刚发现不久的印度河文明遗址怀有浓郁的兴趣。遗址发现之前，英国的工程师为修建从拉合尔到木尔坦的铁路线一直在使用一种形状奇特的石渣，这些砖石的历史可追溯回公元前3000年。当他们被及时制止后，哈拉巴古城的地基已露出地面。接着又在距浩浩森森的印度河故道仅几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它的姊妹城摩亨佐达罗。他沉静地站立在摩亨佐达罗古城废墟附近的一座土丘上，仔细地欣赏审视这一文明奇迹。他为这个了不起的发现异常高兴还有其他原因。它代表的是吠陀时代之前的远古文明，但远比它之后的一些文明更发达，因此印度教正统主义的历史观应该修正，历史不得不重新评价。他惊愕不已地听考古学家对新发现作绘声绘色的讲述：摩亨佐达罗是古代城市规划的典范，它有先进的排污系统和灌溉系统，有建筑规整的街道和排列成序的民居，有公共澡堂和公用水井，有明确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划分，它是我们地球上组织化生活的最古老的例证之一。

尼赫鲁一边欣赏古代文明的这一奇迹，一边大概也想到它与现代城市之间的共性。欧洲行将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古老文明的某些特征犹如殷鉴不远，类似的可悲因素继续困扰着人类的现实，战争、饥荒、宫廷密谋、阶级斗争、宗教压迫、酷刑、帝国的扩张、杀戮、毁灭、迷信、祭祀和神怪在近五千年中持续不断地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场景。印度历史漫长而复杂的演变是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历史中点缀着循环往复的军事征服和改朝换代，从而

形成这个国家杂色纷呈的复杂背景。冲突和纷争的历史终于快走到尽头了吗？他在不停地思索这些事情，后来他最后一次坐牢时写下《印度的发现》一书，其中详尽探讨了这些他关心的主题。

选举活动比他预先设想的更富有教育意义。全体选民的人数达三千万人，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为 54%，不包括尚未实行普选的土邦地区。在英属印度 11 个省的 1585 个席位中，国大党赢得 711 席；在 6 个省区获得完全多数。旁遮普过去曾一直抵制民族主义运动，这次由多数派组成的联合党控制了形势。尼赫鲁乐观地相信，既然不同教派的地主能联手合作，那他们的佃户肯定也能摒弃教派偏见，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尼赫鲁对选举结果感到振奋鼓舞，最使他高兴的莫过于西北边省占当地人口 90% 的帕坦族穆斯林中绝大多数人投了国大党的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冲突在印度某些地区已时有发生，他原以为他们会投穆斯林政党的票。另外此事也是一大讽刺。西方作家和英殖民政府的官员总是对边省帕坦人的“野性”津津乐道。在吉卜林的作品中，他们是一个“刚烈、好色、尚武的民族，从襁褓时代就已对战争、杀戮和暴卒见惯不惊”；帕坦人从不辜负英国人对他们的离奇的理想化和厚望，总是与那些“文儒柔弱、戴眼镜、满腹经纶的”孟加拉人作对。但选举的结果却粉碎了这种神话，帕坦部族投了甘地和国大党的票，对英国殖民者来说不能不算一个打击。取得地区选举胜利之后，尼赫鲁终于舒了一口气。

五、与命运相会

国大党在选举中获胜，显然也与其竞选纲领中某些激进的承诺有关，特别是农民和农村问题。国大党还保证：在该党组成政府的省区，决不允许英国省督进行元端干预，决不在英国“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基础上与英方合作，决不向占领国提供任何支持。但这时国大党上层中又起了新的争议：国大党员是否应在该党选举未能获胜的省区担任公职？尼赫鲁坚决主张他们应利用选举结果的合法性要求实现完全独立，而甘地表示反对并得到国大党权力机构的支持，结果还是尼赫鲁让步了。

国大党的省级部长们在英国省督的主持下进行宣誓，两方的友好关系在某些省有迅速发展的迹象。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在联合省当选为省政府的部长，成为印度首位妇女高级官员。尼赫鲁注意到权力本身实际上变成了目的，其他因素也在同时发生作用。即使在省区政府中，权力等于施舍，施舍引起竞争，竞争则鼓励了不同教派、不同种姓之间的敌对和歧视。在组建省区政府的最初半年内，明显可感觉到这种令人生厌的气氛。国大党内的情况不容乐观，派别之争和政策见解上的分歧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加深的趋势。

党外的形势更让人不安，主要的表现是穆斯林联盟开始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穆盟是一个成分庞杂的集体和公开的教派主义组织，1906年由英国人发起成立，主要包括穆斯林地主、小商人和惯于见风使舵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但声称代表全印穆斯林人口的利益。穆盟与国大党代表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对立，虽然尼赫鲁对它表达的政治见解颇有些不屑一顾，但它存在的事实依然摆在那里，要想置之不理并非容易之事。正是从这时起，教派主义成为印度次大陆政治生活中一大特征，一直延续到独立之后甚至独立近50年后的今天。

教派主义的丑陋野蛮勿庸争辩，因此用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去反对它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必须先回答

一个问题：教派主义的根源何在？尼赫鲁与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的答案只有一个：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带来的恶果。他们回想起寇松当年将一个好端端的孟加拉一分为二，从此印度便开始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英国人至今仍在坚持这么干，要想扭转局面已很困难。这一答案简单清晰，但未必能使人完全满意。当然，英国在统治印度期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教派的分立，甚至也煽动这些对抗。不过教派分立和冲突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印度教派主义的毒素并非仅源于某些个人或个别组织的倒行逆施。圣雄甘地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对立冲突的反对是旗帜鲜明的，他用非常激烈的言语表明自己的态度。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孟买律师，曾在国大党内担任领导职务，后因政见不合退出另组新党。一些国大党领袖曾赞扬他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亲善团结的友好使者”，可这已是好多年前的旧事了。真纳并不是一位宗教界人士，有人甚至说他是不可知论者，但后来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真纳不得不学会如何辨别麦

加的方向，号召穆斯林拿起武器准备“圣战”；他过去主张一个印度，相信一切宗教团体都能在其中和平共处，但现在他却强调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天壤之别，而不久前这些差异对他还是无关紧要的。他高喊：“印度教徒对牛顶礼膜拜，而我们吃牛。”教派抗争的邪风此时已在北印度部分地区呼呼吹起，早在1930年坎普尔就发生过一起大规模教派骚乱，死了60余人。真纳认定穆斯林绝不可能从国大党那里得到公平对待，因此他要将伊斯兰教当成为穆斯林建立独立的政治根基的有力武器。尼赫鲁承认真纳作为一位律师和政客的才干，但对他的品格和推行穆斯林政治的做法怀有很深的成见：从教派主义意识形态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行不由己的俘虏，因为不管他外表如何现代化，他是属于一种几乎不懂现代政治思想或现代政治发展的旧一代人物。关于笼罩着今天世界的经济问题，他似乎完全无所知。他虽然具备了那么多的力量和顽强性格，但他却是一个奇特的消极性人物，最适合他的标志可能只是一个‘否’字。”

但归根到底，问题的焦点并不是他们个性方面的差异，而在于国大党在勒克瑙年会后所执行的路线。那次大会打开了国大党大量接纳普通大众的闸门，不同种姓、派别和阶级的印度教徒纷纷加入国大党，他们代表了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印度教的宗教领袖公开鼓吹多数人统治即印度教统治。印度教一统天下的现象在次大陆实际已消失好几百年了。尼赫鲁坚决主张抵制教派压力，为两派联合的民族主义创造基础。他认为，假如国大党不承认阶级分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最重要，否认同一阶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拥有相同的利益，那就绝不可能指望大多数印度人能自发理解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也不可能自觉动员起来为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多次指出：纯粹的民族主义是不够的。历史当时已在证明尼赫鲁的观点的正确性。但在这点上甘地及国大党多数领导人认为他夸大了阶级对抗在民族运动中的作用。尼赫鲁争辩说，一旦国大党决定它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竞争是合理的，那就不可能使全体印度人团结在国大党的旗帜之下，真纳就更有理由分别对穆斯林农民、地主和商人说：在印度教徒占统治地位的印度，你们会被印度教高利贷主活生生地吞掉；如没有英国人的保护，你们就会被印度教的资本家淹没；你们需要一个穆斯林自己的商会，否则就会在印度教徒的商业竞争中遭到灭顶之灾。

尼赫鲁对事态的发展深感震惊，他尽管越来越难以抑制对穆盟的反感，但认为国大党也要负很大责任。国大党内有一些出了名的大印度教主义者，例如巴特尔、拉金德拉·普拉沙德、企业家比拉等，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甘地的姑息和理解。只要他们顽固坚持狭隘的教派主义立场，就不可能指望穆斯林联盟能有更理性的表现。

穆盟通过选举在分配给穆斯林人口的482个席位中仅获得109席，只得到穆斯林总投票数的4.8%，显得微不足道，于是它便指责国大党的权力垄断和未履行部分竞选诺言，在穆斯林中下层中煽起教派主义惶恐，国大党的形象受到贬损。1937年，穆盟在意义重大的补缺选举中赢得不少席位。尼赫鲁神情沮丧，写信向甘地大肆抱怨新上任的国大党的政府官僚：“他们千方百计让自己去适应旧秩序，并且试图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这一切虽然很糟，但还可以容忍，更糟的是我们失去了经过辛辛苦苦的努力才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崇高地位。我们正在沦落到平庸政客的水平。”

尼赫鲁担任国大党主席已连续两届，但甘地反对在选举运动后马上换

人，以免给外界一种纲领缺少连贯性的印象，因此坚持要他连任。他还来不及同意，“选尼赫鲁”的活动已在党内紧锣密鼓地开始。党内左翼认为他是阻止国大党急速向右转的唯一人选，也打算支持他连任。但在1937年11月，加尔各答的《现代评论》发表了一篇奇怪的不署名文章，文中说，像尼赫鲁那样的人尽管才华出众，但却是对民主的威胁：

“专制政治总打算跃跃欲试，难道贾瓦哈拉尔不会自以为是一位凯撒吗？如果第三次再选他，我们就会因抬高某个人而牺牲掉国大党，让人民联想起专制政治。况且贾瓦哈拉尔虽然言辞激烈，但他显然已疲惫不堪。我们尽可以希望他将来有出色表现，但别让我们滥用捧场和恭维去毁了他。我们决不需要凯撒！”

这篇文章引起轰动，党内右翼高兴得手舞足蹈，左派和甘地却极为气愤，认为是敌人在攻击尼赫鲁。究竟是谁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将谴责的目光射向英国人和右翼人士，另有些甚至责备甘地。《现代评论》的主编发誓该文的作者没有署名，他们发表它只是为了引发辩论。看到朋友们怒火填膺的样子，尼赫鲁再也无法一本正经地板着脸了，承认作者就是自己，可他相信文章里字字句句都是对的。他已打定主意不再第三次连任国大党的主席。在过去两年中，他已成功地将国大党转变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党员人数从过去的50万跃升到500万。他知道自己领导层内部受到右翼的包围和抨击，但他发现一条新的准则：暂求党内安定，避免哪怕是有益的争执。他需要激流勇退和暂作休息。事隔20年后，一位采访他的外国记者重提当年那篇分析他的文章，尼赫鲁再次证明真是他写的，但说仅是为个人消遣而作，他给了一位朋友，后来朋友又传给别人，最后登上报纸，从而在国大党内外产生出喜剧性效果。那位记者问他，是否仍同意文中他的自我解剖，他当年所归纳的独裁倾向等性格弱点在他任总理后有无体现。他机智地答称：如果一个人能够发现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并且加以讨论，这早就可以证明他决不会听之任之的。

他的母亲斯瓦鲁普拉尼一直未从两年前遭受的那顿棒击的损伤中康复过来，元月间死于一次意外的脑出血。尼赫鲁守在她的病床边，看着她在他怀里闭上了双眼。他的父亲与妻子早已离他而去了另一个世界，现在他与过去生活的最后一环也折断了，而展现在他前面的却是一个值得继续奋斗的新世界，他应该信心十足地向未来走去。

英迪拉还在牛津读书。尼赫鲁很容易便从朋友那里得到一封邀请他去伦敦参加会议的信件。他出席了1938年的国大党年会，向会议代表简要分析了剧烈动荡的世界局势和印度面临的处境，但在谈到印度的近期目标时调子明显降低了。沙巴·鲍斯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国大党新一届主席，这与甘地的意愿相违。尼赫鲁会后马上启程前往欧洲，行前他向朋友们吐露心曲：欧洲之行很有必要，它能“让我疲倦惶惑的心吸收点新鲜空气”。

欧洲这时正处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关键时期，张伯伦的绥靖主义和希特勒的强权政治几乎成了整个欧洲的缩影。他与英迪拉一道呆了些时日，也见见她那些激进的校友，但他的心思却始终集中在欧洲正在变动的版图上。他在伦敦见到许多朋友和熟人，特别与来自南印度的激进派人士克里希纳·梅农交情最深。梅农是左派组织“印度联盟”的创始人，也是持不同政见的国大党人，后来成为尼赫鲁最重要的政治助手之一和挚友。尼赫鲁与梅

农成天没完没了地谈论当时世界的热门话题西班牙内战，他对勇敢抗击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甚至专程赶赴炮火纷飞的巴塞罗那，亲眼观察那里的战斗场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阴云密布的西欧相比，他似乎更喜欢这个代表人类自由信念的国家。“在贫乏、破坏和日益接近灾难的环境中，我比在欧洲其他地方更安心。那儿有光明——勇敢、决心和作点有意义的事的光明。”在一幅珍贵的照片上，可看到尼赫鲁在梅农的陪同下正与西班牙共和军战士交谈，他看上去神情严肃冷峻，眉宇间凝含着某种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他本人十分喜爱这幅照片，把它看作自己与西班牙的命运紧紧相连的纪念。后来当听说自由的西班牙沦陷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时，他心情极为沉重，悲愤得竟说不出话来。

他返回伦敦后在海德公园发表演说，坦陈直言对欧洲形势的看法。后担任英国工党领袖的迈克尔·福特当时还是位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他记得梅农带他去听尼赫鲁讲演，在他记忆中，尼赫鲁的演讲“极为庄重、激愤，很能打动人”。尼赫鲁不久去巴黎时，得知张伯伦、达拉第与德意法西斯签订《慕尼黑条约》，将捷克斯洛伐克拱手交给希特勒。他讨厌英国的绥靖主义政策，称这些英法政客是“希特勒的传声筒”。他毫不讳言地对记者说：“这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代价包括其他民族流血遭殃，民主蒙耻，友邦惨遭瓜分。即使如此也不会有和平，只会有无休止的冲突、讹诈、暴力统治和最终的战争。”尼赫鲁与西方绥靖者不同，从来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曾希望见他，但他总是几句话便回绝了，也不掩饰对他们所代表的势力的蔑视。

尼赫鲁在欧洲时也详细读了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那些消息对他非常重要。他早就听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红军长征，认为他们能打破蒋介石的层层封锁开辟新的根据地简直富有传奇色彩。他也通过广泛阅读了解了毛泽东和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在尼赫鲁的倡议和促使下，印度国大党在1937年10月到1938年6月间曾三次发起“中国日”活动，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声援中国抗战。在欧洲逗留期间他始终不忘密切注视事态在中国的发展。当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占领区制造血腥屠杀时，他极为震怒；当读到中国军民万众一心奋力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时，他的兴奋溢于言表。

他此次在欧洲呆了5个月，这次欧洲之行总的说来使他感到惆怅和悲哀，“心中十分难过，许多幻想破灭了”。他看见光明正在又一次熄灭，世界大战的劫难从地平线上迅速逼近。在他曾寄予厚望的苏联，也正进行着血雨腥风的大规模“肃反”。欧洲仿佛即将全面陷入黑暗的深渊。1938年11月，尼赫鲁怀着对世界形势极度失望的低落情绪，与英迪拉一同踏上归程。他一路上心里老想着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苦苦思索托洛茨基说过的一句使他深受震动的話，后来他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引用：“显而易见，20世纪是人类记忆中最不得安宁的世纪。任何一位我们的同时代人，只要他贪图和平和舒适甚至其他一切，那他就是错生在一个倒楣的时代。”尼赫鲁相信，希特勒在欧洲的胜利将给整个世界带来一场灾难，法西斯是全世界的死敌。他对希特勒使用一个古老的印度教符号“卐”象征纳粹、大肆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越论”的作法嗤之以鼻。满载游人的海轮向东驶去，浓黑的烟柱散入阴沉的天空，欧陆的海岸线慢慢从他的视线中消逝，他轻轻说：别了，骄傲而又多灾多难的欧洲。

回国后，尼赫鲁在无数次集会中向人民讲述西班牙、中国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欧洲的危机。国大党决定为激战中的巴塞罗那送去食品和医疗援助，但送到时该城已被佛朗哥的队伍攻克。国大党也派出由著名医生爱德尔率领的5人援华医疗队前往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帮助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1939年夏天，从延安的一封来信送到阿拉哈巴德，收信人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

“我们希望通知您：印度医疗队已在这里开始工作，他们受到八路军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他们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给每一位与他们接触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特借此机会感谢伟大的印度人民和印度国大党向我们提供医疗和物资援助。……请接受我们的感谢、良好祝愿和衷心的感谢。”信件的署名人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1939年初，国大党计划召开一次新的年会。鲍斯决定再次以左派的旗帜开道，竞选连任主席。尼赫鲁试图劝阻他别与党内其他派别闹翻，但没有成功。甘地则明说反对鲍斯连任。鲍斯公开与国大党整个领导层对抗并获得再次当选。他宣布：国大党应当立即开展大规模的争取彻底独立的斗争，向英国发出退出印度的最后通牒。他还指责说，不少领导人与殖民主义同流合污，这显然也是想影射甘地。他的当选表明他的激进纲领在国大党内特别是年轻党员中有不小影响，但这次年会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涣散，相互攻讦的激烈程度在国大党内前所未见。一待鲍斯当选，马上就有十几位国大党核心机构的成员辞职。其中只有尼赫鲁的辞职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尼赫鲁明白，此时此刻如支持鲍斯就意味着与甘地分手，而他并不想在继续前进的路上离开甘地。他试着主动调解鲍斯与甘地的关系，但鲍斯却因他已同右翼人士一道辞职而不再信任他，况且鲍斯也知道甘地本人并非真想与党内左派妥协。尼赫鲁劝说不成，认为鲍斯的行为对国大党的团结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此不愿与他一同共事。这次年会充满勾心斗角和人身攻击，鲍斯尽管当选，但觉得自己受到国大党内两位重要权威人物的无情批评和诋毁，很快便病倒了，不久又做出一件使人人吃惊的举动，他辞去国大党主席和核心机构成员的职位，自行组成“前进集团”与国大党领导层分庭抗礼。该谁来接替辞职的鲍斯呢？甘地提名尼赫鲁，尼赫鲁却提名在国大党和印度穆斯林中享有崇高声望的阿札德大毛拉，也有人提巴特尔，但最后选出的是一位才能平庸但处事谨慎的党务人员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风波虽过，尼赫鲁却对国大党内的勾心斗角和党同伐异烦腻透了，拒绝在领导机构内任职。

他打算再一次出国访问。这次他选的地方是中国，他决定去那里会晤国共两党的领袖，共同讨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时欧洲的形势已危如累卵，印度随时都可能作出重大反应，因此他不准备呆在国外，只想看看就回。他乘飞机抵达中国的抗战之都重庆，受到各界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接待。他拜会了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人。在短短的两周内，他与中国社会各界广泛接触，明确宣布支持中国抗战，并与中方共同提出和制定了发展中印两国合作的计划。在与印度有关的问题上，蒋介石建议他与英国人尽早达成一项协议。尼赫鲁觉得好笑的是，蒋总向他吹嘘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如何民主，而他却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他原打算接受中共的邀请访问延安，但突然间接到国内发来的一份急电，原来是德国已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战争已在欧洲全面爆发。国大党请他立即回国研究印度对战争的对策。尼赫鲁只得致电中共领导人表示遗憾，匆匆返回印度。这次短暂的访华使他感到

满意：“无论就我个人而言，或就印中两国的未来关系而言，这两个星期都是值得纪念的。我回到印度后比以前更敬重中国和中国人民，我想不到有任何不幸的命运能够摧毁这个有古老历史而现在又很年轻的民族的精神。”

回国途中，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矛盾的想法和疑问。他渴望打败国际法西斯主义，但又不愿一个受殖民奴役的印度再次充当欧洲的炮灰。“我们常常责难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可是我们更加关心这个控制我们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会滚蛋吗？他们承认印度的独立吗？承认印度有权通过制宪会议制订自己的宪法吗？还有许多这一类的问题需要明确的解答。我们如何使我们政策的两个主要趋向——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得到调合呢？我们如何使我们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协调一致呢？在现存的情况下，这是个很难的问题。”

其实答案很明白，假如英国要想使印度成为一个盟国，就应马上准备移交权力。这一观点由他总结在一份紧急决议中。决议重申了国大党对战争的一贯性政策，要求英国说明它的战争目的；对印度的完全独立作出明确的承诺。尽管也有争议，但决议获得国大党核心机构的最后通过。甘地和鲍斯分别提出其他建议。甘地争辩说，无论英国还是印度都不应当介入这场大冲突，因为“暴力，哪怕是正义的抵抗也是一种邪恶”。他甚至呼吁英国人民用“精神力量”去抵抗希特勒的暴虐，强调印度即使获得自由，也须用非暴力原则来保卫自身安全和抵抗外敌人侵。鲍斯走了另一个极端，他要求利用英国战时的困难处境，重新发动一场反对英国人的不合作运动，不惜使用武力。国大党特别会议通过了尼赫鲁的反法西斯主义纲领，鲍斯和甘地对会议结果都不满意。

一周后，英属印度总督林利斯戈召见印度的主要政治领袖，就印度参战的问题进行磋商。其实这已是马后炮了。就在英国对德宣战不久，林利斯戈就马上宣布印度处于战争状态，这种做法引起尼赫鲁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的极大忿懣。尼赫鲁悲愤地写道：“一个人，他既是一个外国人，又是一种可恶的制度的代表人——竟能够把4亿人投入战争中去，而对他们连最起码的商量都没有过。它伤了印度的心！”国大党派尼赫鲁作为全权代表与林利斯戈谈判，当他开始详细陈述国大党的立场时，林利斯戈要他冷静下来。英国总督以嘲讽的口吻说：“稍微慢一点，尼赫鲁先生，我这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头脑不能与你那敏捷的智慧保持同步。”谈判结果完全无法使人满意。1939年10月中旬，英总督发表一份毫无说服力且空洞无物的声明，答应在将来某一不确定的时候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声明中还包含一个用心险恶的前提条件：权力的移交必须等到穆斯林等少数派宗教团体对宪政安排感到充分满意之后方可进行。尼赫鲁感到极为气愤，他从这一纸声明中再次印证了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顽固心态。他决定直接向真纳发出呼吁！

“我不知道您和您在穆斯林联盟中的同事如何打算，但我真诚相信你们也会对总督的声明表示强烈反对，拒绝按他所建议的方针与之合作，我强烈地感到，我们印度人的尊严和自尊心已受到英国政府的羞辱，他们想当然地视我们为殖民制度的下人，何时何地都可对我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

真纳对此反应冷漠，不置可否，在他眼里，国大党的困难就是穆斯林联盟的机会。数月以后当甘地呼吁他共同努力代表印度反对英国时，真纳却回

答说：印度有两个民族。一个是印度教徒，一个是穆斯林，他们的利益各不相同，穆盟赞同建立一个单独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

英国人虚与委蛇，真纳另有所图，尼赫鲁不得已只能与林利斯戈摊牌了。国大党领袖们要求在政府中任职的国大党高级官员立即辞职，以不合作行动抗议总督的声明。由于国大党的这一决定，穆盟对英国在大战期间的作用和意义便变得更不可缺少。英国人尽可能地利用穆盟，资助其喉舌《黎明报》的出版。一待国大党的部长们辞去职务，真纳便号召穆斯林群众在“获救日”庆祝这一事件。

维护印度的团结，曾是每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愿望，但当自由仿佛已在远处向人们频频招手的时候，英国当局决定玩穆斯林这张牌了。尼赫鲁尽管对教派政治比其他国大党领导人有更深刻的见解，但也难明白真纳的身价会如此大涨，他在致后者的信中坦率承认：“我自己的思想已转到另一个方面，我的大部分兴趣在其他方面，因此虽然我对这一问题想得很多，理解其中大部分内涵，但我觉得仿佛是一个局外人，心灵上感到陌生。”不久前正是为了逃避国大党自身内部的这种“陌生的”气氛，他去了欧洲和中国，只是当印度面临因世界大战带来的特殊困难时他才赴命归来。

1940年7月国大党在浦那开会，尼赫鲁的立场再次得到大会肯定：印度将抗击法西斯，但必须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参战，否则其他一切无从谈起。这时温斯顿·丘吉尔已接替张伯伦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在英国政治家圈子里是出名的殖民政策强硬派，从不讳言自己“是以一个对印度自由绝不妥协的反对者的面貌出现的”。尼赫鲁对丘吉尔作为战时领袖的勇气和能力评价颇高，但认为“他所代表的却是19世纪保守的帝国主义英国，似乎不能了解这具有各种复杂问题和力量的新世界，更不必说那正在形成中的‘未来’了。”丘吉尔对国大党的答复可想而知。国大党已不能再拖延它的抗议活动。甘地意识到，如果发起一场群众运动，就不可能控制运动的方向和节奏，所以他要求只进行个别人的和平抵抗运动，换句话说就是只发动一次象征性的运动。

然而出乎甘地的预料，虽说的是个别人的运动，但参加者的队伍迅速扩大。殖民政府毫不犹豫地下令大逮捕，入狱者很快便达到3万人，其中许多是辞职的地方政府的国大党议员和官员。1940年10月底的一天，尼赫鲁在戈拉库普尔城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会场情绪火热，听众在下面齐声高呼，宣誓为独立随时准备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几小时后，尼赫鲁被捕了，罪名为“进行反政府宣传”，被判在德拉顿监狱服刑4年。他对那座监狱相当熟悉，曾经两度关押在那里。数年以前，《自传》的大部分章节就是在塔楼式的牢房中写成的。他曾在《自传》的“尾声”中动情地写道：

“我在监狱中度过的岁月是些什么日子！我一个人孤独地坐着，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看着一年四季过去。我看见过多少次月亮盈亏，群星运转。我的多少青年时日埋葬在那里，往事不时涌上心头，带来刺心的回忆，它们轻言细语地对我说：‘值得吗？’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什么犹豫。如果根据我现在的知识和经验去重新过以前的生活，毫无疑问我将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作出许多改变。我将在各方面改进我以前所做过的事。可是我不会变动我在公共事务方面所采取的主要决定。实际上，我不能更改这

些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比我自己有力，一种非我所能控制的力量推动我采取这些决定。”

频繁被捕入囚，他早已对狱中生活习以为常。他每天一早起来锻炼，然后去牢房边的园子里干活，挖掘一块坚硬的地面，在上面种上花草和蔬菜。天气不好时他就呆在牢里纺线织布，晚上他在昏暗的灯下读书和记笔记，直到熄灯就寝。

不久他在狱中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德国向苏联发动了全线进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夜之间便成为一纸空文。东方的日本也在印度支那开始蠢蠢欲动，向印度方向逼近。1941年12月4日，尼赫鲁与其他被押的国大党领导人全部获释。东方的战争即将全面爆发，英国人需要国大党的合作，也寄希望形势的突变可产生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性方案。尼赫鲁出狱三天后，从报上读到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消息。这时他的心情与1905年听到日本在对马海峡击败沙俄舰队时简直是正好相反，绝无半点兴奋，他强烈感觉到日本已变为一个暴虐的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国家，到中国访问时他曾亲自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暴行，绝不可能想象印度再成为其又一个受害者。不过国大党内也有像鲍斯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愿完全用世界性眼光看待分析整个形

势，而是坚信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敌人的敌人便是我们的朋友”始终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丘吉尔这时也受到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罗斯福总统明确希望英国能妥善解决印度的危机，尽快使印度获得独立，以免给对日战争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1941年8月美英两国在《大西洋宪章》中宣布：全世界人民都有权自行选择他们的政府。同年9月，丘吉尔却宣称该宪章不适用于印度。然而，日本在东南亚的迅猛推进迫使英国战时内阁必须进行最后的努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的克里普斯使团带着方案来到印度。

克里普斯是英国工党的左翼领袖，他来印度是受英国政府的委派，与国大党协商印度的未来地位问题。尼赫鲁很快发现他虽对现状和形势的进展了如指掌，但没有任何实权，不过是

丘吉尔的传话人，因此双方绝不可能通过谈判达成有实质意义的协议。尽管如此，国大党领导人还是花了不少时间与克里普斯对话。尼赫鲁对他说：一旦日本人入侵印度，国大党将领导一场抵抗入侵者的全面游击战，反英国的和平抵抗也会自动停止。但克里普斯无法说服任何一位国大党重要人物应无条件地协助英国打赢战争，最后只得一无所获地回英国去了。甘地对克里普斯使团的方案的评论非常尖刻，不过反映出印度的普遍看法：“它是由一家行将倒闭的银行签发的过期支票”。

然而甘地却不喜欢尼赫鲁关于组织游击队抗击日本人的言论。他说，日本是与英国交战，又不是与印度交战，印度不应进行武装抵抗。战争正在逼近印度的国土，甘地显得极为不安。在尼赫鲁看来，“他的政策和非暴力的纲领与这个新情况不大能协调起来。很显然，面临着一支侵略军队或是在双方的敌对军队之间，和平抵抗都是不可能实行的。采取消极办法或是接受侵略也同样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该怎样办呢？”尼赫鲁及国大党内许多人普

遍反对用非暴力方式来对付一场军事侵略。一句话，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陷入了困境。

尼赫鲁这时的处境也很艰难。他注意到，国大党内的民族主义者不分左翼右翼几乎都持完全相同的观点。巴特等人极力向甘地证明英国已日薄西山，新加坡的陷落和英军不战而降向印度表明了英国并非不可战胜。甘地不至去与日本达成私下交易，但绝不愿与英国人保持步调一致。激进的左翼国大党人队伍中甚至出现更激烈的反应。1941年1月，鲍斯从他在加尔各答的家中神秘地失踪了，后来又突然出现在德国首都柏林。尼赫鲁得知后极为不安。次年3月鲍斯在柏林广播电台向印度人发表讲话说：轴心国是英国的敌人，因而它们是印度的朋友。他号召印度的爱国者拿起武器与日本军队并肩作战，在全亚洲打败英帝国主义。日本东京电台转录了他的讲话，用来反复向印度播放。尼赫鲁对鲍斯深有所了解，知道其用心在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为印度谋求利益，可他却无法赞成鲍斯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和策略，他任何时候都绝不可能与法西斯国家站在一条战线上。

1942年8月，国大党核心机构在孟买举行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大会申明：“自由将使印度能够把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巨大潜力用来有效地抵抗侵略”，因此英国应立即撤出印度。国大党声称，如果英国拒绝这一要求，就将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抵抗运动。绝大多数代表在会上接受了“退出印度”的决议，尼赫鲁认为该决议“是对于立即承认印度自由和结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合理论证”。会议结束后第二天的凌晨5点，尼赫鲁又一次在家中遭到逮捕，未经审判便被押往亚马那加要塞监狱。亚马那加在历史上颇有名气，16世纪后期曾有一位著名的女王章得比比在那里抵抗过强大的莫卧儿军队的猛攻，后来阿克巴大帝钦慕女王的勇敢和美貌，便停止进攻与她签了永久性和平协议。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这座要塞改成监狱。现在尼赫鲁、甘地、国大党主席阿札德及全部国大党主要领导人都关进了要塞。

运动领导人的人狱并没有使人民放弃继续斗争的决心。每个大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许多村镇被殖民当局宣布为“骚乱地区”，官方动用英国军队镇压运动，甚至发生了用飞机扫射示威者的暴行。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000人死亡和6万人被捕，即使这一打了很大折扣的数据也能反映示威起义的规模之大。比较准确的实际死亡数为1万人左右。国大党右翼指责运动参加者狂热和盲动，监狱中的尼赫鲁为民众辩护说：“你们夸夸其谈反殖民主义运动，而真正进行这些勇敢斗争的是人民。”甘地以为英国人不会动武大开杀戒的想法被事实证明完全错了。

这次是尼赫鲁在英国统治下第九次坐牢，也是最长和最后的一次，在狱中关了两年零四个月，直到大战结束前夕才获释放。漫长的铁窗生活带来的是无法排遣的孤寂，使他的情绪一阵阵低落，但也慢慢促使他“思量并试图用以往的生活、自己的一生与一连串的人类活动史的这些回忆来填补生命中的真空”。他渴望用写作充实自己的思维和行动。1944年4月，他动笔写作《印度的发现》一书，5个月后写完这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的思想”的重要著作。书中渗透了他对印度过去、现状和将来的理性思考和崇高激情：

“我想从写述往事中设法使自己摆脱掉‘过去’的负担。但是这‘现在’连同它一切的复杂性与不合理的地方仍然遗留着，前面存在着那不可知的‘未来’；而且这些

负担并不比‘过去’的负担轻。飘忽的心灵寻不到归宿，还在不安宁地游荡着，使自己和别人都感到不安。我有几分羡慕那些纯洁的心灵，它们未曾为思想的袭击所污损或亵渎过，并且疑虑也从未曾在它们上面投映过一点影子，或划过一道痕迹。在他们看来，生命是何等地安静舒适呵，尽管它偶尔也有震惊和痛苦。”

其实尼赫鲁从没有哀叹或懊悔他本人充当的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壮角色，他早就认定自己就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捐

躯者。胜利已经在望，黎明即将到来，印度的最后独立已成不可更改的事实，等待的只是时间，正如他喜爱的雪莱的诗句：“严冬既已到来，春天还会远吗！”他难道还有理由悲观失望吗！

他在狱中获悉，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取得震惊世界的重大胜利，决定性地挡住了纳粹战争机器的推进。读到苏联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时，他不由得联想到印度所处的厄境。苏联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而献出千百万人的宝贵生命，而印度的孟加拉此时却遭受着可怕的饥馑，受灾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就连殖民政府也无法封锁消息。他难过地想到，印度已被英殖民主义剥削得濒临衰亡的边缘。

也在这个时期，鲍斯在国外宣布成立“流亡政府”，劝说被日军俘获的印度士兵加入他指挥的“印度国民军”，协同日军作战。由于印度人对英国战时高压统治的抵触和仇视，鲍斯居然很快成了人民拥戴的民族英雄。“印度国民军”部队在多次战役中与英军接火，大部分人员被俘或阵亡。“国民军”中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人，他们将宗教分歧和教派恩怨抛到脑后，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择手段地推翻英国殖民统治。鲍斯能成功地使印度人保持团结，这点倒使尼赫鲁很感兴趣。鲍斯在1945年死于一次空难，尼赫鲁公开表达了对他的沉痛哀悼。他虽与鲍斯政见不合，但从怀疑他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忱。他一直认为鲍斯政治上幼稚，少年气盛，容易冲动和受外界影响，但赞扬他机敏能干，忠于自己的祖国。他抵制各种让鲍斯身败名裂的做法，并得到甘地和阿札德的理解和支持。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决定以“重大叛国罪”审判“国民军”的领导成员，尼赫鲁竟重操旧业，以律师身份出庭为他们辩护。他争辩说：他们确实有错误，但他们始终受爱国动机的驱使，渴求自己的祖国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获得自由。1946年，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及印度其他主要城市举行大型群众示威反对审判“国民军”。假如当时判处那些人极刑，印度必会爆发大规模暴力事件。结果“国民军”领导人被改判终身流放，后又因总督下令全部获赦免开释。

大战结束后，印度全国的政治空气急遽升温。在英国，艾德礼的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但对印度的新政策尚未出台。整个1946年印度都处于政治与社会危机之中，革命一触即发，警察和军队内部人心不稳，哗变不断发生。2月中，孟买沿岸11个基地和港内大小船舰上的约两万名海军官兵扯下英国国旗，宣布起义。事变爆发两周前，指挥某海军基地的一。名英国军官集合官兵训话，放肆地辱骂他们是“王八蛋、贱货、野蛮人”。此后不出三天英国当局便失去了对印度皇家海军的控制，兵变范围扩散到近百艘舰只和20个水兵基地。一些舰艇上升起了上面写有“革命万岁”的红旗。孟买发起的声援水兵的总罢业虽遭到英国军队的弹压，但影响极大。这次水兵哗变也与“印度国民军”一样呈现出一个有意义的现象：各界群众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没有出现宗教的分歧和争端。

英国当局看出印度军队已不再可靠，诉诸直接镇压的风险很大，无奈之下只得求国大党和穆盟出面制止哗变。真纳发出教派色彩很浓的呼吁，要求穆斯林士兵退出兵变，但毫无效果。直到甘地、尼赫鲁、巴特等国大党领导人要水兵们放下武器，争取和平解决时，水兵起义委员会才发现已孤立无援，被迫停止起义。哗变者顿时觉得被出卖了，但已没有其他选择。也有许多人国大党领袖们这一行为感到失望和气愤。

印度的形势迅猛发展吓坏了伦敦，英国派出内阁特别使团赴印协商撤出印度的有关事宜。该使团建议印度组成联邦制国家，联邦内各邦有较大自治权利。国大党与穆盟曾打算接受这一方案。但围绕印度统一的问题很快便摊开了矛盾，真纳突然宣布他决不步入某种“印度教独裁”的圈套，从而取消了对英国方案的支持。国大党随后也否决了英国提出的方案。穆盟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鼓动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的“直接行动日”，教派主义冲突在印度迅速扩大并愈演愈烈。尼赫鲁与甘地对教派矛盾的尖锐化痛心疾首。尼赫鲁对国大党领导层内部的教派倾向一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与同情大印度教主义的已特等之间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执。

1945年底到次年初，英国在印度组织了中央和省区立法机构的选举。随着大战已近尾声，英总督魏菲尔决定释放全部关押的国大党领导人。出狱后的国大党领袖们全力以赴投入选举活动，他们非常清楚，印度的统一取决于国大党能否在选举中战胜穆斯林联盟，赢得专为穆斯林人口保留的席位。然而选举结果让尼赫鲁和真纳两人都不甚满意。虽然国大党不负众望获得总体多数，在中央议会中取得57个席位，但却没争取到一个穆斯林席位，全部30个穆斯林席位通落入穆盟之手。这足以表明真纳及其纲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各省的竞选形势各不相同，国大党在穆斯林居多数的西北边省仍保持着多数党的地位，穆盟在穆斯林人口为主的每个省区都未取得总体多数。

1946年8月16日是穆盟商定的“直接行动日”，那天的“行动”在加尔各答致使5000人死于非命。教派冲突迅速蔓延到整个北印度，直到独立时都未能平息，它至少夺去25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大量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演成印度人血洗印度人的惨痛悲剧。等到英国派蒙巴顿公爵前来印度加快权力移交之时，教派骚动已变得不可收拾。

1946年也是尼赫鲁个人在政治上异常活跃的一年。他在7月里第四次被推选为国大党主席，接替届满的阿札德。不久他接受英国总督的邀请，组成印度过渡政府并担任政府副总理兼外交事务部长。穆盟虽也参加过渡政府，但坚决拒绝与国大党合作。年底，尼赫鲁、真纳及过渡政府的主要成员赴伦敦就英国内阁使团的方案进行对话。

蒙巴顿注定是来印度最后降下大英帝国的国旗，为印度近两百年的耻辱划上句号的合适人选。路易·蒙巴顿是英王乔治六世的表弟，战功卓著的海军将领，二次大战后期曾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自英国工党政府1945年初夏掌权以来，印度将在几年内宣布独立已成为明摆着的事实，扯扯绊绊的主要障碍是当时的总督魏菲尔无法使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走到一起。对英国人而言，将印度次大陆分为两个国家未必是上策。但时局越来越明显，穆盟顽固拒绝与一个印度教的政府合作，只需要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此外任何让步都不能使他们接受。魏菲尔尽管想做得尽量公平，但国

大党方面仍怀疑他与许多其他英国官员一样偏向穆斯林。结果英国政府召他回国，换来另一个人快刀斩乱麻。他就是蒙巴顿。

蒙巴顿与尼赫鲁的首次会晤是在 1946 年 3 月的新加坡。前者当时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在星岛处理战后事宜，尼赫鲁以印度过渡政府代表的身份去那里慰问印度军队。新加坡的英国军政要员普遍把他视为不友好人士，主张冷落他，因为他们认为，这位印度绅士作为国大党领袖竟在英国对日作战的最关键时刻鼓动印度的独立，无异于在帝国的后院点火。不过蒙巴顿却不那么看。他预见到尼赫鲁必会成为独立的印度的首任总理，因此哪怕稍微一点失礼都可能给英印两国的未来关系带来严重的麻烦。他毫不犹豫地主动向尼赫鲁伸出友谊之手，对方也立刻作出热烈的反应。蒙巴顿对海军的兴趣远远超过政治，他也不知道不久后派给他的政治使命，他从东南亚返回英国后接受了无数的荣誉勋章，随后马上被派往印度担任最后一任总督。

蒙巴顿 1947 年 3 月抵达印度时，怀揣着首相艾德礼的一条简明指令：退出印度。由于事关重大，他手中的权柄超过他的前任。他还想重提英内阁使团的方案，即印度在移交权力后组成一个统一而松散的联邦，居人口少数的穆斯林在经一段时间后如不满意现状，有权退出联邦。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印巴分治这时已成为无法更改的现实，频繁发生的教派纷争和冲突致使国大党与穆盟达成和解的希望化为泡影。阿札德是一位出色的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远非真纳所能比肩，他与基德瓦伊等国大党内的穆斯林领导人均反对对穆盟妥协。但木已成舟，甘地和尼赫鲁尽管非常难过，还是勉强同意了印巴分治的方案。可即使这时大家也不愿相信分治成为事实，就连真纳直到决定分治的最后时刻都还显得心神不定，他对朋友说，他仍希望每年能去他最喜欢的印度城市孟买住一些时间。

结束殖民统治的最后一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次大陆上空久驱不散的教派阴云使人们对独立即将实现的喜悦大减其色，北印度不断发生的教派冲突搅得人心惶惶。尼赫鲁心里十分清楚，罪责不能完全归咎一方，真纳的确瞅准了机会，适时将宗教融入政治，但他个人并不能对这一飞来的横祸承担全部责任。国大党也不能开脱责任，它对这种整体局面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比蒙巴顿赴印就职早一个月，另一位知名的英国人也来到这个即将失去的庞大的帝国领地访问。麦克米伦后来曾担任英国首相，他这次来印度见过尼赫鲁、巴特等国大党领导人。他巡游的最后一站加尔各答刚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教派暴力冲突，“这场可悲但又极寻常的冲突，给一次非常盛情招待的宴会投下了阴森可怕的影子。”他既为英国即将失去印度感到惆怅失落，又对印度充满希望和危机的前景满腹疑虑。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当我们坐在河边那著名的榕树阴下的凉台上时，处于不同腐烂程度的尸体从上游漂下来。一些鸢鹰在追逐啄食。但由于鸢鹰不是水鸟，它想抓住对它来说似乎是最大的珍馐——尸体的面部特别是眼球，就很难办到，如果想达目的，往往要冒生命危险。一只鸢鹰奋身俯冲攫向尸体面部，但在尸体被抓时即开始下沉，它只好赶紧往上飞，才不致淹死。我怕失礼，自然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但与席上典雅玄远的高谈阔论相陪衬的这个背景，却具有一定的引人深思之处。”

不出所料，蒙巴顿夫妇一抵达德里，尼赫鲁就发现他们是容易善诗相处的人。蒙氏本人开明达观，不带偏见，对印度的民族主义抱有深切同情，力

主印度尽快实现自由。他与尼赫鲁和甘地的关系融洽，但觉得与真纳沟通很困难，他甚至有些看不起后者。他也认为原定的独立时间 1948 年 6 月太晚，担心苦苦等待会把印度领袖们的才能消磨在有害无益的教派纷争或其他无关疼痒的琐碎小事上，印度的形势也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他因此建议将宣布独立的时间提前。1947 年 6 月，他在制宪会议上对 300 余名国内外记者表示，印度最后独立的日期定在同年的 8 月 15 日。换句话说，印度的领袖们还有两个半月时间来最后通过印巴分治的方案，分割印度军队，与在殖民时期享有众多特权的土邦王公达成协议。

尼赫鲁对蒙巴顿的接受同蒙巴顿夫人的个人作用不无关系。埃迪蔽娜·蒙巴顿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英国犹太人家庭，祖父是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她在学生时代就接受激进主义思潮的熏陶，动员父母出资赞助英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与典型的总督夫人们有着天渊之别，她思想激进，崇尚自由主义，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她酷爱读书，博闻强记，是一位独立性十足的女性。她极为欣赏尼赫鲁的才华、热情和幽默，对他的《自传》评价很高。她对尼赫鲁的影响之大令人惊讶，甚至在官方的照片上也能看到他俩亲密无间的样子，也能从尼赫鲁的眼光中明显看出一丝温情脉脉。显然他们相互都迷住了对方。她很快成为尼赫鲁亲密的私人朋友，但作为总督夫人。她不得不抑制自己外露的情感。尼赫鲁也非常喜欢蒙巴顿本人，希望在政治上争取他的全力支持。尽管这样那样的政治考虑将私人关系弄得错综复杂，但尼赫鲁与蒙巴顿夫人的友谊却引人注目，这难免会在国大党和穆盟内引出不少闲言碎语。不过许多人认为他俩的密切关系出于政治动机，其实他们错了，所有了解他俩关系内情的人后来承认，就个人生活而言，尼赫鲁一生中从未像那时那样幸福和满足。

1947 年 8 月 14 日，印度终于迎来她漫长曲折的近代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天。从这天的午夜 12 点起，这个古老、文明灿烂而又饱受屈辱的民族正式宣告获得新生，统治印度长达近二百年之久的英国殖民政权寿终正寝。印度的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从国家制宪议会大厅的主席台上站立起来，面对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情绪激动得难以自抑，他哽噎着几乎说不出话来，最后仅简单说了几句，但这些话的分量和知名度远远超过他的任何长篇讲演：

“多年以前，我们曾订下与命运相约的时间，而现在，实实在在地履行我们的誓言的时刻终于到来。随着午夜钟声的敲响，世界寂然入睡了，而印度的生命却重新唤醒，去拥抱自由。一个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从过去走向新生，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民族长期以来饱受欺凌的灵魂终于扬眉吐气。在这一庄严神圣的时刻，我们宣誓为了印度和印度人民的利益，为更加宏伟的人类事业奉献出一切努力。”

他在发言时，许多历史性场面和人物从他脑海中一幕幕映过：印度璀璨的古老文明，民族的骄傲和屈辱，拉合尔会议的决定性“独立宣言”和第一次“独立日”行动，国大党和千百万印度人民多年来可歌可泣的艰苦斗争，甘地、提拉克、莫蒂拉尔、鲍斯等伟大的自由斗士。他还想起了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恒河和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雪峰……独立，它是一个何等神圣和耐人细细品味的字眼，它象征和蕴含的内容何等地博大和丰富，但印度完全

受之无愧。

六、黎明时方的噩梦

印度迎来了独立，尼赫鲁这时已近 59 岁，他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正在开始。有人称这是他个人英雄时代的开始，然而他却注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面对更多重大的危机、挑战和抉择，他注定将在无法驱散的阴影下奋斗，为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留下一笔丰厚而沉重的财富。

英国人离去了，他们身后留下来一个什么样的印度呢？如论有用的话，他们留给新印度的最直接的礼物要算在近两个世纪中培植、发展起来的军队和文官制度，它们使这个新兴国家具备了成人的脊柱，文官制度确保印度向新政权的平稳过渡，军队则可维持国家的基本稳定和外面安全。至于其他方面，尼赫鲁认为只有时间才能说明问题。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印度，但并没有改变多少陈旧落后的印度。也许其中有些本来就不能改变。烁热的阳光，密密的棕榈林，稻田和茶场，从古代以来就屹立着的参天大树，辛苦的农夫的矮土房，神庙和清真寺，南方那些壮观华丽的宗教偶像，这一切仿佛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土邦王公的统治并非这样。头巾上嵌满珠宝，大象驮着绚丽多彩的华盖和舆轿，铺陈炫耀的金银首饰、长矛、仪仗和利刀快枪的森严护卫，这一切在殖民时期完整保留着并得到强化。随着独立的到来，这样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

人民沉浸在赢得独立的兴高采烈之中，但欢欣鼓舞的气氛几乎在几小时内便烟消云散，愁云和恐慌又布在人们的脸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治与独立同时生效，政治分割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引发加剧了教派冲突，野蛮的暴力、理想主义、胜利、激情和阴谋交织在一起。甘地当时正在孟加拉，有助于稳定那里蠢蠢欲动的教派情绪。但一场冲突却吞噬着分裂的旁遮普。独立前夕这块后来划入巴基斯坦的地区就发生了教派骚乱，迫使非穆斯林人口大批迁徙。独立后，非穆斯林教派的政府无法主政，文官们维持的省行政机构也宣告解体，教派间的矛盾更趋紧张。无论是印度政府，还是国大党或穆盟的领导人起初都未多注意正在酿成的悲剧。就在独立和分治的当天，大规模骚乱几乎同时从印巴新边界两边交邻的城市拉合尔和阿姆利则开始，然后迅速向东、西旁遮普蔓延，甚至也影响到德里。新政府的反应只是大吃一惊和束手无策。在此后几周内，大量人口遭到杀戮，每方至少有五六百万难民争相逃命，沿途伴随着残杀和劫掠。当逃离永不归返的故土时，不少暴徒入室抢劫，强奸妇女，烧死儿童，狂呼教派口号。由大约二万三千人组成的边境部队不仅无法控制形势，而且士气低落，其中一些士兵也加入了双方的杀戮行为。尼赫鲁悲愤地说：“人民完全丧失了他们的理智，行为禽兽不如，疯狂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既是一场心理上的危机，又是一场政治危机。一切精心策划都算错了。印巴分治曾被国大党接受为一条摆脱教派仇视的出路，而现在却只能使仇恨更加严重。尼赫鲁承认，如果国大党领导人早早预料到这点，就会不惜一切保住印度的统一完整。他并不掩饰当时的狼狈，坦率承认他自己判断失误。

尼赫鲁的一位外国友人回忆说，1946 年底，他打算离开已住了很长时间的印度，行前去向尼赫鲁道别。他们一起呆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主要是尼赫鲁说话。当他离开时，尼陪他一直走到门口，将一只手轻轻放在客人的胳膊上说：“马尔库斯，我希望你能记住三件事。第一，印度决不会成为

自治领，而是要彻底独立。第二，决不会出现一个巴基斯坦。第三，一旦英国人离开后，印度决不会存在教派冲突。”这位友人在印度独立后不久重返德里，他不忍心向尼赫鲁重提后者的三项预言，但又无法从心中驱走那些敏感的问题，所以谈其他事时总有些尴尬。不过尼赫鲁却不是这样，他给了客人一个迷人的微笑，突然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话吗，马尔库斯？不成为自治领，不冒出巴基斯坦，不……”他说到这里时突然停下来，几秒钟内两人都缄默不语，屋内静得可听到呼吸声。随后他又自言自语般地加上一句：“难道我错了吗？”

最先传来的西旁遮普的暴行使尼赫鲁惊呆了。“我觉得少有的束手无策。在行动中无论其结局如何，人们总能克服这一感觉，但因我无法采取能产生效果的直接行动，负担变得愈益沉重。”但他还是力图使自己振作起来。他给蒙巴顿写信说：“我不能，也不愿抛弃我对我的人民的责任。假如我不能有效地行使这一责任，那我就怀疑我是否有权利呆在我的位置上。就算我本人不对此怀疑，其他人肯定也会。我不是个逃避现实或喜欢退却的人，我现在写信给你也不是出于这一想法。只是局势极为困难的事实犹如必须接受的挑战。我肯定会接受挑战。”

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垂头认输，要么奋起抗争。尼赫鲁坚决回答：“我们决不会垂头认输！”面对艰难的时局，他的首要任务是使印度人民的心理恢复正常。他写道：“这里的生活依然犹如可怕的梦魇，事事仿佛都出了问题，尽管表面看上去我们正在改善。但是我们的根基已经动摇，一切规范仿佛业已丧失。只有骄傲和责任感支持我们向前走，我们不得不重新建设，建设必须从国内的根基开始。如果树根已经干枯，花繁叶茂的生命力还能持续多久？”

追究起始的责任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无论起因何在，恐怖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难以遏制是眼前发生的现实，到这个时候还去证明哪一方更糟已没有任何意义。1948年新年来临时，据估计从巴基斯坦已涌入大约50万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政府将他们安置在德里及附近地区，但他们痛苦、忿怒、激动、无家可归，很容易成为准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狂热印度教教派组织争取的对象。这些教派组织向德里的穆斯林发出恐吓。德里城住着大批穆斯林居民，其中多数住在城中心的月光广场附近。国大党内的穆斯林领袖阿札德从这里发出呼吁，要德里的穆斯林别逃往巴基斯坦，他用简练平实的乌尔都语讲话、讲到古德里城的传统，向人们追述阿克巴大帝的宽容统治，恳求他们不要离开家园，并保证说他本人决不会背井离乡去任何所谓的“天堂”。

当印度教教派组织的暴徒开始实施驱赶穆斯林的行动计划时，尼赫鲁的怒火终于对着他的内政部长爆发了。内政部本应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部长巴特尔受教派主义的影响很深，在某些方面与尼赫鲁尖锐对立，但经常受到甘地的庇护。尼赫鲁对巴特尔说：“即使穆斯林是牲口，我也不会容忍他们横遭杀戮。”巴特尔却答称有关事态的报道被夸大了。甘地也介入争论，他申斥这位太使他失望的部长说：“我不是住在中国，而是在印度，况且我还能用我的耳朵和眼睛。如果你还要劝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向我保证穆斯林是无中生有，那么显然我俩谁也不会再相信对方了。”巴特尔只得不再吱声。

尼赫鲁不知疲倦地在德里四处奔走，巡视局势，安慰受到惊吓的穆斯林家庭。他经常冲入狂热的暴民群中，喝斥制止无端的伤害行为。当时正在德

里采访的美国记者诺尔曼·卡辛生动地记述了尼赫鲁在教派暴动期间勇敢的个人表现。

一天深夜，一群印度教市民被西北部传来的穆斯林的暴行所激怒，横扫了新德里的主要商业区和月光广场，肇事者冲进穆斯林居住的楼房，捣毁建筑，抢劫财物，准备大开杀戒。甚至警察都还未大批赶到，尼赫鲁已出现在现场，他在黑暗中奋不顾身地冲入人群，试图让人们恢复理智。他看到一名穆斯林正被一群印度教徒揪打，便冲上前挡在暴徒与挨打者之间。突然一人高喊：“贾瓦哈拉尔在这里，尼赫鲁在这里，别伤害贾瓦哈拉尔！”喊声传遍人群，它产生出不可思议的奇效。人们放了那人，呆呆站在那里，丢掉各自手中的武器，夺来的财物掉在地上。暴众们从心理上瓦解了，这时警察赶到现场驱散人群，平息了事态。次日，朋友们急忙去看望尼赫鲁，为他在狂乱的高峰中面对暴众临危不惧感到惊愕不已。其中一位说：“你会被杀死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由你自己来决定”，他平静地答，“其他许多人也会在昨晚被杀掉，那又怎么办呢？”

尼赫鲁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救一位普通穆斯林这件事的影响传得很远，成千上万原已打定主意逃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现在决定继续留在印度不走了，将他们的性命安全押在尼赫鲁保护他们和保障他们的公平权利的能力之上。在以后年代中，印度穆斯林对他的这种信任成为建设国家和维护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

卡辛还讲了一件令人感动的小事。那场教派骚乱平息几周以后，总理与他的一位外国客人一次自己驾车外游，当驶到德里以南约15英里处一个穆斯林居民占绝大多数的村子旁时，由于前面有一支驼运商旅缓缓而行，堵住了后面的交通。这个村一直以教派冲突而有名。炎热难耐的气候，又燥又脏的路上漫大飞扬的尘土，赶驼人的火爆脾气，受阻无法前行的汽车、卡车、牛车和其他机动车上人们不停的叫骂声，这一切都为了一场教派骚乱提供了引燃物。突然间村子里走出一帮穆斯林青年，他们手持棍棒匕首，围住尼赫鲁的车，其中有人认出了总理，对他恶语相加。尼赫鲁迈出汽车朝那个青年走去，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话。这时忽然响起一阵对总理的欢呼声，穆斯林们纷纷围住他表白忠诚，其中一些人满面羞愧，开始为他们的行为而哭泣。尼赫鲁与他们亲切交谈，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他们讲述他的希望。在驶回德里的途中，那位客人流露出对总理安全的担心，尼赫鲁承认当时确有危险，但他说他不能让必须做的事受阻。

但对尼赫鲁来说，比表现个人勇敢更重要的是使丧失理智的人民恢复常态。他到北印度各地到处发表演说，反复告诫民众应该建立起一个国民不因其宗教信仰而缺少安全感的印度。世俗主义从来就是国大党的原则，现在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印度不能采用教派主义政策，如果印度人不热衷于教派复仇，印度军队就有可能开入巴基斯坦保护那里的印度教少数派。他对人们说：“屠杀穆斯林不仅是一件个人人性堕落和教派狂热的行为，而且它也毁掉印度民族的尊严和印度政府的威信，背叛了鼓舞人民进行自由斗争的甘地的哲学。我们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但我们现在仍面临另一场其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已取胜的独立斗争的战斗。这场战斗的敌人并非来自外部，而是一场与我们的自我进行的战斗。”

要履行这一职责，尼赫鲁不可能指望得到内阁的绝对支持。一些内阁成员如阿札德、基德瓦伊等与他站在一起，但他们对印度教群众的影响很小。

而国大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巴特尔、普拉沙德等得到印度教教派组织的支持。与其说他们相信一个神权国家，不如说他们坚持国家应代表印度教多数派的利益。巴特尔认为，穆斯林官员即使愿留在印度，也必定不会忠诚，因此应将他们免职。在他看来，只能将印度的穆斯林当作确保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受到公平对待的人质，因此他反对尼赫鲁在德里为穆斯林保留某些居住区，也不同意派穆斯林官员处理穆斯林难民问题。甚至在观点上比巴特尔更危险的是普拉沙德。他是甘地的信徒，在后者面前卑躬顺从，但是从来就未被甘地的教义精神真正打动过。他写信对尼赫鲁说：单方面的努力并无助带来满意的后果，实际上只会引起出乎意外的糟糕结局。只要巴基斯坦还不断驱逐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印度政府派兵保护德里的穆斯林居民就毫无用处。他甚至警告尼赫鲁：“千万别做逼着我们的人民离开我们的事。”他还认为，尼赫鲁总是规劝印度人以文明方式行事，到头来只会让世界舆论相信印度有罪。

这样一来，尼赫鲁不仅要呼吁骚乱者恢复理智，而且还须劝告他这些有影响力的同僚。他提醒他们，使印度声名狼藉的并不是他的言辞，而是外国人的报道，令他在会见外国使节时也深感羞愧。他写出一封致政府要员的公开信：

“发生的这些事件整个表明了全体穆斯林的境况。无论他们的地位、名望或住在哪里，他们到处遭到追捕和杀戮。暴力团伙光顾每一位外国大使的官邸，搜捕他们的穆斯林仆人。……杀戮和残暴有一个限度，而这几天的北印度早已超出限度。一个放纵于此的民族不仅是对他们自身的残酷，而且也毒染了整个社会气氛。未来的暗淡也许不会因为杀死了若干万人，但会因为伴随着这一暴行并可能持久存在的那种病态心理。我充分意识到我与这种氛围格格不入，不适宜作它的代表。不过我完全相信，如果我们对它举手投降，那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实在是命该如此。

“我们曾经在甘地的指导下谴责恐怖行为。当时那些行为即使用正常的标准看也是正确的，因为是为了民族自由的事业。而现在到处都在以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公开杀戮，我们却踌躇不决，不敢说话，生怕失去人民对我们的拥护。我必须承认，我对这种领导毫无兴趣。除非我们坚持某些准则，否则自由没有什么意义，印度也肯定不会变成我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国家。……我们正面对任何政府都可能遇到的最严重危机，对一个新政府来说尤其如此。我们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后果。世界也正注视着我们，世界舆论值得我们重视。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正注视着自己，假如我们的估计出错，谁还能拯救我们？”

甘地赞同这封信。事实上尼赫鲁这时再一次与甘地靠近了。如果说在独立前数年间他俩的分歧较大的话，这时他更多地受到甘地精神的鼓舞，更加依赖这位师尊兼朋友的影响。他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校庆仪式上公开讲：“你们中有多少人能知道甘地的存在在这几个月中对印度的意义？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他对印度和对自由的卓越贡献。但是，他的任何贡献

都不会超过他在过去 4 个月中的作用，因为他始终像阴暗迷离的世界中一块目标的柱石，一座真理的灯塔，他那坚定低沉的声音盖过了大众的喧嚣，向他们指出应该依循的正确道路。”

随从蒙巴顿的一位英国官员在日记中写道：“近距离观察尼赫鲁面对这一考验时的表现是一次令人振奋的经历。他力图证明人具有信仰人道主义和文明的才能。在教派主义骚乱中他几乎是孤军作战，勇敢面对从个人阴谋到集体疯狂的形形色色的教派主义行径。他用清晰、理智的声音讲话。3 月至 8 月关于权力移交的谈判也没有唤起他充沛的精力，他那时喜怒无常，不时勃然大怒，表明他当时过于紧张。但是现在他已使自己焕然一新，在这场更深刻的危机中他使自己的气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既有激情和勇气，又有客观和冷静。他不愧是我们时代最有见识的人物之一。”

甘地于 9 月 7 日返回德里，他支持尼赫鲁保护少数民族。避免报复、坚持过去的理想和抵制狭隘偏见的努力，从而增强了对印度各方面舆论的影响。但甘地不能帮助尼赫鲁作为国家政府首脑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后者得到蒙巴顿的鼎力相助。尽管按宪法规定蒙巴顿不能插手，但他参与处理危机在当时已成公开的秘密。他出席政府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尼赫鲁在会上宣布成立由有关各部首长组成的内阁紧急委员会，请他担任主席。蒙巴顿插手印度新政府使他能在尼赫鲁死后若干年中过分夸大他本人在当时的作用。蒙巴顿的说法是：尼赫鲁和巴特尔多道请他协助处理局势，他表示同意，但要求对他的积极介入暂时保密，并提出遇事虽与部长们磋商，但实际由他自己说了算。尼赫鲁接受了这些条件。“从 1947 年 3 月到 1948 年 4 月。是我在给他（尼赫鲁）制订治国方针，他对我充分信任，愿意让我自己来干。”

尼赫鲁政府面临的难题很快便从阻止杀戮、设立难民营转移到与新成立的巴基斯坦的关系上。这是一个更广泛和更复杂的问题。尼赫鲁相信，印巴分治只是一个短期的政治解决办法，并不能抹煞两者的文化亲缘关系和经济联系，因此不应将巴基斯坦作为敌人。他希望一旦眼前的骚乱结束，两国可根据人民的自由意愿实现统一。但事态的发展与他的愿望完全相反。

印巴的尖锐矛盾也与土邦的归属密切相关。印度的土邦历来受英国人的精心保护。独立前夕，英国仍坚持土邦王公对将来的归属握有最后的表决权，它们既可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也可继续保持独立。其实人人都知道后一条路走不通。围绕着土邦的最后表决各方展开了大量的秘密活动。为了争取土邦归并印度，国大党不惜贿赂王公，许诺给他们大笔永久性政府补贴，让他们仍能以过去英国人带给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活下去。但最难办的是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两邦，尼赫鲁最后迫不得已对两个地区诉诸武力。

克什米尔的局势尤为严峻。当暴风骤雨正从旁遮普地区开始减退时，一场危机正在向克什米尔逼进。克什米尔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土邦，但统治者是印度教徒。独立前夕，该邦王公在归属印巴哪一方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提议与两国签订维持现状条约。巴基斯坦答应了，但因接到王公的提议时该邦已发生骚动，印度未作答复。实际上，印度官方对王公的决定持冷漠的态度。尼赫鲁知道，巴基斯坦正在后面推波助澜，外部大国也想趁机卷入。他只是请他的朋友、克什米尔民族运动领导人谢赫·阿卜杜拉出面组织地方政府并宣布重新选举。阿卜杜拉刚刚出狱，是一位能干和有号召力的领导人，反对教派主义立场，有使克什米尔归属印度的想法。

印度政府这时对贾纳戈的兴趣比对克什米尔更明显。贾纳戈是位于西海

岸一个领土分散的小邦。独立时，该邦统治者不顾当地 80% 的人口是非穆斯林的事实，宣布该邦并入巴基斯坦。印巴两国领导人都很清楚，该邦的重要性不在其本身，而是它将为某些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开出先例，譬如在克什米尔和海德拉巴的争端。蒙巴顿这时虽还担任印度总督，但已管不了巴基斯坦，他竭力阻止印度对该邦采取军事行动，其他三位指挥印军的英国将军也跟他一样。他成功地劝说住尼赫鲁不要动武并主动表态赞同在这个小邦举行公民投票。在蒙巴顿、尼赫鲁与巴基斯坦总理利亚夸特·阿里·汗的会晤中，蒙向后者强调尼赫鲁的表态的重要性，向他保证印度将严格遵守，并且表示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土邦，印度决不会在违背大多数居民意愿的情况下强迫一个邦并入印度。尼赫鲁听到这里时神情黯然地点点头，阿里·汗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光彩。毫无疑问，他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克什米尔，但心情则完全不一样。

还在克什米尔的危机爆发以前，巴基斯坦已占了明显上风。10月下旬一天夜晚，消息传到德里，说组织充分、装备精良的部落民从巴基斯坦抢先进入克什米尔，正向首府斯利那加进发。印度内阁国防委员会次日凌晨开会，大多数人主张派一支军队增援克什米尔政府，蒙巴顿不同意派兵，尼赫鲁对此也有顾虑，他更希望由当地王公联合阿卜杜拉的力量组织抵抗。他起初拒绝了内阁同事和克什米尔方面的要求，后来只是经不起巴特力和阿卜杜拉的劝说才同意派兵。由此可见，尼赫鲁尽管对克什米尔的山山水水有不少罗曼蒂克的依恋，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政策，向克什米尔派兵的决定绝不是他一人感情冲动时作出的。蒙巴顿见尼赫鲁和他的部长们已下定决心，只有让步了，他知道大家在这件事上完全可以不理睬他的意见。况且甘地的思想也转过了弯，他坚决反对武力，但对尼赫鲁说，向克什米尔的邪恶势力姑息让步决不可能带来和平。不过蒙巴顿还是说服尼赫鲁和巴特力，一旦用军事手段恢复了那里的秩序，就着手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最后归属。印度军队在 10 月 27 日早上飞抵克什米尔，及时地避免了斯利那加的陷落。

尼赫鲁要从克什米尔驱逐巴基斯坦支持的部落民武装，需要得到阿卜杜拉的合作，他写信为后者鼓气：“我们正从事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绝对相信我们能度过危机。昨天作出决定，今天我又听说我们的军队已抵达斯利那加，我感到轻松多了。我们斟酌再三后已采取断然行动，跃入海中，我们定能游到彼岸。它已成为对我们未来的考验。在这场抵抗中，我相信我们将向全印度和全世界表明，在克什米尔，我们能用团结和睦和非教派主义的方式行使职责。采用这种方式，就可克服克什米尔的可怕危机，就能治愈印度近几月中遭受的深重创伤。”

当真纳得知印度军队开入斯利那加时，威胁说巴基斯坦将不惜与印度一战。蒙巴顿屈从了讹诈，提议尼赫鲁与他一同前往拉合尔谈判。尼赫鲁同意谈判，但巴特力认为这是一次谋求妥协的屈辱之行，巴基斯坦这时也发表声明谴责印度在克什米尔搞“欺骗和暴力”，尼赫鲁只好取消出访，让蒙巴顿单独去巴基斯坦听真纳的唠叨抱怨。没有尼赫鲁的参加，这次会晤注定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克什米尔的战斗仍在继续。阿卜杜拉建议向巴基斯坦发出最后通牒，实在不行就正式宣战，但尼赫鲁拒绝了，他只想坚决地从克什米尔驱逐巴基斯坦的部落民武装。蒙巴顿却依然天真地以为印巴两国总理能勉强达成协议，殷勤地促成他俩单独进行一次密谈，但未料到越谈越糟，双方都抱住自己的立场不放。尼赫鲁不断发火，竟声称他将“舍弃总理职务，亲

自挎一支步枪，率领印度人抵抗入侵”。

甘地比蒙巴顿看问题现实，他认为只要英国政府态度强硬，就能强行通过一项解决方案。但艾德礼不愿这样做，蒙巴顿催促他尽快与尼赫鲁和阿里·汗会晤，他充耳不闻。尼赫鲁绝不愿就此妥协，克什米尔这时对他已成了印度根本利益的象征。可以这样说，作出的决定不仅要决定克什米尔的前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前途。因此“它与我们的厉害关系比表面看到的大得多”。蒙巴顿规劝他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裁定，认为这是避免印巴全面开战的唯一办法。蒙氏想的是向联合国笼统提出双方停火，举行公民投票的问题，尼赫鲁要做的却是提出巴基斯坦入侵克什米尔的具体事件。尼赫鲁已表态克什米尔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过他现在还不打算将这个问题扯进联合国的提案中。他也向阿里·汗表明这一态度，同时补充说，只要巴基斯坦继续支持武装侵入的部落民，印度将扩大在克什米尔的战争行动，甚至打击后者设在巴境内的军事基地和通讯线路。阿里·汗说，他欢迎联合国进行干预。当蒙巴顿建议让阿里·汗过目印度打算提交联合国的议案时，尼赫鲁拒绝了，但阿里·汗态度随和，表示并不非得看草案不可。

在印度国内，巴特尔反对向联合国提交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议案。甘地虽表同意，但显得极为勉强，他对草案作了改动，删掉其中提到的克什米尔可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于印巴之外的内容。蒙巴顿对国际事务缺乏明晰的认识，他说服尼赫鲁将联合国牵扯进来，这对印度而言是很不幸的。尼赫鲁后来对此悔之晚矣。印度向安理会的提诉不但未得到想要的答复，反使自己处于被动尴尬的位置。印度原指望联合国阻止巴基斯坦参与或支持对克什米尔的进攻，但巴基斯坦不仅完全否认，并指责印度敌视巴基斯坦，对穆斯林实施种族杀戮，以欺骗和暴力手段将克什米尔并入印度。安理会基本上未理会印度提出的具体事情，明显同情巴基斯坦的立场。他们认为，印巴在克什米尔拥有同等的利益，因此一切有关的国际性决议都必须对两国保持公平。联合国实际上接受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笼统指责，不顾联合国历来只讨论具体问题的做法，结果，“克什米尔问题”在联合国的文件上变成了“印巴关系问题”。

印度在克什米尔驱逐武装部落民的行动并未取得明显成功，巴基斯坦的武装人员仍源源不断进入这一敏感地区。在这种背景下，印度政府于1948年初决定冻结因印巴分治而应向巴方偿还的巨额财产，除非克什米尔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因为人人都清楚，巴基斯坦正等着这笔钱用来从国外购买军火对付印度。巴特尔态度最强硬，他在内阁会议上高声说，“一个子儿也不给！”尼赫鲁表示赞成。但甘地却不同意这样做，认为这是缺少政治家风度和不明智的，将是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桩不光彩的行为”。蒙巴顿也认为它违反了宪法的规定。甘地在国大党和政府中这时没担任正式职务，但他能发挥独特的巨大影响，尼赫鲁在重大问题上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甘地对必须驱逐巴基斯坦的武装人员这点是毫不怀疑的，他不可能接受穆斯林只因宗教信仰不同就不是印度人的理论。印巴分治前夕，当蒙巴顿向他解释分治是合理的妥协时，他们当场便撕破了脸。这次他俩的意见一致。甘地抗议政府扣留已答应返还巴基斯坦的财产，加上印度国内的教派流血仍然不断，这是他从1月13日开始绝食的主要原因。

甘地已是78岁的老人，这是他一生中第十六次绝食，也是独立后的唯一

一次。尼赫鲁、巴特爾和阿札德三人都恳求他停止绝食，但他坚定地拒绝了。尼赫鲁担心这种危险的抗议行动可能会使这位受人崇敬的精神领袖丧生，因为对他的年纪和健康状况来说定时进食至关重要。巴特爾知道甘地的绝食也间接针对着他本人在处理德里的印度教徒暴力行径时的无能，他不满地说，甘地这种无谓的死对哪一方都毫无裨益。说完后他准备起身离开甘地的房间，阿札德希望他继续呆下去，但他终于失去了自制力。“我呆下去究竟有什么用”他大声嚷道，“圣雄不会听我的，他好像已打定主意要在全世界面前给印度教徒抹黑。既然他有意如此，我留在这里毫无意义。”甘地被巴特爾的粗暴言行所激怒，表示要代表印度的穆斯林继续绝食。

甘地的绝食持续了5天，尼赫鲁注意到他的抗议甚至对巴基斯坦也产生出广泛良好的效果。尼赫鲁自己也绝食一两天表示同情。甘地听说后对他表达了深切的关心：“放弃你的绝食，印度需要你。……祝愿你长寿，永远作印度的珍宝。”原话是印地语，“珍宝”与“贾瓦哈拉尔”正好是同一词。5天中甘地不吃一点儿东西，体质状况急速恶化。他绝食是想重新唤醒印度人的良知，改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印度为他的壮举震动了，德里处处举行群众集会，通过决议接受他的愿望，呼吁停止一切教派暴力活动。当地各宗教团体的领导人纷纷前往拜会甘地，发誓按圣雄的意愿停止暴力冲突。印度内阁也表示将重新考虑偿还财产的问题，他们一方面相信原来的决定在情理上无懈可击，同时也表示只要甘地希望就立即付款。当征求甘地的具体意见时，他提议全额支付，于是印度内阁宣布撤销他们此前的决定。甘地停止绝食，表示愿马上访问巴基斯坦，促成印巴两国和平友好相处。

然而，良好的影响很快便在印巴两国消失殆尽，根深蒂固的教派仇视仍污染着人们的灵魂。1948年1月30日黄昏，甘地在比拉宫的院内遭到一名狂热的教派分子的暗杀，当时距他停止绝食仅两天。当印度在等待公布凶手的情况时，穆斯林们惊恐地躲在各自家中，他们害怕假如杀手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穆斯林，可怕的复仇血洗就会顷刻而至。印度的穆斯林对甘地的悲剧性遇刺深感悲戚，对等待自己的明天更是忧心忡忡，当知道凶手是印度教徒后，他们悬着的心放下了。凶手已抓获，愤怒的人群痛打了他并扭送到警署。尼赫鲁与印度的要人们听到噩耗后赶到现场。蒙巴顿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对人群高叫：“穆斯林杀了他，是一个穆斯林！”他刹那间便厉声驳斥他：“你这个笨蛋，你难道不知道刺客是一个印度教徒吗？”其实当时他也不清楚凶手是谁，可他知道，如果传开凶手是穆斯林，那就会爆发大规模的血腥内战。幸亏凶手确实是一名印度教徒。

为人类和睦的事业而死，对甘地的一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是他的生命礼赞的最后一行。他本人也会把这看作是他最后的归宿。早在1926年，当甘地得知另一位在印度享有崇高声望、主张教派和睦的宗教领袖遭到狂热分子的暗害时，他说：“我的心灵是如此难以承受，它已无法哀伤，只愿祈祷让我们就这样去死。”遇刺几周之前，他在德里街头曾问一群刚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难民：“要么口诵神的英名为信仰而死，要么被病魔、瘫痪或衰老慢慢拖死，究竟哪一种更好？我赞同无条件地选择前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作出了更令人诚服的回答。正如尼赫鲁在一篇散文中精深意切的评论，甘地在无意识之中成为创造完美的生活艺术的大师，甚至他的死也带给人们一种无可比拟的艺术享受：

“随着他逐渐变老，他的肉体仿佛只是他那强大内在

精神力量的载体。人们听他说话或看到他时，他们几乎会忘掉他的肉体的存在。所以他坐过的地方变成了一座庙宇，他踩过的地方变成圣土。他的突然离去令我们悲痛万分，我们要永远哀悼他和记住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分，他的脚步敏捷轻盈，他的微笑感人至深，他的双眼溢满笑意。我们绝不会把他同衰弱的体力和耗竭的智慧作任何联想，他的生与死都处于他的力量和体魄的巅峰，留存我们脑海里和我们时代的记忆中的是一幅永不消褪的情景。”

这篇散文写于甘地遇刺两周以后，但尼赫鲁的瞬间反应也差不多相同。当然不用说，甘地的死对他个人的打击是难以形容的。他匆匆赶到比拉大厦证实消息，在现场他“沉沉低下头，开始像一个孩子那样啜泣”。在暗杀发生数小时后，蒙巴顿将他推到麦克风前，他眼中饱含泪水，声音已能自制，职责的神圣召唤压倒了他那沉重的失落和悲痛的虔诚：“朋友们，同胞们，一道光明已从我们的生命中消逝，到处笼罩着黑暗。我不知对你们说什么，我不知怎样对你们说。我们敬爱的导师、我们的慈父不在了。我说光明已经消逝，然而我却错了，因为普照这个国家的光明不是普通的光辉。这束光辉代表的内涵超出瞬时的存在，他代表的是生活，是永恒的真理，它向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避免我们误入歧途，指引这一文明古国奔向自由。一场大难犹如一记符号，它使我们铭记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件，忘却我们已想得过多的小事。他用自己的死来提醒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就是生活的真理。如果我们能牢记这点，印度必将受益无穷。”

在甘地的火葬仪式上，尼赫鲁等人点燃用檀香木垒成的火堆，庞大的人群队伍中突然降临一片沉寂，随之成千上万的参加者开始自发地向尼赫鲁慢慢靠拢，他们希望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拥戴和支持，同时也想从他那里获取力量。一位负责国家保安工作的高级官员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几乎出于本能，猛地对其同事叫道：“让我们在潘迪特君（尼赫鲁的尊称）身边围成一圈保护他。”但尼赫鲁极不耐烦地奋力冲出保护圈，高声说：“在谁的面前保护我，难道是我自己的人民！”

甘地的死震撼了印度，也震撼了世界。有良知和恢复良知的人们纷纷谴责教派主义，内政部长巴特尔被迫宣布教派主义团体为非法组织，教派活动转入低潮。同年4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决定成立印巴问题委员会，采取措施调停两国在该地区的冲突，恢复和平和秩序，为公民投票创造条件。很快实现了停火，克什米尔被停火线划为两块，印度实际控制了人口集中的河谷地区的大部分。但是克什米尔问题仍悬而未决，作为一个致命的隐患将长期影响印巴关系和地区安全。

七、英联邦情结

甘地遇刺身亡后，尼赫鲁成了唯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印度人。他在印度国内的威望已得到广泛认可，从而有可能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外部。印度获得自由之初，正是美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战时联盟无可挽回地陷入崩溃的时期，欧洲被划分为相互对抗的两大集团，东欧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西欧却受到美国的左右，冷战愈演愈烈。西方将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看作是对苏联炫耀战略实力和发出警告。中国革命正在走向胜利，这将在根本上改变亚洲的政治版图，使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对此感到极为恼火。不久以后，冷战终于在朝鲜演成真正的战争。

尼赫鲁 1946 年 9 月参加印度过渡政府时就明确表示自由的印度将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执行一种与她自身的民族利益相符的独立外交政策。不足为怪，这一目标在独立之前谈不上多少精确性和具体性，它主要是一些朦朦胧胧甚至想当然的主观愿望，譬如谋求亚洲各国间的紧密联系，组成亚洲联盟。尼赫鲁说，印度能在从大洋洲、亚洲到东非的广阔区域内发挥积极作用；印度作为一个最先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将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不结盟和积极发挥影响的立场。不过要将这一切认识付诸实践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承认，印度对世界事务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继续，同时又是反其道而行之，此外再加上对世界各国的普遍善意”。一个新兴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制订出来，但尼赫鲁头脑中的总体方针是明确的，他希望用积极严肃的思考代替笼统含糊的认识，一步步着手制订印度的外交大计。

战后的世界并非风平浪静。印度拥有经济和外交的巨大潜力，但国家的综合国力尚弱，若要想在一个已被冷战搅得四分五裂的世界上发挥影响而又不致招来怨恨不满，确实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美国的决策者们尽管手上掌握着核武器，但仍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的苏联则怀疑每一个与他们的意见不完全相同的国家，新独立的印度自然不在受信任之列。尼赫鲁利用一切场合呼吁消除世界的紧张和猜疑，冷战对立的双方话听起来都不甚顺耳。他们在联合国讨论克什米尔问题时故意与印度为难，借此表达对尼赫鲁政府的不满。美国的表现尤为明显。尼赫鲁忿怒地抱怨说：“美国人在外交政策上如此天真，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成功靠的只是金钱和武力，而不是他们的智慧或任何其他本事。”苏联指责印度的中立政策，不断暗示印度应打定主意，不要在集团对抗之外骑墙观望。尼赫鲁虽有克什米尔问题的压力，但不愿根据大国的意愿修改他的既定方针。他并不是要自命不凡地标榜一种与众不同的原则，或是不计任何代价地实施在伦理上无懈可击的外交政策，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这种后来被称为“不结盟”的政策对印度的实际好处，以实用主义的标准评价它的功效，认为它稳固地置根于当时世界的现状。虽然他后来经常阐释不结盟的道义依据，并借此出尽风头而使其他国家自惭形秽，然而他从未忘记这一立场的具体适用性。在他看来，置身集团对抗之外基本上不是一种行为准则，而是需用效果来检验的一种手段。“孤注一掷不是明智的政策。纯粹用机会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只要你愿意，一种坦率的、诚实的、独立的政策是最好不过的。”

从安全因素考虑，独立初的几年中，尼赫鲁看不出有何理由放弃等距离外交转而与大国结盟。当时印度的安全未受到任何直接的威胁，因而有条件从长计议，在不结盟的框架下建立自身的工业和国防，完全不必靠卷入冷战

来寻求直接支持。另一方面，他坚信集团对抗只会带给世界灾难，印度的介入只能助纣为虐。他说：“世界大国相互间的行为实在令我震惊，与我们信奉的原则相去甚远，他们的言辞和行径简直粗暴得难以置信。我并不认为会爆发大范围战争，但只要掌管世界命运的大国始终这样我行我素，不幸的世界就决不可能安宁。”

印苏关系在独立后一段时间中并不友好。苏联起初并不喜欢尼赫鲁政权，一味指责印度新政府的一切政策，指示印度共产党在国内某些地区搞暴动。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糟，尼赫鲁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我们在许多领域需要俄国的友谊和合作，但是我们是一个敏感的民族，我们对咒骂和贬损的反应强烈。俄国的政策基调仿佛还是：印度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它依旧是英国人的走狗。这当然是十足的胡说八道。如果一项政策的依据都如此胡涂，那政策本身必定大谬不然。”本来值得努力去消除猜忌和误会，但印度做得并不好，尼赫鲁的妹妹、印度驻苏大使潘迪特夫人与苏联政府的官员们交往不多，关系冷淡。

1948年9月，苏联的态度曾有改变的迹象。苏联大使对尼赫鲁内阁的一位部长说，苏联政府愿意帮助印度，尤其是处理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的问题。但结果没有兑现，显然是因印度的反应使苏联不快。印度仅保证对任一方都不怀敌意，在大国争端中保持中立，但苏联不能满意这一答复。尼赫鲁除此以外也不愿走得更远。苏联不信任他也并非全无道理，很明显，印度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中立对西方国家更有利。尼赫鲁本人对此也是心中有数，他多次向英美等国发出信号：在当今世界，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印度绝不可能与苏联站在同一个营垒。在英联邦国家首脑会上，他虽然批评美国在经济领域内的扩张政策，但宣称亚洲国家决不赞成苏联的扩张主义，建议多关注苏联政策的这一特征，而不必去批判作为经济学说或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就此看来，尼赫鲁的中立和不结盟有一定的假设成分，他实际上倾向于西方，只不过这与苏联的不宽容态度有很大关系。尼赫鲁总希望他的中立和超脱能得到大国的理解和欣赏，但斯大林当时的确未看出他的良苦用心，正如不久后杜勒斯也不得要领一样，结果这两次都使印度的不结盟饱受冷遇。印度作出的亲西方的反应又招来苏联方面更激烈的批评，两国的不和不断加深。这成了尼赫鲁决定印度继续留在英联邦内的重要背景因素。

从独立那天起，尼赫鲁就开始精心营造他头脑中早已成形的主权共和国的构架，根据正在制订的新宪法，印度成为一个自由的主权共和国是顺理成章的事。多年以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印度完全与英国断绝关系，给印度和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独立的实现使情况出现微妙的变化，英国人主动撤出印度的作法和战后扑朔迷离的世界形势要求他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考虑问题。留在英联邦内，这曾是无可思议和不可能的选择，但它对新印度的好处并非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印度脱离英联邦可谓正中真纳的下怀，因为这样就能使英联邦在印巴冲突中无保留地站在巴基斯坦一边。蒙巴顿和梅农都劝尼赫鲁考虑到印度在军事上的脆弱和经济的依赖性，不要轻易脱离英联邦，以免使它变成反印度的国家集团。他们认为，英联邦并不能限制印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反而可以促进稳定与和平，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确保印英关系继续发展。尼赫鲁赞同他们的观点，打算尽量抛弃历史成见，建设性地探求印度与英联邦建立新关系的可能性。即使这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印度的猜忌和偏见对尼赫鲁的决心不无影响。

尼赫鲁认识到，继续保持与英联邦的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对印度是有益甚至确有必要的，一定程度上也是“迫于某种形势的压力”。他情感上与英国难以割舍是事实，但这对他的政策的影响很淡。他与许多人看法不同，从不把英联邦看成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实体，或是让英国突出其领导地位的场合，英联邦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各国相互交流意见的联合会。以贾亚普拉卡西·纳拉扬为首的国大党左派告诫尼赫鲁说：继续留在英联邦将表明印度缺少自信，有与某一强权集团结盟之嫌。尼赫鲁答道：印度保留英联邦的成员资格可以保证至少在数年内得到实际利益，付出的代价却很小。何况这种联系对印度不存在约束，印度只要认为必要可在任何时候脱离英联邦。与大国的微妙关系是他的重要论据。这些年中，苏联对印度保持冷淡和疏远，尼赫鲁与印共的冲突又增添了印苏之间改善关系的障碍，因此印度能做的只是尽量摆出友好姿态伺机发展关系。印度急需经济和技术援助，不得不致力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但尼赫鲁希望设法避免在双边关系上过分依赖美国。联合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印度持不公正的态度，印度对它似乎不宜寄予厚望。相比之下，英联邦却为印度提供了一个既可维护国家的稳定、又不致被美国拉得太紧的国际组织。尼赫鲁的态度得到英国的赞扬和感激，当时连美国的外交官也怀疑英国在印度面前拆美国的台，美首任驻印大使写信对美国务院说：“蒙巴顿不止一次地提醒尼赫鲁要谨防美元帝国主义。英国人对我们在印度的强大影响和他们自己的脆弱地位很不以为然。”

作出最后决定的责任主要在尼赫鲁。他这时尚不清楚印度能以什么条件保留在英联邦的位置，所以只能让形势的发展顺其自然。英首相艾德礼在1948年3月曾私下向尼赫鲁提出这一问题，建议印度留在英联邦并答应继续效忠英王。艾德礼解释说，印度本身缺少共和制传统，共和思想基本上是从西方输入的，因此只要国家元首根据宪法不享有超出比总督更大的权限，就不会引出任何政治方面的麻烦。何况国家元首由一位超越党派政治纷争的人士担任会带来诸多优越性。再者，留在英联邦有助于印度加强与巴基斯坦、锡兰和马来亚等邻国的关系，促进印度的统一和地区安全。蒙巴顿也向尼赫鲁提议将印度新宪法中的“共和”一词换成“联邦”。他的建议既不实际又无意义，因为就算尼赫鲁同意，宪法的共和性质在整体结构中也不会有所改变。尼赫鲁对印度的英联邦成员资格的问题一直不表明态度，他清楚，印度的公众舆论明显赞成脱离，他不可能随随便便使国内舆论转向，何况他的心理也十分矛盾。殖民主义统治给印度人心灵上投下的阴影毕竟太深，英联邦也太容易使人们联想起过去的屈辱，印度肯定不能再当自治领，她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印度一旦成为共和国，是否还能与英国保持一种比一般的国家关系更密切的联系。尼赫鲁和不少印度领导人都认为发展友谊比确立正式关系更重要，用他本人的话说，发展印英关系的动力主要是因于英国政策的改变，特别是蒙巴顿夫妇的努力使印度人淡化了英国统治那段沉重的历史。但英国在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等问题上的不友好态度又使印度人讨厌与它保持密切的关系。

1948年10月尼赫鲁去伦敦参加英联邦首脑会议。当时海德拉巴已并入印度，与英国的关系少了一个障碍。艾德礼、克里浦斯等英国工党政府领导人表现得非常友好豁达，承认印度作为亚洲大国的实力。尼赫鲁与巴基斯坦总理在伦敦的会谈尽管毫无收获，但他没有理由责怪英国政府。因此当艾德礼再次催促考虑印度与英联邦的未来关系时，他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印度

将成为主权共和国，但可制订单独的条例以界定印度在英联邦中的成员资格。要采纳这种做法，就等于将在根本上改变英联邦的性质，变化包括：不以立法形式标明“英王作为英联邦的第一公民是荣誉之源”，仅需共同认可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安排；英联邦国家在英国的一切法律和条约中不能被视作外国，这些国家的国民也不能被视为外国人；新订商约必须规定英联邦成员国在“最惠国”条款中处于特殊优先地位。尼赫鲁对艾德礼说：“我的建议表达了我們继续保持与英联邦的关系的诚挚愿望，目前来看是务实和恰当的。毫无疑问，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它将得到进一步加强。”¹³⁴

尼赫鲁在他的法律顾问与英方的法律专家进行充分讨论后起草了正式提案，但艾德礼这时觉得他的提案从法律角度看依据不足，遂提议全体英联邦成员国再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宣布它们希望继续与英联邦维持一种特殊的联系。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也极力主张尼赫鲁看重这些国家的感情因素，同意由英王作为英联邦国家的象征并拥有指派大使的权力。

即使就英王是英联邦国家的荣誉之源这一观念，尼赫鲁也不能担保印度能欣然接受。他希望在立法上避免这类提法。当时有人提出，承认英王是整个英联邦的元首，但印度可不对其承担效忠的义务。也就是说印度不得不在宪法中放弃“完全主权”的提法，为英王的名誉地位留出某种余地。尼赫鲁仍然认为不可接受。实际上，让印度或其总统居从属地位的任何感觉都会招来印度国大党和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对。即使在不具实质意义的形式上，他和他人民都对国家主权的减弱或受损极为敏感，这对一个刚获得独立自由的新兴国家是不难理解的。他在给党内同事的信中写道：

“真正的要点在于，英国人与我们的人民在态度上存在根本分歧，英国人以法律或情感为理由而强调的重点遭到我们的反对。大多数人民只准备接受共同国民观点，以及宣布我们属于英联邦。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就会有困难。我们的人民需要完全表明他们正在创出一个崭新的开端，并且就像宪法本身宣布的那样，主权属于人民，而不以任何形式属于其他人。”

这样，当艾德礼及澳、加等国领导人要求专门强调英王在英联邦中的作用时，尼赫鲁却不愿提到英王。梅农急于保持印度与英联邦的关系，这点上他与英国政界人士有共同语言，他提出一项折衷意见：印度不表态承认英王对印度的权力，但英王能如过去一样继续担任包括印度在内的英联邦国家的元首。尼赫鲁同意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英王的权力。印度将不提“英王是荣誉之源”的字眼，并特别声明英联邦并不是超国家组织，而是一个自由、独立国家的联合体；印度接受英联邦共同国民的概念；印度人民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包括共和国总统，将充分行使自己的主权。

但这时尼赫鲁又一次流露出怀疑和担心：针对英国在其他事情上的所作所为，印度人民会同意自己的国家继续留在英联邦内吗？毕竟，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公开支持巴基斯坦，英国人帮助巴基斯坦策划在克什米尔的武装进攻，英国政府还支持荷兰镇压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起义。他致信英国外相：“我很苦恼事情出现麻烦，它妨碍了我所盼望的印度与英国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我觉得英国在印度、亚洲和克什米尔的政策并不得体，我真不懂为何于此，因为我认为英国对印度采用这种政策对自己并无益处。印度目前非常重

要，将来还会更加重要。”艾德礼以他惯用的干巴巴的口气反驳尼赫鲁的抱怨，这让尼赫鲁很不愉快，他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在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对印度的不友好态度完全说不上公正或平等，它显然出于其他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他想让英国人知道，英国仅结束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并不能使印度的民意充分满意，而他们骨子里对印度怀有的偏见只会激起印度人更强烈的对立情绪。

尼赫鲁完全理解印度的强烈反应，但他并不想以情绪作为对外政策的依据。他促成国大党年会发表声明，欢迎各独立国家“自由地加入英联邦”。同时他坚决表示，印度决不会比他在伦敦时答应的条件走得更远。他反对将印度与英联邦的关系看成纯粹的法律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对英方纠缠、拘泥其法律依据感到十分诧异。在他看来，只要双方愿意，即使不设一位总督，一个共和国仍能与英联邦之间方便地处理关系。

艾德礼与加、澳等自治领的总理们坚持确认英王在英联邦的地位至关重要，他们提议，可考虑印度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资格加入英联邦。丘吉尔的想像力甚至更丰富，他从罗马史中找出了共和国加入联邦的先例，不过他似乎觉得应由英国国王兼任印度总统。艾德礼也专门给尼赫鲁来了一封信，大谈英王本人及王室的美德，声称只有英王才真正象征着英联邦的大家庭性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是某种普遍的、超越一切的信念和族类。”为了说服尼赫鲁接受，他甚至提议可从印度古典时代的称谓中为英王寻找一个头衔，从而保留英王在印度宪法中的位置。尼赫鲁却认为他的思维方式过于天真。

尼赫鲁感到继续这类幼稚的探讨毫无意义。英国官员访印时又提出一项建议：印度承认英王是英联邦组织的象征，接受其担任这一组织的“元首”或“保护人”。尼赫鲁坚决反对英王向总统授权的观点，但对其他建议不置可否。问题明摆着，解决方案必须既能为英王在英联邦国家关系中找到一个位置，同时又不能在印度宪法中考虑英王的存在。尼赫鲁礼貌地告诉艾德礼：在制宪的最后阶段修改宪法的任何做法都会引起人心不稳。对于承认英王是英联邦元首的问题，印度内阁和国大党，核心机构答应讨论。尼赫鲁本人不喜欢“英联邦元首”的提法，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英联邦是一个超国家组织。他认为称英王为“英联邦成员国自由联合体的象征”更合适。他也愿意在加入英联邦的实际利益方面再讨价还价，继续提出印度享受共同国民的问题。但其他人对此却没有太大兴趣。

英联邦特别首脑会议 1949 年 4 月末在伦敦举行。尼赫鲁在会上提出他的三点方案：印度享有英联邦国民权，印度保留其成员国地位，印度承认英王为英联邦国家自由联合体的象征。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自治领国家总理强调不能接受修改向英王效忠的章程，尼赫鲁却不同意印度在英联邦中地位低于其他国家的方案。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一向为尼赫鲁所反感，但南非总理在这次会上反显得开明，他附和尼赫鲁说，随着每个成员国的民族意识增强，共同向英王效忠的程度普遍减弱是自然的。他与尼赫鲁都认为，英国王室在其人口并非全是英国血统居民的英联邦中不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因素，只有相同的意识、相同的生活方式和相同的利益，才能给新的英联邦带来活力和凝聚力，因此改革英联邦势在必行而且有益无害。

会议授权艾德礼、克里浦斯和尼赫鲁三人共同起草一项关于印度保留其英联邦成员资格的宣言。共同国民的观念本可对印英关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响，但英国没有采纳印度提出的这一革新性建议，只答应以备忘录形式列出留待将来考虑。大家的注意力仍集中于英王的地位上，看似文字游戏的内容成了争论的焦点。最后在尼赫鲁的坚持下，“英联邦元首及自由联合体的象征”改成“作为自由联合体的英联邦的元首”。本来决定发布两个宣言，一个重新肯定其他成员国的效忠，另一个界定印度与英联邦的关系性质，但后来又将两个宣言合一，这样做的好处是不指明印度的特殊地位，印度接受“英王是独立成员国的自由联合体的象征，因而也就是英联邦元首”的提法。即使如此，尼赫鲁依然觉得“英联邦元首”这个词扎眼，但并不坚持非改不可。况且南非等成员国已经申明，这一头衔并不等于英王可凭借元首的资格取代各国宪法的功能。宣言还明确宣布：全体成员国一律自由平等，不在政策上结盟，而是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追求和平、自由与进步。原稿讲到“和平、安全与进步”，但尼赫鲁将“安全”改为“自由”，因为他认为无论是印度还是另一个英联邦国家都不能要求其他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支持它。某些领导人问他：“合作”在这里到底指的是什么？加拿大总理皮尔逊回忆说：“尼赫鲁无法避开问题，但他给了一个绝妙的答复。他说，除了建设性与和平的目的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合作，通过这种形式建立一个英联邦军事防务集团并指望遏制共产主义是难以设想的。我很少听到比这更犀利的言辞。尼赫鲁的确表现出过人的智慧。”

回国后，尼赫鲁在对印度国民的广播讲话中为印度留在英联邦的决定辩护，他的诚恳和雄辩很能打动人心：“我自然关注印度的利益，这是我的首要义务。我总想从更广泛的世界事务的角度来考虑这一义务，这是我们的导师过去教会我们的一课。他也告诫我们，要依循和平的方式，与其他人友好相处，永远维护印度的自由和尊严。”他发现疑虑、恐惧和仇视正遮住了世人的视线，人们习惯用冲突和冷战的思维定式考虑问题，因此他急切欢迎每一项可能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措施。他坚信，印度与英国之间的历史恩怨以一种友好方式解决只会是一个好兆头，对两国都有好处。当今世界存在如此之多的破坏性因素，用尼赫鲁的话说，“我们不愿再去加剧进一步的破坏分裂。任何有助于愈合旧伤和增进合作的机会都应珍惜。”但他明确声明，英帝国的“邪恶成分”必须摧毁，一切事务都必须有助于各成员国的发展进步。他还补充道：“最好是使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这样对全世界有利，而不是给它带来破坏和灾难。”

共同签署的《伦敦宣言》在印度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也招来不少猛烈的批评。其中包括左右两翼。国大党左翼人士和印共引用尼赫鲁过去反对自治领地位的讲话，指责他言行不一，出尔反尔，“粗暴伤害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感情”。右翼也想方设法找他的茬儿。巴特尔埋怨说，与英联邦的联系必将不可避免地给印度外交政策带来某种消极影响。巴特尔的态度增强了印度国内批评的烈度。当时正巧一位印度工会领袖在马来亚因非法持枪被处重刑，这使印度原以为英联邦成员国之间更容易关照相互之间侨民的利益的希望落空。在国外，苏联《真理报》的观点充分代表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态度，它抨击说：尼赫鲁的决定为英国使印度继续为大英帝国效劳的罪恶计划提供了新的政治基础。相反的是，《纽约时报》赞许它是“历史性的一步，不仅能为英联邦带来进步，而且为共产主义的扩张划定界限，开辟了比大西洋条约更宽阔的防务前景。”

不管外界众说纷坛，毁誉参半，尼赫鲁作为这一决定的始作俑者，一旦

打定主意印度继续留在英联邦，就不会打算再瞻前顾后，三心二意。他相信，《伦敦宣言》在每一方面对印度都是体面的，即使甘地在世也会同意。英联邦既不是一个超级国家，也不是一个仲裁法庭，印度并未用自身的独立作交易，然而获得的却是一个可以支撑她的稳定的大家庭，它给了印度一种外围空间，使如免遭孤立，甚至也能赋予她更大的行动自由。他甚至觉得，由于印度是英联邦的一员，不少亚洲国家对与印度磋商问题和建立密切的关系表现出更强的信心。

正如尼赫鲁所言，印度决定留在英联邦为印英关系“愈合了伤口”。英国外相克里浦斯表露出的兴高采烈代表了英国的普遍心情：“我把这次会议看成是过去几年来我们共同努力的顶点！我非常兴奋，我相信你已做了世界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大事。我们有此机会一道工作，尽管不能始终面对面，但总是心贴着心。”印度与英国之间新关系的基础由此奠定了。不久后召开的国大党贾浦尔年会正式通过这一决议。在英国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成员国资格为印度的外交造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好环境。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印度树立了一个与西方健康发展友好关系的榜样，极大地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声誉。1月26日是国大党在20年前选定的独立日，1950年的这一天，新印度结束了自治领过渡时期，宣告成立共和国，普拉沙德被推选为首任总统，尼赫鲁担任总理。

八、初识薪大陆

尼赫鲁的言论偏向西方，印度确认与英联邦的联系，以及印度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冷淡，都有助于改善他在美国的形象。接受联合国建议在克什米尔停火表现出尼赫鲁的诚意，受到美国的好评，他积极的反殖主张也并未招来新大陆的怨恨。鉴于荷兰殖民军侵入印尼和摧毁共和政府，尼赫鲁在德里发起了一次印度洋邻国会议。这一地区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广阔地域。尼赫鲁没有邀请美英两国参加，尽管英国一直盼望得到邀请。澳、新等国的出席足以表明这是一次地区性会议，并非打算形成一个敌视西方的亚洲集团。尼赫鲁明白：当亚洲各国还相对弱小时去侈谈亚洲集团没有太大的意义，反会引起对立和增加世界的紧张空气。这一时期，新中国还未建立，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因此中国还无法在世界政治中充当重要角色，尼赫鲁设想建立一个以印度为核心的亚洲国家联盟，至少建立一个类似美洲国家组织那样的多种族、反殖和相互合作的亚洲地区组织。因此，尼赫鲁把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会议看作是这一发展过程的第一步。他在两周一次固定给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自信地写道：“从亚洲的观点看，这次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即使不在现在，也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新的力量组织和新的力量平衡。我们并不想形成一个新的集团，但亚洲各国不可避免地会愈来愈团结紧密，印度将在其中扮演主角。”

根据设想中的印度在亚洲的新角色，尼赫鲁不时向吴努、苏加诺、哈达等亚洲国家领导人提出谆谆忠告，自愿在缅甸政府与克伦族起义者之间进行斡旋。为解决缅甸国内的冲突，他邀请缅甸、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锡兰的外交官来德里会晤，吴努不愿接受斡旋，但其他国家的代表仍在德里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主动派去一个调解使团。

印度的这些活动得到美国的明显赞同。美国人在1949年初对尼赫鲁的呼声甚高。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称他是“亚洲最伟大的人物”，建议美国政府就对华政策和对印尼的政策向他征求意见。《巴尔的摩太阳报》评论说：“他在许多方面都算是战后世界舞台上出现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政治家。他的伟大是人格的伟大，他并非只属于东方或西方，并非只属于权贵或贫民，他不只是一位政治家或苦行僧。潘迪特·尼赫鲁身上兼具这一切成分，他代表两个世界、两种哲学和两种生活方式发言。尼赫鲁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关键是他能将过去的恩怨置之脑后，迎接新形势的到来。”《生活》杂志登载了一篇介绍他的长文，同一周内他的照片也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

美国政府也不甘落后，通过驻印大使转达尼赫鲁，希望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内加强合作。尼赫鲁的反应是谦恭中不乏自负，他对美国大使说，美国与印度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予对方，因为两国都具有实在或潜在的重要性：“命运和形势已将巨大的责任压在美国肩上。命运和形势也将印度放在亚洲的一个特殊位置，就连我们这些今天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印度命运的人也未必能够胜任。毫无疑问新印度将不断前进，尽管可能跌倒，但她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前行。”

他的自信发自内心。印度在国内问题上已经度过难关，转危为安，目前正蒸蒸日上，因而她现在有可能在世界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在印度议会说，印度又一次溶入人类事业的主流，成为东西方的交汇点，所以她目前理应该采取一种更积极的对外政策，而不搞骑墙观望、模棱两可的中庸。亚洲

与欧洲不同，历来强调和谐，没有冲突的传统，印度因此能避开与强权结盟，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印度将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探讨一切问题，不受任何欧洲式意识形态的限制。尼赫鲁的观念中这时也开始更多地突出印度特色，甚至掩盖了他的实用主义特征。他挑选拉达克里希南出任驻苏联大使，此人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哲学家，可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印度对世界的价值。

尼赫鲁的外交逐渐走向积极，自然需要明确定位印度与美苏两大国的关系。联合国固然重要，但与他过去的期望有很大距离。尽管苏联批评尼赫鲁政府，支持印共，但尼赫鲁仍愿意对苏联表示友好，发展非政治领域内的关系，如互换影片和交流文化代表团，继续加紧贸易谈判，印度主动提出购买石油等等。但无论不与大国结盟的理论前提如何，印度与英美的关系实际要比与苏联的关系密切得多。印度主要是想从西方国家那里获取经济和技术援助，当然也看重与后者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尼赫鲁在强化了印度与英联邦的联系后，理所当然愿意寻找直接与美国发展关系的机会。此时的驻美大使是他的胞妹潘迪特夫人，美国社交界称她为“迷人的克什米尔贵妇”，但她不善于将热情亲切的交际变成一纸有用的协议。因此尼赫鲁决定亲自出马，接受杜鲁门多次向他发出的访美邀请。

就在这时，美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却让尼赫鲁失望。虽然印巴已在克什米尔停火，但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在实施安理会决议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他不可能接受1949年5月提出的要求印度撤军的议案，除非巴基斯坦完全撤出其军事力量，解散巴控克什米尔的武装组织和彻底消除印巴开战的危险。印巴双方在撤军问题上的裂隙无法弥合，联合国建议请美国的尼米兹将军出面调停。杜鲁门和艾德礼也介入进来，催促尼赫鲁接受调停。尼赫鲁对巴特尔说：“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从克什米尔轰走。”他告诉美国大使，印度无论付出何等代价，定要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坚持立场。克什米尔的争端涉及到道义问题，因此在印巴之间搞平衡和调和是完全错误的。他也致信艾德礼说，印度原则上并不反对国际仲裁，但仲裁必须针对具体问题。

尼赫鲁给在伦敦任驻英联邦高级专员的梅农发去电报：“我们需要与英美两国友好相待，但无论高压还是利诱都不能使我们放弃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立场。”他公开声明，印度反对杜鲁门、艾德礼强加的仲裁建议，印度军队不会单方面撤离克什米尔。西方普遍认为他是在先声夺人，设法回避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印度的不妥协立场反过来又强化了巴基斯坦对印开战的念头，两国的贸易实际上已完全停顿。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和美国特使的调停宣告失败。在尼赫鲁看来，克什米尔问题一如过去悬而不决，甚至形势比以前更紧张，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处事不公。

然而，尼赫鲁并没有取消或拖延他对美国的访问，他承认访美意义重大，为此在心理上作了认真准备。印度需要美国的援助，特别是粮食、机器和资本货物。正如他反问梅农的那样：“印度何乐而不与美国靠近一些，借此增强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呢？”但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既幼稚又傲慢，印度应避免因此而付出代价，特别是不要与美国的企业界拉得太紧。印度急需的经济援助必须以贷款或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以免说话口短，自取其辱。他相信印度对美国有着某种特殊的重要性，毕竟这时亚洲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印度那样的影响力。“印度有许多可以给予，当然不是金钱或出口商品，而是凭借她目前的地位。世界今天已充分承认，亚洲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取

决于印度的未来。印度正在成为亚洲的中枢。”

正因为如此，尼赫鲁决定在访美期间依然展示他本来的自我风格，友好、坦率地说明对美国援助的需求，但不是乞求施舍，而是理直气壮地对印度在世界的地位和印度的未来满怀信心。他提前在给潘迪特夫人的信中写道：

“只要我有时间，我常会考虑即将对美国的这次访问。我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待美国？我应如何对美国人民讲话？我应如何与美国的政府、企业家和其他人打交道？我应将自己的哪一面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是印度式的一面还是欧洲式的一面，因为我毕竟也有欧洲式或说英国式的一面？我必定会遇到某些困难的处境。我要向美国人表示友好，但始终应表明我所代表的事物。我并不想为我们的基本政策承担诺言。我愿意这样想，对美国之行最好的准备就是什么也不准备，而是相信我生就的机敏和临场发挥，总的态度则是友好和开放性的。我去那里主要是学习而不是指教，当然除非人们间接或偶然向我学到什么。我见过许许多多美国人，读过大量关于美国的书，不过我们不能以亲切贴近的方式去真正地熟悉美国的氛围。”

1949年10月的访美并不特别愉快。这是他首次访问美国，他对美国人在技术和物质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他也觉得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缺乏深度。他因美国政府对他的不结盟政策的反应而感到惊讶，他解释得十分费力，但美国领导人的反应却很漠然。他在美参众两院的欢迎会上的演说洋溢着理想主义：“我们必须实现自由并捍卫自由，我们必须对付侵略并抵抗侵略，动用的力量必须能够满足这些目的。但即使我们准备抵抗侵略，我们却不能忘记最终的目标——和平与和解。心灵和智慧必须统一于这一最高目标，决不因仇恨和恐惧而动摇迷失。这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和目标。我们既不对现实视而不见，也不会提倡对人类自由面临的挑战默不作声，无论这种挑战来自何方。一旦自由面临危险，正义受到威胁，一旦发生侵略，我们不能也不会再保持中立。我们将按自己的方式致力于世界和平，不屈不挠地坚持确保和平的思想和行为。”

尼赫鲁希望有伟大民主传统的美国能理解并欣赏印度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立场，也热切盼望在两国间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他以诚恳的口吻告诉美国：“我站在这里，是为了我们两国的公正、自由与和平的共同事业。”但他煞费苦心的讲演和解释并未在美国政客中获得预想的效果，洗耳恭听这位东方圣人讲道的美国人不时面面相觑，不得要领。主人们却乐于不失时机地向他炫耀财富和物质繁荣，令他大倒胃口。在纽约的一次与美国企业界的午餐会上，他被告知，桌边的人可支配二百亿美元。据说在白宫举行的晚宴上，坐在尼赫鲁左右的杜鲁门和美首席大法官文森大部分时间都在争论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产的烈性威士忌孰优孰劣。几年后尼赫鲁在新德里接见来访的美国记者时还谈及此事，批评美国人“过于浮夸”。

尼赫鲁与杜鲁门、艾奇逊的正式会谈也未能增进双方的热忱和理解，大家都摆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样子。尼赫鲁激烈地为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辩解，批评美国模棱两可的态度。美国方面则不喜欢他对新中国的好感，对印度不久前公开表示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大光其火。在经援问题上，美国大使此前已通知尼赫鲁的财政部长，杜鲁门将满足尼赫鲁提出的全

部要求。但尼赫鲁拒绝乞求施舍，也不愿要比印度急需的物资更多的东西。结果，尽管当时小麦在美国市场上大量过剩，要向印度提供一百万吨的援助易如反掌，但印度甚至连条件优惠的交易也没捞到。

实际上，尼赫鲁已打定主意不受美国人的引诱。他态度友好，但立场坚决，明确表明印度将执行不与大国结盟的政策。他对美国领导人说：“你们对中国的态度是错误的，你们的重新装备计划只会阻碍世界和平。”当他结束访美回国之后，立即推动印度正式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不久也紧随其后与新中国建交。美国出于报复向巴基斯坦招手，找到一个心甘情愿的伙伴，美向巴提供军事装备，并诱使后者在1954年加入亲美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尼赫鲁的访美从官方角度看完全令人失望。艾奇逊后来写道：“他对印度来说如此重要，而印度的存在对我们大家又是如此重要，甚至就像伏尔泰说的上帝那样，即使不存在也必须造就一个。但他却是我所见过的最难打交道的人。”尼赫鲁自己的评论是，美国政府想从他那里得到对所有问题的默契，却又不愿在任何一件小事上帮助印度。“他们全力以赴地欢迎我，我对此非常感谢并确实表达了谢意。但他们想要的不是感谢和亲善，他们想要的是我不能给予的东西。”

不过他的访美也不能说是一次失败，因为除了在华盛顿艰难的讨价还价以外，还有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美国公众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他有机会亲自观察美国生活中许多吸引人的侧面。无论他走到哪里，人群都情不自禁地向他欢呼。一位美国人说，他惊奇地发现印度人一睹圣人为荣的风气也遍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欢迎社论以“世界巨人”命题。著名外交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在芝加哥欢迎他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影响我们时代那些冥顽好斗的势力，其中堪称伟大的历史人物的人更少、我们的客人潘迪特·尼赫鲁就属于此列。他的周身发射出圣洁的光辉。”《圣路易邮报》这样报道尼赫鲁结束访问时的情况：“尼赫鲁离我们去了，他身后留下成群泪眼朦胧的妇女。”

尼赫鲁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他那有强烈感染力的个性。对普通美国人来说，他开扩了他们对亚洲的视野，使他们了解到这个古老的大陆正在走向公正、自由与和平的宏大目标。特别是他向他们展现了自由印度的崭新形象，表明印度渴望与美国友好相待，印度也绝非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乞讨者，她虽然物质力量贫弱，但愿意为国际事务作出应有的贡献；她曾在甘地的指引下变得无所民惧，愿意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帮助清除猜疑和恐惶的病态心理。他也反复解释，印度在冷战中的不偏不倚并不意味着对某些根本性问题保持沉默和冷漠，不结盟并不排除信守原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欢迎仪式上重申他在美国会讲到的观点：“当人类的自由与和平陷入危机时，我们不可能也不会保持中立，因为那时的中立就会是对我们为之奋斗和代表的事业的背叛。”

在尼赫鲁的心里，盟约和协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和他所称的“感情共识”。他在美国发表的许多讲演正是想促进这一目的。他希望密切与美国的联系，但又说“最亲密的关系应属不是关系的关系”。他相信无论在华盛顿遇到多大阻力，他仍能对美国公众施加某种影响。的确，印美之间达成的某些共识引起苏联的不安。苏联领导人一开始就对他的访美满腹狐疑，《纽约时报》的文章“尼赫鲁是蒋介石的接棒人吗？”像是发出了警报。苏联提出非正式抗议，后来又召见印度大使，提到尼赫鲁声明的一旦侵略发生印度

将不再保持中立的言辞，直截了当地追问他所说的侵略者指谁。

访美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尼赫鲁本人也深受所见所闻的影响。他既有泛泛的赞赏，也有对不合他口味的东西的苛刻批评。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几年中，他曾对美国极为景仰，寄予厚望。他关在亚马那伽要塞监狱时珍藏着一本赛珍珠签名的赠书。他从小就醉心读潘恩、索罗和富兰克林的著作，也像大多数学童那样在笔记本上整段抄下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但直到1947年独立，美国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遥远海面的一座灯塔。印度独立之初，印美的官方关系不尽人意，他对美国的认识仿佛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但现在通过与美国人民、他们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直接接触，改变了他对这个国家的极端看法：

“我发现我对美国的访问不仅有趣，而且颇令我激动。当然，美国是一个奇妙的混合物，我们都知道它崇拜成功与金钱，但我却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对我有更大吸引力、更加永恒不朽的东西。这使我感到几乎就像在家里般安适自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暴露出当今世界存在的本质冲突——人类精神的冲突。所以我回国时比临行前怀有更强的自信心。”

尼赫鲁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收获，只是更加坚定了他对西方政客的认识。他似乎看得明白，西方并没有彻底摒弃它的殖民主义衣钵，继续理所当然地将亚非国家看成次等民族。访美回国后，印度与杜鲁门政府的关系甚至比以前更糟了。艾奇逊送来一封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信件，口气简直像一道最后通牒。尼赫鲁忿然地说：“我讨厌美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死搅蛮缠。”他仍然拒绝就克什米尔问题接受国际仲裁，对外部压力表示出强烈愤慨。他的确想过，外界批评印度的克什米尔政策也许不应全怪英美，印度政府的含糊其词和对国内穆斯林的教派主义政策也负有责任。因而他设法主动改善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但他的努力未能成功，1950年3月两国差一点兵戎相见。于是尼赫鲁又认定主要是美英等国在为巴基斯坦撑腰。两个月后，美国热情接待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利亚奎特·阿里·汗，尼赫鲁敏感地认为美国想把他树成一位与自己分庭抗礼的亚洲领袖。访美期间留下的幻想顿时从他头脑中荡然无存，他致信潘迪特夫人表达怨气：“我必须说，美国人要么过于天真，要么太缺少智慧。不管你是尼赫鲁、伊朗国王还是阿里·汗，他们都履行同样的例行公事。这样做完全降低了他们的热情姿态和溢美之词的价值。好话用得太多，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我曾在一所学校受过更严谨的语言和行为的训练，恐怕不能欣赏这类拙劣的做法。”

美国的善变在尼赫鲁看来不仅是无法容忍的粗暴行为，而且他的自尊心也因此深受伤害。他减轻伤害的最好办法是嘲讽美国人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幼稚和浅薄：“看来他们是在精心策划扶植巴基斯坦，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是想搞垮印度。让我惊愕的是美国人的政治见解何等不成熟！他们不从自己或其他国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尤其当 they 与亚洲打交道时，他们显示出的缺乏理解力简直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尼赫鲁与杜鲁门政府的不和至少加深了他对美国政府的偏见和抵触情绪。50年代初与他接触过的不少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强烈情绪。当时的美国驻印大使是个苦差事，担任此职的洛伊·亨德森总结道：

“尼赫鲁有某些内心的秘密，他有强烈的反美情绪。”

这是由于几个因素形成的。在他童年，他的家庭教师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灌输一种思想，认为美国人俗不可耐，属于次等民族。据他妹妹透露，这对他的影响很大。要是有美国人应邀到他家做客，这位教师就要教孩子们提高警惕，而且事后还要把客人品头论足地批评一顿。其次，尼赫鲁生来是一个性格极为内向的人，这就对美国人通常的外向性格表现自然而然地抱着反感。此外，他认为美国人低劣，没有文化，倾向于瞧不起他们。尼赫鲁对于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极为恼火，这就更加引起了一种强烈的、或许是下意识的由骄傲而产生的反作用。所有这些观念或多或少地由于他所受到的哈罗公学的教育而更加巩固了。”

美国大使的这番看似全面的评论显然偏颇多于客观，很难有说服力。尼克松 1953 年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访问印度，他的看法也许不失公允：“我在印度会见尼赫鲁之前，有些人对我说他是反美的；有些人说，他是反英的；还有些人说，他就是反对白人。这些指责也许都有点道理，但是根据我同他谈话后的印象，尼赫鲁只不过是热爱印度。”

即使印美关系如此，尼赫鲁依然小心翼翼不招惹美国，避免任何可能与西方恶化关系的举动。在逐渐疏远美国政府的同时，他也注意不让印度倒向苏联。这时他仍对苏联深怀戒心：“印度始终认为国际共产主义是带侵略性的，一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二是因为今天的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大斯拉夫主义。印度并未指责苏联对印共的活动负有责任，但我们心里清楚，俄国在鼓励它们，反过来只要俄国愿意就能阻止它们。”当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提议与苏联缔结友好协议时，国大党和印度政府内不少人表示赞同，但尼赫鲁却要求他们谨慎行事，不要过犹不及，每走一步都要注意反应。他指的主要是美国的反应。他提醒同仁：“假如发生世界大战，印度无论如何也不会与苏联站在一起。显然，我们与美国和英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比与其他国家要密切得多。我们事实上与苏联之间没有这类关系，也有明显理由认为不可能在重大的方面发展关系。”由于印共在西孟加拉邦的起义以及西方国家对印度的猜疑，他指示拉达克里希南与苏联发展关系不要操之过急，以免不慎进一步弄僵印度与英美的关系。

但是，与苏联保持距离和担心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并未使尼赫鲁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偏见。新中国对他的亲西方举动曾多次发出尖锐批评，他没有反驳，而是宽厚地将这些批评归结为“革命胜利的热情洋溢”。新中国的建立显然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国际性事件，其他国家的态度将决定这一事件改变世界力量对比的方式。尼赫鲁充分意识到仔细制定对华政策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上与苏联基本保持一致，尼赫鲁认为这合乎情理。然而他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与众不同，中共根据自己的方式夺得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未得到苏联政府的全力帮助，因此中国不可能只满足于充当苏联的小兄弟。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政权这件事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在于中国已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得到亿万中国人民的拥护欢迎，人民拥护新政权不仅因为它信奉的意识形态，也在于他们从此彻底摆脱了水深火热的苦难，过上幸福的日子。新中国政权稳固，被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其他国家应该正视现实，与这个新政权打交道。对他

而言，以后几年中最重要的是测准中国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承认中国，那就会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设置障碍和引起对立，也会使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拉得更紧。反之如对中国友好，就会鼓励中国自愿地走出苏联的圈子，除了可淡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外，也可加速中苏在外交政策上产生分歧。尼赫鲁特别不喜欢苏联在南亚、东南亚的破坏性政策。为了防止这些地区与西方打得火热并成为后者的基地，苏联感兴趣的只是制造混乱，削弱这些国家的政权。但尼赫鲁相信中国更倾向于制止冲突，促成和平，至少新中国在求得国内稳定和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实力之前是这样的。

因而，尼赫鲁赞成对新中国采取“谨慎友好”的态度，印度应明确摆出友好姿态，绝不要支持中国的敌人，也不加入任何可能被看作是反华或反共的集团。他果断地拒绝了吴努关于印度、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共订防务条约的建议，认为它完全不切实际，无异于将杜鲁门主义扩大到南亚和东南亚。1950年1月英联邦国家外长会议在科伦坡召开，尼赫鲁促成与会者普遍同意，当前所需的不是一个北约类型的太平洋条约，而是在英联邦国家的帮助带动下提高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准。他对世界形势的基本估计，以及对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基本态度，决定了印度在朝鲜战争中拒绝支持美国的好战政策，在严守中立的前提下积极促成停战、和平的正确立场。

1950年底，尼赫鲁已成为一位世界性人物，他的地位与声望与他的国家的实力大小没有太大的必然联系，他的拥护者远远超出印度国界，遍布全世界。无论何处，只要那里的人们厌恶战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渴望用理性、正义和宽容来指导国际事务，尼赫鲁就必然是他们的代言人。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大事，一旦他认识到与印度的利益或与他的个人价值观相关，他就会努力让两者协调一致，譬如公民自由，亚非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巩固世界各地区的和平。纤弱的身架，整洁的外表，身着纽扣锁闭的紧身外套，第二个扣眼中插一朵红玫瑰，头上一顶白色甘地帽遮掩住他的秃顶，他的面孔总是绷得很紧，显得威严和不堪耐烦。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在世界的心目中成了民族自由、进步和国际亲善的主要象征。

最显眼的证明是1950年底剑桥大学的校长选举。原担任此职的简·史末资元帅年初去世，校长的位置一直空缺，剑桥许多年轻教师主张推举尼赫鲁，他们很快便得到该大学校友中一些最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哲学家罗素、作家福斯特、政治家巴特勒和蒙巴顿。大学评议会有近百位成员正式提名尼赫鲁，一份由6位最著名的支持者签名的提名信在投票者手中广泛传阅：

“在有资格担任校长职务的剑桥毕业生当中，印度总理无可争辩是最突出的人选。……潘迪特·尼赫鲁作为印度总理，他竭尽全力为转变因仇恨和偏见而走入歧途的世界服务。他的工作的价值及对和平的贡献是同时期其他剑桥人士所做的一切无法比拟的。我们请求本大学的成员推选尼赫鲁。他既是位学者，又是位国务活动家。由他担任本大学的校长，既表明了我们对他的品格和知识素养的褒扬，也标志着我们希望并相信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人类信念能够和平共存。”

另一位候选人是亚瑟·特德爵士，他是二次大战中战功赫赫的空军指挥官，但他的提名却没有引起像提名尼赫鲁那样的轰动。很多人认为尼赫鲁在

选举中能争取到大多数选票。大学的章程并不要求候选人对提名表示接受，不过剑桥大学副校长还是正式致信尼赫鲁，希望知道他本人对此的态度。这件事很快引出政治方面的问题。假如他接受提名而又在选举中失利，印度的舆论将会极为不快，就算他能当选，投票反对他的不少人也会怨怒。只有保证一致通过他才可能考虑接受，但这却是做不到的。因此尼赫鲁告诉他的支持者，他的提名应予撤销。他毅然放弃他的母校给他的这个最令人羡慕的机会，因为在这个影响英联邦的性质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不愿冒任何有损印英关系的风险。事后仍有不少人对此表示不解和遗憾，福斯特的话最有代表性：“他要真冒一次风险该有多好。”

九、权力周围

萨达尔·巴特尔是国大党内的另一位巨人。他早年投身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党内和人民之中有崇高的威望和强大的号召力。他在尼赫鲁的第一届政府中担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当时责任重大的土邦事务部也属他管。就资历和能力而论，他完全够格，但不幸的是他与尼赫鲁在观念与其他方面的矛盾很深。麦克米伦曾这样描绘他：“他是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人——迄今所见过的印度人中我觉得是唯一具有个性和勇气的人。样子颇像一位罗马帝王，尤其是因为他披了一条白毯子（这是印度教徒在冷天用的），加深了这样的印象。他不让人家谈别的，只许谈他想要谈的，并且突然结束了会晤，但并无真正失礼之处。他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尼赫鲁等人，但有一两次轻蔑地谈到‘那些想靠言谈而不敢行动的人’。”

尼赫鲁与他这位难以驾驭的副手在许多事情上存在严重分歧，早已是印度高层内部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巴特尔也是内阁中唯一敢向尼赫鲁的权威提出公开挑战的人。在过去时期，他俩性格和思想观点上的差异也有显露，但由于甘地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以及大家忙于独立斗争的共同事业，两人都有所克制忍让。但现在不同了，随着独立的到来和甘地的权威逐渐减弱，要使这两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他们不熟悉的行政领域携手合作就显得极其困难了。他俩都深受民众爱戴，一位在党的组织内拥有惊人的影响力，另一位则牢牢控制着政府机构。掌权不出数月，事情已变得形同水火，两人在关于总理的职权范围问题上摊牌，差一点导致巴特尔正式辞职。

尼赫鲁认为，凭借他的职务，他应比其他任何人对总体决策负有更大的责任，随心所欲地指挥、协调和监督应属他的特权。这就是说，他有权干预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尽管当他这样做时应表现得体并让有关部长知道。如果这种压倒一切的权威受到挑战，或是任何部长在不报告总理或内阁的情况下作出重大决定，总理就不可能再继续当下去。尼赫鲁给巴特尔的信中提出了这些看法。但巴特尔对总理角色的解释却截然不同：各部门负责实施内阁的决定，总理的责任只是保证各部门的工作不出现任何冲突。在他看来，假如像尼赫鲁设想的那样扩大权力，总理有权在属于部长权限之内的事情上做主，那他的做法就是不民主。

争执传到甘地的耳里，不出所料，两人都主动表示只要有助于解决问题，自己愿意让贤由对方来干。但甘地规劝他俩继续精诚合作。不久甘地遇刺身亡，他俩更感到有义务遵循圣雄的劝诫。巴特尔仍表示要辞职，只因为甘地遇害表明内政部不称职，但尼赫鲁没有答应，他给巴特尔写去一封长信：

“目前随着甘地君的故去，每件事都在变化，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不同的、更困难的处境。过去的争执已经停止，这意义重大，我仿佛觉得此刻的紧迫需要是让我们大家尽量同心协力紧密合作。确实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的相互合作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我俩共同面对过多少风风雨雨。我能满怀诚恳地说，在此期间我对你的感情和尊重都在与日俱增，我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它减弱。就连我们的分歧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共识和相互的敬意，我们甚至学会了求同存异，不断携手共进。总之，在我们现正面临的甘地逝世的危机关头，我认为这是我的职

责，如果我能冒昧地这样说，我俩作为朋友和同事共同面对一切也是你的责任。不仅表面如此，而且充分忠实对方，相互信任。我会坦率地向你提出，我希望你也能同样如此。”

巴特尔的回信也充满热忱，个人间的友情一度掩盖了他俩在政策上的分歧。例如他们正常公开地表达对教派问题需优先考虑的方面的不同意见。尼赫鲁关心极端的印度教教派主义再生变乱，巴特尔则更看重未能遏制从巴基斯坦涌入的难民。但其他麻烦突然间也接踵而来，大大磨蚀了他们共同携手的决心。巴特尔患有心脏病，常常在莫苏里疗养，虽然尼赫鲁想方设法让他了解情况，但总有考虑不周的时候。巴特尔对不少决定在未征求他的意见的情况下作出感到不满，而尼赫鲁却对巴特尔分管的部门总是行动不力大伤脑筋。

引起他俩相互对立的一个更重要问题是海德拉巴。海德拉巴的问题属土邦事务部工作的一部分，本应由巴特尔全权处理，但尼赫鲁却积极插手，这不仅是因为他身为总理而表现出的兴趣，而且也因为海德拉巴的归属前景直接关系到印度对克什米尔的政策。两处除了涉及到一些各自的具体问题之外，都属印巴关系基本问题的组成部分。海德拉巴与克什米尔的情形正好相反，土邦统治者是穆斯林，绝大多数人民是印度教徒，穆斯林人口仅占11%，1947年8月15日以前没有并入印巴任何一方。从地理位置看，海德拉巴位于印度次大陆的内陆，与其统治者有意归属的巴基斯坦远离。当时有理由和证据相信，海德拉巴的统治者正扩充军队，从海外购进武器，骚扰边界，打算长期对抗印度政府，并同时与巴基斯坦遥相呼应，必要时协同行动。巴特尔主张对海德拉巴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但他正在外地养病，因此印度政府在尼赫鲁的指挥下仍在耐心等待观望，寄希望海德拉巴方面变得明智起来。尼赫鲁总是强调，强制性合并不符合印度的既定政策。他的举棋不定、优柔寡断致使事情一拖再拖，麻烦迭出。直到次年4月，他才以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为由，派军队开入海德拉巴。该土邦遂正式并入印度。对海德拉巴的直接行动对印度的统一进程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但尼赫鲁与巴特尔在处理这件棘手事情上的不同特点也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独立之初，尼赫鲁负责宪法大纲的起草工作，他与巴特尔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引人注目。巴特尔要求，宪法应保证因土邦合并而对土邦王公实行永久性补偿。他对此十分关心，甚至不顾有病缠身，打算从孟买赶到德里争取增加这一条文。尼赫鲁与大多数内阁成员却认为责成一个政府付出这么大一笔补偿金并不现实，他说：“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一永久性的事实，我简直无法想像任何一个政府能保证某种永久性补偿。”但他决定推迟作最后抉择直到巴特尔返回德里。尼赫鲁对这种巨额浪费极为厌烦，但无可奈何，经过多次协商都没有结果，甚至他整个总理任内都未能找出一种减少这笔非生产性开支的良策。

两人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涉及财产权。尼赫鲁反对将财产权列入宪法的基本权利中，但他后来不得不让步。从这点引出如没收私有财产时的赔偿权问题。巴特尔从孟买送来一封信，称要求获得公平、平等的赔偿权利是拥有财产权的必然引申，在国家面临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取消一切对私有经济的激励将等于对印度宣判死刑。尼赫鲁阻止传阅这封信，大概主要不是因为他对赔偿原则有何反对，而是因为信中措词强烈地赞许私有财产。国大党对这

一问题并无分歧，但尼赫鲁、潘特等人急于废除柴明达尔地主制度，因此他们希望在宪法中明确说明制订赔偿原则的是立法而不是司法部门。巴特尔似乎满意了。但尼赫鲁后来发现法庭有充分的余地阻止土地改革法规的执行，结果在部分乡村地区引出动荡，所以 1951 年又对宪法进行修改，规定有权获得私有地产，尽管这与基本权利的规定前后矛盾。

他俩最根本性的冲突仍然围绕教派问题。巴特尔虽然承认世俗主义是一种理想，但更强调教派对立的现实和印度教徒的利益。他比尼赫鲁更激烈地谴责巴基斯坦，他也坚持印度的穆斯林有义务宣布并证明对国家的忠诚。对尼赫鲁而言，以这种方式取得效忠的保证是荒谬的，忠诚不可能迫于某种命令或恐惧，只应该是形势发展的自然结果。只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大多数人民才能造就这一形势。他俩的分歧不仅在内阁中有所表露，而且也反映在国大党内的辩论和高级官员的活动中。据说巴特尔曾在他的寓所召集一些要员开会，猛烈批评尼赫鲁的政策、洗刷掉自己的任何责任、表示打算辞职。同情巴特尔的官员从中得到暗示，甚至有人对西方使节透露他俩迫在眉睫的公开宣战。

尼赫鲁写信请巴特尔不要辞职，希望他将全部问题提到国大党核心机构的紧急会议或某次国大党全会上进行讨论。他俩这时都不愿再掩藏性格和观点上的格格不入了。尼赫鲁在信中说：“情况已起新的变化，这使我深表怀疑：我们共同工作的努力对达到有用的目的是否还有意义，或是说它是否只会阻碍政府的正常工作。我们政府的影响仿佛已严重削弱，人民公开议论政府的政策矛盾百出，结果造成政策全无。在巴基斯坦，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报复是印度对付他们国家的法定手段。这绝对只会毁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此情况下，你我各自为阵、各行其事的事实，并且无论如何，即使人们相信我们那样做，也是极端有害的。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的决定，它涉及到国家的政策，党自然应该在这件事上说话。”

巴特尔申明自己忠实职守，尼赫鲁却道出他苦恼的是一些更根本性的问题：“就个人方面而论，尽管我俩有感情基础且相互尊重，但我们处事方式迥异，因而容易在许多事情上各行其道。还有非个人因素，即国家的大势所趋，它涉及政府、国大党以及其他机构。我看到我的全部理想正化为泡影，印度目前的状况不仅令我苦恼，而且仿佛向我表明：我的毕生事业只是一个失败。”

1950 年 8 月的国大党年会围绕下届主席的选举再起波澜。候选人包括坦东、克里帕拉尼和夏卡拉奥·德欧。就振兴国大党而言，他们都不是理想人选，但尼赫鲁相信选举坦东的坏处最大，因此赞同观点与自己接近的克里帕拉尼。坦东是一位教派思想严重的国大党老官僚，与巴特尔关系密切。尼赫鲁怀着诚意写信劝坦东主动放弃：

“国大党的处境不妙，除非采取某些措施恢复它的活力，否则它就可能逐渐遭到淘汰。它看上去像是已失掉自身的内在活力，我们关心的全是党派之争和争权逐名。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以如此卑微的方式行事真令人悲哀。过去两三年中对此听之任之是我们的不幸。你大概也认为我的言行有许多不对之处。就我来说，我经常惊讶不安地读到你的讲话，感到你正在鼓动印度的有害势力。我认为印度如果要取得进步和保持团结，今天的主要任务是

解决好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要不然，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我们的少数民族。不幸的是，在印度众多人们的心目中，你已成了印度教教派主义观念的某种象征。我在思考，难道国大党也要走这条路吗？如果真是如此，那我的位置该在哪里，在国大党内还是在国大党控制的政府中？因而这个大问题关系到我本人的行动。”

尼赫鲁当时感到公开表达他对坦东不适合担任国大党主席的意见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坦东得到巴特尔等人的支持，巴特尔要求尼赫鲁别阻止坦东当选。尼赫鲁拒绝了，这并不是件个人恩怨的小事，而是防止国大党蜕化变质的大问题，他告诉巴特尔并公开表明态度：“我发誓一旦坦东当选，我将不能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只要决定这样做，我会完全义无反顾，谁对我或我的言行都不会有多大作用。”

人们普遍把这场人选之争不仅看成是个人观点的冲突，也是尼赫鲁与巴特尔之间争夺最高控制权的较量。然而当坦东在选举中获胜，两方摆开阵容准备厮杀时，尼赫鲁突然让步了，他对巴特尔说：“我不可能继续再像以前那样行使职责，我如同当着众人之面挨了一记耳光，这表明国大党不赞同我所代表的路线。在此情况下我担任总理已毫无意义。我感到灰心丧气，无能为力。”

就算他继续任职，他的政治对手们也对削弱他的有效权力怀有信心。的确，这样做比让尼赫鲁彻底退出更使他们中意，他们为这一目的正联合起来。巴特尔相信尼赫鲁仍会像甘地在世时那样及时调整自己适应新的形势，为此主动想消除尼赫鲁因坦东当选而感到的沮丧，他与尼赫鲁共同向报界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证明坦东的当选不涉及任何个人因素。此波未平，彼波又起。总统普拉沙德拖延批准内阁在巴特尔缺席时提出的土地法案，尼赫鲁不顾巴特尔的抗议，以内阁总辞职逼迫普拉沙德表态。普拉沙德和巴特尔两人为此极不舒服。在高层领导人中，党内元老派人物拉贾戈帕拉查理历来支持尼赫鲁的政教分离政策，现在也跳出来两面抹和。内政部提议，打算访问巴基斯坦的印度穆斯林官员须事先经审查得到许可。尼赫鲁坚决反对，因为这表明对这些官员完全缺乏信任。拉贾戈帕拉查理告诉尼赫鲁，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但他又对巴特尔写信说内政部的提议合情合理，只是鉴于总理对此事的坚决态度不必操之过急。巴特尔接此信后交给尼赫鲁，后者才知道拉贾戈帕拉查理对他的个人忠诚也可能动摇。

尼赫鲁开始明白自己已被逼到要么缴械投降要么权力架空处境，他于是接受了挑战，使用他不惯用的政治权术进行抗争。如果抛开他的理想主义个性色彩，他兼具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官场杀手的本能，绝不会乖乖地交出权力，也不会同意按政敌授意他的条件就范，在权力架空的情况下继续当政。相反，他通过一系列言辞激烈的发言，迫使国大党机构接受了完全表达他个人观点的决议。随后他又拒绝在坦东为首的核心机构中任职。他也认真考虑过解除巴特尔在土邦事务部的职权。他草拟了一封给巴特尔的信，想提醒后者注意，有报告证明此前推选坦东任主席的那些邦的政府曾受到很大压力，土邦事务部起了很坏的作用，完全像凌驾在邦政府之上的领主，在本属其他部门管辖的事情上越俎代庖，遇事又很少与内阁商量。尤其是新并入的海德拉巴正变成土邦事务部一手经营的独立王国。

不过这封信没有发出，大概是因为尼赫鲁得知巴特尔此时已病入膏肓。

但他还是通过其他人让外界知道他不满意土邦部的所作所为。他也重新给巴特爾写了一封信，但完全不提解除他的土邦部部长职务一事。尼赫魯答应继续留在国大党核心机构，但明说不会对坦东的错误观点妥协。他考虑到维持团结，不过未解开心中的矛盾：“我在这件事上的行动违背了我的办事逻辑，内心愿望以及我的直觉，我觉得自己仿佛干了错事，我纵容的事几乎是对自己的背叛。”但只要他感到还有机会按自己的意图控制国大党，为它带来新的转折，他就必须继续留在党的核心机构内。

尼赫魯与巴特爾的奋斗没完没了地进行，这两位民族运动的巨人最后的一些往来信函表明他们甚至为某些琐碎小事也大动肝火。1950年底巴特爾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尼赫魯终于从服中拔去了这根大芒刺。

国大党内的阴谋和斗争并未因巴特爾的死而停止。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1951年1月通过一项倡导团结的决议，号召团结在尼赫魯的周围。但是党内的气氛仍使人压抑。尼赫魯要求坦东执行决议，并暗示后者如有保留或拖延，他本人将强制执行。他给朋友写信：“我相信我在国大党组织内还有些影响，但我感到我越来越不起作用了，我仿佛已同党的工作断了联系。以前我并没有这种特殊的感受。所以，尽管我渴望有所作为，但发现自己有点无能为力，有时我甚至怀疑是否还值得继续这样下去。”

他再次准备放弃国大党核心机构中的职务，但不打算离开国大党。不过这次他决定以退为进。他认为，尽管弊端在党内潜移默化，但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政党组织。当国家最需要稳定和团结一致之时，如果国大党销声匿迹或停止工作，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众多相互仇视和相互冲突的小集团，甚至导致政治动乱。但国大党必须进行改组。尼赫魯仍对通过他称的“适当转弯”将事情引入正途抱有信心，这不仅意味着要清除坦东，而且要在党内和国内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他对此耿耿于怀，甚至不分场合地对来访的外国记者说：

“我们在探索我们的灵魂。这听起来有些过于形而上学，但我们讨论的当然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正在探索，设法对我们的国内生活、国际生活以及个人生活进行某种调整。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它为团结。我不知道我是否应向你流露紧迫感。我们生存的世界宛如一座欲爆的火山，印度的形势也是爆炸性的，我为未充分意识到这点而悲哀。我对印度的未来充满信心，但也不能小看我身边出现的众多分裂倾向，他们简直不知道人民在想什么，而是将精力花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忘记了重大事情。我们的民主还是一株必须精心培育的纤弱树苗。”

作为计划的第一步，尼赫魯必须改组国大党的核心机构，以便使党内能包容不同的观点。他建议召开一次小会，但坦东表示拒绝。后者认为尼赫魯应先整顿政府，假如国大党不受欢迎，并不因为它的立场或行动出了问题，而在于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时，例如控制粮食供应、颁布片面性的印度教法典等。坦东讲到的例子本身就足以让尼赫魯生气，因为它们正代表着双方的立场分歧所在。尼赫魯背着坦东找来一些经过挑选的国大党高层人物开会，其中包括内阁成员潘特、基德瓦伊和莫拉吉·德赛。他坦率地说：“我对目前的局势感到很伤脑筋。压在我和你肩上的负担和责任是沉重的，我们必须摆脱过去狭隘的老一套来思考和行动，而应完全勇于面对形势。历史赋予我

们责任，我们不能推诿逃避。”

国大党民主阵线是国大党内代表左翼的团体，成立于1950年，它反对坦东代表的路线。该组织于1951年5月开会，讨论退出国大党的问题。这时，一些邦持不同政见的国大党领导人已经辞职，现在最怕的就是其他人也如法炮制，参加反对党或与反对党在大选中合作。尼赫鲁和阿札德恳求他们不要退出，而是从国大党内部努力。去留主要取决于基德瓦伊的态度，他是民主阵线的主要领导人，与尼赫鲁亲近，并参加了后者召集的小型会议。尼赫鲁决定对他施展个人影响。

鉴于眼前这种错综复杂、阵线不清的局面，尼赫鲁一度也难免灰心丧气：“我生来就不适合在偏狭的党派陈规下发挥作用，也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素质。我对我周围所见的低下的见识和道德水准感到厌烦之至。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不久，克里帕拉尼等人又表示将辞去国大党内的职务，尼赫鲁一再挽留他们。他费力地维持国大党的团结，建议坦东不要接受主要党员的辞职，同时他也继续寻找办法削弱党内高层反派势力的影响。他写信对蒙巴顿说：“只要有值得我为之奋斗的事，我就是一名优秀的斗士。只要一个人对自己的直接目标疑虑重重，他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就会减弱。”他辞去在国大党议会党团中的职务，表面原因是他不满党团对某些越权的地方首席部长抵制不力，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要借此重新扭转国大党内的风气。尼赫鲁下一步要求坦东改组党的核心机构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坦东意识到尼赫鲁意在端他的家底，顽固拒绝这样做，但违心地表示愿辞去国大党主席职务。

正当最后摊牌日益明朗化的时候，支持尼赫鲁的营垒内部又生出乱子。尼赫鲁的地位因基德瓦伊等人的活动受到损害。事实证明他给这位朋友的忠告没起作用。持不同政见的国大党人大会当时在巴特那召开，会上新建一个社会党。尼赫鲁的反应非常严厉：“一个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组织按常规不能称为一个政党，最好称它是乌合之众的下等酒吧。”基德瓦伊的做法让人捉摸不透，他出席大会并发了言，被提名为新党的中央委员，但他此时仍是国大党员并担任内阁部长。他的用意其实在于利用新党加强尼赫鲁在国大党内反对坦东的力量，但他自作主张，热衷于秘密活动。他对尼赫鲁的忠诚不可动摇，正如他对尼的表白：“过去30年的关系使我懂得，你说的话塑造了我的思想。”不过他的行为方式却常使尼赫鲁难堪，难怪后者说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朋友。我的计划多次被他的言行打乱。我对他感情很深，但他就是不能约束自己，总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这一时期，巴基斯坦威胁着要开战，国内反对党多方发难，与国大党内保守势力的大较量也处于关键时刻，党内的进步力量正需要紧密团结。但基德瓦伊的辞职等于也辞去他在内阁中的职务，帮了尼赫鲁的倒忙。尼赫鲁不愿接受他的辞呈，但无助于改变事实，他陷入被动，只得向坦东承认一位反对党成员不宜担任内阁职务，快快接受了基德瓦伊的辞职。

坦东赢得这一回合，尼赫鲁不得不重新计划他的战略。一旦他的头脑清醒过来，便开始寻找彻底摊牌的最佳时机。他在思考，党如果内部分裂并表现疲软，就无法发挥国家的团结因素的基本功能。他如果继续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下工作，也只能是无所作为。“你认为自己无所作为的时候，你就如同一个死人，执行着某些僵死的陈规。现在我开始为自己找到感觉了。”他意识到清除坦东的机会已经出现，决定开始按计划行动，但这次是以退为进。尼赫鲁辞去在国大党核心机构和中央选举委员会中的职务，并告诉内阁同僚

说：“我相信自己对这件事的操心超过任何事。和睦团结的努力已经失败，谬见影响着党的政策，党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小，它也许能赢得大选的胜利，但也许会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灵魂。我绝不能站在那里袖手旁观，责任属于我，决定也必须属于我。”

坦东知道无法招架尼赫鲁的辞职“绝招”，再次主动提出下台。国大党核心机构在尼赫鲁未出席的情况下开会，一致同意坦东辞职，请求尼赫鲁回来重组党的机构。但尼赫鲁并不打算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折衷，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个性或脾气，而在于基本的政策。他在致党内某些高层人士的信中写道：“是谁的观点在国大党内流行，是坦东还是我？对这个问题应该作出明确的答复，任何逃避现实的企图都只会使同一问题以更尖锐的形式反复提出来。”直到党内人士都认识到并且承认他们两人的对抗是路线是非之争而不是个人积怨或权力之争时，尼赫鲁才答应接手国大党的权力。他做到了这点。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1951年9月召开会议，批准坦东辞职，推选尼赫鲁再次担任国大党主席。从这时起，尼赫鲁开始集党政权力于一身，最后结束了独立以来政府与国大党貌合神离、各行其事的怪现象，充分巩固了他不受挑战的地位和权威。或许这才是“尼赫鲁时代”的真正开始。

克里希纳·梅农也是给尼赫鲁带来政治上麻烦的人物。他是尼赫鲁的朋友，独立后任驻英联邦高级专员长住伦敦。他面容清癯，精明强干，政治上雄心勃勃，但健康状况不佳。他与尼赫鲁之间的特殊交情尽人皆知。独立前夕，尼赫鲁对梅农率团在伦敦的艰难谈判给予极高的评价，从此梅农深得信任和器重，不少人认为他是尼赫鲁的标准代言人。尼赫鲁赏识他的反应机敏和谈吐严谨，曾公开说：“我很难再找出比他更敏锐和聪明的人了。”在新德里，围在尼赫鲁身边的人大多是见识浅薄的平庸之辈，因此他更欣赏梅农表现出的智慧，承认他俩对大多数问题的看法有共鸣之处。用一位他们的共同朋友的话说，即便是他们之间许多随意的交谈，也都有某种心照不宣的内心对白。

梅农独立初担任驻英联邦高级专员的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尼赫鲁对他的尊重和情份。他在英国有很深的背景，与执政的工党领导人关系不错。他深具外交眼光，在英联邦的多次磋商中发挥出色。同时他生活上刻意显耀简朴，不重排场，在英国外交圈子里留下深刻印象。尼赫鲁对他的欣赏也得到克里浦斯、蒙巴顿等人的赞同。但是，梅农个性和工作作风上的重大缺陷也逐渐引起尼赫鲁的注意。尼赫鲁甚至感到梅农的作用正在变成对他不利的因素。梅农不信任大多数官员，对财经问题一窍不通，从不愿委派权力给其他人，事无巨细喜欢亲自过问，甚至连文员稍稍离开一下都得经他许可。他每天可以花数小时监督公车的使用情况。尼赫鲁发给阿札德的一封加急电报竟被他耽搁了大约一周时间。阿札德当时正在访英途中，只因梅农坚持要亲自处理一切电报，但碰巧身体不适卧床休息。就连他卓越的政治见识也因他对琐碎小事的过分操心而显得黯然失色。况且当时有人揭露，他以自己的名义介入几桩可疑的交易，致使印度政府损失数千万卢比。其中最显眼的是购买大批质量低劣的吉普车一事。大家相信梅农的朋友们从这些交易中捞到不少好处，审计总监和财政部长建议对当事人提出起诉，但尼赫鲁坚决反对，否认其中有任何不正当和不道德的行为，也否认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但他承认监督不严和判断失误，这件事因此不能就此了结。

梅农自然将此事及其他批评说成是官员们在尼赫鲁那里栽赃陷害他。几

个月过去，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他长年大量服用镇静剂，经常昏厥，这下看上去更糟了，像是变了一个人，智慧和机敏不见了，他在公众场合讲话甚至语无伦次，糊里糊涂。他总觉得自己被想像中的敌人重重包围，他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次，他竟向情报部主任告发巴特尔，当时后者正前往伦敦访问。不久后他又为签订对日和约一事给尼赫鲁发去一封电报，电文显然是他药性发作时口授的：“我敬请你亲自考虑这件事，不要让你的文官们用主意牵着你的鼻子走。他们的想法简直像英国人。请不要再做错事。除你自己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懂外交事务。”言辞如此生硬，尼赫鲁不得不命令他收回。尼赫鲁建议他首先考虑自己的健康，必要时离职休养。为了让他相信这是出于好意并打消疑虑，尼赫鲁表示近来自己也坐卧不宁，也打算放下工作去休息一段时间。

梅农不是一个听劝的人，但事态已不允许尼赫鲁再顺其自然。艾德礼在给尼赫鲁的信中称，由于伦敦的印度使团雇用了一些英国共产党员，英国政府以后将只通过驻印度的英国高级专员传递绝密情报并处理事宜。梅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诽谤，是对印度不顺从英方政策的报复，因此总理应坚决拒绝艾德礼的建议，或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但尼赫鲁认为印度在这件事上处于不利。他也正好利用这一尴尬的处境将梅农调离英国。

梅农似乎察觉到尼赫鲁的意图，他首先想到是尽量挽留后者对他的情感。他给总理的特别助手马泰写去一封充满哀怨的长信。他知道尼赫鲁会见到这封信，因而在信中抱怨他没有获得应有的支持，并暗示想要自杀：“我想你不会了解，我与潘迪特（尼赫鲁）在精神和感情上的联系到现在已有20年之久，尽管其中大部分只是单向交往，因为毕竟对方是一位如此伟大的人物。但眼前，受信任和重用的是那些想毁掉我们的事业和使我们的独立贬值受辱的小人。他已明确表示讨厌我提意见。……好在现在一切都结束……他是今天亚洲、也许是世界最伟大的人，对他的忠诚相伴我一生。忠诚现在要求我悄然消失。”

对梅农信中歇斯底里的讨好奉承和凄切悲怨的自怜，尼赫鲁的答复并不强人所难且不乏好意。他想用现身说法来开导这位想不开的人：

“你了解我对你的依恋，你也应知道我如何评价你的才能。但我想你一定不希望我放弃自己的判断，尽管它与你的判断并不一致。我并不完全相信你的判断，或是说，你有时对我的判断表现得非常缺乏信心。我必须应付这里的局势，不得不我行我素。你大概不希望我不顾自己的经验或意见吧！我们正在度过艰难的时期，我不知道下几周或几月内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一个月后我是否还担任总理。发生的许多事令我烦恼，我努力想使自己像以往那样从容地处理一切，不让自己烦躁不安。只要我还能正确行事，保持自信，我就会尽力而为。对我来说，靠极力强打精神来工作对我和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与每个与我意见相左的人大动干戈也毫无裨益。”

梅农仍坚持说他没有生病，并连连申辩他对尼赫鲁的忠诚不变。但证据多起来了，连他的医生以及蒙巴顿夫妇都劝他退休。尼赫鲁派马泰去伦敦了解情况，也让梅农知道用意所在。在接到有关梅农身体糟糕的确实报告后，他给马泰写去一信，信中处处流露出他那令人感动的人情味：

“数月前我决定克里希纳（梅农）必须离开高级专员一职。但我并不着急，我想让他自己提出来。我作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日益不适合这一工作，但主要原因是为他本人着想。我看到他正渐渐消沉，说不准哪天他会在其他人面前让自己丢丑。那才是生活中的真正悲剧，而当这一切发生在像克里希纳那样卓越、正直和忘我的人身上时，悲剧色彩就更重了。死亡和自杀是不好的，也是痛苦的，但它们并不能抹去过去，它们只不过为生命打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但是心灵的沉沦和蜕变更加可怕。对过去时光的记忆都被最近的不愉快印象淹没了。”

尼赫鲁写给梅农本人的信既温和又坚决，坚持要他离职6周接受治疗。梅农仍不同意，但表示要努力振作起来。医生和蒙巴顿夫妇不时向尼赫鲁汇报近况。这时碰巧英国政府换届和保守党重新掌权，立即撤梅农的职可能被认为有政治原因，所以尼赫鲁不再催促他离职，但要他开始慢慢办交接手续。梅农的抵制仍在继续，他送交了一份冗长晦涩的报告，要求重建印度驻英联邦使团，拒绝对过去的行动作任何解释。尼赫鲁告诫他别让其他人利用他的固执来毁损总理的形象，但他充耳不闻。尼赫鲁只得再给他写信：“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我总担心说的话或做的事会带给你伤害和烦恼，甚至更糟的是误会。生活本身已够难了，我们没有必要使它更难。因此，我希望你能考虑我心平气和写给你的信。请想想我必须发挥作用的大环境，想想我们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

尼赫鲁起初打算让梅农进入内阁，但梅农威胁说即使自杀也不回国。他又提议让他当驻莫斯科的大使，后者又拒绝了。梅农言不由衷地说：“我目前想做的一切是悄悄而不失尊严地离开或消失。我真遗憾你已将我归入追名逐利之辈！”后来尼赫鲁又提议梅农到印度驻联合国使团工作，这样既可让他有些事做，又能让他离开伦敦。他一直留在那里令他的继任者十分为难。梅农愿意前往纽约，但有言在先是当使团负责人而不是当驻美大使潘迪特夫人的副手。此时恰逢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尼赫鲁终于想出一个折衷办法，让他代表印度政府专门处理朝鲜问题。

梅农尽管在这一位置上经常得罪西方，但还算称职。1952年大部分时间里朝鲜和谈陷入僵局，梅农无事可做，于是又开始抱怨尼赫鲁不重视他。尼赫鲁委婉地对他提到外国友人的评论，说他总是避开印度使团，花很多时间与外国人泡在一起。结果又引出他的一番伤心表白：“我的确经常感到我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我觉得我们间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关系并非一般，只有靠我俩本人才能维系。我相信美好的时光依然还在，因此写信给你。”尼赫鲁接信后马上打电报安抚他，随后又写去一封温情脉脉的信。这封信很能表现他为人处事的一贯风格：

“我昨晚收到你的上封来信，读了不止一遍，总想弄懂究竟是什么事令你不安。我当然意识到你写信时颇为苦恼和并不愉快。你问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我真不知道我们间出了什么问题。我现在仍同以往一样对你怀有感情和敬意。我有时不理解或不喜欢你的言行，但对其他人也是常见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对我们最亲密

的朋友，也难免有疏远和缺少理解的时候。然而时间过去了，感情基础依旧还在。一个人能充分了解或理解另一个人吗？别人是否喜欢、是否信任其实完全无所谓。真正重要的是感情基础、尊重和相互诚实。就我自己而言，没有任何事情可动摇这点。我与你在一起时很愉快，喜欢我们的谈话。当我知道你可能回到印度不走了时深感高兴，因为我并不想离你太远。因此，请你别再去想那些没有的事，不要为此徒生烦恼。”

从尼赫鲁那里得到感情的确认，梅农的个人野心这下开始膨胀。他一改早些时候的态度，愿意回到印度工作，他要总理任命他为内阁部长，但尼赫鲁发现他在国内的知名度和声望不高，不打算满足他的要求。不过当按拉达克里希南的建议让他当德里大学的副校长时，他忿然拒绝，仿佛自己受到莫大的羞辱。这时朝鲜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他正好有些事做，重新安排他的事便暂时搁置下来。朝鲜战后不久，印度被选为印度支那停火监督委员会主席国，梅农专职负责委员会的工作。他也多次率印度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在许多外交场合激烈指责美国等西方国家，其中似有明显的渲染个人性格和出风头之嫌，不时也让尼赫鲁被动地站出来替他圆场。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和外交官也毫不掩饰对他缺乏好感。从朝鲜战后到 1955 年期间，梅农虽未担任内阁职务，但一直以尼赫鲁的首席外交事务顾问的身份出现。原驻华大使潘尼迦已经失宠，潘迪特夫人去伦敦担任驻英联邦高级专员，外交秘书皮莱表示他与梅农在外交部里势不两立，不久他主动退出内阁。其他几位资深外交官都与梅农的关系很僵，但怯于他与总理的交情而避之不及，各寻出路。尼赫鲁对梅农的迁就甚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本人在政府中的威信。1956 年，仍不满足的梅农再一次向尼赫鲁流露出极度忧郁，后者竟不顾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大党议会领导人的反对，任命他担任政府不管部部长。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尼赫鲁盼望已久的，梅农的入阁事实上的确加强了他对政府的控制。后来梅农又从他那里取得国防部部长的交椅。

在这段时期，有损尼赫鲁形象的另一个危险人物便是他的特别助理莫汉·马泰。马泰是喀拉拉邦的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速记员，但精力充沛，办事认真。他早在 1946 年 5 月就进入尼赫鲁正式组阁前的工作班子。独立后，尼赫鲁作为总理虽是一切重大行政事务的主宰，但日常工作必须要借助一个小小的秘书机构进行处理，机构包括一名中级文官、一名专职助手和几名办公打字人员。从经济上考虑这一编制甚为可取，它为他那些视庞大办公机构为个人地位标志的内阁同僚和首席部长们作了表率。从工作效率的角度看，小机构也能满意运转。尼赫鲁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完全是自己起草各类文件。他在整个总理任内，平均每天接到大约两千封信，当然并非都与公务有关，他通常在晚上花数个小时口授回信，所需要的不过是一组能连续工作一整天的打字人员。尼赫鲁从不拖延回信时间，就连无关紧要的信件他也会在 24 小时内给予答复。

正因为如此，无论谁担任他的私人秘书都会感到没有什么事可做。马泰很容易便谋得秘书处负责人的位置。此前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的权能极为有限，对任何事情都愿意听其自然。但马泰的上任使情况有了变化。由于全部重要文件都须经过总理秘书处，他很快便使自己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他可以决定尼赫鲁看哪一份文件，可以不经尼赫鲁同意而自行决定某份文件的处

理或以总理的名义对它发表意见。他也能在送抄总理的文件上批注，给总理写备忘录对各种问题提出看法。甚至他还无中生有地向尼赫鲁进谗言，从而经常使后者对不满马泰的那些人产生偏见。

任何一位总理就其工作性质而言只能是一个孤独的角色，他不得不和他的同事保持某种距离，还得处处提防许多想利用与他的熟识捞取好处的人，这样他就与普通社会生活断了联系。在执政的 17 年中，尼赫鲁从未进过一家国内的书店，从未搭乘过一次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对他来说，更因其独特的个性和处境而增添了一层孤独感。他与妹妹潘迪特夫人和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几年中很少就公务认真咨询过她们的意见。他与基德瓦伊有长时期的友谊，直到后者 1954 年去世，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尼赫鲁的帮助是有限的，说不上是坚定的支持。基德瓦伊对尼赫鲁的忠诚不能怀疑，但他通常不多发表看法，只愿跟随着领袖前进，并且他的工作作风也是喜欢孤独和密谋，尼赫鲁并不怪他，但他偶尔也会做一两件唐突的事出来让尼赫鲁难堪，特别是参加新党和退出内阁。甘地的去世对尼赫鲁打击很大，他逐渐摆脱阴影并恢复了内心的平衡，但变得更加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当 50 年代初巴特尔死后，他基本上再没有与任何人充分交换过意见，甚至连梅农、蒙巴顿或拉达克里希南也不例外。从这点看，他是一个完全封闭自我内心的人。

这样一来使得马泰有机可乘。马泰算不上尼赫鲁的知己，但尼赫鲁相信他忠诚、正直和能干，靠他为自己传递消息，靠他使自己摆脱日常烦琐小事的干扰，靠他庇护自己免受朋友们的纠缠不休，靠他提醒自己对付那些搞阴谋诡计的同事。但马泰并不是尼赫鲁想像中那样可信的侍从，他心胸狭隘，贪得无厌，见风使舵，而且惯于溜须拍马，落井下石，很会利用他与尼赫鲁的接近去滥用他个人炙手可热的权势。部长高官都乐意听取他的高见，官员们登门求访揣摩他的旨意行事，他的身边也逐渐形成了一帮玩弄权术的亲信。他的反常行径不是受到姑息便是令人生畏，英迪拉也怂恿他僭越正常的权限，潘迪特夫人称他副总理，拉贾戈帕拉查理对他说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些部长夫人经常给他送去情谊绵绵的问候，甚至连更了解他的品性的蒙巴顿夫妇也对他关怀入微。尼赫鲁对这一切知之甚少。于是，这个初通文墨的暴发户成功地使尼赫鲁成为自己形只影单、孤芳自赏的受害者，并使官场的腐败习气在印度政界广为流行。

十、朝鲜调停

全球性冷战终于在亚洲酿成大规模武装冲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由于苏联代表年初的退出，联合国安理会由美国一手遮天。安理会在当天通过一项美国的提案，决议谴责北朝鲜对南方发动武装进攻，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采取共同行动阻止冲突扩大，迫使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劳氏来不及请示新德里便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印度政府尽管相信对北朝鲜的指责有一定道理，但命令劳氏在未经政府决定之前不要再作表态。两天后安理会又通过美国提出的第二项提案，要求各成员国向南朝鲜提供包括武装在内的一切援助，对朝鲜北方实施武力制裁。这次劳氏投了弃权票。同一天，美军远东地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美海军、空军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的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远东的局势更趋紧张。

然而，印度内阁在召开两次会议后发表声明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内阁不久前刚进行了改组，国大党右翼的势力增强，他们将朝鲜冲突的原因看成是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尽管巴特未出席内阁会议，也不可能作出支持社会主义北朝鲜的决定。有些部长公开对尼赫鲁说：“苏联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朋友，将来也是如此。为何我们要拒绝我们友邦的召唤呢？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对付俄国人的扩张。如果它们垮了，我们也就完

尼赫鲁接受了安理会决议，但丝毫说不上积极。他承认，决议中提到的有部分是事实，如果联合国不出来说话，则意味着这一国际性组织的瓦解，从而引出其他严重后果。况且印度只要接受第一项决议，第二项就很难拒绝。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辩解说，“从逻辑和政治上讲，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认为，印度的声明既要让安理会满意，也必须维持平衡，为印度保留行动的自主权。支持联合国的决议并不等于修改印度的对外政策，印度是一个独立国家，将继续坚持与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方针。巴特对他这种防范性语气很不满意。尼赫鲁在给巴特的信中写道：“当然，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类事情上绝对独立，每项行动或政策都是过去其他行动和其他世界性事件生出的结果。但在一定限度内仍能保持独立性。我们宁可保留更多的独立自主。”作为一种姿态，尼赫鲁致电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重返安理会和苏联政府出面协助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尼赫鲁在接受安理会决议的同时再次强调他的不结盟立场，实际上是想表明印度不希望美国将朝鲜问题与台湾和印度支那等问题扯到一起，印度也绝不会向南朝鲜提供任何军事方面的支持。他指出，印度的武装力量只用于保卫自身国防安全，若交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会使印度感到难堪，因为麦克阿瑟的指挥权不限于朝鲜，而是包括整个东亚。他也注意到，接受安理会决议削弱了印度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本来就不密切的关系，这很不值得，“我们不应完全失去以前那种独特的地位，我们应寄希望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促成各方停止冲突和化解敌意。”

尽管印度最初赞同过美国的观点，但尼赫鲁绝不喜欢美国借联合国的招牌扩大战争的做法，他担心由此一来便不可能再说服苏联、中国一道协助停止朝鲜半岛的冲突。梅农明确反对政府的表态，表示要辞职，拉达克里希南也不赞成这一政策。印度各界发出不少批评。这些反应无疑增添了尼赫鲁的不安。他在给潘迪特夫人的信中流露出心事重重：“不可为狂暴的激情湮没，

不可偏狭固执，需要尽可能客观地判断发生的事件，同时还必须考虑印度国内外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因此要作出一个决定并不容易。试图在刀锋口上保持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事。印度的政策究竟是对是错，将来自有公论。但我们确实已让不少国家和人们感到不快。我们没讨好任何人。”

他对苏联的怀疑仍未消除，但他也不信任美国的动机和意图：“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庞大的、强有力的苏联国家集团，它们正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不仅执行相同的国内经济政策，而且也有共同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是扩张主义的，因此有可能与其他集团发生冲突。它的扩张主义不仅指政治方面，也指它鼓动其他国家内部的骚乱。另一方面，与它敌对的集团尽管在理论上信奉民主，但却总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在亚洲国家鼓励那里的反动势力和军事寡头。从结果看，它支持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因此尼赫鲁认为，必须坚持一种既非权宜之计又与亚洲的利益和特征相符的政策，盲目受人摆布只能走入死胡同。

7月7日，安理会再次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正式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十余国的联军，以联合国的名义向北朝鲜开战。中国、苏联等国发表声明予以谴责。战争的喧嚣声越来越高，朝鲜危机已在加速世界性冲突。在此关键时候，尼赫鲁发现他的一帮主要驻外使节处境尴尬，无所适从，每一位大使几乎都自搞一套，互不通气。潘迪特夫人忙着与杜鲁门会谈，梅农频繁会晤艾德礼，潘尼迪把自己看作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络官，拉达克里希南私下安排自己与苏联外交部和美驻苏大使商讨和平，劳氏则不跟新德里打招呼便就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主席。尼赫鲁担心外交官们的自作主张会打乱他的整体计划，致使外交陷入被动。

在东亚局势骤然紧张的关头，尼赫鲁分别致函斯大林和艾奇逊，力陈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苏联重返安理会的必要性，明确表示印度渴望阻止世界走向全面对抗：“我们应让每个人坐下来想想，一旦狂热和偏见主宰了人们的头脑，任何取得的实质性成功都将付之东流。”尼赫鲁的诚意改善了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苏联作出积极反应，显得比过去更欣赏印度的态度。中国也感谢印度支持她进入联合国。尼赫鲁认为，中朝两国的利害关系的确存在，中国对朝鲜战况的高度关切是合乎情理的。他坚定了苏联重返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心。甚至美国也认为印度与中苏之间的关系可以利用。艾奇逊让尼赫鲁向中国传话：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出发，中国应避免卷入朝鲜战争或进攻台湾。尼赫鲁答应转达，但随着美空军对北朝鲜的大规模轰炸，以及麦克阿瑟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私访台湾，尼赫鲁日益担心好战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他感到，西方在国并没有准确地把握亚洲的情绪，它们以为靠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就能赢得战争。以好战和复仇的疯狂处理朝鲜问题只会导致整个朝鲜半岛的毁灭，联合国的努力也将彻底失败。“他们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他们以后怎么还能与任何亚洲国家打交道？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下去，在亚洲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尼赫鲁厌恶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指出，亚洲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发生的事，如果迫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必会冲淡中国人强烈的民族特征，转而加强对苏联的依附。“美国的政策正在使中国做出美国最不愿见到的事。”虽然美英领导人曾向他保证“联合国军”在得到联合国的命令以前不会越过三八线，但他并不相信美国真会放弃它的军事冒险。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战争言论便是最好的证明。美国要印度向中国传话，不要对美国

在朝鲜的军事进展作出强烈反应。潘尼迹没有按他们的要求行事，但美国却得到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反馈：除非苏联进行干预并爆发世界大战，中国“不可能”直接介入朝鲜战争。这一消息很可能助长了美国的狂妄自大，鼓励它变本加厉地继续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顽固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尼赫鲁认为美国的做法极不明智，所起作用完全是破坏性的。

中国的反应作常强烈。9月21日，周恩来再次请潘尼迹转达中国政府的警告：“如果美因扩大侵略，中国将因其危及到中国的安全而不得不进行反击。”尼赫鲁给周恩来写去一封个人函件，力劝忍耐克制：“新中国的强大使她能以尊严和冷静面对未来。亚洲各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友好邻邦而深怀敬意。我坚信，中国再多等待一些时候，定能够和平地实现她期望的一切目标，从而赢得全人类的感谢。”

然而西方大国的行为注定使尼赫鲁白费努力。它们毫不理会中国发出的警告，认为中国仅是说说吓唬人话而已，因此决定越过三八线向北方推进。尼赫鲁极力劝说英国外相贝文谨慎行事至关重要，但他的话未能改变“联合国军”开入北朝鲜的事实。有一种说法是，印度外交部怀疑潘尼迹报告的准确性，因而减弱了尼赫鲁发出警告的语气。周恩来向潘尼迹重申，如果麦克阿瑟的军队继续推进，中国将被迫立刻采取行动。尼赫鲁又一次呼吁周恩来不要急于动手。但“联合国军”在10月21日越过三八线后步步进逼，攻占平壤，兵锋直指中朝交界的鸭绿江边。这时中国终于动手了，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接到命令跨过鸭绿江，正式进入朝鲜作战。

朝鲜战争最初阶段，各方都曾将注意力转向尼赫鲁，希望他施展自己的影响，寻求得到他的支持。尼赫鲁骄傲地说，“世界将我们看作是亚洲感情的中心。”但现在的行情仿佛变了。他强烈主张，不要最大限度和无止境地使用武力，应利用北朝鲜军队失利的适当时机通过停火谈判重建一个统一的朝鲜，可眼下谁都听不进去。这些不顺耳的建议在美国为他招来严厉的指责。美国政府和新闻界都攻击印度，尤其是责怪尼赫鲁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国的主张。《纽约时报》评论说：“潘迪特·尼赫鲁自称代表亚洲讲话，但他的话却表明他放弃了这一权利，他的批评现在只能被看作一大妨碍，是对共产主义的绥靖姑息。可以肯定，历史将证明尼赫鲁的政策也许不无好意，但它却是怯懦、短视和不负责的。”尼赫鲁对此的公开反应极为冷淡，不屑一顾。他没有退让，命令印度驻美大使继续礼貌但坚决地申明印度的观点。

印度在1950年11月建议对北朝鲜的部分领土实行非军事化，以便避免战争双方扩大冲突范围。贝文同意他的意见。英国这时的基本政策是虽与美国密切配合，但也不要推波助澜。志愿军进入朝鲜后迅速推进，与北朝鲜军队共同打退了对方的“总攻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南溃败。杜鲁门这时威胁要使用原子弹，双方都在为战争全面升级作准备。尼赫鲁认为，战争的决定权显然操在美中两国领导人的手里，阻止战争扩大的机会愈益渺茫了。他忧心忡忡地写道：“就我们而言，将努力置身于战争之外，我们是中立的。但是否我们最终能成功地保持中立，现在还很难说。”

在当时情况下，加拿大外长皮尔逊建议，以朝鲜立即实现停火、中国停止对朝鲜的军事卷入为前提条件，探讨中国参与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但尼赫鲁认为他的建议不现实。不过尼赫鲁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一道呼吁中国和北朝鲜表态不进入三八线以南地区。他也请前往华盛顿的艾德礼说服美国促成在朝鲜停火、实行非军事化并举行和平谈判，同意中国参与解

决朝鲜和台湾问题。相同的建议也送到中国领导人手中，周恩来表示出兴趣，但他在不知道美国的态度以前拒绝对此表态或作出承诺。不出所料，杜鲁门政府顽固拒绝讨论台湾问题，也不愿考虑尼赫鲁方案中的其他内容，除非朝鲜的战况稳定下来。当时，战场形势正逐渐变得对美国有利，因而美国在外交场合的态度更趋强硬，于是与过去一样，印度遭到无情攻击。印度驻美大使传回消息说，杜鲁门告诉美国国会：“尼赫鲁已经出卖了我们，他的态度对我们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负有责任。”印度国内许多地区当时正在遭灾，大量人民处于半饥荒状态，印度政府不得不再次请求美国运送 150 至 200 万吨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但得到的答复却令人失望。梅农提议尼赫鲁于次年年初参加伦敦英联邦首脑会议前先访问北京，后去华盛顿会晤杜鲁门，称“这对美国的效果会如同在神志不清的高烧病人头上放一只冰袋”。但尼赫鲁认为与中美领导人直接斡旋的时机尚不成熟，美国指望战况朝对自己绝对有利的方向转化，而世界上不少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同情也在上升，因此双方都不愿在对自身不利的形势下就此罢休，要使激烈对抗的气氛有所缓和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也觉得，“中国的地位从哪一方面都是强大的，他们完全不必冒险，他们可能在某些小事的处理上态度更随和些。”除非尼赫鲁能提出明确的方案，否则飞往北京就毫无意义，况且此行必须伴随着美国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强硬立场。所以，他此时能做的只是再次催促艾德礼劝说美国接受印度的观点。

直到 1950 年底，尼赫鲁对朝鲜问题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卷入朝鲜战争的西方国家要么不理睬他的忠告，要么将他的话作耳边风。中国虽然赞赏尼赫鲁的工作，但对其效果不抱过高期望。中国出席安理会讨论朝鲜问题会议的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对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表示，印度没有向朝鲜派出一兵一卒，因此印度的意见并不重要。

尼赫鲁因他在朝鲜问题上的劳而无功以及国内的麻烦事深感苦恼，当他 61 岁生日到来时，他的神情沮丧就不难理解了。他写信对为他贺寿的巴特尔说：“不知怎么的，今天我觉得情绪非常低落，原因是印度和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国家仿佛都在出毛病。我的心事日益加重，自己想得很多，而能做到的却很少。我勤奋工作，但我开始怀疑工作的效能。有那么多的事情令我丧气。一个人只有当抱着某些明确的理想和目标时才能精力充沛和热情满怀地努力。一旦理想消退，他的精力和热情也就消退了。”

不过人们普遍承认，尼赫鲁为避免全面战争所付出的努力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动扩大战争规模的震耳鼓噪声中，他采取了明智和稳健的举措，他的和平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鼓舞人心的象征。著名记者、尼赫鲁的传记作者詹姆士·卡迈隆曾于“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当天在新德里见到他，尼赫鲁当时极为烦躁不安，毫不掩饰对这一军事行动的反感。这位记者回忆起他们的话题时说：“他常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信任和感化别人，从他那道德说教的老生常谈中设法删掉具体的责骂对象，他只是时时刻刻都提醒人们记住他们几乎已经淡忘的事：在充满暴力和威慑的世界上还存留着某种更高的价值标准，这就是爱好和平，它是永恒的原则而非权宜之计。”

1951 年 1 月，英联邦首脑会议在伦敦召开。梅农劝尼赫鲁抵制会议，认为首脑会议在此时召开无异于是支持进行战争的对话，对和平无益。尽管印度是英联邦成员国，但英联邦的立场并未真正改变，殖民主义的影子依然没有抹去，与过去不同的只是它不可能再武断地宣布印度进入战备状态而已。

这番激烈的话出自此前一直致力于维护英联邦国家团结的梅农之口，足以表明当时印度对英联邦追随美国的不满情绪。不过尼赫鲁并不打算缺席。梅农坚持说，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共产主义是时和平的唯一威胁而应在任何地方加以反击，尼赫鲁就应马上反驳。

在这次会议上，尼赫鲁强调与中国友好的重要性，指出追随美国的好战政策将卷入战争的危险。他仍然相信中国和苏联希望避免战争，因此应摒弃任何可能加重紧张空气的行动。贝文反驳说：中国虽然可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但两国正采取联合行动，它们的共同战略一目了然，即中国用人力优势钳制西方，苏联则迫使德国保持中立从而使欧洲防务计划受挫。贝文甚至告诫尼赫鲁，他担心印度会在若干年后发现自己夹在世界的两极格局中两头受气。

尼赫鲁意外地发现，他的反战立场获得了英国军方的支持。英国总参谋部在给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即使俄国不进行公开干预，对中国开战也不可避免会让西方集团付出惨重代价，其结果可能是致命的，不仅对英联邦的团结和美国是如此，对当今自由世界的整体地位也是如此。”英国军方也正在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尼赫鲁显然受到鼓舞，他要求英联邦组织别再无条件地支持美国，而是应设法让美国明白，当前最重要的不是谴责和威胁中国，而是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但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首脑们不愿与尼赫鲁一道在联合国中得罪美国。不过他仍有一个收获，他促成一项决议，倡议举行一次由美、中、英、苏四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在“与现有的国际义务相符”的基础上讨论远东的全部问题。他认为这一措辞适用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条文。

尼赫鲁极力劝说中国不要拒绝这一方案。他说，所用措辞尽管含义模糊，但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权益，中国受邀参加四大国会议甚至比迈入联合国大门更有尊严，何况进入联合国的事也会水到渠成。中国的答复显得谨慎，但实际上却是积极的。尼赫鲁接着设法使美国接受英联邦的倡议，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对和平与直接谈判的强烈愿望，希望美国不要再扩大事态，坐失良机。他致周恩来总理的信充满诚恳，情真意切：

“当前的时势需要最高超的政治家风范、远见卓识和宽宏大量，这样才能有效挫败制造战争的势力。它带给亚洲的不仅是和平和力量，而且也有道义上的领导地位。今天的新中国能够高瞻远瞩和当仁不让地领导和平潮流，从而迅速地从世界上消除紧张不安的情绪。中国的地位事实上已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完全承认，她的主要目标也被公开地或悄悄地认可。在此情况下，现实既成定局，再争执措辞形式已没有任何意义，也犯不着非使其他国家丢人现眼。印中两国在历史上饱受欺凌，我们曾嫉恶如仇，奋起反抗。我们今天应依循另一条不同的途径，通过和平与合作的方式努力争取世界的稳定与安全，这并非表明我们软弱可欺，而恰恰是表明我们拥有力量和自信心。”

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特称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是“一份保证和平的经典性文件”。中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周恩来提议将四大国会议改为七大国会议，加进法国、印度和埃及。但周恩来不久指出，由于美国极力要联合国通过诽谤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中国政府无法坐下来进行谈判。尼赫鲁对

此也确有同感，只要美国政府坚持一意孤行，单方面说服中国明显行不通。他的确千方百计想缩小双方的分歧，但他的希望又一次化为泡影。“我们的一切努力终于在美国的大棒政策面前失败了。不过，我们满意地尽到自己的责任，以后的事态只好听其自然。”

尼赫鲁的和平努力并没有赢得西方的广泛赞许，不少人认为他正在组织一场反西方的运动，至少效果看来是如此。《经济学家》杂志以“尼赫鲁：理想主义者还是绥靖主义者”为题，攻击他的和平斡旋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他可能像张伯伦一样是个绥靖主义者，但他更加危险。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而尼赫鲁的分析却有大量是事实。西方可以不高兴他的结论，但却不能不信其中的事实，否则只能后果自负。然而尼赫鲁的强大并不在于他谈到的事实或道理，而是他绝无仅有地表达出亚洲的情绪。他使西方对亚洲的猜忌趋于表面，亚洲只有他能做到这点。”观点右翼的英国《旗报》着重攻击他正发起一场亚洲的反西方运动。当时伊朗在石油出口的问题上对西方态度强硬，因此也被说成是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美国对尼赫鲁的指责更是有如愤怒的声讨，一些政客四处游说，反对按印度提出的优惠条件向其提供二百万吨粮食的要求最后美国政府答应提供一百万吨谷物，但规定必须由美方负责监督粮食的分配计划。尼赫鲁讨厌这种前提，但因需求很急，他决定先了解方案的细节。他不愿牺牲自己的外交立场去为这一问题讨价还价。面对美国的故意刁难，他在印度内阁强调指出：

“我希望我们能独立自主，即使这可能意味着物资匮乏。只有我们做到自力更生，我们才能从其他国家得到更好的对待。因此我毫不怀疑，我们在粮食方面应确定的唯一可行的计划是自给自足，此外没有其他出路可走。除非我们自己无能，否则绝对没有理由不实现这一目标。”

尼赫鲁随便晃了一眼美国的食品援助方案后便对美国大使说，与其接受馈赠而让外国机构控制印度的分配系统和发展计划，不如分期付款但保持自主。印度如果同意美国的条件，实际上等于把印度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至少也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卫星国。“我当然充分意识到我们拒绝援助的后果，但我仍不能说服自己接受这种最后的侮辱。”他公开宣布，印度在进口粮食的问题上绝不至堕落到接受外国的任何条件、置民族尊严于不顾的地步。美国最后表示让步，援助计划得以实施，尼赫鲁致信杜鲁门表达谢意。

印度的饥荒问题得到缓解，但对日本签订和约的问题又提了出来。1951年4月5日，美国政府片面制定了《对日和约》的草案，要求其他有关国家接受，并威胁要单独对日媾和，但这一行为遭到苏联、中国等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反对。印度也在此之列。在尼赫鲁看来，如不加改动地在和约草案上签字，无异使印度的外交政策来一个急转弯。主要的障碍是：美国继续驻军日本，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托管，台湾尚未交还中国，千岛群岛和南沙哈林岛也未归还苏联。尼赫鲁的不合作再一次使他成为西方攻击的对象。

《纽约时报》的文章“迷失的领袖”对他大加讽刺挖苦：“尼赫鲁正迅速变成战后以来最令人失望的人物，他舍弃了成为伟人的权利，历史不会原谅他。更有甚者的是，尼赫鲁已将他的注意力全部转向某一地区、某些具体问题以及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克什米尔问题上。他的政治家风范已经不能再鼓舞他的人民和其他国家前进，只会毁掉他们的事业。多么非凡伟大的人物堕落

了！”

美国当局认为，尼赫鲁拒绝按美国的调子签订对日和约不仅是想非难美国，而且也是使印度、中国和日本紧密靠近共同对抗欧美的计划的前奏。尼赫鲁向美国大使解释，他从未打算离间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印度对美国不抱恶意，只是对某些重大国际问题存在分歧，并不影响两国领导人所取得的共识和两国的友好关系。但要安抚美国并不容易，印度政府与负责处理对日和约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杜勒斯对潘迪特夫人抱怨说：印度仿佛在迎合中国的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巴不得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消失殆尽。尼赫鲁听到这番话后终于明白了，美国人无端指责印度原来是他们心理上十分脆弱。

印美之间的龃龉很大程度上与印度在外交场合为中国说话有关，印度为此得到中国的热情报答。潘尼迦不断从北京发回乐观的报告，他告诉尼赫鲁，中国从来没有发表过对印度不友好的评论，中国新闻界频繁报道尼赫鲁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印度在西藏的一些遗留问题给中印间的友好关系罩上阴影，印度为此没必要小题大作，自取烦恼。中国热切希望与印度建立更稳固、更密切的睦邻关系，绝不会让某些枝节问题成为发展关系的障碍。中国主动表示愿向印度提供食品援助一事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尼赫鲁欣然接受中国的好意，但因缺乏必要的运输条件而失去实际意义。大约与此同时，由于印度政府不愿将中国提供的一笔资金转给一个印共组织，中国取消了原订向印度红十字会赠送的价值40万户比的援助物资。

1951年4月，杜鲁门解除了好战成性的麦克阿瑟在远东的军职，指定马修·李奇微接替。尼赫鲁和梅农都认为这是一个和谈的好机会，希望中国作出积极反应。但尼赫鲁敏感地注意到，中国提出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和战地停火的建议，但选择的传话人是苏联而不是印度。这就迫使印度退到一个次要位置，不可能再强求中国相信印度的代言人资格。尼赫鲁支持中国固然有很强的功利因素，他清楚知道，与中国这个强大邻邦国家的友好相处对印度至关重要。但他的对华政策也有不少理想主义成份，他希望与新中国的友谊不仅将维持亚洲的和平，而且能使团结的亚洲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作出典范，开创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阶段。然而中国的处境不同，有自身的既定目标，特定的条件决定了在国际事务中不会过分依赖印度。

此后大约一年内，印度对朝鲜问题的直接兴趣有所减弱。朝鲜交战双方在1951年6月底同意开始举行停战谈判，但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谈停停，旷日持久，战火却没有停息。次年2月，中国抗议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致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尼赫鲁这时仍然冷眼旁观，直到美国大使鲍尔斯和来访的罗斯福夫人促动他继续介入。尼赫鲁请潘尼迦转告中国领导人，他相信美英等国急于解决远东问题。他也建议对中国指责的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进行单独调查。周恩来作出的反应彬彬有礼，但未给明确的答复。不过尼赫鲁注意到中国对美国的谴责减低了调子。当美国提出按自愿遣返原则遣返志愿军战俘时，中国政府主动要求印度帮助向西方施加压力，就遣返问题与中国达成新的协议。潘迪特夫人当时正在北京访问，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别会见她时都提及这一问题。尽管中国代表在板门店谈判中要求遣返全部志愿军战俘，但周恩来向印度表示中国可以考虑自愿遣返方案。根据中方的估计，美方拘押了大约17万战俘，因此按保守的数字，应遣返的战俘数为10万人。尼赫鲁愿意出力帮助，但觉得确定一个任意数不合惯例，为此他请梅农与英

国外相艾登一道制定一项总体方案，建议战俘所属国派代表对不愿接受遣返的战俘作工作，即进行解释。这一方案经过稍加修改便被中国接受了，根据这一原则又订出具体实施计划。尼赫鲁知道他正为中国办事，必定难免再遭西方责骂，但为了和平事业他甘愿如此。他甚至打算对北京作一次访问。

1952年7月，美国飞机轰炸北朝鲜的发电厂，并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杀伤和平居民，中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中国也突然收回诺言，谴责战俘自愿遣返计划，坚持要求送返全部志愿军被俘人员。这一突发事件搅得尼赫鲁心烦意乱，主要不是因为牵涉到朝鲜问题，而是因为它又一次表明中美双方都不会轻易买他的账。他似乎觉得在中美之间已没有回旋余地，对朝鲜停战的前景多了一层担忧。但周恩来仍明确希望得到印度的支持，美国也表现出对达成协议关切。尼赫鲁决定派梅农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前往联合国，协助处理朝鲜问题。

直到1952年底，中美等国仍未就在朝鲜的双方战俘问题达成协议。10月中旬，七届联大第一次会议在纽约举行，大会讨论了两个提案。一是波兰代表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提案，要求“根据国际惯例”遣返全部战俘。这完全符合中国的立场。另一个由美国代表提出，要求实行自愿遣返。梅农为了中和这两种对立意见，不久提出另一项提案，建议由四个中立国家组成战俘遣返委员会，如无法进行多数表决则由联合国大会作最后仲裁。印度的提案有一个缺陷，即其中提到将不愿遣返的战俘移交给联合国。然而从中国和苏联的角度看，联合国受美国控制，已变成一个有偏见的国际组织，况且它本身就是朝鲜战争的交战方。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有理由认为印度的提案偏袒了美国，但它们并没有马上反对，而是静待时机。尼赫鲁对实现停战重新恢复了信心，他致信周恩来，强调中国明确表态同意停战的重要性，尤其谈到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的好战势力会重新抬头，卷土重来。他还说，梅农提案的基础是充分理解中国的立场，应该得到中国方面的赞同，这样一来美国也不能拒绝印度的提案，从而大大增加了被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可能性。

这段时期，梅农作为尼赫鲁的外交代表表现出色，他的谈判和斡旋富有成果，他在联合国各国代表中间积极活动，在各国首都间往来穿梭，与驻新德里的外国使者频繁会面，争取他的提案能被大多数国家接受。1952年12月3日，印度提案被联大全体会议正式通过，苏联等国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却遭否决。印度提案的通过为最终实现朝鲜停战和战后的战俘遣返创造了基本条件。梅农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才能，给联合国和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增加了人们对尼赫鲁的尊重和信任，但梅农从美国等西方国家那里得到的却是讥讽辱骂。与他打交道的大部分美国人对他疑心很重，他也不信任他们，而他公开或私下对美国的不恭言辞加深了美国对他的猜疑和反感。例如艾奇逊就对梅农深怀嫌恶，这种感觉扭曲了他对后者的基本评价。艾奇逊写道，梅农在谈判中耍滑头，总喜欢含糊其词，又不愿拿出任何书面东西留证。加拿大等国的代表却认为，印度是当时最能取信朝鲜交战各方的国家，大家都知道梅农代表着尼赫鲁，因此他的话自然具有特殊的份量。

关于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美国的说法与印度完全不同。根据杜勒斯在1956年1月号《生活》月刊上的回忆，他当时相信尼赫鲁“能尽快与北京对话”，因此他对尼赫鲁说，如果他1953年5月去印度访问时朝鲜战争仍在继

续，“美国就将取消对军事行动的一切限制，动用各种手段打赢战争。”他显然是指美国会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重点打击中国东北的军工基地，甚至不惜使用原子弹。他的文章接着说，中国和北朝鲜最终同意停战是“因为他们明白无误地得到警告：美国将通过决定性打击取得战争胜利，除非中国马上宣布停战。”这种说法表明，杜勒斯肯定尼赫鲁已将他的威胁话传到中国领导人耳中，即如果中国不同意停战，美国就会向中国的军事目标直接投原子弹。

据印度外交部后来公布的权威消息，尼赫鲁与杜勒斯会谈后马上作了备忘录。其中写道，他俩讨论了战争扩大的危险，但根本未谈起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的事。也可以肯定，尼赫鲁并未向中同转达过这类威胁的话，他只是将与杜勒斯会晤的情况告诉了中国的领导人。

令尼赫鲁遗憾的是，印度的斡旋没能使中国和苏联满意。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不到两周，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反对联大根据印度提案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指出：这个决议案支持了美国继续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是在没有中、朝两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因此它非法无效。中国的舆论界也嘲讽印度自诩为亚洲的喉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则用激烈的语言批评印度的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认为，通过的决议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巧妙地利用印度反对中国的产物。也有不少人觉得，中国本来可能接受联合国的决议，但由于受到苏联的制约，因此首先关注的问题只可能是如何加强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地位。后来情况的发展证明这一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印度外交在这段时期的弱点主要表现在驻外使节的能力欠佳。梅塔在华盛顿是经验不足的新人，驻北京的赖嘉文虽不像他的前任潘尼迦那般自以为是，但也是新手。原先拉达克里希南与苏联领导人保持着融洽的私人友谊，但他不久被另一位官员换了下去，后者善于与苏联政府周旋，但在政治上人微言轻。这批大使的素质不高，本来可用梅农来支撑大局，他的能力不容置疑，但他的行事作风鬼鬼祟祟、变幻无常，结果印度的提案通过了，却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好感，中苏两国反而认为印度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

尼赫鲁感到委屈，仿佛自己站在西方一边反对中苏，而且实属迫不得已。他有些无可奈何地评论说：“中国和美国势不两立，看起来的确说不到一起，世界存心要去自杀，印度又能怎样呢？”但他不让自己灰心或悄悄地隐退，指示梅农在联合国坚持印度的观点，同时他也要驻华大使赖嘉文保持冷静：“我们愿意坚持进行友好的努力，并且我们一方对所做的事应该问心无愧。我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始终是既友好又坚决的。”印度外交部也对中国大使说，印度的提案并不是为了支持美国在朝鲜的战争，而是因为苏联、波兰的提案事实上行不通，印度如放弃提案只会使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强硬提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会对中国更加不利。印度的解释至少没有马上使中国信服。

尼赫鲁开始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达成朝鲜停战协议的问题上，中国表现得超然自在，不慌不忙，而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看上去对尽快找出解决办法也显得不急。梅农也是这种看法并提出不少证据。尼赫鲁起不到多大作用，感到无能为力，只得拭目以待事态的演变。不过他仍向外界作出明确表示：印度随时愿以善良的愿望和不结盟的信条发挥积极作用。但他暂时未得到任何回音。

回音终于出现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朝鲜谈判的僵局开始打破，中国采取了更加灵活的谈判策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赴苏参加斯大林葬礼

回国后不久，于3月30日发表声明，提议双方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所收容的全部坚持要求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则移交中立国，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这是中国政府为促成朝鲜停战发出的明显信号。梅农称这一声明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声明中所提出的动议打开了使世界走向光明前途的道路，“中国的建议为千百万人民带来了希望”。就尼赫鲁看来，周恩来的声明与印度的立场非常接近，他不由得又兴奋起来，在给赖嘉文的信中写道：“这是件大好事，我们不必到处宣扬我们早就有此忠告，我们任何时候都应保持清醒，与中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同时又要维护我们的尊严。也许过去几个月中的事件已基本取得良好的结局。中国政府必定欣赏，我们既维持了友好关系，又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没有因外界压力而改变。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我们的长远政策，那就是发展与中国的友谊，但在与我们命运悠关的利益问题上决不让步。”

可是到了5月，美国仍反对将战俘遣返交由某个中立国家进行。中国提议由5个中立国家共同组成一个战俘遣返委员会，这样就与印度的意见更加接近了。中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无论基于什么理由，但肯定与杜勒斯发出的恐吓无关。尼赫鲁并不特别在乎答应停战的原因如何，仿佛对他来说停战结果就是一切。他马上发表外交声明，支持以中方建议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并呼吁召开大国首脑会议讨论和平问题。他游说其他各方，促成普遍接受中国关于成立遣返委员会的倡议。1953年6月8日，中美双方终于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朝鲜停战协定也于7月底正式签字。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接见印度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5国驻华大使，邀请5国参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5国很快接受了邀请。

印度在朝鲜问题最后解决过程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当选为中立国战俘遣返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安排对双方战俘的解释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组织他们的遣返。印度根据协议派蒂迈雅将军率领印度的中立国看管部队前往朝鲜，由他担任委员会负责人。

事情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拒绝和平和南北分治，抵制停战协议，他们突然擅自释放大批北朝鲜被俘人员，给战俘的遣返工作引出混乱，也为执行任何停火协议带来困难。尼赫鲁对此大发牢骚：“问题明摆着，南朝鲜究竟谁在指挥？难道存在联合国和李承晚两个不同的司令部吗？联合国军司令部要么约束李承晚，要么就彻底放手。如果选择前者，他们就应该做点什么，夺去他的权柄。如果他们不愿这样做，那也就没有资格签订有效的停火协议。你能想像中国人在前线有五分之二的人停火，五分之三的人继续作战吗！真是不可思议。联合国的威信已受到严重的损害。人们的确可以认为，除了对远东关系重大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之外，联合国自身的前景也大为不妙。”

他希望尽快举行联大全体会议，讨论“联合国军”执行和平使命的问题。除非由美国出面制约李承晚，否则便会前功尽弃引发新的危机。李承晚粗暴地辱骂印度，毫无任何协助配合的意思不说，还想方设法让印度难堪。尼赫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美国政府表示，印度未得到满意的保证前无法开展工作，印度“不会接受一个与她的自尊不相符合的位置，也不会答应让她的代表只能偷偷摸摸地从事活动”。

美国管住了李承晚，但很可能也答应后者不让印度出席停火之后举行的

朝鲜问题政治会议。正式签订停战协议后，美国果然提出参加战后政治会议的国家只限于直接卷入朝鲜战争的国家。建议提交联合国时，多数国家的代表在美国的操纵下投票反对印度参加政治会议。尼赫鲁难过地写道：“一些曾公开表示要投我们赞成票的国家退缩了。不仅如此，美国的大使们还在各国的首都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眼看一个大国这样行事，实在使我大长见识。”

尼赫鲁的朋友、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埃斯科特·雷德后来对此评论说：“美国当时对印度表现得非常无情。”中国鼓励印度力争参加政治会议的机会，但尼赫鲁觉得这样做有失尊严，并且李承晚也许正盼望印度作梗，那样便可以导致谈判破裂。尼赫鲁明确表示，他不希望联大再开全体会议重议印度的资格问题。他的这一姿态获得不少国家的赞许，甚至丘吉尔称赞这也是印度为朝鲜问题的最后解决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顾全大局的高姿态并不等于尼赫鲁心中没有委屈和不平。他觉得，印度为促成朝鲜交战双方最后停火已作出巨大、艰苦的努力，现在在战俘遣返过程中仍处于出力不讨好的境况，以至竟发展到双方都指责印度偏袒对方的地步。在联合国战俘营中，战俘聚合起来袭击看管人员、策划集体越狱的事时有发生。看管部队的处境也很糟糕。尼赫鲁十分焦急，只得向联合国和美英领导人发出呼吁要求协助：“那里的局势仍然极为严峻，世界和平的前景和印度的荣誉与之相系。”

根据朝鲜停战的规定，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应安排 90 天的解释期，经解释后仍未能行使权利的战俘由政治会议在 30 天内设法解决。不直接遣返的志愿军战俘约两万余人，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鼓蛊人心的造谣诽谤，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明真相，对遣返回国疑虑重重，犹豫不决，因此解释工作确有必要。解释期原订从 9 月 25 日开始，但因美国、台湾和南朝鲜方面的干扰破坏，一直拖到 10 月 15 日。台湾和南朝鲜当局派出大批特务以各类不合法的身份混入战俘营内大肆活动，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进行威逼利诱，阻止他们出面听取解释，战俘营也时常发生杀戮和其他暴力事件。遣返委员会和看管部队根本无法控制形势，各方关注的解释工作多次陷入停顿状态，难以顺利进展。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本身也对是否应使用武力强制战俘听取解释的问题出现分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赞成动用武力，瑞典与瑞士反对。印度也赞同强制执行，但严加限制动用武力的程度。印度看管部队尽管注意到恐怖活动和恐吓在战俘营中盛行，但因权力受到制约，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

很快发生了严重危机，上千名北朝鲜战俘抵制出营听取解释，当看管部队包围营地强迫他们出来时，他们威胁要集体逃亡。由于这一事件可能引起大规模杀俘行动，问题只得提交遣返委员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称这属于看管方印度的事，与委员会无关，瑞典和瑞士则在等候本国政府的指示。印度政府授权看管部队采取强制性措施，但避免引起大规模杀俘的冲突。

局势引起外界的强烈反应。中国《人民日报》载文批评印度未采取有效行动控制事态，指责印度看管部队“软弱和纵容”。尼赫鲁无意接受中国的全部指责，也顶住联合国的普遍压力，他打算要求印度看管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使用强制性手段。但大规模惩罚战俘会导致遣返委员会分裂和停火协议遭到破坏，这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他向新闻界辩解印度的困难处境：“指出形势的严重性是容易的，但要找到一条既不使委员会的工作彻底

破产、也不会影响实现停火的出路却困难得多。”国内不少人劝他撤回在朝鲜的印度看管部队，以免惹火烧身，他不同意：“我们不可能拒绝这一项对世界的意义如此重大的责任。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而放弃，必然会毁掉我们的自信和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就会加重世界的危机。其他没有哪个国家能承担起这一责任，也不会被双方所接受。无论如何，现在谈论召回我们的部队就意味着我们劳而无功，不负责任。”

朝鲜问题的最后僵局显然只能靠联合国解决。但联大主席皮尔逊对召开全体会议不感兴趣，而是仍寄希望向中美两国单独施加压力。美国片面决定，无论是否举行朝鲜问题政治会议，必须在4个月解释期结束后释放全部战俘。尼赫鲁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印度不能同意美国的决定，愿将这一问题重新提交联合国大会解决。他再次招来美国的激烈抨击。他也谢绝了美国请印度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政治会议的建议。

在中国方面，周恩来向印度指出，蒂迈雅将军对拒不听取解释的战俘表现现得过于迁就。但尼赫鲁已指示蒂迈雅，一旦4个月的解释期结束，即1954年1月20日，将对未遣返的战俘重新拘押，如果5国委员会通不过，印度作为主席可自行决定。此外的任何措施都可能引起无政府状况和暴力冲突，甚至连看管部队的安全也将得不到保证。他也要求刚接任联大主席的潘迪特夫人促成早开联大全体会议，但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却不赞成。

结束解释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把大批扣押的中朝战俘强行移交给台湾和南朝鲜当局。中国政府严密关注事态的发展，周恩来一方面支持召开联大全体会议，同时也要求遣返委员会延长解释期。尼赫鲁却认为已不可能改变按期结束战俘解释的决定，但表示应在其他相关方面尽量考虑中国的要求。他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完全可能将余下的战俘交给台湾和南朝鲜当局，但印度对此无能为力。不过在尼赫鲁的促成下，中国提出的其他要求尽可能得到了满足，由遣返委员会宣布接收战俘方不得改变战俘的身份，委员会也拒绝移交在看管营中犯有谋杀和其他罪行的战俘。另外，大多数联大成员国不赞成召开特别全体会议，连英联邦国家也表示反对，丘吉尔向尼赫鲁解释说，美苏英法四大国正在柏林开会，讨论内容包括朝鲜停战及善后问题，联合国在同一时候全面讨论朝鲜问题显得不合时宜，反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1954年1月，朝鲜战争战俘遣返工作正式结束。同年4月底至6月初，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由于美国等国和南朝鲜的顽固阻挠，印度最终未能参加会议。但尽管朝鲜停战一波三折，盘根错节，尼赫鲁充分显示出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政治家风范，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印度及他本人为朝鲜停火和实现和平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受到中国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高度赞赏。

十一、中国之旅

从1954年中期起，尼赫鲁疏远美国、靠近社会主义阵营的努力在稳步进展之中。他注意与美国政界中那些刺耳的好战声保持距离，他对来访的外国友人说：“除了强硬的语言和强烈的情绪，谁也不知道美国的政策究竟是什么。”他后来评论道，“美国好像以为对每个问题只有大谈特谈、大喊大叫才能解决，我自己的看法则是多一点沉默更有帮助。”他对美国的许多方面看不顺眼，这与他对打过交道的美国政界人士的评价不无关系。他在一份印度学者访美的计划书中批道：“我完全赞同拓宽个人的眼界。但只有广度是不够的，也必须要有深度。就我看来，普通的美国人既无深度又无广度可言，那里有专门学科的技术知识，这肯定重要，不过美国很难说是一个人们目前能去那里探索高级文化的好地方。”

他讨厌美国政府的政策，经常表露出对美国的偏见，但并没有因此很快拉近与苏联的关系。他注意到苏联国内的“解冻”和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微妙变化，寄希望逐渐增进相互的理解，但在政治关系上做得尽量谨慎。当苏联大使提议双方拟定一个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条约草案时，他找借口回避了。不过他希望从苏联获取更多的科技项目援助，也不在乎因此会使大量苏联专业人员滞留印度。他解释说：“在国际事务中，无论做什么事总会存在某种冒险的因素。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建设印度，我们应当利用任何有助于达到目标的条件。”

与对美苏的关系相比，尼赫鲁对中国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对发展双边关系更少显得犹豫不决。印度是最先正式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建交的国家之一，印度一贯积极倡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朝鲜停战问题上印度也发挥了卓有成效的影响，受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好评。1954年，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打开了中印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大门。

这一年，法国殖民军在越南奠边府遭到粉碎性打击，印度的新闻媒介大肆宣扬这次胜利，尼赫鲁也毫不掩饰因法国战败而感到的喜悦。由于中苏和西方一些国家的积极促成，在日内瓦举行了印度支那和平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和印度支那的三国四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国际重大会议，由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团出席。印度没有参加。正是在这次会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故意轻慢周恩来，当周恩来主动向美国人伸出手时，杜勒斯粗暴地拒绝了。这一侮辱性举动引人注目，全世界对此都有评论。杜勒斯的失态举止在尼赫鲁看来简直无法容忍，令人气愤。这件事的发生对促动他邀请周恩来访印有明显的影响。

尼赫鲁派出一架印度客机专程飞往日内瓦，接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前来印度，途中由他的特派代表梅农陪同。多年以前，尼赫鲁从法国著名作家安德鲁·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一书中已对周恩来有一些了解。周恩来与尼赫鲁的早年经历有些相似。周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接受教育，后来成长为一位有世界眼光的中共高层领袖和外交家。尼赫鲁知道，毛泽东1949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只是为了去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一个友好条约，而周恩来却受过完全不同的欧洲学院派教育。《人类的命运》一书以1927年中国大革命后期的上海为背景，书中的一位主要人物就以周恩来的生平为原型：他亲眼目睹自己的亲密战友遭到敌人的血腥屠杀，他本人长期从事地下党领导工作，一旦被捕则必死无疑。这种经历给他留下了坚强、

锐利甚至无情的性格特征。周恩来与当时身为欧洲左翼人士的马尔罗在上海不期而遇，成为朋友，这本书的写作从他俩的个人接触中获益甚多。尼赫鲁也早就听说，周恩来尽管严肃冷峻，但风度潇洒，是外交人员竞相效仿的楷模。

1954年6月25日在新德里机场，周恩来拥抱了尼赫鲁，尼赫鲁也作出同样热烈的反应。周恩来将两国的人口加在一起，对热情的欢迎者说：“9亿6000万人民的友谊形成了亚洲和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和平力量。”尼赫鲁发自内心地赞同这一情绪。处处都是想见到周恩来的人群，人们高呼“秦尼一信地，巴依巴依！”（中印两国是兄弟）那天虽然天气暴热，但仍未能阻拦如簇人流到街头一睹中国总理的风采。

还在两个月前，中印两国政府已在北京签订了《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与交通协定》，前言中首次载入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印度称为“潘查希拉”，该词源于一个古老的印度教理想。同一协定规定，印度放弃其在中国西藏的一切影响，交还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业务和驿站设备，撤离武装卫队，从而“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尼赫鲁对此并无遗憾，要求继承英殖民主义的影响本身就令他难堪。况且除了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立外，印度也并非没有得到实惠。在尼赫鲁看来，开辟边境通道和指定贸易市场可看作划定了部分边界。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新政策，1954年的协定不过是对1950年以来的立场加以确认。尼赫鲁认为放弃印度在西藏的遗留权益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必然结果：“我们只是放弃了事实上不能拥有和已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已放弃在西藏的某些权利，显然那不属于我们。不过我们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友好的关系以及对边界的实际接受。”周恩来访印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达成共识：中印两国在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同样适用这些原则。应周恩来的邀请，尼赫鲁决定不久将访问中国。

同年10月底，尼赫鲁踏上访问中国的旅程。他对自己的印度“发现”得够多了，这次访问将使他有机会“发现”亚洲和世界的另一重要部分。途中他在印度支那国家逗留了几天，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故交、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会晤：“他向前走来，几乎是跳上前来，与我拥抱亲吻，显然他不是故作姿态，而是情之所至。他敏锐、坦诚、宽厚，完全不像人们想像中的那位叛乱领导人的形象。”

结束对河内的短暂访问后，尼赫鲁由专程前往迎接的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上炳南和驻印大使袁仲贤陪同经广州、武汉飞往北京。他的主要随行人员有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印度外交部秘书长纳·鲁·皮莱、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等十亲人。中国极为重视尼赫鲁的来访，《人民日报》在欢迎社论中高度评价尼赫鲁和他代表的印度：

“印度为维护和平的努力在世界上占有愈来愈不能忽视的地位，我们两国之间只有和平的文化和经济往来，而没有战争和仇恨。尼赫鲁总理对我国的访问，是中印友好关系的重要发展。这一次访问将进一步促进我们两大国家间的了解和合作，对于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人民对于我国伟大邻邦印度

的杰出的政治家——尼赫鲁总理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尼赫鲁一行在北京机场受到周恩来、宋庆龄、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迎接，他由周总理亲自陪同前往国宾馆，沿途数十里受到首都 20 多万市民的夹道欢迎。主人没有动用防弹车，而是两位总理同乘一辆敞篷车检阅欢迎队伍，这在尼赫鲁出国访问中还是头一回。一位随行者称这是给他的“罗马式凯旋”。

在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亲切有加，周恩来高度赞赏尼赫鲁对中印友好作出的贡献：“尼

赫鲁先生很早就对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抱有同情。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时期，尼赫鲁先生对中国的团结抗日非常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尼赫鲁总理领导之下，印度迅速地与中国建立了邦交，印度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推动并协助了朝鲜的停战。不久以前，印度又同科伦坡会议有关国家一起对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作了重要的贡献。现在，印度还在印度支那同波兰和加拿大一起担任监督停战的任务。印度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中国人民很高兴在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中有印度这样一个友好的邻邦和尼赫鲁总理这样一位卓越的朋友。”

尼赫鲁的答词也同样诚恳而热情洋溢：“撇开我也许具有、

也许不具有的任何优点不谈，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从这方面说，我这里的访问已成为我们两大国的关系中具有一定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在任何时候，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在目前这个混乱和困难的世界上，这也许具有更大的意义。归根到底，人类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加重要，生活在中国和印度的将近十亿的人是必须估计的。”他也赞同周恩来对中印关系的基本估价：“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冲突的纪录，

只有友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纪录，这是两个伟大的邻邦的值得骄傲的传统。”

然而，使尼赫鲁深受感染的不是人们聚集起来欢迎他的浩大场面，而是中国人民流露出来的真诚友情。他从中看出了某种自发性因素。他记道：“每当我到一个地方时，我都有意让

自己显得更平易近人，性情开朗，中国人民极为热情的欢迎令我备感欣喜。”它几乎是一种感情的迸发，表达了中国愿与印度友好的真切希望。印度虽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但与中国同为亚洲大国，应该与中国友好相处，这将使两国和整个世界获益匪浅。尼赫鲁发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虽用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武装自己，但仍然保持着浓郁的民族特征：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传统美德的依恋、对艺术的热爱、对古典文化的同情与热情好客的风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他对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心仪已久。除了在北京紧张的国事活动以外，他也花不少时间参观游览。他兴致勃勃地游了颐和园、故宫、雍和宫，天坛，对颐和园中的颐水园、谐趣园、万寿山、昆明湖、长廊和佛香阁等风景和建筑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在主人陪同下来到北京西郊公园，见到一年前他赠送给中国的小象“阿萨”。他还神情专注地欣赏了艺术大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和越剧名家袁雪芬的《西厢记》。中国全国民主妇联也专门举行茶会

欢迎英迪拉·甘地夫人。

在这次访问中，尼赫鲁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人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许多变化。变化都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这令他大为惊异：“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穿上新衣，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我对此尤其难忘。男女青年充满生气，蓬勃向上，孩子们欢歌笑语。这些记忆特别让我难以忘怀。”

他相信中国热切希望与印度友好相处。他指出，印中两国能通过许多途径进行合作，尽管各自面对的问题也许不尽相同，它们采用的方法也许不同。中印两国和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宽容和友好的感情，只要有这点作基础，其他事都好处理。他向中国主人热情表示：“我们两国都在从事提高千百万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得他们都成为自由和繁荣的充分享有者这样一个伟大事业。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已坚定地走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我完全相信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有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是相同的，我们所必须正视的条件也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很多东西。”

尼赫鲁与周恩来再次共同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们重申，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国家之间，而且也适用于总体的国际关系之中，从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今天仍然存在的敌对和惶恐就会让位于相互信任和理解。在两位总理后来举行的定期会晤中，他们都希望实践这一准则。只是随着两藏问题和中印间的未定边界在 50 年代后期成为困扰两国关系的消极因素，情况才趋于复杂化，中印双方都指责对方背离五项原则，特别当 1959 年西藏达赖集团发动叛乱逃入印度后，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日趋强硬，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是后话。

两位总理的会谈是在积极和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尼赫鲁注意到周恩来对印度很有感情，仍像他 4 月初在新德里访问时那样表现得相当友好和通情达理。但会谈并非没有分歧。尼赫鲁指出，亚洲不少小国普遍存在着害怕中国的心理，或许它们也害怕印度；他本人也注意到海外华人的问题，以及中国通过当地国家的共产党来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可能性。周恩来简单地加以否定，无意作更多的解释。当周恩来讲到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它企图欺凌弱小民族并统治世界时，尼赫鲁答道，他并不认为美国人民希望战争，并且毫无疑问，美国人也担心共产主义的入侵，因此总在想方设法采取行动保护自身的利益。尼赫鲁也不愿讨论台湾及被蒋介石集团控制的部分中国沿海岛屿的命运。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极为重视台湾问题，特别他们获悉美国正在与台湾讨论一项共同防御计划，不过尼赫鲁也并未因此而显出不安。周恩来暗示，中国欢迎尼赫鲁促成向中国发出邀请参加亚非会议，也希望他倡议召开一次有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出于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周恩来补充说，他已经多次建议巴基斯坦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改善同印度的关系。两位总理随后谈到两国的边界问题及存在的其他某些争议，但没有详细展开。遗憾的是，尼赫鲁回绝了周恩来关于双方发表一份联合公报的建议。许多人认为，假如他当时同意发表联合公报而不是仅凭借自己的谈话记录的话，也许后来双方关于地图边界划定的争执就能避免。

尼赫鲁也见到毛泽东主席，此前他早已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和长征有很高的评价。这是他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面晤。尼赫鲁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他很注意这位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人物。西方记者将他俩的谈话形象地描绘成“为亚洲历史打了明显的标点符号”。根据尼赫鲁后来的回忆，毛泽东见面时不停地抽烟，谈起话来慢条斯

理，很像一位好为人师的大叔。他谈到中印两国在历史上的密切联系，两国在近代相似的不幸经历，也谈到两国之间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两国都需要和平的环境来改造各自的落后经济等等。毛泽东说：中印两国没有任何大的争端，两个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完全可能加强合作，中国需要至少 20 年的和平时期发展本国经济，也就是说正好需要 4 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国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进行合作。

尼赫鲁正仔细倾听，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说：但美国绝不会让中国人民享受和平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甚至睡不上一个安心觉。”美国正霸占着中国领土台湾及大陆附近其他许多岛屿，从这些基地频繁地对大陆进行空袭轰炸。美帝国主义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大获其利，但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却对它没有好处，因为到时革命会普遍爆发。原子武器除了会使更多的人遭到杀戮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性质。毛泽东的结论是：战争尽管是件坏事，应当尽量避免，但它一旦到来就应勇敢地欢迎，尼赫鲁在这点上提出异议，他语气和缓地争辩说：原子战争带来的并不只是伤亡人数的增加，而是杀人性质的改变，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与过去的战争完全不同。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漫不经心地告诉尼赫鲁，他绝不会被美国的核讹诈吓倒，就算数百万中国人在第一轮攻击中丧生，中国仍有足够的人留下来消灭美国人！尼赫鲁后来说，他听到这句话时有些楞了，不觉得打了一个颤。

1957 年 11 月 8 日，距这次与尼赫鲁的会见大约 3 年后，毛泽东在莫斯科又说了同样的话：“我就这一问题同尼赫鲁进行了讨论，他在这方面比我更悲观。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半数不幸毁灭，另外半数人仍会活下来，而帝国主义则会遭到彻底摧毁，那时世界上就只有社会主义存在。在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内，世界人口又会增长半数甚至更多。”7 年后毛泽东在另一次谈话中还提起此事，时间是 1965 年 1 月 9 日。埃德加·斯诺在他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写道：“他（毛泽东）记得他说过中国不希望战争，他们没有原子弹，但如果其他国家希望打仗，全世界就会面临一场大灾难，就是说会死去许许多多的人。至于到底会死多少人，谁也不能知道。他讲的并不仅是中国。他不相信一颗原子弹会毁灭全人类，因为那样你就再也找不到一个政府去商讨和平。他在与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到过这点。尼赫鲁当时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了解核武器的毁灭能力，尼赫鲁肯定不会有人能从原子战争中幸存下来。毛泽东对我说：大概不会像尼赫鲁说的那么厉害吧，现有的政权可能消失，但其他的政权将取而代之。”

不过尼赫鲁还是同意毛泽东说的，没有哪个国家能从这样一场战争中得到好处。毛泽东建议尼赫鲁利用他的影响向美国当局指明这点，他风趣地说：“假如我们能像艾森豪威尔的总参谋长那样起作用，就会建议他不要发动战争。然而，总理先生（尼赫鲁）能比我们更容易地做成这件事。如果我们这样做，他会认为我们在用革命恐吓他，他就会说‘我不怕革命’。”

毛泽东也向尼赫鲁提议召开一次有上百个国家参加的世界和平大会，订立某种形式的和平与互不侵略协议。尼赫鲁对此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如果过了 15 年还没有战争，人们会更害怕使用全面毁灭性武器，那时达成世界性和平协议的时机就到了。“当然，”毛泽东答道，“无论战争杀死多少人，要使整个中国沉入大海是不可能的，印度也是如此。”

他们的其他话题也同样精彩，他们两人都精通历史，但尼赫鲁听到毛泽

东对古代中国的皇帝的见解时却惊愕不已。毛泽东对尼赫鲁讲起秦始皇，详细列举这位帝王的功绩。尼赫鲁插言说，但是他烧了书，坑了儒，毛泽东笑着答道：要想做到“思想上的统一”，当时恐怕必须那么办。尼赫鲁从不喜欢盲目地夸耀印度的传统，觉得它总是被宗教狂热分子利用，因而他对毛泽东的评论颇感意外。后来回印度后他曾对同僚说，他从毛泽东的身上看到一种极为强烈并稍显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在周恩来那里却完全没反映出来。

中印两国领导人的正式会谈是积极而富有成果的。当西方新闻媒介别有用心地报道尼赫鲁与周恩来在会谈过程中存在尖锐对立时，尼赫鲁公开宣布：“这些消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印度的基本态度与中国的基本态度有一些不同，但是在我们的会谈中并没有发生过分歧，而且我能很愉快他说，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

中国对尼赫鲁访华表现出的热情友好在印度国内获得巨大反响，印度各主要报刊纷纷连续在头版作长篇报道评述，醒目标题如“中国首都像过节一般”、“真挚感情的热烈表现”等，印度人都从报上看到毛泽东亲切会见尼赫鲁的大幅照片：两人面带微笑，颈佩花环，热烈鼓掌和碰杯互相祝愿。中国领导人也给来访的印度客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尼赫鲁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赞扬毛泽东是“有着伟大成就的历史人物”。访华不久后他对一位外国客人说：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他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他给人的印象是襟怀坦白。至少他当时的印象是如此。尼赫鲁访华的全程都有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陪同，甘地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毛没有来过印度。我后来听说，他曾等待我们向他发出邀请。要是我们邀请了他访问印度，许多事情也许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当时知道他有这一想法，他就会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和尊敬的客人，我喜欢周恩来，他见多识广，对外交事务尤为老练和成熟。他观察事物比别人略胜一筹。”

这次访问留给尼赫鲁的基本印象是中国正在稳步地发展。回国后他写信告诉蒙巴顿夫人：“她拥有巨大的潜力，并正逐渐转化成现实的力量。中国不仅地大物博，而且意气风发，充满自信；中国人民团结、有组织、有纪律、勤劳，散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从中国的角度看，关于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接纳她进入联合国的争论仿佛只是无稽之谈，因为她那众多的人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谁也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接受新中国的问题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至关重要，而中国自身已逾越过心理障碍，并不在乎外部承认与否。”

尼赫鲁赞赏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当然并不是说他口服心服而甘拜下风。他对印度内阁说：“我对中国印象至深。但我也要告诉你们，即使访华时，我也为我自己的印度深受鼓舞。中国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印度低人一等。”他明显意识到，印度的存在和支持对这个时期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中国需要印度。他认为，中国不一定会在经济发展方面超过印度，印度在起步上有优势，但中国为自己确定的步伐比印度更快，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清醒”。尽管中印之间尚没有出现不友好的兆头，尼赫鲁也不怀疑两国能够和平友好地相处下去，但他却说：“那里有些东西始终在告诫我，我们不能落后，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水平。”他坚持说，印度没有理由改变自身既定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最终将是社会主义经济，我用

这个词并不是指任何教条主义的意思，而是指它的广义而言。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需要根据充分的数据和明确的指标来进行有组织的实施，至少从战略的观点看它需要各种类型的控制。很显然，我们不能实行苏联或中国式的集权主义路线，所以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民主的计划、避免过度的强制性以达到我们的目标。也许，这种计划不可能产生出靠集权和大肆采用强制作法所获得的可观效果。即使如此，我们珍视某些价值观和准则，宁可依循民主的途径。”

不过有一种有趣的说法。尼赫鲁虽然过去也谈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但实行起来始终三心二意，畏首畏尾。访华期间他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深受触动，回国后方开始认真强调在印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以说自1947年独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当然，他在中国耳闻目睹的一切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基本信念，他依然相信，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根据它自身的特点。尽管他访华时没有以不恭的语言评论苏联或苏联的政策，但并不等于他希望印度上如法炮制。况且他从骨子里“坚决反对将印度推入某一其他国家的阴影之下”。然而，不少人的确得出这样的结论：尼赫鲁在访华后比以前更积极，更紧迫地考虑和实施民主社会主义的计划。他对他的首席部长们说：“就我而言，我相信议会民主制和个人自由，但我也相信经济迅速发展的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是一次了不起的考验，需要我们的全部智慧、力量 and 目标的统一。”

十二、万隆上空的明星

朝鲜的冲突未停，印度支那的战火已起。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4 月底举行，印度没有参加。但尼赫鲁不愿在有关亚洲的问题上无所作为。几乎与日内瓦会议同时，在尼赫鲁和苏加诺的发起下，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缅甸和锡兰 5 国的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会晤，倡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在印度支那立即实行停火。

在科伦坡会议上，苏加诺建议举行一次大范围的亚非会议。尼赫鲁过去一直不愿意为地区性矛盾提供一个国际讲坛，尤其像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他无限期地拖延印度与以色列互换大使，担心那样做会妨碍印度在适当时候调解西亚争端的机会。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广泛讨论国际问题的亚非会议只会引出尴尬的局面，但科伦坡会议改变了他的主意，开始接受召开大型亚非会议的主张。他希望这一会议能成为反对美国强行与亚非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的讲坛。印度、印尼、缅甸等国团结一致是一个好的开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亚洲和平区，然后寻求扩大和巩固。

尼赫鲁认真考虑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他认为，由于这一会议的主要预期目标是营造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改善亚非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因此没有必要提出正式的讨论事项，也应避免就具体问题发生争论。他希望在会议的组织上尽量避开矛盾和不和，印度本打算邀请以色列，但又怕阿拉伯人不高兴，只得安抚后者在邀请以色列以前先征得他们的同意。但尼赫鲁在邀请中国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中国本来也对出席亚非会议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英国外相艾登曾向尼赫鲁暗示，邀请中国会在英美两国产生很坏的影响，但尼赫鲁没有理会他的告诫。尼赫鲁说，印度并不想惹恼英美，但英美毕竟不是整个世界，印度还得考虑世界其他地区的观点和反应。梅农对艾登的谈话实际上代表了尼赫鲁的观点：“我们被告知，美英不想让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但这一意见对我们不起什么作用。实际上我们对此很不高兴。美国和英国做的许多事都令我们不快。”

不久，科伦坡会议 5 国总理到印尼的避暑胜地茂物再次会晤，决定邀请除以色列和南非以外的所有亚非独立国家参加订于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排除南非的理由是充分的，不要以色列参加则是尼赫鲁对阿拉伯国家的让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接到开会邀请，周恩来复电表示中同将派团出席。台湾被排除在外。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受到邀请，这一地区涉及到紧迫的和平问题，科伦坡 5 国对执行日内瓦协议负有特殊的责任。在邀请两个朝鲜的问题上没遇到太大阻力，但最后还是决定不邀请为佳。

拟定的与会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而使世界不能低估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但中美关系的危机对会议的顺利召开是一个不利的因素。美国认为中国继续拘押美国战俘破坏了朝鲜停战协议，中国却坚持说关押的是直接在中国投伞降落的间谍。尼赫鲁向中国传话说，美国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强烈，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也对后果的严重性表示担心。但周恩来以冷静坚定的口气说：“尽管中国需要和平，但我们决不会乞求和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主动愿意访问中国进行调停。尼赫鲁劝周恩来接待，说：如果拒绝接待联合国官员，就会对中国的敌人授之以柄，何况哈马舍尔德的访问有助于在全世界面前澄清中国的立场。这在当时尤为重要，因为联合国总是单方

面地指责中国。哈马舍尔德也表示，直接与中国接触会产生某种积极的效果，开辟出新的途径。

尽管联合国尚未承认中国，但中国政府同意接待哈马舍尔德。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显的，来访带给中国充分参加国际社会活动的机会，有助于巩固中国的外交地位。不过由于美国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密切联系，联合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尼赫鲁对中国的好感并没有获得广泛响应。丘吉尔完全支持美国，艾登、皮尔逊等人赞成向双方施加适当的压力。艾登相信尼赫鲁能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一点作用，要他劝说中国停止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并派一名代表去联合国进行对话。

尼赫鲁从伦敦致信周恩来陈述英联邦的意思：将台湾问题单独放在一个次要位置上加以考虑，同意先就其他问题进行协商，不要坚持让美国从台湾完全撤出；同意出席一次类似日内瓦会议那样的与联合国无关的非正式会议；在不提出香港问题的前提下促进中英关系。他还说，无论哪一方的处境如何有利，但鉴于另一种选择只能是战争，目前各方的消极态度是不够和不合适的，应当逐步地解决问题，先从外交试探和非正式接触开始，以期减轻紧张局势，譬如，如果美国停止敌对行动并制约蒋介石，中国就应默许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等沿海岛屿撤出。周恩来的答复对尼赫鲁没有多大用处，周恩来指出，美蒋继续勾结向新中国进行猖狂挑衅，因而中国的任何动议都无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中国的唯一积极反应是支持苏联提议的按日内瓦会议形式召开一次大国会议，但这在尼赫鲁看来并不足以改变美国的对抗态度，因此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仍同过去一样没有减小。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东亚的战争危机，尼赫鲁深知即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不仅具有一般性意义，他下决心要使这次会议圆满成功。与会议筹备有关的任何细节在他看来都不是小事，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毕竟还须记住一件事，这在印度尼西亚经常置于脑后，就是要准备充足的浴室和卫生间。人们可以不要客厅，但不能没有浴室和卫生间。条件准备差会使人不快，当讨论重要问题时，心情不佳可不是好事。”

许多人认为尼赫鲁将会是万隆会议上最重要的角色。在当时大多数人的眼中，中国的实力和影响虽然与日俱增，但亚洲的政治舵手依然还数印度，而尼赫鲁在印度的地位和声望正如日中天，他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众所公认。的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使亚洲登上世界舞台的成功努力而论，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人物之一。他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表达亚洲的普遍性观点，将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亚洲大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即使那些对他抱有相当成见的人也能从他身上发现卓越闪光之处。丘吉尔写信对他说：“我希望你能想起‘亚洲之光’一词。我认为你在领导印度方面能做出其他任何人做不到的事，至少在整个亚洲的思想领域，是你将人的自由和尊严奉为理想。”在英联邦内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尼赫鲁，各成员国才感到它们之间的团结具有意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要人遇到棘手难题也找到他指点迷津。西德反对党领袖奥伦豪尔专程到伦敦向尼赫鲁解释他的社会民主党对德国重新装备和德国统一的看法。阿登纳渴望会晤尼赫鲁，听取他对西德政府的逆耳忠言，但因时间安排不合他的意而取消。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匆匆赶到戴高乐机场只是为了见上中途转机的尼赫鲁一面。澳大利亚总督凯西请求尼赫鲁制止印度尼西亚对西新几内亚的领土要求，他在万隆会议前写信对后者说：“很显然，你本人将是万隆会议上的领导人，尽管我也希望

周恩来先生能充分利用会议给他的机会。”艾登与哈马舍尔德指望他能以个人身份影响周恩来，劝说中国答应美国的提议，以释放美国空军战俘为条件换取美方对数十位中国旅美学界离境归国的许可。荷兰政府则期望他转告苏加诺，保证公平、迅速地审判关在印尼的荷兰战俘。他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正明显得到改善，苏联高度评价印度在印度支那停火监督委员会中的工作。他不久前对中国的访问足以向世界表明他的调解作用并非无关紧要。美国政客们尽管对他经常非难，但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总忘不了征求他的意见。非官方舆论也对尼赫鲁充分信任。爱因斯坦临终前不久还向他转达美国科学界对消除东亚战争危机的殷切愿望。总之，各方面虽然动机、心态不完全一样，但都对尼赫鲁寄予厚望，也都关注着即将举行的万隆会议和他个人将发挥的作用。

中国当时没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尼赫鲁主动表示从印度派专机接送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周恩来临时乘荷航的班机从仰光飞往印尼，而印航派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不久便坠入大海，机上除3名机组人员逃生外全体人员罹难，4月15日，尼赫鲁起身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行前得知印航专机爆炸的消息，他致电中国政府向受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事后的调查表明，这次悲剧完全是香港方面的国民党特务策划制造的。这件事成为轰动性事件，给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蒙上一层阴沉的气氛。

一位负责调查这起事件的印度官员回忆说，他在万隆得到命令前往香港查证，行前尼赫鲁当着周恩来的面对他的工作能力赞不绝口。当天晚上他去周恩来住处详细介绍飞机起火情况，画草图时一不小心被墨水弄污了手，周恩来叫来一位服务员，后者用热湿毛巾替他擦净污迹。这位官员对此小事印象很深，后来对尼赫鲁谈起，尼赫鲁评论说：“是啊，中国人如果希望对你礼貌，可以做得非常好。”这位官员在调查过程中多次访问北京时都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后来回印度后他又对尼赫鲁提起中国领导人的友好待客，尼赫鲁又重复他在万隆说过的那句话。回忆还说：“当我最后一次与周恩来在北京见面时，我汇报了调查的进展。他明确断言，港英政府想把事件的调查拖到年底，然后不了了之。尼赫鲁在万隆时指示我尽量避免与中英任一方发生争执，于是我恭敬地向周恩来提出，就我所了解的香港当局直到当时的表现，我恐怕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周恩来此时看上去神色严厉，略含威慑地说，‘那么你不同意我的意见了，让时间来证明我们谁对谁错。’当时是凌晨两点，地点在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我必须承认我那时浑身直打冷战。”

与空难相比，更令人担心的是会议是否有希望圆满成功。东亚的战争危机随时都可能加深，印度支那的战火也可能再起，亲西方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形成搅浑了东南亚的局势，并且西亚的局势也因英国、巴基斯坦等国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而紧张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亚非各国的代表聚在一起开会本身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会议发起者之一的尼赫鲁来说，这次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认为，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协议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同1947年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关系会议一样，万隆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重申亚非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亚非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欧洲的外围，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但它们现在站起来了，对世界上的大事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再遭到忽视；它们并不希望干预其他民族的事情，但一旦涉及到亚非的利益，就必须倾听它们的呼声。亚非国家之间无论存在何

种分歧，但它们都面对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它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也许不尽相同，但它们绝不会接受其他大国强加的任何决定。无论外部势力如何强大，加以强权干涉亚非国家的事务只会引起同仇敌忾。

尼赫鲁意识到，这一切希望很容易淹没在赞美亚非精神的泛泛空谈之中，因此有必要使万隆会议紧紧地围绕一些根本性的主题。他也会像其他代表那样，大讲亚非大陆正在风起云涌的热情，讲它们与历史正同步前进，但是他将尊奉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他认为，亚非的首要任务是使各个不同的国家集合起来，既包括与美国军事结盟的国家，也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它将包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次会议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与发展各与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同等重要，因而主要议题应该有广泛的概括性，尽可能强调共识和共性，淡化相互的分歧与矛盾。他相信，这次亚非会议要想获得成功，需要进行精心策划和运作，组织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智谋和技巧。

4月18日，美丽的万隆充满热烈欢快的节日气氛，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在“独立宫”中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亚非29国的代表团。鲜花簇拥的主席台上，坐着东道国印尼的正副总统苏加诺、哈达及5个发起国的总理尼赫鲁、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吴努、科特拉瓦拉和穆罕默德·阿里。巨幅深红色帷幕前排列着全体与会国家的国旗。为了避免各国一开始就陈述自己对不同问题的立场，减少讨论时的灵活性，尼赫鲁提议免去开幕式的发言，但个别国家表示反对，他只得让步，但他本人没有在开幕式上发言。进行广泛讨论之后，会议决定就一般性问题达成共识，将有争议的问题留给非正式讨论。尼赫鲁在会上积极施展影响，主要各国领导人共同发表声明赞同中印两国前不久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他看来，这是促进相互信任和团结、拒绝加入意识形态的冷战和军事盟约的重要标志。他对会议一致通过他的提议满怀信心。

然而，冷战的阴影仍在万隆上空游荡。当讨论到发表一个谴责殖民主义的决议时，亲美的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提出苏联控制东欧的问题，要求会议谴责“共产主义集团的新帝国主义”。巴基斯坦表示赞成。尼赫鲁没有料到他们会来这么一招，他敏感地察觉到美国正想方设法将冷战的影响引入亚非国家内部，企图引起这些新兴国家之间的分裂。他当时气得脸色铁青，情绪激愤，几乎是跺着脚冲出会议大厅。呆在他身边的英迪拉责怪他不该如此冲动。他冷静下来重新返回会场，态度坚决地说：这一问题与亚非的关系相去甚远，亚非会议是一次政府级会议，应在特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东欧国家是主权国家，也是联合国成员国，会议将它们看作殖民地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做法”，他指出，如果代表们希望讨论独立国家遭受外来强权压制的情况，“你们就走入了某个迷惑、困难、不确定和国际上都弄不清楚的误区，你们会成天到晚争个不休，无论得出怎样的结论，都只是失真和靠不住的。”尼赫鲁早已不再是苏维埃制度的仰慕者，并无意袒护苏联，他说，“我不喜欢他们干的许多事，正如我不喜欢西方大国干的许多事一样。在适当时候，只要与会代表认为有必要，我们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抗议。”但他声辩说，东欧局势不能作为正式问题和政策的对象提出来供其他国家批评，亚非各国只需笼统地强调任何国家不应干涉别国的内政就足够了。最后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采纳了周恩来的措词：“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应当尽快消除这一罪恶。”决议没有专门提到独立国家，从而迈过了亲美国家设置的这一障碍。

更麻烦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军事结盟，它引起与会者的普遍关心。尼赫鲁

不厌其烦地详述不结盟对亚非国家的意义和好处。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西欧有利，但它对世界其他地区则表现出殖民主义的态度。“东南亚条约组织”也是对《日内瓦非战公约》的消极反应。诚然，每个国家都有权捍卫自己，但申张这一权利不应靠加盟西方集团或苏联集团，或是靠另组一个军事集团。对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潜在的實力不在于扩张军备，而在于加快工业进步和培植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平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万隆会议的参加国不应凭借扩充军力或军事结盟。“我们不赞成共产主义思想，我们也不赞成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因为这两者都基于错误的原则。”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印度都不会加入其中任何一个集团，而是将始终如一地恪守自己的独立自主原则。不结盟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关系到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假如世界被彻底划分为两大对立集团，战争将不可避免。军事结盟只会增加成员国的不安全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可缓和紧张局势，不会损害任一方的利益。印度目前能利用自身的影响加强反战和爱好和平的力量。

尼赫鲁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指望劝阻已签署军事协约的国家。其实，他既然承认它们有权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也就等于承认它们不一定接受他的观点。会议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只要符合联合国宪章，各国有权单独或联合起来捍卫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尽管没有增加其他新内容，但尼赫鲁认为它仍与军事结盟性质的“马尼拉条约”不同，因为联合国宪章仅提到在受到武装进攻时进行自卫的权利。不结盟主张在这次会上的最大收获，是公报中规定联合防御不为任何大国的特定利益服务，这也间接地谴责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马尼拉条约》。

尼赫鲁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众多的与会国代表，从这点看，万隆会议对他算不上是一次实质性胜利。实际上，他为了确保最大程度的和谐不惜牺牲自己的观点，只是当讨论内容有失控之虞时他才坚持己见，不过他仍对会议十分满意，主要不是因为正式讨论中达成倾向性意见，或发表了广泛接受、皆大欢喜的联合公报，而是因为会议的成功举行和亚非各国领导人济济一堂与相互结识。尼赫鲁会后给蒙巴顿夫人写信描述道：纳赛尔以前除去麦加朝觐外从未离开过埃及，这次“兴奋得简直像个小孩”。尼赫鲁自1947年以来也是第一次出席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通过此次接触他改变了对许多亚非领导人的看法。

周恩来总理是万隆会议上的另一颗明星，甚至很多人将万隆会议看作是尼赫鲁为周恩来安排的活动舞台。是尼赫鲁有意这样做还是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他的政治意识过于天真呢？前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他把自己看成制片人而不是主角，难怪人们都注意到周恩来是会议上风头最健的人物，因为后者能为自己找寻发动外交攻势的适当机会，而尼赫鲁却相形见绌。

尼赫鲁认为周恩来的成功也是这位中国总理个人的胜利。由于大部分与会国家对新中国缺乏认识，有些还抱有很深的怀疑和偏见，周恩来也是首次与大多数亚非领导人见面，大家对他并不了解。尼赫鲁在开幕式上对他作了热情的介绍。周恩来本人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从消除殖民主义的痛苦和灾难中寻找共同的基础，我们之间就很容易相互了解、尊重、同情和支持，而不是相互怀疑、恐惧、排斥和对立。”发言结束后，起初鼓掌的不多，随后掌声如雷鸣般响起。尼赫鲁称“这是一篇精彩的演说。他显得有些动情，主动走上前与周恩来热烈拥抱，全场再次热情鼓掌欢呼。

周恩来不出所料，充分利用了这次难得的机会，显现给人们一种永恒的友好形象。尼赫鲁在会议期间记道：“他在大会和分组会上表现得极为出色，显得能干，温和，讲话总是有理有据，他竭尽全力地会晤各方代表，参加各国代表团举行的各种招待会。他也同他们举行个别会谈。他并不提出任何重要的建议，只是当涉及

有些与他坚持的原则对立的问题时才提出反对意见。他显然盼望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所以总是尽量表现得随和，即使有时遇到某些代表的无礼言行，他也能泰然处之，克制忍耐。只有一次他在小组会上发了脾气，大喊中国绝不容忍受人欺负。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周恩来对尼赫鲁说，中国政府实际上本已决定释放美国飞行员，但却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一次与印尼、锡兰和菲律宾代表的小组会上，他对所谓将共产主义引入西藏的说法一笑置之，并邀请他们都去西藏看看。他公开表明愿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直接对话。会下他又补充道，他不能作进一步的承诺，除非已探明美国的态度，但他盼望寻求一项和平解决的方案。如果中国停止解放沿海岛屿的行动，就等于承认了蒋介石集团占据台湾和美国在那里驻军的合法性。在印度支那

问题上，周恩来同意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化，支持尼赫鲁反对吴努关于由印度向这两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建议。

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周恩来郑重声明，中国尽管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绝不会进行扩张或从内部颠覆

别国，他来万隆正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增进相互理解。他特别提到，任何国家都应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制度，中国尊重美国和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但也要求对方同样尊重中国的权利，中国不需要特殊的权利与地位，只要求得到公正平等的对待。他的话给各国代表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在这项声明的基础上，周恩来与他们进行了单独会谈。先从印尼开始，双方谈到海外华人的问题。与泰国谈到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一位西方著名记者对尼赫鲁和周恩来这两位明星人物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作了生动有趣的对比：“他们两人都知道，他们国家发生着的一切对大多数新独立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关系重大。”

周恩来用中文演讲，通过一名译文翻译成英语，他的发言在尼赫鲁之前，他指出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利益一致。说：中国正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义务将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联系在一起。他邀请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访问中国，看看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显著进步。他并不装腔作势，咄咄逼人，而是风度翩翩，显得实事求是，稳重克制。

“过了一会儿尼赫鲁发言时，人们发现两人之间有惊人的不同之处，尼赫鲁讲话不用底稿和翻译，他面容亲善，情绪激动，语言中饱含一种能唤起人们热情和希望的感情力量。他并不试图改变其他人的信仰，也根本不谈光辉灿烂的历史必然性，他展示给大家的是人类处境的变幻莫测和危机深重，但整个的立足点是争取自由，他能肯定

的只是一种良好的可能性，告诉人们自由就在他们的眼前但需要努力争取。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印象至深，但他们也相信尼赫鲁，即使他们不赞同他的观点也会信任他。他们可能无法让自己领会他的智慧或理解他的苦衷，但对他有信任感，知道他这人绝无坏心。由于安全因素的考虑，周恩来在万隆期间身边布满保安人员，尼赫鲁身边也围着许多人，但主要是想与他交谈的人，他们来自新兴独立国家，突然间被赋予创造历史的责任，因此需要有一位像尼赫鲁那样的人传递给他们某种信心。他孤傲矜持，但绝非冷漠超然，独往独来。”

在尼赫鲁的眼里，周恩来“通情达理，克制力强和有良好修养”，但实实在在是一位精明而务实的共产党人，他不受友谊或义务感这类幼稚观点的左右，而是相信任何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孤立无援的，只有靠自力更生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他自然认为中国与印度争地位、争影响是天经地义的。尼赫鲁也敏感地察觉，周恩来在万隆期间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了密切的友谊。阿里对周恩来说：巴基斯坦并不敌视中国，不担心中国的侵略，也不会卷入美国与中国之争可能发生的战争。尼赫鲁后来竟说，他已得到可靠消息，周恩来当时也对阿里说，中巴两国不存在任何影响相互发展友好关系的利益冲突，但印度与中国之间就不一定了。尽管尼赫鲁在会上没有表露，但这种猜忌肯定加深了他对中国的戒心。

尼赫鲁为了强调印度及自己本人的重要性，也在不同场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中国的某些成见，这强化了与会代表和新闻界对中印相互竞争、互不相让的看法，客观上产生出某些消极的影响。一位记者写道，万隆会议闭幕式之前的早晨，尼赫鲁邀请一些记者与他共进早餐，地点是他在万隆郊外的住所。

我们坐在阳台上，看见下面满院鲜花盛开。尼赫鲁已经下楼来到鲜花丛中，满足地呼吸着诱人的花香。他的神情像是正在沉思，他讲起亚洲的未来前景，特别提到中印两国。他说他对此想得很多。他又说：显而易见，印度国内的形势对印度以外的地区，亚洲以及非洲，都有重大的影响。会议期间东方的两个大国都在向其他国家的千百万人展示典范。尼赫鲁说，印度的范例尽管错综复杂和不无

困难，但它表明在不消灭每个人的个性的前提下也能建成一个进步的社会。印度有4亿人，其中大多数尚处贫困，他们需要工作、食物、药品，学校和居室。中国共产党人却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控制的社会中才能真正解决这一

类总体需求。他们认为，如果不先有一个适用于完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治机制，就不可能尽快尽善地完成既定目标。

尼赫鲁说，这是些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他相信印度虽然面对许多困难，但正在不断地向前迈进。我们问他，就他看来新中国发展中的优势和弱点是什么。他以特有的讲话风格回答说，他不用去作这类判断，

历史将是最适合的评判者。但他又补充道：任何一国的领导人当墨守套用某种一个世纪之前的经济或意识形态学说时都应当谨慎小心。

“这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吗？他回答说：是的，马克思的思想中有许多合理和有价值的东西，但自马克思发表他的理论以来世界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试图将这些学说奉为自然法则加以遵循在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就是倒退。他又补充说，况且马克思主义的教义适应面太窄，难以解决社会发展面对的诸多问题，它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低估了与人有关的其他一切事物的力量。生活包括的内容远远不止经济的发展。”

虽然尼赫鲁与周恩来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但两人在会议期间也有相处不快的时候。周恩来后来说：“我见过的大人物不少，尼赫鲁却是我所见过的最傲慢、最自负的人。”尼赫鲁在万隆期间也不乏刻薄他讲过一件与周恩来有关的事，想借此表明他对中国领导人的成见：

“我俩被选进一个分组委员会，负责为会议草拟一份文件。这是大会急需的一份简短声明，我们在基本精神上很容易达成了一致，我请周恩来写第一稿，但他拒绝了，说他宁愿我来写。我自然是用英语写，然后通过他的翻译读给他听，他对初稿表示赞同，但说文中有若干关键词句似乎改变了他所理解的声明应当表述的原意。我们再次大体上讨论了声明的目的，尤其是其中那些引起麻烦的用语。我们毫无困难地就草案的本来含义统一了意见，这下剩下的全部事只是将为数不多的英语单词译成中文了，做这件事又花去几小时时间，但即便如此，他仿佛还是不完全满意译文的准确性。你知道当我离开会场时脑子里作何感想吗？我自言自语说：‘哦，天哪，只要想一下卡尔·马克思的中文写法就够了！’他听到这句话笑了，然后说：‘你知道，我极度认真。’”

尽管万隆会议前后发生了一些节外生枝的戏剧性情节，但会议获得圆满成功，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溶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尼赫鲁筋疲力竭地返回印度，对会议的成果喜形于色。他的不结盟政策在万隆得到拥护和响应，不结盟运动开始体现了生命力。万隆会议的成功也是一个对世界大多数民族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性事件，它标志着亚非各国彻底摆脱外来殖民压迫获取自由独立的信念，也表明了它们完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积极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决心。这次会议将周恩来和尼赫鲁两位巨人并列推到前台，他们分别代表着世界上两个新兴的伟大国家。“万隆精神”也由此成为一个时代最有生命力，最具建设性的象征。

十三、印苏蜜月

万隆会议后，尼赫鲁继续在两大阵营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他严厉抨击美国政策的许多方面，反对美国组织军事联盟和扩大其在亚洲的势力范围，这就使他的观点与苏联的现行政策出现了结合点。从 1955 年起，苏联开始公开向印度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并同意援建一座年产 100 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厂。但尼赫鲁认为倒向一边而疏远另一边的做法不符合不结盟的原则。他在万隆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不属于两大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提议加入。如果我们不得不孤军奋斗，我们必须独自坚持，准备面对一切后果。”从万隆回国后，他对美国驻印大使表示，尽管美国的政策有许多错误，但印度不会敌视美国，印美需要成为朋友。

除了正式的外交场合以外，梅农作为尼赫鲁的代表穿梭于北京，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极力促成对立各方间达成妥协。尼赫鲁相信他的不结盟完全能以这种方式发挥有效的作用，用他的话说，“对它无所谓赞成或反对，肯定或否定。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意见，有悄悄发出的暗示，有不作承诺的笼统表白，有翘首以待的答复等等。如果出现的反应是积极的，我们就向前再走一步，否则我们便保持沉默。我们想做什么呢？让每一方更温和，更平静，更多地听到另一方的意见。这完全不算正式地转达消息。”

尼赫鲁对世界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渐走向和平的分析和寄予的希望是正确的，对此今天已很少有人怀疑。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有些不乏远见的人认为这并非是望梅止渴。《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形势的发展足以给人们带来冷战平息希望。但在美国好战的一派观点看来，尼赫鲁的见解似乎更像是派别偏见的辩护。他们说，既然尼赫鲁是公认的不结盟领导人，为何他不能避免万隆会议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反而为中国提供讲台。美国的舆论机器于是攻击说，印度赞成共产主义并鼓励它的扩张，尼赫鲁不可一世想谋求亚洲的领导权，尼赫鲁企图将印度变成一个强权国家，尼赫鲁的印度反对阿拉伯人的事业，诸如此类。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写过一篇诋毁尼赫鲁家族的文章，美国的官方机构有意让它广为流传。与此同时，美国也以经援为工具迫使印度在美国的政策面前就范，并想方设法削弱尼赫鲁在国内的权威。要是换成另一个人当总理，美国的做法很可能导致印美关系出现破裂，这在当时必会得到大多数印度人的欢呼。譬如，印度政府和国大党内不少人要求尼赫鲁拒绝接受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但尼赫鲁没有同意。他知道，英国的好战势力正恼羞成怒地发起一场反印度和反对他本人的运动，他不愿再给他们可乘之机。

可见，尼赫鲁并不打算通过激怒一方或讨好一方来偏离他的不结盟立场，他担心自己的基本政策遭到误解，也不希望用他的个人威望承担风险。“不结盟”的旗帜使他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当中国决定释放 4 名美国飞行员时，特地选印度而不是联合国向美国传话；哈马舍尔德邀请尼赫鲁宣布联合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结束，只因后者无时间赴美国才另选他人。尼赫鲁当然明白他对国际事务拥有影响力的个中原因，因此绝不愿轻易将它毁掉。

然而，维持平衡和走钢丝并不意味着瞻前顾后，止步不前，他需要发动积极的外交攻势。尼赫鲁 1955 年夏季对苏联的访问使他的影响又一次达到高潮。苏联对他的来访表示出前所未见的欢迎，莫斯科作了精心的准备，《印

度的发现》俄文版于访问前夕出版，尼赫鲁专门为之写下序言。接着又特地发行了《泰戈尔选集》第一卷。尼赫鲁对苏联表现出的感情并不意外。一段时间以来，苏联领导人感觉到他的基本政策有助于苏联自身的利益。日内瓦会议后不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曾对尼赫鲁在印度议会的一次讲话大加赞誉：“那篇讲话充满智慧和远见，我要说尼赫鲁万岁。”苏联领导人了解印度的难处，知道某些人甚至称尼赫鲁是共产党，他们只希望尼赫鲁仍然是过去的尼赫鲁。

苏联这时终于有机会向世界表明他们对尼赫鲁的热情和亲近了，主席团全体成员赶到莫斯科机场恭候他的到来，布尔加宁生平第一次亲自驾驶敞篷车送一位外国领导人穿过人头攒动的大街。苏联显然是想努力超过中国一年以前对他的接待规格，正如甘地夫人的回忆，“我相信苏联领导人看过我们访问中国的电影，因此他们认为苏联的规格不应低于中国。”苏联领导人也想让尼赫鲁意识到，苏联对他的热情与美国对他的冷淡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就连莫斯科的外国观察家也承认，对尼赫鲁的欢迎和接待中有一种自发性因素，人们将他看作是世界和平的希望象征。

这次是尼赫鲁近 30 年之后重访苏联。早年那次访问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不夸张地说，对他思想的形成有过相当程度的影响。这一次他的身份却是印度总理和世界和平运动公认的重要人物。他看上去平易近人，充满好奇，指望“用开放的思想 and 开放的心灵”去发现对他有意义的东西。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我记得在 30 年代时读维伯斯的大作《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我当时想了解的问题也是我现在仍然思考着的问题：这一新文明究竟是什么？哪些是它亘久不变的本质，哪些又是必将消逝的表面之物？尽管它披上一层经济的外套，却又表现为一种充满生命力和进取心的新信仰，它是人类历史中出现的一种新型宗教吗？它是否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哲学观？我们能用它理解人类关系的复杂性，理解人类自诞生以来所进行的那些伟大而又常常悲剧性的冒险活动吗？它能让我们窥见未来吗？”

苏联的经验从经济领域看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但对那种在甘地的和平行动的传统下培养起来的人而言，一旦注意到暴力手段被无保留地溶入一种哲学时，他们难免会对其产生怀疑和厌恶。不过尼赫鲁此时更关心的是，除了暴力、强权和抑制个人自由的因素之外，苏联的经济战略能否有助于解决印度或世界面临的问题？要想为这类问题找出明确答案，以总理身份对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进行官方访问显然是不够的。他相信这次访问的见闻将远远超过多年前那次走马观花的游历，但也不能抱过高的期望。

他在访问中亲眼看到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变化，“解冻”正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明显、深刻的变迁。令他触动最深的是人们的整体风貌。他访问了苏联的不少城市，见到千千万万人民充满幸福和喜悦，生活美满，丰衣足食，儿童的物质需求、体育运动和卫生健康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绝大多数人口的年龄都在 50 岁以下，他们在苏维埃的旗帜下长大，完全受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我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令人满意的。人人都在紧张地工作，没有时间发牢骚，即使有些抱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尼赫鲁仿佛看到，一个崭新的社会正在苏联内部孕育成长。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建设迅猛发展，到处是新建的工厂和城镇，工农业生产与日俱增，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并对自己生存的环境表现出充分自信。老百姓普遍养成阅读的习惯，善于科学地思考问题。这样一个社会一旦摆脱它周

围的战争阴云，就能安定下来专心致志于正常的生活，民主和个人自由也将随之而至。尼赫鲁写道：“我并不认为苏联已出现像西方一些国家中存在的那种个人自由，但一个注重知识和教育的社会不可能长期屈从对个人自由的压抑。”他还认为，苏联需要做的事很多，需要捍卫的成果也很多，因此有理由相信苏联渴望和平而不喜欢战争。与他谈话的苏联人都由衷地坚信，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的国家就能与美国并驾齐驱取得同样巨大的经济成功。尼赫鲁甚至得出这样的印象：苏共是苏联的执政党，每时每刻都面对国内外发生的各种重大事情，充分了解现实并对时局负有责任，他们与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人完全不同。

他用两周时间在苏联各地观光。访问中亚的加盟共和国时，他对撒马尔罕的精美建筑赞叹不已，这座城市的闻名与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之君巴卑尔分不开。他参观了不少历史胜迹和博物馆。在列宁格勒，他主动提出要参观冬宫，除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发源地表示好奇外，他也仔细欣赏珍藏在那里的古典大师的作品，特别喜欢达·芬奇和兰伯朗的绘画。他的时间表安排很紧，随从人员们累得要死，但学童般的热情和好奇心赋予他无穷的动力，促使他观察和了解各种事物。

尼赫鲁的访苏在政治方面取得了成功，苏联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他的印象很不错。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尼赫鲁关心的还是曾向美国提过的相同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会因友谊和印苏近期对某些问题的共识而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指出，中国释放美国飞行员的举动已受到西方的赞许，苏联应劝说中国继续释放关押的其他美国战俘。他反对通过召开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六大国会议讨论东亚问题，因为这将必然涉及到台湾出席会议的资格问题，而最好的办法是鼓励中美之间开展直接对话。苏联主动表示愿帮助印度成为安理会第六个常任理事国，但尼赫鲁婉言谢绝。他强调应优先考虑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严厉批评美国的侵略立场，尼赫鲁答道：“我弄不懂为何一个强壮的人总想炫耀自己的肌肉。”他的话听起来像是附合苏联，其实却一语双关。他接着将注意力转向美国政策中相对积极的因素，譬如麦卡锡主义的失势，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分歧，艾氏谋求和解的姿态，美国人民普遍希望和平等等。他鼓励苏联领导人别对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四大国会议失掉信心。

访问之初，尼赫鲁在对苏联给他的热情接待作出相应反应的同时显然并没有忘乎所以。《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说：“他集剑桥绅士、东方圣人和20世纪的政治家于一体，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间谈吐自如，游刃有余。”但随着访问一天天继续，尼赫鲁对不绝于耳的赞美声、欢呼声难免也有动情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评论也就变得刺耳了：“尼赫鲁先生的意图肯定是好的，不应怀疑他怀有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的愿望，也不应怀疑他想在美苏两大势力之间充当和事佬的初衷。遗憾的是，尼赫鲁先生对和平的贡献竟是完全接受苏联的政策。如果他有意而为之，那也无可厚非。但他毕竟是一位聪明人，不会不知道拥护苏联的事业只会招来美国的怨恨。这很难说是他的愿望。他离开莫斯科时说，‘我将我心灵的一部分留下来！’我们大概可以认为他也将自己的同感留了下来。”

美国舆论界的评论显得既苛刻又欠公允，其实，无论尼赫鲁讲话的语气如何动感情，但双方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是由印度一方起草的，与尼赫鲁在会谈中的立场完全相符：苏联承诺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宣言》和

全面核裁军建议；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但强调应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也不确定最后期限；将相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扩大到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后一提法明显针对苏联已实际放弃的国际共产党情报局。苏联领导人试探性地建议：双方共同谴责某些国家组织军事联盟的政策，同意不参加任何直接针对对方的盟约和行动。但尼赫鲁表示拒绝，他觉得，这一承诺等于接受了一种变相的联盟。苏联领导人不便坚持只得作罢。

在莫斯科期间，尼赫鲁接到艾登发来的要他访问伦敦的邀请。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是件好事，布尔加宁意味深长地说：“如果西方能像我们那样理解你，这对世界将是一大福音。”直到此时，尼赫鲁仿佛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向西方转述在苏联见到的一切，尤其是苏联政策的积极变化。他给艾登的信中写道：“我的印象是，苏联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不仅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它使我对未来更加满怀希望，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相信能以和平方式探讨和解决问题。”

尼赫鲁在伦敦与艾登、麦克米伦会谈时也用同样的话评价苏联，这对西方领导人对苏联现行政策的判断不无帮助。麦克米伦参加日内瓦四大国会议后赞扬他说：“英国政府深深感谢印度总理，他对俄国形势的评价是我们会谈中的指南，并且每次都证明正确无误。”

尼赫鲁相信，潮流正在转变，世界已临近一个转折关头，各国将走出冷战的城堡迈向真正的和平，日内瓦大国会议标明了这条新航道的第一阶段，世界上的具体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局势会日益恢复正常，骚动和紧张必将缓和，各主要军事强国之间也将增强相互的信任和理解。他总爱对人说，最大的铁幕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然而，日内瓦会议一扫阴霾，既不是印度的胜利，也不是尼赫鲁的个人功劳，各大国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利益所在，利害关系才是它们行事的依据。日内瓦会议后不久，尼赫鲁的美好愿望便统统落空了，这就很说明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确实促成了大国之间的勾通和理解，力争各方接受友好、公正的道义原则，缩小了西方与苏联之间存在的裂痕。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收效是巨大的，正如他访苏时所言：“我们的声音并不洪亮，我们轻言细语地讲话，因为这是印度的传统。”但这些幕后活动甚至比万隆会议或其他正式的演讲和联合公报更富实际意义，是这一时期不结盟外交对世界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尼赫鲁赞成与苏联发展友谊，但他反复强调：印度不同任何其他国家捆在一起，不能让人觉得印度依靠他国的援助生存，印度无法忍受自尊贬值的屈辱。“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获得的尊严，主要归功于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同时又与人为善。因此，我们对一切事情都须有所克制，克制又不等于拖延。实际上欲速则不达，若一步走得太急，响应反会延缓。”

1955年底，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回访印度，新德里准备进行隆重欢迎。但尼赫鲁此时更关心与苏联详细讨论援助问题，尤其是在重工业生产和技术领域。有些印度的部长对苏联的姿态表现得受宠若惊，头脑发热，建议请苏联领导人过目印度的“二五”计划草案，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尼赫鲁当然不会同意。然而，外部形势的发展和苏联领袖们的激情共同促成这次访问有声有色，意义深远，这多少使尼赫鲁有些意外。

当时，军事结盟性质的《巴格达条约》正式签署，英国、巴基斯坦相继加入，美国也与该集团发生密切联系。这看上去都像是对印度不友好的举动。英国政府虽然保证不做任何对不起印度的事，但很难让尼赫鲁信服，因为这

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将印度重新推人不利的处境。《马尼拉协定》加上《巴格达条约》，表明在印度的周围也存在一个敌对的包围圈，巴基斯坦是盟约中的重要一环。而这时巴基斯坦国内对印度的指责也在升温。对外部环境的不安进一步唤起印度对苏联的热情。

美国对印苏靠近很不舒服，想方设法与印度过不去，结果是弄巧成拙。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印度的一些讲话过于直率露骨，得罪了杜勒斯，后者于是与葡萄牙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承认印度尚未收回的果阿是葡在亚洲的行省。这一无端挑衅使印度国内的愤怒情绪达到顶点，也使美国此前对印度的一切友好表示黯然失色。美国驻印大使后来解释，美国此举的意图只有一个，就是提醒印度注意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攻击。尼赫鲁原打算让苏联客人对他的不结盟态度留下更深的印象，不要在印度国土上不合时宜地批评别国政府。但西方的做法事与愿违，尼赫鲁反而看出，完全可从苏联对印度收复果阿和克什米尔的无条件支持中得到好处。这样一来，苏联领导人自然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

西方新闻界激烈攻击尼赫鲁已变成苏联的怀柔战术的牺牲品。英国政府不仅拼命为《巴格达条约》辩护，而且极力阻止印度购买苏制军用飞机。美国也对印度向苏联订购军事装备表示“严重的关切”，外界压力之大，就连印度国防部长都担心得到苏联的轰炸机会影响印度的不结盟形象。但尼赫鲁不那么看，他申明购进苏制飞机并不损害印度的基本国策，不过他又说：“我们应时时留心，不要表现得对某一方过于亲近，这种策略不好。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尊严，我们的话就更有份量，也会更容易达到我们的目的。”

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在印度的访问处处掀起民众的狂热反响。在加尔各答，竟有二百多万人集会听他们讲话，人们在街头围着他们欢呼致意。访问者既深受感染又惊愕不安，鉴于安全原因，他们从敞篷车下来换乘了全封闭的大轿车，一位克格勃官员居然提议印方派军队维持秩序，必要时鸣枪示警。专门负责访问接待工作的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回忆更是有趣：

“这两位苏联领导人在访问印度期间地位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的地位很明显地上升了。他们到达印度之初，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到他们离开印度时，赫鲁晓夫走在布尔加宁前面了。你可以从许多细节上观察到，是赫鲁晓夫把他自己摆在布尔加宁前头的，而后者听之任之。访问刚开始时，你简直无法使他们两人同时通过一道小门，因为他们必须肩并肩地前进。我们在一个小的露天剧场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文艺表演。我想既然是副总统和我父亲陪同他们观看演出，那么去的时候也应该是副总统陪同一个，父亲陪同一个。可是俄国领导人说，不能这样简单地将他们两人分开。他们坚持两辆汽车应该并排前进。但是马路太窄，并排前进不可能。”

尼赫鲁充分利用“苏联领导人与印度人民一起的友谊场面”，并非仅为了获得经济和技术援助，而且也是想督促他们对政治和国际重大问题表明态度，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苏联与印度共产党的关系。这一时期，印共正因苏联领导集团对尼赫鲁政府的兴趣以及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减弱而大惑不解，处境尴尬。由于尼赫鲁牢牢掌握着印度的国内政局，起初他并不急于向赫鲁晓夫等人提出这一问题。他只是随便提及：他认识议会中不少

印共议员，他们好像并不关心国家面临的困难，也不懂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毫不讳言向他表示他们对发动人民感兴趣，其他具体事他们一概不谈。赫鲁晓夫听后笑而不语。但当访问接近尾声时，趁苏联客人情绪轻松、兴高采烈的当儿，尼赫鲁对他们谈起他的感觉：如果过去发生的事能说明问题，印共念念不忘在印度搞暴力革命，并总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行事。他也暗示印共正从海外获得数量可观的经费。赫鲁晓夫答称：苏共在指导其他国家共产党方面的作用被夸大大，无论苏联支持与否，共产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都将存在并得到发展，要苏联下令停止世界共产党的活动是不现实的。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权，当然同情和理解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但绝不打算领导这些共产党。事实上，苏联通过撤销国际共产党情报局已解散了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赫鲁晓夫接着又补充说，苏共与印共没有联系，这从苏联在政策上将印共置于一个难堪的位置就能说明问题。尼赫鲁提到，印共与苏联保持接触的努力会损害印苏关系，赫鲁晓夫说他也为此感到难办。至于印共来自国外的经费，赫鲁晓夫申明他从不知道任何这类津贴。尼赫鲁称他基本上相信，共产党国家的大使馆雇用印度人向印共转达建议和消息，并企图打着和平运动的幌子鼓动共产主义。赫鲁晓夫郑重地答道：他对使馆里的这类事一无所知，但苏联大使绝对小心谨慎；一般来说，苏联政府遵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希望任何有损印度政府和尼赫鲁的事发生。在当时情况下，尼赫鲁能得到苏联领导人这样的保证应该非常满意了。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离开印度前夕，尼赫鲁表示希望苏联撤回对一些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否决。作为对印度的告别礼，苏联领导人答应让除日本等个别国家外的其他国家进入联合国。这明显给了尼赫鲁很大的面子，表现出苏联的外交灵活性，也表明他们比西方更愿意承认印度的作用和他的个人影响。不久后苏联引人注目地撤回否决权，此举大大加深了印度人和尼赫鲁本人对苏联的好感。苏联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即使日内瓦首脑会议和外交长会议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但冷战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世界事务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亚非国家开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与印度加强关系是值得和必要的。他们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得体：没有强迫印度承担任何义务，并不期望从提供援助中获取回报。赫鲁晓夫当结束访问时大度地对尼赫鲁说：“我们想与你交朋友，但并不妨碍你与其他朋友的关系。我们也希望成为你的朋友的朋友。”

英美却并非表现得如此开明豁达。艾登极力安抚尼赫鲁，向他保证英国绝不会向一个英联邦国家提供军援去反对另一个英联邦国家。英联邦秘书长霍姆却要求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尽量显示出“友好的姿态”，被惹怒的尼赫鲁说：“恐怕英国政府中大多数的官僚还生活在过去时代，幻想他们还能将印度看成一个可以随便打发的三等国家。”美国对尼赫鲁的态度并不更好，来自华盛顿的指责不绝于耳。尼赫鲁当着苏联领导人的面批评美国说：“由于它自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起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它几乎看不起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朋友还是敌人。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用傲慢专横的态度去激怒别人。”他认为，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短视必然减弱它们因提供大量经济援助而在印度赢得的好感，赫鲁晓夫虽稍嫌生硬、粗鲁，但比西方人更明智。

面对西方的强烈反应和压力，尼赫鲁主动改善并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他表现出魄力和勇气，也从后者那里得到慷慨的报答。苏联态度鲜明地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和葡占果阿等问题上的立场，也向印度提供大量的经济、技术

援助，印苏之间长期的经济合作事实上是从这时开始的，合作升级的速度令许多人惊奇。印苏领导人的互访也巩固了尼赫鲁在印度国内外的地位。尽管西方开始并不高兴，并毫不掩饰对印苏关系发展的担忧，但他们也马上意识到不能对印度指手划脚，于是不得不对印度的立场做出更多的让步。

十四、不结盟伙伴

1955年2月的伦敦又迎来英联邦国家的总理们，尼赫鲁在这帮首脑中尤为显眼，风头十足。几年来，他一直执行一种独具特色的政策，吸引住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大家洗耳恭听他对世界形势的精辟分析，他向他的英联邦同僚们指出：殖民主义观念早已落伍，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亚非地区的爆炸性局势。他表示相信，苏联的内外政策已出现重大改变，其他国家应逐渐消除对苏联、中国的怀疑和恐惧。他的话给大家留下清新的印象。

在尼赫鲁与西方领导人的多次会晤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解释他的外交政策。值得欣慰的是，尽管西方新闻界对他的评论常表现出对立甚至敌意，但他却能使那些与他亲自接触过的人相信，他的看法是诚挚和善意的。这样一来，即使是西方也对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众多的亚非新兴国家中，尼赫鲁已得到广泛的好感和信赖。对大多数亚非领导人而言，他是这些国家解放斗争的鼓舞者和导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总理、主席和国王纷纷来到印度，向尼赫鲁表达热烈的敬意，又邀请他前去他们的国家访问，公开地把他作为偶像加以崇拜。特别在东南亚的缅甸、印尼和西亚的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情况更是如此。来自黑非洲的民族运动领袖们也为他的魅力所倾倒，其中包括正踌躇满志为独立而奋斗的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

尼赫鲁对印度的作用获得普遍认可而倍受鼓舞，他颇为自负地写道：“我总是怀着骄傲、喜悦和与日俱增的责任感注视着印度在国际上的荣誉。我们不必谈论它，我有意不颂扬印度，或大谈我们的政策可能取得的成功。赞美依然封存在我的心中，它将鞭策我为我们国家的事业不断努力。我们为何要向别人谈这些呢？其他人愿谈是他们自己的事。事实比褒扬或贬损更重要，它正迫使世界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予印度新的地位。这虽然令我振奋，但也有几分让人生畏，因为它也赋予我们巨大的责任。”

尼赫鲁虽然不高兴英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但印英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友好的。多年以来，印度为摆脱英国的殖民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这个民族在独立后依然与过去的压迫者保留特殊的关系，这甚至让英国人也感到诧异。丘吉尔显然就在此列。丘吉尔1947年以前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强硬态度人所共知，但当印度独立后他愿意发展与尼赫鲁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欢迎印度留在英联邦内，对待不理解态度的人说：“我问自己是想请他们留下来还是让他们统统走开，我内心的回答是：我想他们留下来。尼赫鲁的确表现得宽宏大量。”他仍有指责印度的时候，但当他复出担任首相后，很少再不负责任地发表议论。曾与尼赫鲁一道赴英参加女王加冕盛典的英迪拉谈过一件与他有关的事：在一次晚宴上，她发现这位过去一直顽固反对印度独立、对甘地和她的父亲恶语相加的保守党领袖正坐在她身旁。丘吉尔突然问她：“不久前我们还互相憎恨，现在却像密友一样亲切交谈，这不奇怪吧。”英迪拉马上回答道：“温斯顿爵士，我们并不恨你。”丘吉尔听后直言不讳他说：“但我那时是恨你的。”

由于尼赫鲁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与英国的关系也并非没有麻烦。这时的主要矛盾是英国在东非的殖民政策。尼赫鲁认为，除了反帝反殖的基本政策不可改变外，非洲也是印度隔海相望的邻居，利益有不少共同之处。他指责在野的保守党向相对温和的工党政府施加压力，批评英国政府殖民地大

臣“心胸狭窄，报复心重”，不适合与非洲人打交道，但他也对肯尼亚的“茅茅”运动的暴力特征感到遗憾，对在新德里召开一次泛非会议缺乏信心。不过他认为：面对英国殖民者的苛待，非洲人除反抗以外别无出路；当英国人正对非洲人肆意冒犯之时，侈谈多种族社会、谴责恐怖主义倾向、强调保护旅非印度侨民的利益都没任何意义。英国人不喜欢印度驻东非代表，认为他太喜欢表态和坦率得近似无情，但尼赫鲁比他还显得极端。他写道：“我们完全支持建立多种族社会，但我们不愿再多谈这个词，因为非洲人现在正被驱赶、追捕和射杀。印度人民首先应为他们的安全祈祷。”判处肯尼亚爱国领袖肯雅塔有罪纯粹是非洲人无法接受的恶劣行径，非洲人的做法再糟也比赤裸裸的、野蛮的白人种族统治强。“目前，我们不可能对非洲人有何指教，你该不会去教导一位房上正在起火的人吧。”他在印度议会指出：“我现在对针对非洲的小改小革根本不感兴趣，那些事得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更关心的是与身处厄境并不得不面对强权政府的沉重压迫的民族站在一起。我固然谴责各种类型的暴力，对它们决不宽宥，但我只能站在非洲人民一边，这是我服务他们、将他们带回我认为的正确道路的唯一方式。”

他在新德里的一次集会上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向肯尼亚人民重申印度的同情。他的讲话招来某些英国政界要员的忿懑。他们指责他干涉英国的内政：“要是我们批评你们对安得拉邦分治和对不可接触者的政策，你们将作何感想？”尼赫鲁从容答道：非洲的种族主义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印度人民有强烈的看法。他本人曾坚定地支持印度留在英联邦内，并在不少问题上赞同英国的观点，假如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他过去的论点将失去说服力。令尼赫鲁意外的是，丘吉尔这次对他的立场表示理解和接受。丘吉尔是识时务的，他注意到尼赫鲁对亚非国家的影响，指望他能对英国重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给予积极帮助，例如与埃及新政府的关系。

尚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已公开表明他对阿拉伯事业的同情，把它看作是世界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担任总理后，他力图在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上保持中立，不过这是一种向阿拉伯人倾斜的中立，正如他本人所说：偏向阿拉伯人但不敌视犹太人。印度穆斯林的压力，希望借此避免加剧印巴之间的糟糕关系，以及担心对发展与印尼的友好关系不利，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加强尼赫鲁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但他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去指责犹太人。他希望看到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享有充分自治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联邦，保留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如果必要的话过十年再来全面重新审议这一问题。以色列国的建立是一个既成事实；埃及当时还未爆发革命，法鲁克国王统治的埃及在联合国讨论海德拉巴问题时投票反对印度，这些因素促使尼赫鲁在接受事实的基础上承认了以色列。尼赫鲁 1948 年 11 月访问开罗，对所见所闻极为厌恶，“我发现法鲁克是我见过的最令人讨厌的人物之一。”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尼赫鲁首先的反应是投弃权票，后来为了协调他对穆斯林国家的基本政策，他又命令印度代表投反对票。但他也表示支持阿拉伯人的总体政策需要重新调整，不能无原则地在每件事上支持他们。几个月后他承认以色列，但由于国内穆斯林的反对，他没有立即在特拉维夫设立使馆。尼赫鲁与埃及 1952 年 7 月推翻法鲁克上台的纳吉布政权没有多少亲密关系可言，因为他觉得后者的亲美色彩太浓。但两年后反西方的纳赛尔掌权了，人们普遍以为阿拉伯世界的这颗政治新星会听尼赫鲁的意见。尼赫鲁在伦敦开

完英联邦会议回国时专程在开罗逗留，他理解纳赛尔在涉及主权问题上的坚定态度，但建议后者不要使用过于刺激西方的语言。纳赛尔此后的语气明显有所缓和，与英国在权力移交问题上的谈判也更顺利了些。丘吉尔感谢尼赫鲁的帮助：“对您的来信及在埃及、以色列等问题上给我们的帮助谨致以深切的谢意。”

然而、尼赫鲁仍然感到英国的殖民主义态度并没有多少收敛。“很明显，无论在肯尼亚、埃及、英属圭亚那还是中非，它执行的仍是侵略性的殖民政策。”他最关心的是非洲，他不仅反对英国像其他欧洲殖民国家那样死死抓住帝国不放，也反对按南非的模式强化少数白人居民的统治。他反复提醒人们注意非洲人正遭受着“几乎如同牲畜”的对待，表示印度将尽全力反对世界的种族歧视：“我们不能直接做任何事，但印度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使我们的意见具有某种份量，因此我们应阐明观点并尽其所能地执行，同时又不要使我们自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尽管有个别国家的民族运动领导人对印度的泛泛同情颇感失望，但尼赫鲁的鲜明立场极大地鼓舞了非洲国家反抗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的信心。

比起他对非洲反殖斗争的支持，尼赫鲁 50 年代中朗在国际舞台上的更重要的贡献是他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印度率先扬起不结盟的旗帜，尼赫鲁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埃及的纳赛尔等人一同成为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

不结盟从观点到运动有一个过程。人们对不结盟的概念起于何时看法不一。梅农认为，首先使用“不结盟”的概念是在 50 年代初亚非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协商中。但早在万隆会议以前，尼赫鲁就已多次阐明印度对国际社会持不结盟的立场。1946 年 9 月，当时印度还未取得主权国家地位，他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说：“我们将以一个自由国家而非别国的卫星国的身份，带着我们自己的政策充分参加国际会议，我们希望与别国直接发展友好关系，携手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我们将尽可能地远离不同集团相互对立、相互敌视的强权政治，它过去曾引起世界大战，甚至今天仍可能给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我们坚信和平与自由两者密不可分，任何地方对自由的否定必会威胁其他地区的自由，引发冲突和战争。尽管世界上到处是敌视、仇恨和冲突，但未来不可避免将走向紧密的合作和建立世界性联邦。独立的印度将为此而努力，创造一个由各自由民族进行自愿合作、消除一个阶级或集团剥削另一个阶级或集团的新世界。”他在印度过渡政府掌权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外交事务中，印度将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远离相互敌对的集团政治。”尼赫鲁认为，这一政策的宗旨是与一切国家、特别是与所有大国同时发展友谊和合作。他在独立初的印度制宪会议上进而指出：“我们倡导与任何其他国家保持密切关系，除非对方本身制造困难。我们愿与美国保持友谊，我们也愿与苏联充分合作。”他又说：“我认为，无论从理想主义和崇高道义的角度看，还是从狭隘的机会主义或民族利益的角度看，没有什么会比放弃我们一贯遵奉的政策更糟糕了。这一政策就是始终与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不与大国结盟或充当其小伙伴以求得到别人的残羹剩水。”

尼赫鲁为何要对不结盟作如此多的解释说明，仿佛唯恐别人误解似的。今天，当不结盟的思想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之时，他的阐释听起来几乎显得多余。但应该记住，不结盟在当时确被不少人看成异端邪说。在印度国内，那些与尼赫鲁政见不合的人斥责他的不结盟政策是鼠目寸光，到头来只会对

印度的国家利益有害。国内党内的某些团体也对他的观点表示极度的怀疑。这些人往往主张与西方全面结盟。

在国际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不结盟是“不道德、注定破产的玩意儿”。后来上台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抨击它是伪善的政策,他在其政治自传《朋友而不是敌人》中写道:“印度的中立(不结盟)说得好听是坐山观虎斗,尽量从两方捞取便宜,说得难听是假装正经,虚伪奸滑。”

尼赫鲁认为,不结盟也意味着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确,他的不结盟政策含有在意识形态的竞争漩涡中和军事结盟方面保持行动自由的意思,或像他本人简明扼要的表达:“实质上,不结盟即行动自由,它是独立的一部分。”这种行动自由充分表现在他的外交活动中,中印两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看作是不结盟思想的一大体现,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一致通过的十大原则也包容了不结盟的基本内涵。

尼赫鲁反复强调不要将“不结盟”与“中立”混为一谈,他在联合国的一次讲演中指出:“某些人用‘中立’一词来概括印度的政策,但我不喜欢‘中立’这个词。我甚至不喜欢将印度奉行的政策称为‘积极的中立’,有些国家确实如此,而印度却不是那样。毫无疑问,我们不与任何军事集团结盟或合作,但重要的事实在于,我们的政策、原则、愿望和目标都要求我们积极地关心和参与解决重大国际问题。”1956年底他第二次访美时告诉美国的电视听众:“不结盟并不等于思想或行动上的消极被动、缺乏信仰或信心不足,也不意味着对邪恶势力卑躬屈膝。它在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时是一种积极和主动的态度。我们相信,每个国家不仅有权获得自由,而且有权决定自身的命运。”

甚至当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时,尼赫鲁都还不忘为不结盟下一个更确切的定义:

“我们称自己为不结盟国家。不结盟一词可有不同的解释,但从根本上说它的含义是确定的,即不与世界上的大国集团结盟。‘不结盟’有消极的意思,但只要我们赋予它积极的内涵,它就是指各国反对为战争目的纠集起来,反对军事集团,反对军事结盟及其他类似行为。我们避开这类结盟,是想要增强和平的力量。不结盟在50年代中期是一个稀罕的现象,一些国家处处宣传不结盟,另一些国家却对之大加嘲弄非难,要么不愿认真看待它。‘不结盟,这可能吗?你不在这一边就必在那一边。’这是

当时的一种典型论调。今天这一论调已不攻自破了。过去的全部事情已经证明,不结盟的观念已日益深入人心。为什么如此?因为它与事态的发展完全合拍,与许许多多人们的想法吻合,而最重要的是它能为人类带来梦寐以求的和平。”

不结盟的观点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和怀疑,要实践这一原则更加困难。在50年代印度以外的世界,汹涌的波涛似乎从来不曾平静,尼赫鲁为自己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他相信中国革命不可能向后倒退,在朝鲜战争中坚决拒绝加入美国的阵营,从而惹恼了杜鲁门,而相邻的巴基斯坦此时却正向亲美集团靠拢。就连苏联、中国也对尼赫鲁的表现感到有几分疑惑:印度不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吗?尼赫鲁的政治基础不就是印度的资产阶级吗?英国的工党政府都得屈从经济压力而对美国俯首称臣,难道尼赫鲁还能

硬得起吗？不结盟是货真价实的吗？这些问题并非没有道理，并且提问的也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亚非地区的民族运动和非殖民化运动正形成燎原烈火之势，印度的示范对它们独立后的政策定向具有重大意义。贝尔格莱德这时也关注着亚非的形势发展，铁托已同斯大林彻底闹翻并分道扬镳，正设法探求一条中间道路，以便既能摆脱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又可回拒华盛顿的收买。不久，在中东的舞台上出现了纳赛尔，他执政伊始便警告“英帝国主义必须抑制它的强权”，甚至已在暗地里制定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计划。铁托和纳赛尔很自然将他们的眼光投向了不结盟，尼赫鲁于是找到了这两位重要的政治盟友。不过他们当时也许并不知道，他们将开创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新潮流。

布里俄尼岛位于亚得里亚海北端，靠近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交界的伊斯特拉半岛的景色优美的海岸线，这里风光绮丽，气候宜人，是一处世界著名的旅游消闲胜地。1956年7月的一天，尼赫鲁风尘仆仆赶到此地，与东道主铁托和先期抵达的纳赛尔举行会谈。这是不结盟运动三位“巨头”的首次三人会面，他们的会晤对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谈后发表的主要文件《布里俄尼宣言》提出了不结盟运动的基本纲领。同时，三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得以进一步加强，三位领导人的个人友谊和相互尊重也深深置根。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紧迫感，意识到必须与全世界的一切进步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协同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进步和安全。

“三巨头”的布里俄尼会晤实际是他们过去富有成果的合作的继续。铁托对尼赫鲁在印度国内外的作用和影响早有所闻，也认真读过后者的著作并为之打动。他1954年12月首次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我们在谈话中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两人都高度评价对方对国际局势的见解。铁托也深为叹服尼赫鲁在他的人民之中享有的崇高威望。铁托回国途中又去埃及见到纳赛尔，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尼赫鲁于1955年2月访问开罗，心直口快的纳赛尔对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人物极尽地主之宜。尼赫鲁对纳赛尔对世界事务的见识评价并不高，他曾说：“埃及，其实是阿拉伯的政治在我看来是非常不成熟的，它很少理解世界上正发生着的事情，仅为他们间的一些枝节问题纠缠不清。当我见到纳赛尔时被他吸引住，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而当读了一些他的书后，我又对他的知识面感到失望。”不过尼赫鲁喜欢纳赛尔的鲜明个性和爱国激情。尼赫鲁死后，纳赛尔曾动情地回忆起他俩乘坐游艇沿尼罗河而下，伴着低沉亢昂的汽笛声，尼赫鲁向他耐心阐释五年计划的优越性。尼赫鲁当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记住，每个国家的未来都与该国的人民息息相关。”尼赫鲁同年夏天也去南斯拉夫回访，受到铁托的盛情接待。尼赫鲁与纳赛尔同年4月又在万隆见面，他们与周恩来、苏加诺等人共同促成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铁托虽没出席会议，但他发表公开讲话赞扬万隆精神，对不结盟问题的看法与尼赫鲁在万隆的发言几乎如出一辙。

铁托后来回忆道：“只要一见到尼赫鲁，就会为他的迷人个性、热情焕发、精力充沛、他对事物的卓越洞察力，以及他那吸引人的翩翩风度和在私下接触中表现出的坦诚而深受感染。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勇于面对生活现实、绝不会被困难所吓倒的勇敢者，他从不沉溺于幻想或墨守教条，而是随时准备果敢、现实地处理和克服一切困难。我也对他热爱大自然、重人情味和珍视家庭生活有着深刻的印象。一个人和一位政治领袖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反

映在他代表他的人民积极争取自由、富强与和平的能力，因为这些是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我认为，尼赫鲁的伟大恰恰在此。”他们两人除多次面晤外，也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及时探讨重大的国际问题。

与铁托对尼赫鲁的赞赏相比，纳赛尔对后者还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崇敬。这位被西方不友好地称为“阿拉伯暴君”的领导人尤其对尼赫鲁与印度人民的亲密关系大为叹服，他写道：“一次，我有机会出席在新德里宽敞的拉姆里拉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尼赫鲁要在会上讲话，等候聆听他的讲演的群众满满坐在台下。尼赫鲁开始对着人头攒动的台下讲话。我知道，一位希望使听众如痴如醉的讲演者，通常总善于煽起听众的情绪。但尼赫鲁绝不是那种人，他从不提高声调讲话，也不大发神威。听众们尽管内心热切，但只是静静地听他讲，人们还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尽管听众的年龄、性情各异，但仿佛都能理解他说的每句话，看得出讲话者与听众心心相印。我当时坐在尼赫鲁身后的桌旁，尽量想捕捉那一时刻的意义。我听不懂他讲的内容，但能看出他的思想和他的语言已在听他讲话的芸芸众生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我不由得深思他对甘地的评价。他说过：甘地之所以成为一位历史人物，并不是他给人民带来新的东西，而是因为他能揣摩、洞察人们的内心深处，并有法使它显露出来，清除掉蒙在表面的灰垢，让其光亮夺目。当我坐在尼赫鲁身后听他对他的人民讲话时，我才深有感触地发现。他与他所谈的甘地是何其地相似。”

尼赫鲁、铁托与纳赛尔三人有不少共性。他们都是本国民族革命的真正领袖和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设计师，深受本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被视为本国独立、自由的象征。他们从本民族遭受异族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经历中深知为独立付出的沉重代价，坚信自己的国家只有在和平和消除外来干涉的条件下才能走向进步和繁荣昌盛，政策独立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应该友好相处。他们也认识到，战后世界两大对立集团的形成及冷战政策正将整个世界导向危险的边缘。由于对诸多问题的共识，他们三人不仅彼此尊重理解，而且能携手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施加积极的影响。除三人国内外拥有的声望和号召力以外，他们各自富有魅力的个性也给不结盟运动增添了不少色彩。

他们三人分别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大陆，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但他们的政治见解、独立自主的政策和友好合作精神却基于共同的理想和原则，因此他们很自然走到一起。尼赫鲁为印度制定了独立的外交政策，明确宣布印度将远离相互敌对的结盟集团。本着这一政策，他与中国领导人一道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在万隆会议上宣布：“我们渴望与欧洲和美国友好相处，加强合作，但是他们惯于认为他们的冲突也就是世界的冲突，结果世界也就随着他们非此即彼。为什么我们要卷入他们的冲突和战争中呢？”毫无疑问，世界的选择只应是不同制度下各国的和平共处。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铁托不谋而合，他访问南斯拉夫时说：“共处本来是消极被动的，但只要我们给它加上‘和平’的定语，就赋予它积极肯定的内涵。”

与尼赫鲁相似，铁托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角色十分引人注目。他在南斯拉夫解放前夕就声明：“我们不要别人的东西，但我们决不放弃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独立后，他坚决地顶住斯大林及其他大国集团的压力，重申“南斯拉夫决心奉行独立的政策，在一切问题上遵循和平共处的准则。”这些准则构成南斯拉夫的不结盟、友好邻邦和开放边界的政策基础。远在亚洲的尼

赫鲁，早已注意到铁托与自己观点的相通之处。

在曾经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畔，纳赛尔在 1952 年通过他的“革命政变”掌握了政权，他扫除殖民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残余，建立起独立的国家，尔后又实行土地改革，决心让埃及尽快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他在 1954 年拒绝加入西方大国支持策划下的军事盟约组织“巴格达条约集团”，令全世界刮目相看。此后他逐渐被看作亚非团结和反对军事结盟的重要人物。

从某些方面看，尼赫鲁在三位盟友中最有力量。这不仅是因为他独具魅力的个性，而且因为印度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虽然它沿袭了西方的部分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绝不会依附西方。它的独立自主取决于两个根本原因。首先，印度正造就的经济基础设施是规模宏大的国营经济，况且本国的实业界尽管与世界市场存在密切联系，但却稳固地扎根于印度的土壤之中。印度的实业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塔塔、比尔拉、达尔米亚等大财团都不愿印度的经济受美国和西方的控制，由于过去殖民地时期的经历，他们深深体会过那种不幸滋味，因此极为珍视印度的独立。印度在经济上并不依赖西方。当尼赫鲁申明印度的外交政策绝不背离其经济纲领时，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第二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即使印度独立于西方会让美国恼火，这在尼赫鲁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印度与美国地理上距离遥远，后者不可能用干涉巴西、阿根廷那些国家的办法来对付印度；如果西方要实施经济封锁也只会适得其反。就连以强硬著称的杜勒斯恐怕也不会建议采纳这类过激的手段。

由于世界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造成的冷战局面，1956 年是国际关系紧张的一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主动提出的对话未取得效果，核冲突和军备竞赛的阴影继续困扰着世界。另一方面，非殖民化运动方兴未艾，急需得到有组织的支持。要求改变现存世界不平等的经济秩序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其中包括解决战后新独立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这些事件和趋势必然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由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组织参与的联合行动。

和平共处和不结盟的原则已在《万隆宣言》和另一些文件中得到广泛确认。为了保证这些原则的顺利实施，有必要制订能被普遍接受的具体行动纲领和战略。这一任务便是在布里俄尼会议上完成的。《布里俄尼宣言》明确肯定了万隆会议的拟定原则。三位领导人以万隆会议的成功作为努力的起点，打算首先尽力消除因世界性冲突与紧张引起的恐慌和威胁。他们指出：集团对立不可能实现和平，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集体安全。他们也要求扩大自由空间和结束由一国主宰另一国的命运的现状，呼吁在包括削减热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在内的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并特别强调对这些协定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宣言》指出：应严格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用于试验目的也包括在内”，因为它们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和污染大气层，威胁其他国家及广大和平地区，也是对国际道义的公然违背。

三人一致认为，中欧、远东和中东是世界上局势紧张和最可能爆发冲突的地区。他们就解决这些地区的危机提出了具体建议，指出：中欧是最敏感的危机地区之一，尤其是德国的问题，应在和平协商的基础上根据德国人民的愿望得到解决。在中东问题上，大国的利益冲突正在使那一地区的局势恶化，和平和独立受到威胁，应在充分尊重有关国家自由的前提下寻找解决办法。他们警告说，巴勒斯坦的局势对世界和平的负面影响极大，必须尽快采

取有效措施。对远东局势，他们相信，“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充分参与。”在非殖民化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比万隆会议的文件表述得更具体、更坦率。他们专门指出：殖民统治完全不受欢迎，它对殖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种耻辱，必须在全世界彻底根除。对于当时正在顽强抵抗法国殖民军的阿尔及利亚，他们呼吁作出“公正与和平的解决，以便赋予阿尔及利亚人民基本权利并巩固地区稳定”。联合国组织是他们在布里俄尼会谈中特别关心的重点之一。他们拥护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强调应接纳所有已提交申请并符合联合国宪章要求的国家加入这一国际组织。他们也要求联合国讨论裁军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等问题。

在他们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没有明确提及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但在三方会谈前分别举行的双边会晤清楚表明，他们希望在一切实领域，为世界的自由、独立、和平、进步和安全继续进行合作。事实上，这一愿望也充分反映在会议的其他文

件中，如他们一致认为现有问题的解决需要采取共同行动，坚信他们奉行的政策有助于减轻国际紧张局势，促成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一方针不仅维护了不结盟运动的广泛性，也保证了历次会议的既定战略能逐步实现。布里俄尼会晤结束了，它将尼赫鲁、铁托与纳赛尔三人作为世界“第三势力”的领袖推到前台，这个小岛也因此成为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圣地。

十五、民君民仆

独立以来，尼赫鲁除了担任印度总理之外，还担任政府外交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1至1954年间他也是国大党主席。他频繁出国访问和接待来访者，出席各种会议，还坚持与在印度外交部门身居高位的官员们见面，向他们详细提问。与此同时，他每隔两周给各邦的国大党首席部长通信，以便就有关国内、国际或该邦的重要问题向他们发出指示。

尼赫鲁的时间表占得很满，对一位60多岁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的正常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直到次日凌晨两点，中间除去用餐和练瑜伽的时间。在夏季的中午他也有一段短时间的午休。他的所有时间几乎都被国务活动占去，他甚至开玩笑说最大的奢望是能忙中偷闲与他的孙子们玩一会儿。

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给予了他最大的帮助，她从50年代初就成了总理府的正式女主人，协助尼赫鲁承担起诸如接待外国外交官和出国访问的繁重任务。尼赫鲁家族有一种孝道的传统，过去尼赫鲁对莫蒂拉尔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成了儿子善待父亲的最佳典范。英迪拉最了解父亲的紧张、疲惫和孤独，担心沉重的责任和心理负担会压垮他。她决定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意愿和时间也要关心、帮助他的父亲。但一切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她不仅是一个女儿，也是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担任律师和议员的丈夫住在勒克瑙，渴望与她一起生活，况且他与尼赫鲁就私人关系而言存在隔阂，不愿将自己的前途附在总理这棵大树上，更不愿迁来新德里同住。结果英迪拉只得经常在新德里和勒克瑙两头跑，而常常一回勒克瑙便接到父亲的电报：“有重要贵宾到，速回。”她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父亲及他需要帮助的事情上。

印度新闻界称甘地夫人是尼赫鲁的管家、不领薪金的秘书兼保姆、经常守在身边的同伴、安排国务活动的负责人。尼赫鲁从内心感激英迪拉对他自己的付出。他明显需要她的帮助，甚至只要能在总理府中见到英迪拉和他聪明活泼的小外孙拉吉夫和桑贾伊，也能使他从压力过重的烦闷或躁动中解脱出来。一位尼赫鲁家族的传记作者这样描述英迪拉在家中的地位：“尼赫鲁脾气暴躁，极易激动，如果没有他们在身边，要他控制一个乱七八糟的政治机构，管理一个近乎混乱的国家，恐怕他早就感到这一任务不堪忍受。”虽然他的脾气急躁，但决说不上性情孤怪，他生起气来总是一会儿就过，身边的人往往也不见怪，毕竟大家知道他对任何人都不怀有恶意。事实上他非常体谅人家。英迪拉当父亲发火时往往正颜厉色地叫他“冷静下来”，有时还当着别人的面责备他。

德里总理府原来是盟军东南亚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大厅里到处挂着身穿戎装、胸前佩满勋章、孔武有力的将军们的肖像，气氛虽然肃穆庄严，但却显得阴气沉沉，让人压抑，使人们容易地感受到殖民时代的遗风，与新印度的形象和格调很不协调。英迪拉搬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些旧画像送进了地下室。她发挥自己作为一名业余装饰师的想象力和才能，很快便将总理府改造成一个颇为像样的家。尼赫鲁对此大加赞赏。尼赫鲁年轻的时候就对园艺栽培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是一位出了名的动物爱好者。疲惫的政治生涯多少使他压抑了自己这方面的雅兴。在英迪拉的策划和指导下，总理府中四季都是花卉缤纷，芬芳妍人。一段时间总理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的私人

动物园。除了尼赫鲁最喜爱的一只丹麦种牧羊犬外，他们也饲养鹦鹉、鸽子、松鼠等小动物。国内外友人将幼狮、幼虎作为礼物送给尼赫鲁，他让它们在总理府度过生长发育期，对它们仔细观察照顾，然后再让人送往国内其它动物园。他视察阿萨姆时当地官员送他一只喜马拉雅小熊猫，英迪拉在总理府内为它造了一座漂亮舒适的居处，尼赫鲁看到它憨态可掬地作室内训练时简直乐不可支。不久他又托人从锡金给它找了一只配偶，后来居然还生下一只幼仔。来总理府访问的外国贵宾也非常喜爱这些尼赫鲁家族中的特殊成员，铁托总统还从他那里讨走了一只威武漂亮的虎崽，带回了贝尔格莱德。当然，总理府中照看动物这类有趣而又麻烦的事基本上都成了英迪拉的专利。

英迪拉以女主人身份陪同父亲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随父亲参加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并经常在德里总理府中陪父亲或代父亲接待来访的外国客人。尼赫鲁总是骄傲地向来访者介绍他的“女主人”，但仅“女主人”而已，绝无官方要员的身份。她的这一角色得到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周恩来、肯尼迪、丘吉尔、纳赛尔、铁托等众多贵宾的认可和好评。曾到德里总理府中做客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回忆道：“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亲自操持，负责照顾我夫人，想方设法使她过得愉快和舒适。他们照英国规矩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每天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与麦克米伦同期访印的另一位客人是印尼总统苏加诺，他也对英迪拉的菜谱和周到的观光安排赞不绝口。但麦克米伦注意到，“似乎尼赫鲁并不怎么喜欢这只从荷兰帝国的废墟里飞腾起来的鲜艳夺目的凤凰。他穿的那身奇装异服与主人的简朴衣着恰成奇妙的对照。加上，他习惯于到处带着他那根像元帅棒似的手杖（吃饭时便把它放在餐具柜上）。我可以看出，这一切尼赫鲁都不怎么欣赏。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见到这位杰出的人物。他善于言谈，知道的事情很多。”

正如不少西方人士所承认的那样，尼赫鲁的优势在于他能充满自信地对世界讲话，因为他坚信他的呼声得到绝大多数他的人民的热情支持。他与甘地不同，甘地将自己的力量传递给其他人，尼赫鲁则从人民对他的顶礼膜拜中汲取营养。他对其国内同胞的巨大影响进而又巩固了他对人民和对自己的信心。他并不善于与其他人密切相处，无论个人或群体都是如此，但印度人民是他的一道秘咒，他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他们也自始至终觉得他的个性完美无瑕，他的行为无懈可击。直到尼赫鲁去世很久，他们对他仍保留着高度理想化的印象。尼赫鲁与他的人民的相互依赖为民主制度的生根在印度找到了土壤。

印度独立后，鉴于印度君主统治的传统和英国殖民时期的代理君主制的影响，以及他本人的地位和声望，实行一种有公民投票权的君主立宪制并非完全不合情理，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强化了自由主义的精神。他也许觉得民主自由本身对他更合算，更便于他实现其它的目标。一位总理，也可以是民权自由同盟的组织者。他在宪法中精心考虑到个人的权利，并充分授权法院予以维护。他不得不同意拘留那些他认为是敌人的人，特别是那些散播教派主义仇恨的人。但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坚持拘留只能是短时期的，决不能不必要地延长。他对印度由一党专政，而党又由某一人控制的现实深感不安，因而尽量避免可能削弱反对派的行为。他坚持反对报刊杂志登载政治广告，并不是他不让或害怕人们严厉批评他本人和他的政府，而只是他无法容忍粗俗下流的谩骂。由于对拘押克什米尔民权领袖谢赫·阿卜杜拉负有最后责任，他内心始终备受折磨，实际上他对自己无能使这位过去的同志免受铁

窗之苦作了道歉：

“我们负有重大的责任，不得不与现存各式各样的势力打交道。但事物常常是按自身的逻辑发展的。我们可看到今天世界上有一些伟大的政治家，他们曾自认为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命运，但他们却被自己无法控制的各种力量推来推去。其实他们能做的只是在特定领域内根据自己的判断尽力发挥作用而已。”

尼赫鲁既不愿干预政府的有关政策，却又不断催促有关方面考虑释放阿卜杜拉。“就我自己而言，我思想上完全不能接受不经审判就长期拘押一个人的做法。我过去一直反对这样做，当然现在也不喜欢。”他认为情况有时逼迫采取某些在正常时不必要的行动，但监禁阿卜杜拉的意义已经失去，不能无限期地关押一个人。“拘捕除会对克什米尔的局势本身带来影响外，还会变成一种负面因素，引发不稳定和国内外对我们的反对。”

尼赫鲁相当重视民主体制的机构一面。身处政府的最高层，这基本上是自己个人的问题。他不得不遏制自己包揽一切决定的倾向，而总是极力表明这些决定是大家多次讨论的结果，尽量显得他的同事极力让他作出一切决定而非其己愿。他总是使人们觉得内阁实际在发挥作用。他在这一方面给他的首席部长们的意见总是无懈可击的：

“首先一点，政府和（国大党）组织中的人员要同心协力；第二，既分清责任，同时又要在各类活动中紧密协作；第三，增强工作干部的责任心；第四，使政府和组织工作在民众中获得良好的反响。你们的地位终究必须加强，但不是靠与其他人树敌，而是靠在负有责任的同事中成为无可争议的领头人。一班人在工作中需要相互支持，坦诚地讨论每一个重要问题。”

但他发现，自己若仅作为一个班子的领头人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阁政府是最弱的一环。他坚持认为一切重大事情都必须在内阁中提出来讨论。内阁中有许多委员会，协商讨论是经常性的，但始终缺乏一种积极的活力和生机，尼赫鲁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至少建立起集体决策的程序，然后再逐渐为它们注入活力。可实际操作中却成了另一回事。尼赫鲁在50年代中的权力剧增。巴特尔死后，内阁已逐渐蜕变成服服贴贴的附庸，从1950年底起，印度政府基本上是尼赫鲁一人的独脚戏，没有谁能向他的地位挑战。“在一批初露头角的领导人中，有很多人是在他的帮助下提升的，并且需要他的支持来保持高位。他控制了党和政府，无论各邦的领导人也好，中央领导人也好，尼赫鲁对他们有多少信任，他们才有多少权力。没有他的同意，几乎任何重大问题都决定不了。在中央内阁和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连那些所谓政治基础牢固的高级成员，在发表意见前，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大家几乎从不发表同尼赫鲁的观点直接抵触的意见。”甚至接任巴特尔担任内政部长、在国大党内声望崇高和地位重要的潘特，也只愿当一个后备人员，小心翼翼不与尼赫鲁作对，满足于举手赞成而不是参与决策。内阁中很少有人会畅所欲言地表达不同意见，最多也只能是闲烁其辞，拐弯抹角。他们往往只谈属自己特长的方面，如尼赫鲁在国防和外交的问题上可能听取梅农的意见，但梅农在国内政策问题上却说不起话。基德瓦伊在穆斯林和克什米尔问题上有发言权，但涉及到其他问题时却避之不及从不开腔。莫拉吉·德赛

在担任财政部长之初也是谨小慎微，事无巨细都向尼赫鲁请示汇报。

脆弱的内阁机制必须依赖于更大范围内的议会主权。由于对过去民族运动所开创的民众政治轻车熟路，尼赫鲁公然藐视习以为常的精英智慧，实行了成人选举权。尼赫鲁极度厌恶在选举中表露出来的拉帮结派和党同伐异，他赋予竞选运动健康的活力，并注意培植议会在竞选期内的威信和生气。他非常认真地行使自己作为人民院领袖和国大党议会领袖的职责，通常总是一直捱完提问的时间和全部重要的辩论。他也极为尊重两院的主持人，巧妙的使用讽刺和辩技来化解辩论中的激动，这一切都得以使议会活动成为印度国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议会中讲话的语气与他在公众集会上的演说迥然不同，绝非是一位信口开河的煽动家。他有时讲话也杂乱无章，但他努力做到辩论而不是教导，回答批评者提出的重要问题，将政策的审议权留给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他通过个人对议会机构的某种制约，有助于使议会机制在印度扎下根来，从而保证再不会有谁能像他那样左右印度的政治生活。他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排除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

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于是便有了一种定论：民主只有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环境中才能以它最纯粹的形式生存下来。尼赫鲁却难以置信地将它加之于一个落后的社会。主要是因为有了印度的范例，今天已很少有人再想当然地认为穷人只对经济问题而绝不会对政治问题有兴趣，不过这条路注定困难重重。假如要想使民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不致成为一个早产儿，就必须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因此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必定与西方所熟知的社会有着根本不同。他首先设法使这种现成的意识形态为印度的新环境服务，而许多人则以为这是不相适应的。但尼赫鲁缺少一位独创性的思想家所具有的那种深刻，他的努力显得疲软和笨拙。他试图建立起一种连贯的思想和实践，但却总显得踌躇不决，考虑不周。也许这受到他阶级背景的限制。甘地在某些方面不如尼赫鲁，并且也从西方借用了不少东西，但他却能将这些东西用于印度的实践，消化在他的观点和行动之中。尼赫鲁却总显得有几分不得要领。然而他毕竟肩负起在一个不发达和贫困的国家中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重担，并且未走已有马克思系统答案加以指导的便捷之路，而是致力制订一个必定庞杂、凌乱，无章可循的行动纲领。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他的尝试不能说成功，也不能说失败，印度今天面对的问题仍旧还是：“有可能设计出一种能保障国内和平，吸引人民自由地参与，创造条件消除难以忍受的贫困的政治体制吗？”

到 1956 年结束的时候，这一实验即将成功似乎已确定无疑。就民主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而论，只有克什米尔是唯一重要例外。民主不仅是有待实现的理想，而且也是实际的需要。因为印度是一个地域大国，具有多样性，问题众多，议会政治似乎也是唯一能行得通的政府形式。尼赫鲁也极力推进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但他的经济思想缺乏明确性，这在关于工业政策的两个文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好在“一五”计划取得成功，并没有充分暴露问题。尚在制定中的“二五”计划则表现出更大的气魄和更广阔的眼界。内阁或计划委员会可以从不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但绝对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的目标。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写道：“二五”计划的文件和预算可能是当时世界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尼赫鲁自信地告诉他的部长们：“即使悲观地估计，美国的干涉（通过巴基斯坦或其它国家）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加 15%，苏联和中国的干涉增加 10%，文官体制的因循守旧和政治障碍增加 20%，印度教传统主义

的影响增加 5%，即使这样，我们仍有 50%成功的机会，而这个 50%会使整个世界历史往更好的方向转变。”

一个政府可以提供合理的机会，在现代化、工业化和科学态度的基础上培养起一个理性、文明和面向未来的社会。政府的责任在于接受任务，制订计划，告诉人民必须为了实现理想而努力工作。他在群众集会上说：“我们必须勤勤恳恳地工作，脚踏实地地前进，没有救星能帮助我们，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解决一切问题。”印度显然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国家，但进步的加速必须借助于科学技术。这方面英国过去在印度做得太少。即使在印度独立以前，虽然政治问题是关注的重点，但尼赫鲁从不忘强调科技发展的必不可少，他十分重视合理采用先进技术带来的巨大可能性。但在那个时代他只能谈谈而已。著名的科学史专家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高度评价说：“也许不是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位奋力争取自由、致力给印度带来无限发展的政治活动家，正在为印度的科学作出最大的贡献/尼赫鲁刚担任总理不到十天，面对教派主义甚嚣尘上，他挤出时间出席了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议。他制订了由总理亲自主持这一理事会并出席印度科学院年会的惯例。他要求政府定期增加用于科研的经费，强调科学研究应为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独立前就已建立的塔塔基础学科研究院得到印度新政府的资助。印度独立后建立起了五大技术研究院，其中第一所建于 1955 年，获得不同国家数量可观的外援。为数众多的国立实验所遍布印度全国，负责从事各类专业科学的研究。

尼赫鲁还组建了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他出席印度主要科学家召开的会议，极力支持著名的印度核物理学家霍米·巴巴关于在孟买建立原子能反应堆的建议。该反应堆于 1956 年 8 月建成，是亚洲的第一座，它象征着尼赫鲁政府独立以来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全力扶助达到引人注目的顶点。

在尼赫鲁眼里，计划既是“行动的科学”，又是一场全体人民奔向自身未来的运动。一位英国记者称印度的基本尝试为“尼赫鲁主义：无忧无虑的印度式革命”。尽管尼赫鲁不喜欢“尼赫鲁主义”这个词，但觉得全文对他的评价不失公允。文中指出：“得到认可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印度展开，如果它能继续获得成功，就能使共产主义相形见绌。这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异端或牺牲品，它的武器只是一系列冗长乏味的法令。”但事实上，这不仅是一场经认可的革命。尼赫鲁并不满足于强加给印度一个立法机构，他承担起一个更为积极的任务。他热心对群众解释他的政策，让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和政治活动中都有一种参与感。民主意味着给人民机会，让他们在一切问题上自己做主，而不仅是对别人的决定表示默认。现代化过程诚然能够自上而下的推行，近代历史就曾有过土耳其的例子；况且即使在今天，政治民主也并非现代化思想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尼赫鲁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民主参与是现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能赋予现代化以最强的生命力。即使对于五年计划这类技术性事务，如能信任民众、尽量不要把意见强加给他们，取得进步的把握就会更大。“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没有什么比人民知道你需要他们的意见和你依靠他们更有利了。当然就计划而论，实际能得到的帮助非常有限，但姿态本身制造出一种良好的气氛。”

乡村发展计划唤起尼赫鲁强烈的热情，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大众的生活，能赋予他们极大的动力和责任心。到 1956 年，这一计划已在印度四分之一的

乡村推行，发展迅速，且组织机构健全。尼赫鲁相信能将计划从公路、学校、水井这类公用设施扩展到农业的集约生产。这项发展计划的实施从未停止，尼赫鲁认为它是引导印度走向光辉未来的主要途径。这种看法也得到许多专家人士的普遍赞同。不过只凭这一方案本身并不充分，如果要使农民从他们的贫困状态中解脱出来，还必须迅速广泛深入地进行土地改革，并将控制人口的增长作为一项长远措施。尼赫鲁深谙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性。正是因他不断的催促，印度独立后很快便废除了大地主土地制度。但这并不等于废除了地主阶级或是像他所指望的那样用乡村合作来取而代之。在新的土地关系中，任何人都可拥有不受限制的土地，结果造成富农的势力越来越强，他们获取了更多的土地，而中下层农民只能得到某种形式的减税。印度土地改革的整个主导思想符合农民的利益，但它实际上的服务对象是富农而不是乡村穷人。富农阶级的权力和财富迅速增长也使政治选举走向反面。由于富农在本地的重大影响，不同政党被迫寻求他们的支持，结果他们便能决定得票的人选。其结果加深了尼赫鲁不断猛烈抨击的种姓、语言分离、狭隘的地方主义等不良因素。尽管尼赫鲁努力进行一场倡导民众参与和认同的革命，但它却被社会中有影响的消极势力彻底扭曲了。

况且，当面对因人口的迅速增长引起的计划受阻和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时，尼赫鲁并没有很快醒悟过来。计划生育开始于 1956 年，但实施过程中缺少认真和动力。尼赫鲁并未充分重视这一方案的实施，因为他认为粮食产量的增加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完全足以克服人口增加的压力。他在独立之初甚至认为，印度有大片地区无人居住，因此印度应算人口不足的国家。后来他从这一极端退回来，承认计划生育已成为摆在全国面前的一件大事。即使这时，他仍然没有感到遏制人口增长的紧迫性。在他看来，人口增长率实际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还低，因此说不上不正常。他愿意通过诸如扩大教育、发展健康事业和产业进步等长期措施来减轻这一问题。

虽然尼赫鲁宁愿通过民主机制来施加他崇高的个人权威，但他在国大党和政府中都是基本的推动力。这一事实对他的领导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与巴特尔之间的分歧源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个人恩怨的色彩很淡。避免他们公开决裂的因素在于他们相互的尊敬和巴特尔本人的超脱举止。但即使对巴特尔，尼赫鲁也能以他娴熟的技巧玩政治游戏。巴特尔死后，他用理想主义言辞给党内斗争中那些令人不快的特征盖上面纱，人们透过这层面纱可以发现真正起作用的是他那超凡出众的才能；永远胜过另外一些站在台面上的权力操纵者。尼赫鲁在党派斗争中没有根基，他也不需要它，因为他知道自己与人民站在一起，正因如此，他成为党内不可缺少的人物。只要形势需要，他也愿意利用这一资本。这类情形仅有过一次，当时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对手是坦东，尼赫鲁必须想方设法把他搞掉。他在策略上表现出技艺高超，以退为进，让局势发展顺其自然，直到对他最有利的交锋时机到来。他最后达到了目的。尼赫鲁精于巧妙地操纵权力，但事实证明他控制国大党的方法并不能用来控制印度政府。在他担任总理的长时期内，政府每一方面的政策都由他监督执行，并常常由他亲自决定，大量工作是在他直接授意下进行的。这些年中的总理每天开足马力工作 20 个小时，他甚至很难有时间与家人共进早餐。他对中央每一部门的职能都有兴趣插手，再加上他对议会的责任和对整个国家发展的最后监督权得到充分认可。他对印度发生的每件事都想关心。他命令向在新德里大广场执勤的交通警提供阳

伞，斥责孟买的首席部长逮捕一对在公开场合接吻的夫妻，关心影片《哈姆雷特》部分内容的审查删切。他从国家和世界性事务中抽出身来，给计划委员会送去男女青年体育锻炼达标规定的详细意见。在他的克什米尔政策遭受挫折的时间里，他居然有时间和兴趣向卫生部建议，对南印度一名据称不吃不喝而活得很自在的女孩的情况进行正式调查。

然而他无休止地注意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一些重要的政府工作却注意不够。他承认多元化的合理价值，从而导致了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工作迟缓无力。他甚至对邦省重划这类重大的问题观望不前，放任自流。他允许在各邦掌握政府的邦一级国大党组织自己选举领袖，他本人只满足于对那些首席部长们如何开展工作提出建议，结果致使某些邦的首席部长为所欲为，不听管束。甚至对禁酒问题也是如此。尼赫鲁虽不赞同禁酒，但他表示尊重邦的自治权，他充其量只是告诫有关邦政府禁酒对它们的财政收支不利。他从不愿利用自己在国大党内的稳固地位来管束和训导他的政治同僚，结果他的权威不必要地降低了，中央政府和各邦之间关系也变得松散疏淡。

尼赫鲁未能将至关重要的中央机构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也许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并不仅仅是一位政治领袖。在独立初期几年中，他在印度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领导潮流的主角。如果说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权别人，那主要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总在不断地游移变换。他花时间和精力关心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各种不同的领域，远远超出对一位总理的期望和要求。对许许多多普通印度人来说，尼赫鲁是他们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他从来就不反感自己过去充当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和知识分子的导师这一角色，特别当甘地死后，他成了向许多人就个人问题指点迷津的教父。从个性而言，尼赫鲁绝不鼓励这种做法：“我不会充当任何人的尊师，我的生活决定了我不能以你们期望的方式向其他人提供个人性的指导。”可他在反对对他进行神化方面做得并不成功。当有人要求他帮忙解决某一起婚变问题或恢复某一家庭内部的和谐时，他宽厚慈善的性情使他难以拒绝。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外出访问，以便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保持与普通人民的接触。当他出门走访印度某地时，聚集的人群不仅仅为了聆听他的教诲，而且更是为了一睹他的风采和求得他的赐福。他，甘地亲自选作自己接班人的婆罗门贵族，为国为民长期不辞辛劳的公仆，当今享誉国内外的总理，这一切都有助于使他在人民中成为一位呼风唤雨的魔术师一般的人物。

尽管尼赫鲁不喜欢被卷入个人私事，但他还是无法避免在日常政府职能以外的其它事上充当仲裁者。他并没有完全献身政治事业，就是在担任总理期间，他也没有被淹没在他生活之外的事件中。他直到去世以前始终保持着广泛的同情心、个人兴趣和对民众情绪的敏感，并讨厌形形色色的低级趣味。印度在1947年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移交了政权，作为新印度的领导人，他的任务是使印度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经济发展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如果要想使印度发展成为一个文明国度，印度的国民具备完整的人格，就需要对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有人在他生命的晚期间问他：“在你领导下取得的最伟大进步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实行了改善印度教妇女状况的措施。他对穆斯林妇女的状况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不愿使穆斯林社会大惊小怪，从而引出政治上的麻烦。即使对于印度教妇女，由于存在传统主义的惯性，他也不能担保她们完全接受《印度教法典》。然而，传统主义权威的瓦解虽然缓慢但是彻底，印度教男子实行了一夫一妻制，

印度教妇女有了离婚和继承财产的权利。甚至还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尼赫鲁就多次申明，妇女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一国进步的重要标准。独立以后，他有了实践这一观点的机会。他带头攻击年龄障碍，为大多数印度妇女取得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扫清道路。印度司法部长当时对他的抱怨也许有道理：尼赫鲁本可以走得更快些，用不着只实行零敲碎打的措施。但是要消除对立面并非容易之事，效果尽管珊珊来迟，它们却是稳固的。“就此意义而论，这部法律开辟了印度的新纪元，它表明我们不仅致力并已实现一场政治革命；不仅努力进行经济革命，而且也同样向往社会革命。只有通过这三个不同方面的协同进展和它们共同汇成一个宏大的整体，印度人民才会进步。”

此外，他还需要赋予印度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尼赫鲁对各种形式的艺术和审美有与众不同的感悟力，他热切希望与别人分享他对生活美的欢愉之情。“一个有文化的人并不谈论文化，而是他的行为显示出文化，他实际上是用文化指导生活。”他倡寻改善和创新大众文化的环境，让那些并不富有的普通人也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情感。他认为全体印度人都应像他那样富有活力，热爱生活，善于想象和充满好奇感，所以极力去发掘他们做人的价值，直到他们也拥有与他同样的见识和观念为止。他主张抛弃民族文化中属于陈腐糟粕的内容，催促给印度的创造性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他提议在德里造一座国立大剧院，每年国庆时将印度全国各地的民间舞蹈家请来首都表演。他对缺乏想象力的工程住宅部下达指示，鼓励在官方建筑物上绘上现代壁画，用崭新的题材和使人振奋的主题一扫传统装饰艺术的沉闷之气。他说：“壁画是通俗的艺术形式，在印度从未得到充分发展。我们过去的艺术非常精美，但它属于过去。我们的绘画过于小巧玲珑，因此并不受欢迎。”

要想让他丰富多采的个性的描绘更加完整，还必须提到他集多种多样的才能、情感和观念于一身的整体人格。尼赫鲁并不是一个容易接近和了解的人。他广受民众的崇拜，但也有些人对他深怀畏惧，这并不仅是因为他身居高位而刻意显示出矜持，而也因为他内心深处的孤傲和清高，他由此可以保持自己神圣不可侵犯。他在客套礼仪上经常表现得很糟糕，在大多数社交场合喜欢孤芳自赏，对他的客人或邻座显出一种仿佛存心虐待般的冷漠。礼貌得体的餐桌边闲聊需要双方付出努力，但他常常做不到这一点。不过要是他有情绪，他也能是一位令人着迷的伙伴，表情生动，言谈风趣，既没有政界人士那种简单粗暴，也不像文化人那样喜欢故作高深，而且善于开动脑筋，营造出任何一种他喜欢的场面。某种自发的天性使他特别善待儿童，印度实际上已不自觉地将其诞辰当作儿童节来庆祝。他不是愁肠百结、忧心忡忡的人，总能想出办法来排忧解难。在独立之初的教派骚乱期间，他访问那些饱受动乱之苦的地区，两眼盯着载满难民的火车，难掩心中的愤怒和忧戚，但他也能在同一次旅途中，靠阅读一本翻译的古典梵文剧本排遣自己心中的难过之情。

尼赫鲁对他的工作带给他的无限多样性和责任倍感欣慰。他对来访的一位西方著名记者说：“正是这种令人激奋的工作在领导今天的印度人民前进。”当听说克什米尔邦的部长们抱怨行政任务过重时，他反驳说：“我简直不知道，假设你们肩上压着几十种不同的负担，每种负担都和克什米尔一样重要，那你们会有如何感受。然而，我却这样挺过来了，从不感到苦恼沮丧。”他面对困难始终保持安之若素。坚定不移的超然，与生俱来的气质和性格以及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都对他有所帮助。他尽管精力充沛，情绪高

亢，但论性格他是位深居简出的隐士，论气质是一位矜持孤傲的旁观者，只有论责任感才是一位积极参与者。他理解自己作为印度总理的最终责任，满怀自信和虔诚地接下这副担子，正如他说的：“在这面三色国旗下，我发过誓要为印度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内心发过誓，我也曾对圣雄甘地发过同样的誓言。”但是他总能站在距眼前的问题更远些的地方，正确地去观察它们。他习惯每隔两周给各邦的首席部长写一封信，信中他综合地谈出自己的思路及对紧迫问题和长期目标的想法。这些信件是一些兴之所至、漫无主题的独白，却出自一位充满激情而又勤于思考的作者。尼赫鲁并不擅长作深刻的或创造性的思考，他也清楚这点。他曾经对一位与他一度关系密切但后来不欢而散的朋友坦诚直言：“我要是更聪明些就好了！”实际上他有的只是一个常人的头脑，受益于理想主义和激情的熏陶，并因沉思自省而得到提高。于是他永不停息地思考问题，尽管有时没有定式，却致力发起了一场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适合印度具体国情的全方位革新运动。他坚信这是一种正确的取向，努力必将结出硕果，他自己也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领导这场漫漫的远征。

尼赫鲁不是一位普通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从来不需要宗教的信念或慰藉。他一直是一位温和的不可知论者，他为自己异教徒似的生活观感到骄傲，赞赏古代人们对未知的神的崇奉。但甘地过去对他的训导，他对佛陀教义的迷恋以及印度古老的《薄伽梵歌》的影响，都给他的观念和个性打下深深的烙印，教会他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全力以赴地实现大目标。“的确，问题永远不会有完，也许你最后会得出教训：必须竭尽全力做每天的工作，而不要过分操心结果如何。”他能一心一意不受干扰的付出努力，因为他坚定地信任印度和他的人民。“我在既定情况下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有时我也操心某些问题的解决，但归根结底我不担心印度的将来，不担心我所关心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就能睡上一个好觉，早晨起来吸吸新鲜空气。譬如我与世界上的大人物或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谈话，他们也许比我聪明，比我富有经验，但我不会因他们的伟大或智慧而自惭形秽，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头脑也相当清楚，态度坦率，谈的都是需要谈的话，并且希望与他们友好相处。反正我不怕他们会谈什么或做什么。”

到1956年底，尼赫鲁的长远目标看起来已不能说只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了。他在印度国内的威信坚如磐石，在国外的声望也与日俱增。1955年印度国庆那天，他在新德里阅兵并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他激动得容光焕发：“看到我们国家正在进步、前进，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我心中充满了骄傲和欢乐。我已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成就感，对我们的未来充满自信。”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民众参与、发展计划、民族自立、国际事务中的自尊，这一切崇高而艰巨的目标都在他这位总理的领导下逐步实现。他有理由沉浸在信心和满足感之中：“我已嗅到黎明的气息，感觉到一个新时代在印度漫长而盛衰无常的历史之后已经开始。我的感觉如此，我想在这点上也能代表无数计的我国同胞。”当刚获得独立时，尼赫鲁就明白有许多使命等待他去完成，有许多希望有待他去兑现。他从未辜负过这些使命和期望。他全力投入反对政治和宗教反动势力和社会保守势力的斗争；在赢得政治独立后，又开始积极争取经济主权并引入社会主义雏形——授以人民土地，成人扫盲，平等，就业，改善健康条件；他努力平息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将各种冲突因素包容在一个广泛统一的格局之中。当然并非一帆风顺，没有

问题，例如他与策动武装起义的印共的彻底摊牌，最后对他们实行了武力镇压。处理语言划邦问题留下不少后遗症。但这些本身并没有威胁到尼赫鲁实现其既定目标的整体效果和他本人的领导权。几乎人人承认，就尼赫鲁的领导权和他在国内外的声誉而言，1956年是尼赫鲁总理任内的最辉煌时期。

十六、危机与挑战

自甘地死后至 50 年代后期，尼赫鲁在世界政坛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同时也经历了一系列国内危机。这些问题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印度。

独立以前，国大党实际表现为一场运动，它像一把巨伞，下面集合着持不同观点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也能暂时着眼于共同目标，弃而不顾相互的分歧。其中不乏有教派偏见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与党外的教派势力呼应。在左派方面，鲍斯的追随者早已分裂出去组成新的政党，在西孟加拉拥有强大的政治基地；纳拉扬为首的国大党内的社会主义者也已脱离出去，另组成印度社会党；在西孟加拉邦和不久将组建喀拉拉邦的南部地区，许多左翼国大党人转而加入了印共。

印共在独立之初的基本立场可从一些口号中反映出来，诸如印度获得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尼赫鲁政府是英帝国主义的侍从，共产党人必须继续坚持斗争等等。印共领导人到各地宣传这些口号，鼓动举行武装起义和开展武装斗争。印共在特伦甘纳、安得拉和西孟加拉积极开展活动，但不久他们发现自身受到孤立，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支持，于是开始转入地下。当时身为内政部长的巴特利可以纵容印度教教派主义，但绝不姑息迁就共产党人，在他主持下进行了多次大规模逮捕，许多印共活动家被投入监狱。后来印共决定放弃暴力革命转通过竞选开展议会斗争，印度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印共成员，并取消限制他们活动的法令。尼赫鲁同时也告诫国大党地方领导人，对共产党人不要过分严厉。他知道印共的队伍中包括不少很有才华的青年，不愿让他们对自己抱有成见和怨恨。

但尼赫鲁对教派主义深恶痛绝，特别不能容忍它在国大党和政府内部的活动。他在 50 年代初击败坦东，削弱了教派主义情绪对国大党机构的影响。他在议会中经常教导国大党和反对党要抵制教派主义的侵蚀。在他支持下通过一项议案，要求限制那些根据种族、种姓或宗教来考虑党员资格的政党。他说：“宗教与政治的结盟是最危险的联姻，只会生出一种反常的怪胎。”两年后，内阁中另一位持教派立场的部长辞职抗议尼赫鲁对穆斯林的“软弱”，尼赫鲁重复了这句话。他表示坚决维护世俗化的价值观，情绪激烈地对议会说：“他们逼我们对我们的同胞说：‘我们要驱逐你们，因为你们的信仰与我们不同。’如果采纳这一主张，就意味着印度的毁灭和我们过去与现在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消亡。我重申，我们将竭尽全力反对这种主张，我们要在任何场所与它进行斗争，无论是在家里、田间、会议室还是大街小巷。我们绝不能让印度牺牲在偏执者的血腥祭坛上。”他的话打动了千千万万他的人民。

毫无疑问，与独立后印度国内的其他政治领袖相比，尼赫鲁对世俗主义的维护最为坚决。1950 年 1 月颁布的印度新宪法被认为是尼赫鲁的原则取得胜利。这部新宪法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份宪政文件，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彻底的非宗教性质：不定国家宗教，政教完全分离，按世俗原则兴办教育，停止从国库税收中拨款资助任何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能通过有效途径担任政府高级公职，个人和团体的信教自由受到保护。宪法的绪论带有明确的社会民主特征，它答应给予每一位公民“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公正，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地位和机会的平等”。

在其他政治力量中，国大党要对付的最严重挑战来自左派。就全国范围

而言，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是印度共产党。印共可能采纳的路线有三种：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举行武装起义和开展游击战；议会外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借助选举巩固斗争成果；坚持走议会道路。独立后印共首先采用的是第一种策略，并且得到莫斯科的鼓励支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惯于用冷战的眼光看待一切，它相信尼赫鲁的政府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因此支持印共造反是顺理成章的。但武装斗争的努力很快失败了。第二种选择很难进行实际操作。因而当印度准备根据新宪法举行首次大选时，印共再次得到莫斯科发出的指令，决定登记参加大选。

印共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但直到大选前还不算一个全国性政党。究其原因，主要是独立前它在组织路线和战术策略上犯了错误。在讲印地语的北印度地区，印共的根基始终很浅，它在孟买虽为工会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并没有及时地发展起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基础。印共最受群众欢迎的三个地区是安得拉邦、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其中有许多原因，然而最明显的原因在于它在英殖民时期采用的特有策略。在这三个地区，本地的印共党员一直在国大党组织内开展工作，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国大党内的左翼团体国大社会党至少在这些地区都由共产党人掌管。印共在安得拉和喀拉拉两地更是民族运动的实际领导者。这一声誉使当地的印共组织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影响大增。

现在的问题是印共如何对待尼赫鲁，或说尼赫鲁如何对待印共。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不可能只由共产党单方面决定。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共产党胆敢违抗莫斯科的旨意或愿望。1950年，苏联开始意识到印度并不是一个可称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家。其实杜鲁门比苏联领导人先意识到这点，于是确定了对印度的基本态度。这一时期冷战正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对立双方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尼赫鲁对世界总危机的看法从美苏两方看来都显得讳莫如深，不易领会。但苏联当局慢慢从他的言论中品出了积极的韵味。苏联对尼赫鲁的态度转变决定性地影响到印共。印共在农村和工厂减少了议会之外的活动，全力准备在首次大选中角逐。

尼赫鲁不敢对选举过程掉以轻心。国大党的两个主要对手是印度的教派政党和印共，但他认为教派主义的威胁更大，更何况它的毒素始终在国大党和政府内部扩散。这次选举无疑是对他的反教派主义立场的重大考验，可能出现的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是他的世俗主义深入人心，要么是他苦心经营起来的民主陷入无法收拾的混乱。最后的结果尚难预料。人民院和邦议会的选举从1951年10月开始，直到1952年5月结束。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实验。印度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投票者总数超过1亿7300万。国大党诚然是全国最大的政党，但确实看不出它有压制政治多元化的迹象，全国大大小小59个政党共提出1万7000多位候选人，分别竞选中央议会和邦议会的大约4000个席位，选举的规模实在可观。此前尼赫鲁已下令取消因甘地被刺而颁布的对教派主义政党的禁令，也就是说，连印度教教派主义也没有被选举拒之于门外。

一旦帷幕启开，尼赫鲁便全身心地投入选举运动之中，他抓紧时机到全国各地巡回访问，驾轻就熟地向群众发表精彩的演说，笑容可掬地会见自由运动的老战士，听取人们没完没了的批评和牢骚。他激烈谴责教派主义，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印共不能真正解决印度的问题。他听到不少发生在乡村不同种姓之间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印度教徒内部的互相残杀，高种

姓的人杀害了获选进入地方议会的低种姓成员。尼赫鲁对此怎能无动于衷和不诅咒种姓制度！甘地也曾谴责种姓制度下的种种荒唐行为，但从未向整个种姓制度发出宣战。尼赫鲁则表现得与种姓制誓不两立，称它是对印度教史前社会扭曲、堕落的反映。他提醒人们：种姓制已残存两千年之久，它的起源始终是一个历史上值得争议的问题，但现代的印度人为什么还津津乐道地将它奉为神明呢？不过他并不能肯定自己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极为艰巨，令人望而生畏，他不得不经常失望地摇头。一位朋友向他指出，也许中国人对如何根除旧习俗有正确的认识。他听后若有所思，然后无可奈何地说，印度已选择了一条与中国不同的路，要考虑中国式的道路已经太迟了。

国大党在独立后的首次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赢得中央议会 499 席中的 364 席；在全国 26 个邦中，国大党在 22 个邦获得大多数席位，在其他 4 个邦也是议会中的多数党。极右翼的教派主义政党在中央议会中只得到 3 席，在邦议会得到 35 席。代表左翼的印共获得中央议会的 16 席，邦议会的 106 席，成为议会中的主要反对党。印共的选票大部分来自南部地区。尼赫鲁时选举结果颇感欣慰，他的政策获得非同凡响的信任，国大党内也毫不怀疑是因他的个人魅力才获得选举的大胜。印度独立 4 年之后，他在自己国家已被公认为是一位不可或缺和取代的政治人物，他的声望与日俱增，而且也意味着从这时起，他在国大党内将就各种重要问题的解决为自己打开局面。

尼赫鲁对建立新印度作出的最卓越贡献之一，是他总是赋予政府一种团结和稳定的因素，他的个性本身就是强大的凝聚力。很自然，人们往往将他的存在与国家的稳定和兴旺发达划上了等号。但即使在他的权力最耀眼的时期，破坏性因素已经抬头。语言划邦问题引起的纠纷便是其中之一。

虽然印度政府已在按合理的原则考虑重新划邦的计划，但有一些别有用心势力仍利用语言问题向印度的团结发出宣战。早在独立前很久，国大党就表态赞同按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划省。当时不少人认为国大党是在许愿贿赂地方，以便争取全国上下对民族运动的支持。殖民时期的行政区划是英国人的杰作，主要动机在于分化本土的民族抵抗力量，同一省邦讲多种语言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一俟印度实现自由，根据语言原则重新划邦属于情理之中的事。还在新宪法通过以前，印度制宪议会中一些议员就催促尽快采取相应措施，但尼赫鲁却不着急，他将这一问题放到次要位置。依他看来，刚独立的印度尚不稳定，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困难，有许多急迫的问题需要政府注意，只有先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才说得上考虑地方行政的细节问题。他主张将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推迟，只同意制宪议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并就语言划邦问题的可能性写出报告。

查证工作一开始就受到民众情绪的牵制。首先起来发难的是马德拉斯讲泰卢固语的居民，他们举行抗议活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从马德拉斯邦分离出去单独成立安得拉邦，一位国大党地方负责人为声援他们绝食而死。结果尼赫鲁以安得拉邦是个例外为由作了让步，新的安得拉邦于 1952 年底正式宣告成立，原马德拉斯邦的剩余部分改称泰米尔纳德邦，由讲泰米尔语的居民组成。

不过很少有人同意尼赫鲁的“安得拉例外”的说法，反认为安得拉邦是其他地区效法的先例。印度宪法将 19 种语言定为正式语种，一旦政府批准另建安得拉邦，就难以拒绝其他关于按语言划邦的要求。尼赫鲁指责这是“愚

蠢的部落式态度”，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将看到我们捅了马蜂窝，我相信我们中大多数人会被螫得鼻青脸肿。”但他也感受到民众感情的强烈程度，指示将在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基础之上提出适当的解决措施，但前提必须是维护和加强印度的团结。

长达两年的调查始终受到干扰，据悉有些邦的政府甚至秘密出资赞助或鼓噪语言划邦的运动。可以肯定，在这种气氛下推出的报告书只会加剧纠纷，因为显然任何建议都不可能皆大欢喜。尼赫鲁呼吁人民保持冷静，但他知道报告不会使他避免麻烦。该委员会在 1955 年提交了报告，建议按语言将印度全国重新划分为 16 个邦和 3 个特别行政区。可是这一方案远不能使人们满意。

从总体看，报告的依据的确显得缺少逻辑性和统一标准。例如其中建议讲同一语言的地区分别划为喀拉拉和卡纳塔克两邦，而讲马拉特语和古吉拉特语两种语言的孟买却继续保留一邦的地位。旁遮普邦的情况与孟买邦类似。原海德拉巴邦部分讲马拉特语的地区划入孟买，另一部分讲同一语言的地区却另立新邦，而讲泰卢固语的地区又规定在 1961 年以前划入安得拉邦。当然也有一些理由可以解释这些例外，如一旦设立马拉特和古吉拉特两语言邦，两邦对孟买城的归属权将争执不下。旁遮普同时并存旁遮普语和印地语，锡克人要求成立单一的旁遮普语言邦，但出于战略安全因素的考虑不作分划。

不出预料，公众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如尼赫鲁给蒙巴顿的信中所说：“通过读那些措词激昂的讲话报道就可想象，印度的某些地区已处于内战的边缘。”旁遮普和孟买的形势尤为严峻，不满的情绪正在演成剧烈的暴力冲突。旁遮普的锡克人一直渴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邦，自然对政府报告大感失望。尼赫鲁访问了邦府阿姆利则，虽没有表示让步，却殷勤地向当地官员解释他的良苦用心，大大减弱了那里的紧张气氛。相比之下，孟买的局势却不那么容易控制，尼赫鲁一度甚至考虑由中央政府接管那里的权力，但又举棋不定，提出一个又一个的修正方案。他的最后方案尽管被议会通过，却仍无法平息矛盾，国大党为此在孟买的选举中遭受沉重的挫折，各反对党组成统一战线，充分利用群众对这一问题的不满以巩固它们自身的党派地位。问题拖了一年，坚持原方案已没有任何出路，尼赫鲁只得再次改变决定。孟买一分为二，分别建立讲马拉特语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讲古吉拉特语的古吉拉特邦，孟买定为前者的邦府。旁遮普在尼赫鲁死后也被分为讲旁遮普语的旁遮普邦和讲印地语的哈里亚纳邦，前者的居民以锡克教徒为主，后者以印度教教徒为主。语言邦问题终于告一段落。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也与语言有关。南印度各邦极力抵制印地语成为印度的国语。独立以来，对英语、印地语或其他语种孰为印度的国语或官方语言的问题，尼赫鲁从来认为没有多大争论的余地。一种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英语并不能取代印地语在印度的地位，印地语除了在北印度广泛流行外，已逐渐被接受为行政和教育用语；部分邦主要使用本地语言；英语继续作为全国通用的辅助语言。

不过从英语向印地语的过渡应逐步进行，不可操之过急。语言邦纠纷已表明印度还未发展成一个意识高度统一的国家，官方急于推广印地语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从而使国家陷入分裂。以印地语为国语必须有待于得到讲非印地语的国民的普遍理解和赞同，况且某些地方语言发展得

比印地语更快，不应表现出对它们的偏见。鉴于这类原因，尼赫鲁冷落了总统普拉沙德关于将印地语与英语一同列为文官考试语文的建议。问题在 1957 年开始变得尖锐起来，南印度各邦唯恐印地语“入侵”，却苦于无法用各自分散的本地语抗衡，于是要求政府正式确认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尼赫鲁避免对具体问题表态，仅叫内阁宣布了一些笼统原则，譬如：解决方案须获全体国民认可，不可根据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见为准；每一种语言都应得到充分机会发挥作用；讲非印地语的国民在受聘公职时不得受到歧视；英语不可能永远作为全国性语言，但对学习英语应予鼓励，英语也能与印地语一道在正式场合作为各邦之间的交流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仓促决定国语的使用，也不应确定严格的期限等。

294

向 v 个

但当获悉中央政府已加紧拟定从英语向印地语过渡的时间及形式时，南部各邦的反对情绪再度激化了。1957 年底发表的政府公报建议，印地语将于 1965 年取代英语成为全国官方语言。40 多名来自南印度的国大党议员吁请把这一时间推迟至 1990 年。尤其在马德拉斯，民众的抗议达到白热化程度。国大党资深人士拉贾戈帕拉查理公开谴责“印地语帝国主义”的威胁。尼赫鲁尽管也批评那些鼓吹印地语至上的狂热分子，赞同慢慢过渡，并向南印度国民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他本人就是“英语热衷者”，可是他并不打算让英语享有与印地语同等的地位。拟议中的法令既承认印地语是官方语言，也申明英语将作为“辅语”继续在一切正式社交场合使用。尼赫鲁宣布：“我不希望非印地语地区的人民觉得某些大门对他们关闭了。”

印度现在不得不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精英教育政策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世世代代以来，印度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从未对“印度一统”的观念构成过实质性挑战。古代的梵语始终团结起实际统治国家的婆罗门贵族阶层，梵语的意象化和宗教传说甚至传遍边远地区的穷乡僻壤，连非婆罗门社会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梵语文化传统。穆斯林势力入侵印度次大陆后，梵文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但新的统治者并没有重新规定一种能在全印通行的语言，官场上讲波斯语，后来又演变成乌尔都语，其口语形式称为印度斯坦语。随着英国征服印度和欧洲在同期迈入产业和科学技术的新时代，的确在独立前很久就存在通过英语传媒彻底改观印度社会现状的可能，但这一变革肯定会最终危及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因而殖民政府放弃了努力。结果，英语虽然成为新贵精英阶层的语言，而各种地方语言却获得不同程度的复兴。社会改革要求人们掌握更多的现代知识，学习英语便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但可悲的是，英语在许多受教育者那里只是一种在殖民政府中谋求一官半职的工具。泰戈尔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孟加拉人，也是学习英语的热心倡导者，他曾扼腕长叹：“我们的受教育阶层不是一个文化阶层、而是一个提供合格公务员的阶层。”

泰戈尔的看法揭示了殖民时代的真实情形，而当印度实现民族独立之后，同一事实依然存在：英语不过是一种媒介，马德拉斯的泰米尔人、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人和阿姆利则的旁遮普人坐在一起时能用它相互交谈。尼赫鲁本人坚信英语是一种促进现代化的工具，他尽管不反对印度各大学允许学生用地方语进行考试，但当听说绝大多数人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偏爱英语时，他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

但眼前的问题却并非那么简单，尼赫鲁不可能以个人喜好或其他非政治的次要因素来考虑问题，这便注定他在立印地语为国语的立场上坚定不移。经过无数次的争论和反复，虽然过渡的最后期限推迟，可印地语取代英语成为第一语言的决定得到肯定。英语与印地语之争也使他与拉贾戈帕拉查理的关系变得紧张，后者要求修改宪法，明确英语永远作为官方语言和邦际中介语言的地位，规定印地语和其他地方语言只作为各邦内部使用的语言。尼赫鲁回答说，印地语不会取代地方语言在各邦的地位，英语也不能成为这些地区唯一的官方语言，也不可能变成普通大众的语言，因为那无异于表明印度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印度本土语言缺乏生命力。不过尼赫鲁重申，英语的学习应得到鼓励，从英语向印地语的过渡须在普遍认同的情况下实施，英语将始终作为辅助语种存在下去。

拉贾戈帕拉查理不满意尼赫鲁的保证，继续进行他的抗议，甚至暗示要支持南印度各邦的分离行动。尼赫鲁责备他“仿佛已完全走火入魔”，以至不能再作理智的判断。当尼赫鲁听说南印度某些组织谈论独立时，申斥他正在挑起一场“冷战”，后者极力为自己辩护。尼赫鲁承认他们两人都无法说服对方，拉贾戈帕拉查理却仍不甘休，公开批评总理态度专制和听不进反面意见。尼赫鲁反驳说：“你认为称一个与你意见不同的人为讨厌批评的专制者就能解决问题吗？尽管我与你意见相左，我肯定不会那样说你。”当时大家以为拉贾戈帕拉查理反对政府和国大党的决定会导致他丢官，甚至有人已为他谋好一个闲职，然而因总理的宽容他保住了政府中的位置。尼赫鲁渡过了他主政以来印度国内政治生活中又一次重大危机。

1957年2至3月，印度举行了第二次大选，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总数从第一次大选的1亿7300万增加到1亿9600万。国大党仍由尼赫鲁领导投入竞选，获得全国大多数选票。执政的国大党在大选中获胜，主要凭借的是他的个人威望而非党的竞选方案。对大多数投票者来说，选举国大党便是选择尼赫鲁，新闻媒介也公开作这种宣传。尼赫鲁本人谈得更多的是执政党的成就：五年计划，乡村发展规划，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目标，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选举者普遍接受的只是尼赫鲁这个魅力无穷的名字。结果，国大党在人民院获得75%的席位。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是尼赫鲁个人的一次辉煌胜利，它再次肯定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强大支配能力，以及他受人瞩目的国际声望。国大党大选后在中央议会占压倒多数，并除喀拉拉邦以外也在全国各邦纷纷组织起新一届政府。

喀拉拉邦是一个例外，那里的选举结果向全世界爆出一条新闻：共产党赢得当地的选举，印共领导人纳布迪里帕当选该邦首席部长。尽管只是地方政府，但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组织政府，在世界上还是头一回。尼赫鲁深知这件事对印度国内外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事后讲，共产党也许意识到他们完全可以通过选举夺得政权。他也不愿明显地与喀拉拉邦的印共政府过不去。不过国大党在该邦的失利多少令他尴尬，他总想将印共的成功淡化成一次“侥幸取胜”，是当地原国大党政府政策不力的结果。实际上他心里清楚，人民对国大党基层组织的不满正在加深，喀拉拉的选举结果不过是第一个明显信号。

印共的宣传极力夸大这次胜利，提出口号“尼赫鲁让权，纳布迪帕里接班！”但可以肯定，印共的胜利使它成了一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政治力量，在中央议会中的席位增加至29席，得票总数接近10%，表明它的支持率自

上次大选以来成倍增长，它的支持者遍布全国。新组成的喀拉拉邦印共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匆忙地在农村和教育领域进行一系列改革。印共希望首先唤起穷人的热情，而穷人们对变化的期望值很高。穷苦百姓对街头的警察说：“现在你们还敢袭击我们吗！台上是我们的政府，纳布迪里帕是我们的领袖，我们在掌权。”尼赫鲁看来，印共采取的某些措施不甚妥当，而且有违宪之嫌，可他不愿干涉，只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然而，邦政府的大多数改革方案遭到地方文官机构的抵制，后者明言只接受中央政府的指示。国大党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尼赫鲁倾向于一种温和的解决方式，而这时已担任国大党主席的英迪拉·甘地夫人提出进行公开对抗。该邦首席部长纳布迪里帕接到新德里的命令，要他维持治安稳定，避免酿出乱子。不过为时已晚。喀拉拉邦信仰天主教的居民较多，当印共领导人还在琢磨尼赫鲁和

中央政府的用意时，天主教僧侣和信徒公开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废除教会学校并抵制教育世俗化计划。他们很快得到印度教教派组织的响应，逐渐形成了印共的全部对立面纠合在一起的局面。拥护改革的人们走向街头声援邦政府，双方的矛盾日渐剧烈，秩序开始显出混乱。当纳布迪里帕政府无法阻止警察向街头的罢工工人开枪时，实际上也就等于站到了后者的对立

面。穷人们以为自己被印共抛弃了，也就撤回了对印共邦政府的支持，局势于是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尼赫鲁赶往喀拉拉邦视察，与印共领导人举行反复磋商。

他向其政治对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很具有攻击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们怎会就受到人民的孤立？真是不可思议！”然后他提议邦政府继续办公，在此期间再举行一次邦选举以便重新组织政府。这本来是一个折衷性方案，因为它可以避免会持

久产生消极影响的强制性解散政府。但喀拉拉邦的印共组织拒绝尼赫鲁的建议，纳布迪里帕坚持要求除非在包括喀拉拉在内

的各邦重新选举。印共不同意重选在原则上虽说不上不妥，却

犯了策略错误，假如它赞同二次选举，作为在任政府就能使文官部门和警察机构保持中立，不得公开反对共产党。由于印共

的拒绝，印度总统以该邦的法律和秩序已陷入崩溃为由，发布命令强制解散了邦政府，地方行政直接由总统接管。英·甘地

夫人亲自坐镇该邦，监督邦政府的解散。事后她继续留在那

里，极力促成当地的国大党和穆斯林组织在第二次选举中结

盟，共同对付共产党人。这开了一个可悲的先例：国大党领导人利用教派主义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

国大党的政客手法使印共在半年后的新选举中惨败，新上

台的是一个无共同原则的联合政府，这种政治组合形式为将来的印度政治开了不良的风气之先。尼赫鲁极力辩解他的干预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的，称此举是出于国内安全和稳定的考虑，他说：“每一个有关系的人，无论他是否表达出来，肯定都认为这样做从总体看是对的。”印共感到极度愤慨，谴责他的行径是“对民主的背叛”。其他一些政治势力也对干预的宪法依据提出置疑。诚如一位作家的记述：“在这联合运动所掀起的怒潮中，邦政府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行，动机被歪曲，政治上的自私打算被夸大，力求做到的好事全被忽视。印度国内以反共为主要目的的报刊也参加了推翻喀拉拉邦政府的运动。”

印度第二次大选后不久，尼赫鲁政府也遇到经济方面的困难。问题主要是外汇短缺和粮食严重歉收所引起的。他告诫国大党说，除非经济形势好转，否则自由将受到威胁。他号召全国生产更多的粮食，加快进行土地改革。在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上，他甚至同意采纳激进的措施，譬如由国家管制粮食贸易、合作农庄和劳务协作。由于经济在许多领域跌入低谷，他的经济政策遭到不同方面的猛烈批评。左派攻击他优柔寡断，办事拖沓；右派指责他走得太远。批评者也抨击他的不结盟政策，认为它减少了西方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尼赫鲁坚定地答道：“我可以明告各位，即使我尼赫鲁走投无路，国大党和我们国家也绝对不会放弃不结盟和社会主义的纲领。”他清楚印度当时所处的困难境地，也为不得不舍弃某些他重视的方案而倍感焦虑，但他坚定表示：“我们绝不会改变自己的政策，如果有人不愿给我们援助，就让他守着他的钱袋去吧。我们不要援助也能继续前进。”

可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国大党高哈蒂年会之后，尼赫鲁显得有些消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感到“疲惫不堪和无精打采”。他表示想辞去职务”。其实当他度过60岁生日时就已经想到了退休。从1954至1958年，他曾四次公开提出这种可能，每次都在国大党内和新闻界引起一阵轰动，嘲讽者这时便会刻薄地说，他提出退休问题的唯一动机，是想再次证明他的不可缺少和依然深受爱戴。也许其中有真实的成分，但很难怀疑，即使尼赫鲁自信只有他本人才能成功地领导印度，可他还有另外一面，他渴望平平静静、悠哉悠哉地度过晚年。他已经经常感觉疲惫，希望有充足的时间休息，而作为一位普通人肯定会有更多的休闲时间。

他在1959年4月再次正式告诉国大党议会党团：“现在我感到必须休息一些时候，让自己从日常公务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他并不是想永久逃避责任，只希望有至少半年的时间作作休整，当一当不受公务之扰、自由自在活动的普通百姓。他的通告对国大党、对印度全国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无论他的内阁同僚还是国大党一般党员，都没有作好他退休的思想准备。全国各地都向他施加感情压力，请求他继续坚持下去。最后他心软了，打消了辞职的念头，显得勉为其难地说：“空气变得愈益沉重和阴暗，对一位渴望呼吸轻松的敏感者来说就更觉得艰难。到底需要干什么，我心里没有数。”还有人说他提出休假是想去英国好好陪一下埃迪薇娜，有趣的是，他在埃迪薇娜死后再也没有当众提过退休之事，尽管他确实病了。他有时会对新闻界老是提出谁是他的接班人的问题感到厌烦，一次竟玩世不恭地说：放心吧，我会先找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辞职风波一结束，尼赫鲁又重新开足马力返回繁忙的公务之中。第二次大选后，国家经济计划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他迫不急待地想让他梦境迅速转变为现实。在他的鼓舞下，第二个五年计划制订者们的案头上有了具体的目标规划：一，大规模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全民生活水平；二，迅速工业化，尤其是重点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三，大量增加就业机会；四，减轻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状。鉴于当时的背景条件和人民的贫困状况，上述目标算不上雄心勃勃。根据规划，待到1961年“二五”计划完成时，国民收入将增长25%；提供10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粮食产量递增25%，棉花递增31%，黄麻25%；21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得到灌溉；工业产值上升64%，钢产量将冲破记录增长231%。钢的高产量寄希望于苏联、西德、英国分别援建的三座大型冶金企业的正式投产，而这些援助可看作尼赫鲁不结盟政策的成

果。

此外，计划还包括实现铁路现代化，扩大铁路网络规模；普及教育，大量增加医疗设施；通过扩展乡村发展规划改变整个农村的面貌等。乡村发展规划向 3 亿 2000 万印度农民展示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尼赫鲁欢呼发展规划的着手实施：“从今天开始的此项工作，带来的是一场人民呼唤已久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基础不是骚乱或人头落地的战争，而是努力根除贫困。”乡村发展规划实质上是一个自助性计划，它给成千上万个村庄带去新公路、新建筑、新学校和新医院，帮助他们整治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给予他们更多的粮食衣物、良好的健康和起码的教育。尼赫鲁夸口说：“就内容的广泛与形式的新颖而论，像印度这样的乡村发展规划在过去几年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过。”他的评价得到美国著名乡村发展问题权威 M·威尔逊教授的赞同。威尔逊对印度的乡村发展规划作了广泛考察研究，他说：“我赞赏并热心支持整个这一规划，赞成它的广泛性、组织性和目标性，我甚至难以表达我的评价和意见，除非让我使用夸张的语言。从许多方面看，在世界各国的乡村改造和成人教育的历史上，从没有达到过如此规模和目标。”

但是“二五”计划的重点始终是加速工业化进程。尼赫鲁认为这是可能实现的，特别在重工业领域，因为有不断扩大的公营企业作后盾。尼赫鲁政府 1956 年 4 月 30 日颁布了关于工业政策的决议，强调扩展国有企业的范围，其中包括全部“基础工业、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工业，以及公用设施建设”，也包

括其他重要工业部门和在现阶段只能靠国家投资的工业部门。从这一政策可以看出，尼赫鲁的兴趣在一个“大”字：兴建大量的现代化大工厂，制造大型机床，大规模开矿和建设大型电站。政府也公开表明将对其他大型企业进行适度干预，虽向企业界保证不将他们的私有财产收归国有，但他们只能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框架内发挥作用。这一度引起私人企业的恐慌，尼赫鲁再次向他们保证说：“我并不要那种国家握有全权和实际掌管一切活动的社会主义，相反，我喜欢经济权力分散。当然，我们不能分散钢铁、机车和其他这类大工业，应尽可能地分散那些受国家宏观调控、以合作为基础的中小工业。我绝不会墨守教条。”他的经济顾问、“二五”计划的主要执笔人马哈拉诺比斯教授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大型机械制造业为第二产业的基础，以乡镇企业为大规模就业的基础。政府的这一态度向私营企业敲响警钟，它们面对压力不得不实施重大的调整和改进，结果使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比过去和谐多了。

1958 年，充分体现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的“二五”计划遇到严重困难。由于出现巨大的外汇缺口，尼赫鲁政府不得不削

减预算，削减的牺牲对象之一就是乡村发展规划，它的实施大大放慢了步子；同时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土地改革计划也被迫宣布暂停。尼赫鲁对此当然十分沮丧和苦恼。他无疑采用了某些激烈的措施，可形势仍不见好转。他焦躁不安地指望加速“二五”计划的进程，甚至不惜对宪法作了一些相应的修正，但非常措施却招来各方人士的反。教育方面的进展也显得步履蹒跚，杂乱无章，80%的人口仍处于文盲状态。而且他在人口过多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决心不足，实际上他从来就相信：只要经济得到发展，印度供养她的众

多人口不成问题。这一论点甚至连他自己的专家都惊得瞠目结舌。当尼赫鲁最后终于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如果按预定发展指标衡量，雄心勃勃的“二五”计划未能完成，最多只能说它取得有限的成功。

十七、心系苏伊士

语言划邦和拟定“二五”计划出现的问题转移了尼赫鲁对外交事务的视线。好在当时世界并未出现紧迫的危机，印度与美、苏、英等大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在一年时间内也相安无事。但1956年3月“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卡拉奇会议决议提到尽早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感到很不舒服。美国本可以阻止这一提法，但它可能并不想那么做。会议结束后法、英外长和美国国务卿来到德里，他们不愿尼赫鲁怀疑他们在支持巴基斯坦的问题上已结成军事同盟。

来访的三位西方政客中，法国的比内给尼赫鲁的印象最深。他对自己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言论感到抱歉，并表示愿缔结协议安排法属印度领地的移交。他公开批评《巴格达条约》，赞许地听取尼赫鲁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尼赫鲁提到苏联态度的改变和美苏之间看法正在接近，半开玩笑地表露出对两个大国达成协议，压制世界是其它国家的担心。或许这是在高层外交圈子中首次提到缓和，而真正的缓和要在20年后才能出现，尼赫鲁对他指出，阻碍继续减轻紧张局势的是地区性条约和有害无益的概念化思维。在现在情况下，不应该谴责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应努力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协议。比内对此表示基本赞同。法国此时最关心阿尔及利亚，在这点上尼赫鲁认为比内的态度合情合理，并提出了自己关于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五点建议。比内准备离开德里后前往开罗，尼赫鲁建议纳赛尔与比尔坦率对话。

英国外相劳埃德向尼赫鲁辩解说，英国实际上是被美国强迫拉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尼赫鲁强调印度对武装巴基斯坦感到关切。劳埃德表示充分理解印度的立场，并就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提出些不切实际的建议。尼赫鲁认为，“总的来说，我们间的谈话是坦率和友好的。从印象上看，尽管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我们的基本立场相距并不远，有不少共识。至少我们能坦诚相待。”

英国这时最关心的问题是确保印度不购买苏联的军用飞机，尼赫鲁则认为印度不必对此事承诺。他告诉劳埃德，印度政府愿意购买英国的蚊式战斗机和堪培拉式战斗机，也愿购买一批苏制伊柳辛式战斗机，因为印度空军喜欢后种飞机，而且它交货及时，价格公道。这纯粹是一宗商业交易，但印度会留心不让苏联技术人员有机会搞到英式飞机新装置的秘密。这一保证无法使英国满意。艾登致信尼赫鲁说，蚊式和堪培拉式战斗机将尽快交货，甚至早于供应英国皇家空军，这些飞机的质量超过苏联可能提供的任何机型，而且装有高机密设施，它们的售价也可降到最低。英国政府也愿意考虑印度提出的任何其它建议，前提是印度不向苏联购买飞机。紧接艾登信函之后的是蒙巴顿访印，这次他充当了说客，他对尼赫鲁说：印度应该只向英国而不要向苏联购买武器，苏制伊柳辛式飞机不是美国提供巴基斯坦的军刀式战斗机的对手。尼赫鲁终于让步了，不过主要不是信了他的话，而是出于友谊。他同意暂时不买任何苏制军用飞机，但他不对将来作出保证，只答应这样做之前先通知并征求英国政府的意见。从这个问题上可看出，尽管尼赫鲁对英国政策的许多方面不满，他与英国艾登政府的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

在所有来访者中，杜勒斯的访问最没意义。他不该在一个最糟糕的时候访问印度。去年他对果阿和不久前对克什米尔的谈话惹怒了印度民意，印度政府不得不采取特别防范措施阻止反对他的示威。会谈持续了5个小时，

两人的看法和打算都无法对路。尼赫鲁会谈后说：“我们对他的来访期望最大的莫过于往他封闭的头脑中装入一些我们对不同问题的看法。”尼赫鲁相信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已走入死胡同，如果仍一意孤行，只会导致世界战争。当尼赫鲁指出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已形成苏联内外政策的新阶段时，杜礼貌地表示赞同，但马上补充说，要使这些变化完全见效大概还得一代人的工夫，因此西方国家应该保持实力。所以，两人对世界事务的基本看法同过去一样相去甚远。

但杜勒斯不失时机地在其它话题上消除误会。他指责英国支持《巴格达条约》而使美国难堪，批评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的顽固殖民主义政策。杜说，帮助法国走出泥淖的重担落到美国肩上。他同意巴基斯坦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不应该有份，把促成巴成为该条约成员国归罪给其他人，把上次在联合公报中提及克什米尔问题的主要责任也推得一干二净。至于美巴之间的军事同盟，杜反复向尼赫鲁保证美国绝不允许巴基斯坦进攻印度，并说他已从巴基斯坦得到同一保证。这些保证并不能让尼赫鲁认真对待，两周后米高扬在德里的话更使他坚定了对美国的不信任感。米高扬在卡拉奇被告知，美巴防御协定专用于加强巴对抗印度和阿富汗的军事能力。事实上杜勒斯也告诉尼赫鲁，巴基斯坦军队将很快具备与印度军队同样的规模，甚至装备更先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杜勒斯的保证变成一句空话。杜勒斯承认，直到他访印时才发现印度真的害怕巴基斯坦发展军力对付印度。

但抛开印巴关系不论，尼赫鲁认为西方已有迹象对苏联的变化作出某种积极的反应。他对这一问题的整体印象在1956年夏季访问欧洲时得到印证。他喜欢艾登，赞扬他在日内瓦四大国会议上的作用。艾登1955年春访问德里时他们也相处得不错。当艾登接替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时，尼赫鲁送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这仅是简短的个人便函，祝贺你担任英国首相，我很高兴在英国和印度期间我们有机会相互作更深的了解。我肯定这不仅对个人情感至为重要，而且有着更重大的意义。我希望，尽管我们的见解可能出现偶尔分歧，我们却能为共同面对的伟大事业进行更高层次的合作。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而且也是许许多多印度人的良好祝愿。”

在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上，甚至尼赫鲁也不能比艾登对苏联政策的分析更精辟。艾登向尼赫鲁讲述了不久前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英国的访问，他说，虽没理由认为苏联已改变要共产主义红遍全世界的最终目标，但苏联的观点和方向在变，从顽固的冷战立场转向更灵活的政策；他们希望避免大规模战争，与其它国家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苏联的国内政策也表现出新的灵活性，这为大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艾登的分析进一步增强了尼赫鲁对英国政府外交成熟性的高度评价。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也证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艾登的印象不坏。尼赫鲁在英联邦会议上还极力主张，应趁苏联的新姿态使世界局势出现转机之时，尽快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

这时他已接到艾森豪威尔给他的访美邀请，他表示愿意通过个人努力促成这件事。杜勒斯前不久还批评“不结盟”是不道德的和短视的，尼赫鲁现在希望找机会与美国总统直接对话。但是艾森豪威尔病了，华盛顿方面希望推迟访美。尼赫鲁认为这是杜勒斯从中作梗，而梅农等人却暗暗高兴，他们认为邀请尼赫鲁只是美国竞选总统拉选票活动的一桩小技。

所以，尼赫鲁离开伦敦后去了巴黎而不是华盛顿。尼赫鲁与比内在德里会谈时就谈定印度将购买法国的奥秘式战斗机，这令英国政府和梅农大为失

望。当时梅农未经授权正与英方商量购买英制猎犬式战斗机。现在尼赫鲁在巴黎见到了继比内担任总理的摩勒，更加信任法国政府的稳健和机敏。他认为法国一旦改善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处境，就会主动提出宽宏大量的解决办法。他带话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领导人，要他们不失时机利用法国提出的方案，但当时这些民族主义者正对他去巴黎而不帮助他们的事业而生气。

也就是说，1956年上半年是尼赫鲁与西方领导人的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他对西方好战的印象也在改变。可是问题就在这时出现了。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突然向世界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纳赛尔的声明震动了世界，特别是利益攸关的英、法、美等国反应强烈，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了。

尼赫鲁此时与英、法政府关系如沐春风，有助于解释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的立场。无论是纳赛尔、铁托和尼赫鲁在布里俄尼岛的亲切会晤，还是后来尼赫鲁与纳赛尔在开罗一道旅行，纳赛尔从没有向尼赫鲁提起过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可能。其实这不足为奇，因为照纳赛尔后来的说法，当时他的确

未考虑国有化。布里俄尼岛风平浪静，远离西亚的战争，以色列总理曾送来一封非正式信件，大意是说：过去以色列依赖西方是错误的，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也是亚洲人，必须转向亚洲。但在飞往开罗的飞机上，纳赛尔给尼赫鲁看了一份杜勒斯讲话的电文，其中宣布美国撤销对修建阿斯旺大坝的援助，讲话的语气在尼赫鲁看来非常无礼甚至傲慢。纳赛尔当时的唯

一反应是埃及将放弃阿斯旺大坝工程，尼赫鲁表示赞同。尼赫鲁早就认为：埃及应该将资源用于大量能迅速产生效益的小型项目，而不是集中在一个至少十年内不起作用的大项目上，况

且这可能使提供大量援助的国家控制埃及经济。

因此，尼赫鲁听到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时既惊愕又不快，他对潘迪特夫人说：“我感到埃及政府正在于力不从心的

事情，它正受某些极端主义分子的鼓励，要对美英拒绝援助阿斯旺水坝计划作出愤怒的反应。”他似乎看出埃及的行动有某种好斗的成分。印度政府内有部分人公开表明反西方态度，支持纳赛尔一方采取果断行动先发制人，并建议全体万隆会议国

家立刻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埃及，抵制西方国家发出的恐吓。尼赫鲁却不愿急着下手，他下令通知各国政府，印度不表态支持任何一方，而是关注事态的发展。他明白，埃及有权让运河国有化，但它采用的方式和使用的冒犯性言辞无助于达成任何可能接受的协议。

尼赫鲁觉得英法近来的表现不错，显然是想尽量公平地对待它们。可艾登的行为迫使尼赫鲁无法再坚持这一态度。比内见过纳赛尔便相信他不是“希特勒第二”，艾登却不同，他顽固地称纳赛尔是“亚洲的墨索里尼”，认为同他毫无共同语言，也不可能与他达成体面的协议，艾登甚至以为尼赫鲁可能赞同他对埃及的强硬。

艾登出了错觉。看到英国对运河国有化如此大动肝火，尼赫鲁转而提醒英国不要采取任何强制手段。尼赫鲁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当听说英国打算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对运河实行国际共管时，他建议纳赛尔采取主动，

在尊重埃及尊严和主权的基础上，召集与运河使用有关各方协商解决争端。只要不出现进一步的单方面强硬措施，危机就可通过磋商得到解决。他还似有所指地说：“我完全不理解，怎能靠炫耀武力来解决这一问题。”

纳赛尔讲话的语气变软了，但他对尼赫鲁所提建议的答复却毫无用处。他要求尼赫鲁与他一道抵制到伦敦开会的邀请，并提议通过联合国讨论全部国际水道的问题。想必纳赛尔清楚这是完全行不通的提议，他所指的国际水道包括巴拿马运河、达达尼尔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亚丁海峡，与这些水道有关的国家显然不会同意进行多边讨论。尼赫鲁没有听从纳赛尔的建议，而是单独宣布他将参加伦敦会议，他给纳赛尔写信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削弱你的地位，而是与你做的一样，争取达成和解方案，这样才会使准备召开的会议不至变成解决问题的障碍。”他又以责备的口吻对纳赛尔说：“我们希望强调这些方面，不支持一国或多国集团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尼赫鲁同时也对艾登指出，受邀出席会议的名单面太窄，需要扩大；如果伦敦会议只考虑国际监督运河的问题，印度不愿意派团出席，企图对埃及强加一个决议只会引起武力冲突，亚非大部分地区也会作出强烈反应；如果会议是想要取得积极成果，那做法就必须完全不同。

尼赫鲁认真考虑了纳赛尔向他讨教的电报后，马上替纳赛尔草拟了一份答复，要后者送交英国，大意是：他对在不邀请埃及政府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感到震惊，而埃及只要接到邀请并且不附带先决条件和承诺，就愿意出席伦敦会议；埃及一方不能接受对其主权构成的挑战，但愿意执行某项保证自由通航的新协定。尼赫鲁本人对联合国不抱幻想，因此他提醒纳赛尔不要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但纳赛尔没有接受尼赫鲁的文稿，表示他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席英国召开的会议。因此，印度先是没有全心全意支持埃及的行动，接着双方又在策略上出现分歧。纳赛尔对伦敦会议避而远之，尼赫鲁却宣布印度将出席这次会议，他声明，印度虽参加伦敦会议，却不参与任何触犯埃及主权的活动。

没有埃及参加的会只能是真正磋商的预演，但并非没有意义。尼赫鲁继续他的一碗水端平的活动，他让梅农前往伦敦开会途中到开罗向纳赛尔解释：埃及的朋友也与埃及一道抵制会议不一定就是个好主意，相反，他们的与会可防止会议作出对埃及不利的决定。尼赫鲁这时也发现这是一桩谁也不买帐的苦差事：“这是我们自独立以来在国际事务中遇到的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局面。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能耐，但我们可能阻止荒唐的事发生。大概结局会是我们得罪了两方的朋友。”

在伦敦会议上，梅农极力劝说西方国家与埃及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而苏联也持同一姿态多少令他有些尴尬。梅农提出一项自认为是折衷性的方案，英法两国不同意其中部分内容，认为实际是对纳赛尔让步。埃及则对整个方案都不喜欢。英国认为印度在伦敦会议上埃及的代言人，梅农也摆出一副正积极影响埃及政府的架式，但纳赛尔表现得并不合作。尼赫鲁大概不会大惊小怪，尽管他要求纳赛尔多点灵活性，但也指示梅农提出某些“更有建设性的建议”，这表明他认为前一项建议太偏向英国。由于印度与埃及间缺少默契，伦敦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支持杜勒斯的创议：成立一个国际管制委员会。印度、苏联等国投票反对。会议决定派出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为首的使团前往埃及劝说纳赛尔。梅农想要退出会议，尼赫鲁没有同意。尼赫鲁并不特别看重会议，因为伦敦会议只能决定向纳赛尔提交讨论内容，

不可能涉及任何具体建议。

会议后，艾登和劳埃德曾指望利用印度对埃及的影响帮助实现苏伊士运河的国际化，但梅农回国途中在埃及没有提出任何建议。而且埃及政府也对梅农存有戒心，所以，聪明的做法是将主动权留给纳赛尔。孟席斯给纳赛尔带去了恐吓性消息，但发现这位总统根本不买帐：“纳赛尔是一个体格魁梧、外表威严的人，一看就是个紧紧掌握着自己政府的人，并且才智出众，但显得有点不成熟，而且不免缺乏经验，他给人印象很深，而且显然很有勇气。”9月6日，孟席斯的游说已明显失败，英法两国公开发出动用武力的威胁，纳赛尔请求尼赫鲁促成磋商，条件是维护用户的合法利益，但不接受国际管制。尼赫鲁同意帮助，并再一次劝阻纳赛尔不要求助联合国。因而埃及公开提议组成一个用户国家参加的协商机构解决运河问题。尼赫鲁催促艾登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尼赫鲁也写信给一直反对使用武力的艾森豪威尔，希望在协商解决时争取美国的支持。

艾登对尼赫鲁的话只当耳边风，单方面宣布将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协会”，实际接管运河的管理控制权。他还补充说，其它申明英国权利的步骤也在慎重考虑之中。人们看出英国已在考虑用强硬手段吓垮纳赛尔，削弱其它阿拉伯国家对他的支持，或是想为军事行动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看出召开用户会议的计划已没有意义，因此建议纳赛尔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这样至少可以推迟危机的爆发。他也告诫艾登不要毁掉尚存的和解希望，提议在采取可能引发战争的步骤前先召开英联邦国家的首脑会议。

中东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尼赫鲁命令印度各部制定发生对抗事件时的对策，研究运河交通阻断可能引起的后果。不过他仍然不相信英国会鲁莽和不明智得为此不惜一战，因而他继续在双方面进行非正式试探，尽力为未来的谈判打下基础。他认为，同情埃及并不一定支持它的每一步行动，特别是它对英法的羞辱。梅农劝告埃及说，即使用户协会的计划完全不可接受，也不妨多表现一些合作精神。尼赫鲁原定在纳赛尔访问沙特阿拉伯几天后访问那个国家，但为了避嫌，他要纳赛尔别等在利雅得与他会面。

尼赫鲁始终不愿无保留地站在埃及一边，但这似乎并没有让西方国家领情。艾登依然坚持成立用户协会，要求尼赫鲁劝说埃及接受。这时要马上召开英联邦首脑会议也有困难。不过杜勒斯接到尼赫鲁呼吁后回答说：美国反对漠视埃及的权利，不过这些权利究竟包括哪些需要认真确定，埃及对运河的合法权益应同在其领土上的国际通行权结合起来考虑。杜勒斯的表态没有意义。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尼赫鲁仿佛觉得战争的危险减小了，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冷战。

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固然损失不小，可纳赛尔的日子也不好过。正如铁托所言，纳赛尔由于缺少经验，对美国取消对阿斯旺大坝计划的援助作出了过于迅速和过于强烈的反应，如果说他因美国取消援助而处境艰难，那他现在的处境则更困难了。在阿拉伯世界，形势也开始变得对纳赛尔不利，埃及人开始紧张起来。英国驻开罗大使的报告说，形势正变得对英国愈发有利，协商解决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梅农提出一项折衷方案，提议埃及建立一个管理运河的权威机构，每年向联合国提交报告；成立一个代表权广泛的用户协会负责咨询工作；同意根据联合国宪章解决一切争端。他认为他已说动艾登和劳埃德接受这些建议，现在是该敦促纳赛尔接受的时候了。当纳赛尔再

次面对一个他并不中意的解决办法时，艾登帮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梅农对英国的反应显得过于乐观，但艾登通知尼赫鲁说：梅农的建议使埃及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这一水道，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无法切实执行，英国不能对此作出承诺，仍坚持早先的国际管制运河的立场。谈判转移到纽约继续进行，哈马舍尔德排开梅农，争取使埃及、英、法三国就原则问题达成一致。梅农传回消息说，埃及这次作出的让步比印度事先知道的大得多，甚至有些事关主权。杜勒斯认为这时可能是用和平手段合理、体面解决问题的最佳机会。尼赫鲁也相信，问题的确已到了协商阶段，再走回头路是困难的。

最后阶段，即使尼赫鲁和梅农没有起太大作用，但他们从宣布运河国有化以来的全过程中对维护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英工党领袖诺尔—贝克写信对尼赫鲁说：“我希望你能知道你对英国的支持有多么大，我国大多数人民对你自始至终的立场深表谢意。我认为，你最初在印度议会的坦率声明具有重大意义，它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能阻止我们莽撞行事。克里希纳（梅农）在整个会议期间和以后的工作很有价值，假如最后采纳了你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希望如此，不仅英国而且全世界都将对你表示感谢。总之，我认为工党与自由党及其他支持者一道，现在完全能够阻止政府可能采取的自杀行动。”

然而，在野的工党领导人的预言错了。艾登正在加紧制订另一计划，对此尼赫鲁和杜勒斯、甚至连英国驻外大使们都蒙在鼓里。英要与以色列秘密接触，就必须推迟与埃及之间原订10月底在日内瓦开始的解释性对话。埃及政府以为这不过是暂时延期，因此，当遭到以色列突然攻击和接到英法联合发出的最后通牒时，它也同其它各方一样大吃一惊。最后通牒发出不到24小时，英法两国的空降和登陆部队同时进攻埃及，战争爆发。

英法入侵埃及显然使尼赫鲁再也不能不旗帜鲜明了。他给纳赛尔写了一封态度明确的声援信：“这是历史的倒退，我们谁也无法容忍。”他公开谴责入侵者，同时呼吁哈马舍尔德保证联合国采取比入侵者更迅速的步骤。他也敦促美国出面干预，他致信杜勒斯说：“我无法想象比这更糟的侵略。假如这场入侵继续下去并获得成功，国际义务和对联合国的一切信念都将化为乌有，殖民主义的幽灵又会在我们身边出没逞狂。欧亚关系的整个未来安危未定，如果它意味着武力征服，那世界和平将不复存在。”

尼赫鲁给艾登本人送出一封正式信函，信中直言不讳：“在我们看来，这是公然的入侵和对联合国宪章的违背。我相信，在印度，在许多亚洲国家及其它一些地方，人们普遍认为，这又倒退到过去那种西方列强以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亚非国家的不幸年代。我们认为这些手段早已过时，不可能再在现代使用。如果可用武力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联合国的整个目标就会瓦解，各国的自由也将受到威胁。我更感遗憾的是，英国一直信奉自由主义政策，现在却同侵略连在一起。许多国家对殖民主义记忆犹新，英国不应该成为它们过去不断反抗、现在仍强烈反感的殖民主义的象征。此时此刻，我们必然同情埃及，没有任何理由能为侵略和进攻一个自由的国家辩解我坦陈我的反感。除非马上停止这一错误行径，否则我看来前途只会是一片黑暗。”

一俟战争爆发，尼赫鲁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奔走，他要做的事很多，促成实现停火，防止扩大军事行动，保全纳赛尔的面子，维护埃及的主权，挽救英联邦。中国、苏联和埃及建议立即召开万隆国家会议，但尼赫鲁认为不现实。他提出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寻找解决方案。他支持由美国派出一支部队

重建埃、以之间的停火线，并由印度、加拿大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一个观察小组。埃及也表示接受。当联合国组建一支紧急部队时，联大主席皮尔逊和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两人都邀请印度参加，梅农同意了，认为“这既可以给埃及道义支持，又可提高印度的声望，可能是结束敌对行动、解救埃及政府的唯一办法”。这支部队经埃及同意后将在埃及领土上短期执行和平任务，它并不是从侵略军手中接防，而是要将侵略军赶回停火线之外。这一建议时印度是有利和合理的，但尼赫鲁希望等待埃及政府主动邀请印度后再表示同意。他要印驻开罗大使转告纳赛尔：“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同埃及完全站在一边。”

苏联建议苏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结束战争，艾森豪威尔却显然不能接受。苏联于是在11月5日直接向英、法、以三国发出最后通牒，暗示它们如果不停止侵略，苏联将使用火箭等现代毁灭性武器攻击它们。英国驻苏大使证明威胁不只是空话，要英国劝艾森豪威尔和尼赫鲁警告苏联这一行动的危险后果。美国对苏联的声明作出迅速反应，艾森豪威尔命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其实尼赫鲁做这事并不需催促，他已向布尔加宁发出呼吁，不要采用任何可能导致全面战争的行动，应赞同通过联合国来采取行动。他也欢迎瑞士提议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举行会晤，并表示如需要，他本人也愿出席。

苏伊士战争的前景对交战双方都不乐观。埃及的武装抵抗正在崩溃，纳赛尔表示打算放弃殊死抵抗。英法因军事入侵受到广泛的谴责，在外交上陷入孤立的困境。8月1日，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美国的提案：苏伊士运河敌对双方立即停火。几天后，英法两国被迫宣布停火，埃及也于同日接受停火。尼赫鲁给纳赛尔送去一封言辞热烈的信表示鼓励：“最新进展表明，形势正向对埃及有利的方向转化。我敢肯定这一进展仍将继续，它不仅将拯救埃及，而且也会最后消除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一切侵略。在此转折关头特向你表示祝贺，我保证我们将维护埃及的独立。世界舆论的大多数站在你们一边，这毫无疑问会有很大帮助，但最要紧的是你的领导和埃及人民维护自身自由的决心。”纳赛尔回信说，他怀疑停火是某种诡计，重申他绝不接受任何限制埃及主权的结局。

在印度国内，尼赫鲁必须抑制日益升温的对英国及整个英联邦的对立情绪。他在私人通信和公开讲话中都没有批评英国及英国政府，只是批评艾登个人，他表达他的反对时更多的是一种遗憾而不是愤怒。在尼赫鲁看来，苏伊士的冒险只是艾登个人的心理失常，因此印度国民应记住艾登并不代表英国全国的舆论。发出退出英联邦的呼声的不仅有左翼政党和国大党，也有保守派领导人。尼赫鲁仿佛又回到独立初印度决定留在英联邦的那一时期，苦苦顶住了压力。他苦口婆心地解释：与英联邦的关系并未限制印度用最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中断这一关系不该是对具体的某一次危机的愤怒反应，而是全盘考虑问题后作出的冷静决定；英国无法垄断英联邦，印度能与加拿大那样的成员国密切合作，进行更有成效的努力。尼赫鲁的努力没有白费，当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尽管印度国内仍在激烈批评英国，英联邦却完好无损。尼赫鲁不仅是新英联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它面对重大危机时的救星。

停火以后，英国请求印度“积极发挥作用，协助问题的解决”。埃及只愿接受一支由印度、希腊和哥伦比亚军队组成的国际维和部队。梅农建议加

上加拿大，并且如果哥伦比亚接受邀请，再加上南斯拉夫、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以便平衡。皮尔逊赞同派一支加拿大部队。哈马舍尔德宣布：先遣部队将包括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印度在内。但几天后，埃及外长突然反对印度参加国际维和部队，理由是埃及的友邦和公开敌国都不应加入。印度大使将埃及突然对印度冷淡归因于他们不喜欢英联邦。在当天晚上，纳赛尔否决了他的外长的意见，欢迎印度参加。埃及外交部对先前意见的解释是：这支军队被许多埃及人看作是占领军，印度如参加会损害它在埃及的声誉。

苏伊士危机基本结束了。英法政府默认了失败，准备从埃及撤军，它们像过去一样没有得到与苏伊士运河有关的任何保证。尼赫鲁写信对铁托说：“它们现在要做的只是避免丢脸。”但纳赛尔还不甘休，他去驱赶英法侨民和犹太人，尽管那些平民并没有从事过反埃及的活动。尼赫鲁阻止纳赛尔这样做，后者争辩说，英法和犹太势力数十年来一直控制着埃及的经济命脉，近几个月又企图使埃及的经济陷入瘫痪，他不能不管这帮势力；况且，英、法的宣传机器仍在鼓噪推翻他的统治，他这样做很有必要。看来，他决心要让埃及彻底摆脱西方的影响。

尼赫鲁失望了，他一直希望纳赛尔不要在小事上表现得器量狭小，影响在重大问题上取得成功。“真正的智慧包括知道我们行动的程度，因势利导，通过宽宏大量制造一种能给自身带来有利变化的气氛。”埃及应该认真听从劝告，逐步巩固已得到的胜利，缓和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中持久不断的危机。

尼赫鲁在苏伊士危机期间表现出色。他不用原则作交易，在根本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发挥出其他人无可企及的积极作用。他利用本人和印度的特殊地位，促成双方和平与和解，反对殖民主义战争，同时他又将反帝反殖的坚定性与维护英联邦利益的真诚愿望结合起来，充分表现出一位世界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受到国际各界人士的交口赞誉。

十八、动荡世界的苦心人

1956 年是世界不安宁的一年，几乎与苏伊士战争同时，欧洲又出了问题。10 月 24 日，匈牙利爆发了反共党政权的骚乱，右翼领袖纳吉上台掌权。由于担心匈牙利倾向西方并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内乱，苏联决定出兵干涉。

10 月底，迅速推进的苏联军队粉碎了匈牙利的骚乱。在印度，尼赫鲁读着纷沓而来的报告，它们众说纷纭，矛盾百出，但他意识到这场遭镇压的骚乱更像是一场民众起义。联大举行了特别紧急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苏联军事干涉的提案。尼赫鲁没有附和美国在联合国的提案，由于他拒绝将匈牙利事件与苏伊士危机相提并论，他在印度国内外都招来猛烈的批评，连印度外交部的专家们也警告他不要使用双重标准，国大党领导层要他“根据我们信奉的原则对匈牙利的形势表明立场”。

但困难在于理解这种原则。在苏伊士危机问题上，情况明明白白，而在匈牙利却并不如此简单，主要的报道均出自西方新闻媒介，它们很可能夸大了华沙条约国家进行“不断干涉”的可能性。况且，公开谴责苏联的行为可能使印度自拆台脚，适得其反。尼赫鲁有理由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同情匈牙利

民族主义运动的最佳方法是私下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但在尼赫鲁的思想深处，这大概也表明政策有所偏颇。印度外交部官

员后来承认：“在新德里的外交部，对匈牙利事件的考虑放在埃及的问题之后。”

尼赫鲁开始时做的一切，只是指示印度驻苏大使非正式地让苏联领导人知道印度的反应。他指出：印度当然同情争取民

主自由的人们。次日他再次发出电报，向苏联政府了解整个情况。他给梅农的电报说：“俄国人与匈牙利之间的任何进一步冲突都是最不幸的事，有人会利用它来转移人们对中东形势的注意。”在获悉准确的消息后，他决定采取温和的姿态，指示联合国的印度代表团避免谴责苏联政府，但同时明确表态应该停止战斗，匈牙利人民应在没有外来干涉或强权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决定他们的未来。

尼赫鲁由于不愿公开提到苏联在匈牙利的干涉行动，他遭到普遍的责难。国大党内的左翼领导人纳拉扬批评他：“如果你不谈出来，你就会始终感到内疚，因为这等于是帮助一个以革命作掩护，因而比老帝国主义更危险的新帝国主义去奴役一个勇敢的民族。”尼赫鲁为了摆脱这类明显的指责，11 月 5

日首次公开表达了他对匈牙利民族力量的同情，谴责苏联的行动。但批评他的人觉得做得还不够。特别是梅农在纽约声称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的内政，他的话又帮了尼赫鲁的倒忙。可以看出，在埃及达成停火协议以前，他头脑中全神贯注的是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而不是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

“我并不怀疑苏联政府的行为是可悲的，但我们依然不了解全部情况，不知道事件发生的过程和发生的原因。埃及的情况却完全一目了然，对它无可置疑。由于这一原因，加上我们与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有密切联系，我们必须迅速强烈地表达我们的观点。”

他在 11 月 7 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苏伊士和匈牙利的情况同样严重；“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国武装干涉另一国应遭到强烈反对，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必须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政府，不受其他人的干涉。”但在苏伊士问题上他敦促美国采取行动。他说：“埃及发生的事使人担心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它会产生一种今后不易驱散的邪恶气氛。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能消除这种担心，治愈一直折磨人的心灵的深深创伤。”

埃及实现停火后，尼赫鲁仍在等待翔实确切的消息，在匈牙利问题上慎于言行，他丝毫不觉得他用自己的基本原则作了任何妥协。梅农自作主张，在联合国谴责使用武力的决议时投了弃权票，并发言为他的行为辩护，这使尼赫鲁的处境更加尴尬。尼赫鲁在公开场合支持梅农，私下却表达出不快。

很显然，不是梅农的弃权，而是他在辩论中的发言让尼赫鲁不安。梅农全然没有直接批评苏联政府，只是稍加影射，并且马上又提到其它大国在另一些地方的行为来淡化此事，他含糊其词的声明听上去简直像在批评匈牙利的反苏势力，连南斯拉夫和波兰的代表在批评苏联的行为时都比梅农来得有力和直截了当。

梅农向尼赫鲁辩解说，他毫不怀疑印度要求外国从匈牙利撤出军队，支持继续讨论这件事情，但在接到联合国秘书长委托写出的关于匈牙利局势的报告以前，不可能作出任何判断。匈牙利的反革命在积极活动，苏联干涉匈牙利的问题在联合国上正被当成冷战的组成部分加以利用，有人指望用它来恢复西方的团结，为英、法在埃及的失败雪耻，减慢在埃及问题上的进展。联合国会议对匈牙利问题未进行认真的评议，只是一味抨击，要是印度仅悄悄地弃权，会被指责为暗中支持苏联。苏联根据条约有权阻止法西斯主义在匈牙利卷土重来，就其是否合法上暂且不论，据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报告说，不可能马上找出谁来替换匈牙利现任政府，如果苏联突然撤军，将引起无政府状态，也会阻碍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自由运动。但是梅农声称，他在联大并没有辩论一个法律或政治问题，因此那种说他害怕苏联而要去迎合它的指责是错误的。事实上正好相反，也许与他的基本判断相违，他大谈特谈的是那里的暴力事件和印度对此事件的严重关切。“如果做得再多，我们就会将自己摆在十足的机会主义和缺乏诚意的位置，即便我们可能，仅仅是可能，获得某种暂时的欢迎。我感到不能这样做，我想你也不会同意。”

他的冗长辩解不能说服尼赫鲁，为了抵销梅农讲话产生的印度故意偏袒的印象，尼赫鲁决定印度将协助决议的实施，而且一旦受到邀请，愿参加调查和观察小组。巴基斯坦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实施警察行动和选举。梅农于是从他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他对这一决议的其它部分弃权，而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有损匈牙利主权的选举则投了反对票。他告诉尼赫鲁，印度应该帮助解决问题，在表明她关注局势和唾弃武力与外来干涉的同时，不应卷入两大集团之间的诽谤中伤或强权政治。

梅农这下得到尼赫鲁的完全支持。尼赫鲁赞同他的观点：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文，而且可能妨碍苏联军队的撤离，而苏联的撤军目前至关重要。显然，无论尼赫鲁和梅农阐明何种基本原则，但两人都想到某种可能：匈牙利在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会成为讨论克什米尔问题的先例。尼赫鲁评论说：“一个政府应遵循一种总体方针，但其政策却常常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尼赫鲁并未改变他对这一问题的本质看法。在印度、缅甸、锡兰和印尼

4 国总理在德里发表的联合公报上，他们要求苏联军队迅速撤出匈牙利，匈牙利人民有权自行决定他们的未来，对他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任何他们认为合理的民主改革。但是公报不赞同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甚至反对联合国派驻观察员。尼赫鲁指示梅农对后一问题的表决投弃权票。他认为匈牙利不是塞得港。在塞得港，不断接到杀戮行为的报告，派观察员确有必要，因此他建议纳赛尔主动提出来。但对匈牙利问题，他要做的只是叫印度驻苏大使打听匈牙利青年知识分子被押往苏联的消息是否属实。

事实上，尼赫鲁长期以来就对联合国一贯表现出的偏颇不公和办事拖拉深感不满，从而导致他作出比正常情况下更激烈的反应。梅农对这一问题却令人吃惊地采取了更灵活的态度，他建议苏联代表说：只要给观察员时间让他们解决问题，让他们前往匈牙利符合苏联利益。尼赫鲁也开始回到这一立场，不过他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埃及。他相信，如果匈牙利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苏联从那里撤军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小。所以他建议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维持和平，因为任何暴力行为不仅会带来新的不幸，也会延缓苏联的撤军。提倡胆怯本来并不符合他的性格。

但不到几个小时，真实的尼赫鲁出场了，他驱散了过去偏见的阴影，不再面对强权政治踌躇不决，充分让自己的感情迸发出来。尼赫鲁这时已不再怀疑，匈牙利事件尽管有西方插手，却基本上是一场人民的起义，遍及全国，而且得到军队甚至共产党员的支持。他开始毫无保留地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印度议会的演讲中指出：明显的事实在于匈牙利的绝大多数人民需要政治、经济和其它领域的变革，他们试图通过起义来达到目的，但最后遭到无情的镇压；紧接着他们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抵抗示威，这对匈牙利人民表明意愿来说比武装起义更有意义。入侵匈牙利与入侵埃及同时发生，两处的入侵者都企图将世界的视线引向另一入侵处发生的事件上，以便掩盖它们自己的侵略行径。尼赫鲁本人相信，匈牙利人民最后将取得胜利。他也认为苏联的干涉不仅会影响它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声誉，也会影响它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乃至苏联人民中的信誉。

BBC 记者报道说，尼赫鲁现在已如同他对埃及的态度那样，满怀深情地关心匈牙利的命运：“他的讲话意义重大，他不用讲稿或提示，讲演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琢磨，而是直接发自内心。尼赫鲁先生过去从未如此明确地反对俄国帝国主义，支持铁幕后面受压迫的人民。从印度向联合国递交的最新提案来看，他要这样继续做下去。苏联对这种公开的挑衅作何反应，

印度饶有兴趣地拭目以待。”

印度的提案要求匈牙利政府接受联合国观察员，新提案表明尼赫鲁对此事件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大转弯，提案得到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接受，但苏联反对。尼赫鲁语气强烈地分别致信布尔加宁、卡达尔和铁托，敦促接受这一决议，至少应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问匈牙利。他说，如不接受决议可能会引起灾难性后果，甚至引发战争，如拒绝哈马舍尔德访

匈，便会在那些甚至对卡达尔政权友好的人心中引起重大疑问，实际上等于证明有关放逐起义者的报道并非谬传。苏联明显地生气了，觉得印度太不给自己面子，居然知道苏联反对之后还极力坚持提案，苏联驻印大使约见尼赫鲁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此时并非迫在眉睫，苏联政府当世界因苏伊士和匈牙利的危机正处于战争边缘的时候提出克

什米尔问题，显然是想对印度来一点讹诈，提醒印度注意，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一直支持它，顺便暗示苏联可能撤回对印度的支持。但尼赫鲁不会因压力而改变立场，这时他对匈牙利的同情已极为强烈，梅农甚至觉得有必要告诫他不要干预。梅农对他说：“目前我们的最好做法是促成哈马舍尔德访问，并希望我们的大使尽快到达那里，我并不认为公开告诉苏联政府如何做会使事情有所进展。”尼赫鲁回答说，他不会进行干预，但他决不怀疑控制匈牙利的是苏军指挥官而不是卡达尔政府，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苏军分阶段撤离。但看起来没有办法做到这点，尼赫鲁只好同意梅农提出的保持沉默。他颇感无奈地告诉议会：“我们谁也不能控制形势，我们能做的一切是尽力而为，避免任何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不要出于改善形势，对那些我们没有正确把握的事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假如战争来临，我们也无能为力。”

几天以后，纳吉被押往苏联，曾从苏联那里得到保证不那么做的南斯拉夫感到当众受到侮辱，铁托十分恼火，发表演说强烈批评苏联。直到当时，他还一直与尼赫鲁激烈争论苏联的干涉事件，他现在希望尼赫鲁支持他可能被迫采取的任何行动。但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两人再次用克什米尔问题提醒尼赫鲁，说：匈牙利对苏联的意义如同克什米尔对印度的意义。尼赫鲁没有动摇，要梅农“尽可能礼貌但坚决地”表明印度不同意逮捕和放逐纳吉，也不同意匈牙利不接待哈马舍尔德。“我们不能使自己陷入谬误，采取任何有违我们自己信念的行动，但我们应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冒犯，或使本来已糟糕的局势更为严重。”他要求原则上支持美国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提案，梅农不满地诘问：这是否表明因苏联近来的行为和尼赫鲁即将访美，印度对两大国的政策有所改变？尼赫鲁耐心回答道：不应谴责苏联违背联合国宪章，苏联从匈牙利撤军不必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任何让苏联出丑的企图只会证明适得其反；印度绝不希望做引发战争的任何事，但如果对正确的行动一直不表支持，那就等于是反对它，这样就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我们不希望谴责谁，不想使局势变得对我们和其它方更加困难，但当沉默本身已变成面对公开的劣行的纵容默许时，我们就不能再保持沉默。我们总是说我们执行独立的政策，我们根据符合自己的总原则来分析认识各种形势。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政策。我非常关心维护世界和平，我也同样关心我们的行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我们申明的原则。”

尼赫鲁准备做出的最大让步是答应对美国的提案投票弃权，而不是不参与。他也拒绝了卡达尔政府要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与奥地利当局协商，确保匈牙利官方代表团访问在奥地利的难民营的请求。

在以后几年中，尼赫鲁对匈牙利事态发展的指责性态度没有改变。1957年1月8日，美国要求立即召开联合国特别会议，并且提出一项苏联强烈反对的提案。梅农提出保持沉默，并就表决一事征求尼赫鲁的指示。尼赫鲁同意梅农在会上不发言，但要求他在投票表决时弃权。苏联对此作出反应，该月底在安理会表决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时也投弃权票，这对印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苏联代表大概相信已给了尼赫鲁教训，因此几天后他们又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提出另一项对印度有利的提案。卡达尔多次要求印匈之间的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但尼赫鲁明确拒绝了。直到1959年12月他才同意在布

达佩斯设常驻大使。

1957年2月,《纽约时报》记者苏兹贝格在德里见到尼赫鲁,他记下了尼赫鲁对数月前匈牙利危机的评价:“他认为对匈牙利的镇压是可怕的。这事发生在苏伊士争端的时候,太不好了。他认为不然的话,俄国人也许会像对待波兰事件一样只会听之任之。纳吉公开向西方呼吁,走错了一步棋。俄国人确信(当然是错的)是美国煽起了匈牙利暴乱并允许英、法在埃及的冒险行动。”这段话如果记述客观,也表明了尼赫鲁对苏联为何出兵干涉匈牙利的认识。

从以上看来,尼赫鲁1956年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并不像许多人指责的那样对苏联存有偏爱,从他的一贯风格看,他也不会感到愧疚。面对苏联出兵匈牙利,他只不过是反应稍慢了些,他太过分关注埃及的形势,以至于当匈牙利危机开始时无法采取及时的措施。就事件的性质来说,他一时也难于得到有关事件的不含偏见的报道。一旦他弄清了匈牙利正在发展的事态,他就顶住苏联暗中的压力,毫不退缩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反复申明,排开各种外国的煽动和内部的反革命活动不论,匈牙利事件基本上是一次民族主义的起义,但它遭到残酷的镇压。只要仍有数千辆坦克驻扎在它的首都附近,那个国家就不可能称自己是自由的。尼赫鲁的政策便是根据这一判断来制定的。但他认为,假如不在正式决议中对苏联加以全面谴责,本更容易恢复匈牙利的正常状况,而他不应、不必也不会拿基本原则作交易。他在这场世界性危机期间选择了一条与自己的“不结盟”宗旨相符、反对强权干涉别国自由的路。

到1956年底,发生在埃及苏伊士和匈牙利的危机高潮已经过去,两次事件使西方殖民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两边都受到削弱。世界局势仍然不安定,人们仿佛又回到了冷战的紧张时期。尼赫鲁忧心忡忡地写道:“我不喜欢世界今天这个样子。我提不出任何特定的事,但它的整体状况和许多小事使我的心中感到严重忧虑。”潜移默化的痼疾、集体安全观念的慢慢解体仿佛正逐渐将人类引向最后的毁灭。科学的进步加深了裁军的必要,而人类的不安却又在推动军备竞争。

印度在这一种气氛中迎来佛陀诞辰2500周年庆典真可谓是一大讽刺。他给梅农写信:“我们在战争和平之间,在原子弹和佛陀之间彷徨。我略感慰藉的是想起了《薄伽梵歌》中的格言:我们应毕尽所能担负起职责,努力坚持正道,对于结果却不要过分担心。”

在外交政策上,尼赫鲁看重的是不受其他人的摆布,不凭感情的一时迸发,而是凭自己的理性光辉来找出一条道路,发展一种他所称的世界性思维,换句话说就是用世界性的眼光看待国际问题。假如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被冷战、世界划分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观念所左右,这样做应该是可能的。在他看来,决不能设想一个人只能与同他观点一致的人交朋友。只要不忘记民族利益,就应寻求与一切国家交朋友。友谊并非只能一对一。

他的这种努力看来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只有巴基斯坦是一例外。与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上的分歧并没有一直损害印苏间的友好关系,为了防止战争,尼赫鲁向布尔加宁建议:苏联应主动停止核试验,这一决定必将产生显著的效果,并迫使其它国家同样仿效。与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已引起尼赫鲁的注意,但它还不到危险的程度。

1956年11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再次访问印度,受到热烈隆重的欢

迎。中国在匈牙利问题上完全支持苏联的立场。周恩来向尼赫鲁指出：纳吉一旦要求西方国家帮助，苏联政府除了干涉以外别无选择。尼赫鲁却反复证明，纳吉无论犯有什么错误，苏联对匈牙利的占领都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它在亚欧许多国家产生出对苏联的强烈反感。“强制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只会削弱后者。但是周恩来坚持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两位总理在此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同意保留分歧。

尼赫鲁决定在接待周恩来后于年底出访华盛顿。他急于促成中美关系的改善。在过去的两年期间，中国已释放了 34 名美国战俘，但是中国拒绝释放仍在押的 10 名美国人，理由是美国没有作出相应的姿态，并且拘押的美国人中除两名外其余都是间谍在押的美国人不多，不至于招惹美国的舆论界，但却阻碍两国关系的解冻。在梅农的催促下，尼赫鲁极力劝说周恩来在他访问华盛顿之前释放美国人。但周恩来坚持说：美国人同意至少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外长会议进行交换，并必须加快送返中国留美学者。杜勒斯迅速作出反应：任何希望离开美国的人都可自由行动。艾森豪威尔却说，美国对中国继续关押美国战俘情绪强烈，致使他在对华关系上无法再向前迈进一步，除非释放这些战俘。虽然美国舆论界早已忘记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损失，但仍对朝鲜战争中的失利耿耿于怀。如果释放了战俘，就可允许美国人前往中国，他们的报道或许就可以改变美国的观点，有助于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周恩来对此回答说：美国人不能忘掉朝鲜战争，因为他们与胜利无缘，但是中国人民也对此情绪强烈，他们不能接受美国要中国彻底让步的要求，并且也看不出美国的立场中有相互交往的意思，因此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可能还要像过去那样长期存在下去。

不过，尽管尼赫鲁发现周恩来在重大问题上从不让步，但中国却看重“千百万人民的友谊”。在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几个月后，中印两国的关系仍然保持稳定。尼赫鲁的政策是明确的，他毫不怀疑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一次曾这样说过：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甚至超过了印度人作为印度人。在他看来，中国人是他们自己政策的主人，与其说中国人是苏联的仆从，不如说是苏联的潜在对手。他们勤劳工作希望建成一个主要工业大国；中国国土辽阔，人口正迅速增长，即使一次核攻击也不能摧毁他们有组织的生活。因此其它大国，要么千方百计想遏制甚至摧毁中国，这将证明是灾难性的和不现实的做法，要么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从而鼓励中国已出现的某些趋势，向更自由化和更进步的政策迈进。他对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并未失去信心。尼赫鲁也意识到，中印关系在某些特定问题上的矛盾正在加深。但他仍决心致力与中国携手共进，不愿意把中国看成潜在的敌人。他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或许也是唯一可行的。在公开场合，他反复地表示他信任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虽然印度和中国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们之间的合作却能够得到增进。他也一如既往地强调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重要性。

尼赫鲁 1957 年夏天访问欧洲时宣布，他相信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能继续保持下去。尽管两国奉行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但没有理由相互干涉；尽管印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这并不是发展友谊的障碍。它们会在经济上相互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只不过是采用的途径不同。尼赫鲁又补充说：他认为，印度的民主方式更为合理：双方能够通过共同磋商

来解决相互间存在的一些小问题，中印之间尽管存在边界争议，但不会在根本上影响两国关系。

尼赫鲁基于这些对中国、苏联的认识，向印度议会保证说不存在“丝毫的可能”印度会与苏联或中国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

尼赫鲁 1956 年 12 月再度访问美国，这次远比 1949 年那一次更富有成果。印美两国在苏伊士危机期间紧密合作，为两国在其它事务上密切关系铺平了道路。“在我看来很清楚，我们应加强与美国的直接关系，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应再由英国或通过英国的帮助来决定。”显然，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公众都极为重视尼赫鲁的访美。加拿大总理圣一劳伦特告诉艾森豪威尔，这大概将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位政治家的会晤，他们两人的影响遍及整个世界。

同年 12 月，尼赫鲁在他的女儿甘地夫人、印外交事务秘书皮莱的陪同下从新德里飞往美国。尼赫鲁这次访美得到了与上次大不相同的接待。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一大帮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他，美国政府给予了他国家元首的礼遇，让他有生以来首次享受 21 响礼炮的致敬，尼赫鲁对此安排显得局促不安。随后又在白宫受到艾森豪威尔的热情欢迎。不过尼赫鲁本人对这次访问并未寄予太大期望，对美国舆论界将他与艾森豪威尔的预期会谈吹嘘成世界性事件感到疑虑重重：“我无法理解，我们怎么可能在两天内就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呢？”第二天，尼赫鲁和艾森豪威尔两人驱车前往后者在葛底斯堡的农场，在那里他们进行了持续 14 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两人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但他们成功地创造出一种理解的气氛。艾森豪威尔一方面虽然承认英法对埃及的最后通牒和进攻是错误的，同时也说纳赛尔的某些行为和言论要不得。尼赫鲁建议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应逐步推进，艾森豪威尔没有就此与尼赫鲁发生争论。首先应使运河疏通通航，然后着手签署运河管理的长期协议，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磋商解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纠纷。对匈牙利问题，尼赫鲁认为苏联的行为受到不安全感的刺激，因为他们相信英法人侵会得到美国的赞同。苏联和东欧的自由化运动应该鼓励，这至少可以减轻眼前的担忧，从而为和平解决现存的问题敞开大门。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承认了尼赫鲁辛辛苦苦争取周恩来让步的努力，尽管它徒劳无获，也欣赏尼赫鲁对美国立场的同情。尼赫鲁详尽讲起印度在克什米尔的处境，抱怨巴基斯坦正利用美国的武器来设法压服印度。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在克什米尔采取任何破坏现状并引起进一步困难的步骤都是不明智的。这一说法与印度的态度一致。艾森豪威尔也承认印度在果阿的权利。他注意到葡萄牙当局在这件事上非常难办，并且美国政府也忙于重大问题腾不出手来，但他还是答应帮助使果阿的印度战俘获释。他果然说话算数，几周后，那些战俘获释。最后当讨论到政治以外的问题时，艾森豪威尔热心地答应支持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很显然，除开具体问题，这次会谈开创了印美两国政府间关系的新阶段，尼赫鲁和艾森豪威尔两人都相互赞赏对方的立场。甚至当离开华盛顿之前，尼赫鲁宣布他现在承认美国的政策是灵活的，能适应不同的情况。基本态度取向在他看来是赞赏世界正在出现的变化，并努力适应变化的环境。美国国务院对此大为高兴，在美国的官方圈子里，人们很少相信尼赫鲁是一个隐性的共产党人，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美国的顽固派舆论甚至担心他能削弱美国的对华政策。英国《卫报》讥讽地评论说：“在当今的美国神话中，印度

人已取代英国人成为狐假虎威的专家。”

结束访问前，尼赫鲁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这次会议由各家新闻网络作电视现场直播，转播覆盖面甚至超过通常为总统谈话的安排。他留给其听众的全面印象是“温和，坦率，谦虚，泰然自若”。一位与会者认为他成功展示的外交辩论的艺术征服了华盛顿。

几天以后尼赫鲁又应邀到联合国大会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演说，会场上坐满世界各国的三 3000 多名代表，他在演讲中

谴责军事结盟，指出：埃及和匈牙利的事态发展表明，世界舆论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因素。他并夸奖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积极姿态。访问整个给人的感觉是印美两国关系吉星高照。访问后出现的迅速进展证实了相互理解的增进。美国在苏伊士事件后担心苏联的影响会填补英法势力从中东扫除后的真空，但尼赫鲁告诫艾森豪威尔，美国向封建政权和不受欢迎的政权提供援助只能适得其反。艾森豪威尔同意可以这么说。然而美国在尼赫鲁访美后不久即宣布“艾森豪威尔主义”。尼赫鲁感到难堪，他相信这一决定是对形势的误导。不过他并不愿刚结束他的会谈就批评艾森豪威尔，只是有一次含蓄地表示对使用军事手段、挥舞刀剑去左右世界的遗憾。艾森豪威尔写信对他解释说：正由于尼赫鲁观点的影响，他顶住了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压力，但美国必须支持那些在遭到进攻时寻求美国帮助的友好国家。艾申辩说，态度鲜明有助于减少侵略的威胁。尼赫鲁答道：尽管苏联在东欧插手很深，但看不出它入侵西亚的危险。西亚最强大的势力是民族主义。如将中东视为需要外部势力填补的真空是极其危险和不符合实际的。如果当地人民不自己起来争取独立，这一地区就会再次变成强权大国对抗的舞台。

尼赫鲁访美之后又访问了加拿大，然后飞往欧洲。在伦敦郊外艾登的乡间别墅，他与这位为苏伊士冒险弄得郁郁不乐的英国首相共进早餐，尼赫鲁不乏好言相慰。

逗留英伦期间，圣诞节来临了，最令尼赫鲁高兴的是他又

见到了他的老朋友蒙巴顿夫妇。他们在位于布诺兰斯的蒙氏庄园中共度圣诞。这些年来，他始终与这对夫妇保持着特殊的友谊，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蒙巴顿夫人，尼赫鲁更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情愫。尼赫鲁是一个情感细腻而又十分敏感的人，置身于国务活动并不能使他感到完全满足。他时常感到孤独，这些时候他想念最多的人是蒙巴顿夫人埃迪薇娜。她的笑语和开玩笑时的神情不时生动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尼赫鲁老爱讲她与她的丈夫蒙巴顿公爵访问俄国沙皇的故事。蒙巴顿是英国皇族成员，而欧洲的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存在密切的家族联系，因而他经常受邀参加众多王室聚会。一次沙皇邀请他的英国外甥们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盛大庆典，给访问团中的男人每人配了一匹白色战马，便于游行时使用。可组织者发现差一匹马，便赶紧从马戏团找来一匹。当沙皇正向游行队列挥手致意时，看见一位英国王子行到观礼台前时突然止步不前了，落到队列的后面。原来事先没人提醒他，这匹马戏团的马经过特殊训练，听到国歌就会抬起右蹄，原地不动！尼赫鲁也记得他在德里举行的最后一次官方宴会，当时他已是印度总理，要在宴会上正式致感谢词。在感谢了她的丈夫之后，他回转过头来微笑地看着

她，当时仿佛其他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从他的眼中消失了。他动情地说：“是神灵还是某位天仙，给了你美貌、睿智、优雅、风韵和生动，你拥有这一切天资，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但你身上更具光辉的是你崇高的人性，是你对人类的热爱，你热心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服务。这种绝妙的性格组合，产生出熠熠生辉的吸引力。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给那里的人带来快慰、希望和勇气，难怪印度人民热爱你，把你看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为你的离去而感到伤心。成千上万的人当知道你要走的消息时都显得悲伤。”

印度的民众大概不全热爱埃迪薇娜，至少不会如他们的领袖那样爱她，尼赫鲁对她离去的伤心必定超过了任何其他。他俩仍然定期见面，只要条件允许就会约会。1956年前尼每年访英一次，每次都去位于布诺兰斯的蒙巴顿庄园住上些时候，并常常拜访埃迪薇娜在伦敦的寓所。一位她当时的邻居回忆说：“他的脚步声很轻，幸福之情漾于面容，每次绝没有两样。他们在恋爱。哦，是这样，他们绝对是在恋爱。”

尼赫鲁不能去英国时，埃迪薇娜便来德里，她通常是在冬天来看望尼赫鲁一家，度过印度国庆，往往再多呆大半个月才返回英国。一次她来拜访，正遇一位著名雕塑师为尼赫鲁塑一座胸像。埃迪薇娜一直坐在那里观赏。当尼赫鲁有公务离开后，这是他通常的情形，她转过头问雕塑师：“你不认为他是你塑造过的最了不起的形象和最美的男人吗？”那位雕塑师不喜欢在工作时回答别人的提问和摆谈，因而没有作出热情的反应。

还有一件有趣的往事。据美国外交官的夫人回忆说，元月下旬的某个晚上。在新德里一家通风良好的大剧场内，她坐在尼赫鲁、埃迪薇娜和英迪拉的后座。当时大家正在看一位著名的美国舞蹈家的演出，但美国现代舞显然不合尼赫鲁口味，他在前排座位上显出烦躁不安，分坐他左右的埃迪薇娜和英迪拉却像抚哄小孩那样安慰他，扶起他向旁倒沉的脑袋。演出结束后，他俩几乎是将尼赫鲁从座位里推出去接过演出组织者递来的一束玫瑰花。据安排他需要上舞台将花献给演出者，他无可奈何地照办了，而埃迪薇娜和英迪拉却不由得暗暗在观众席上吃吃发笑，欣赏这出喜剧。

1960年2月埃迪薇娜死了，尼赫鲁极为悲痛。他的密友记得，这种悲痛甚至一直伴随他直到他自己去世。他与任何人一样，需要在知识和情感上满足自己，但再也没有其他人能给

他带来这种满足。他的政治生涯，他在亚、非和世界其它地区享有的崇高声望令他满足，但这都不能取代埃迪薇娜，他也决不会让它们取代她。

在1956年底一家世界著名杂志举办的选评中，尼赫鲁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提示读者：“无论效果如何，他都能随心所欲地领导印度；无论效果如何，只要他活着，世界舞台就能听到他的声音。”《纽约时报》写道：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也许是唯一一位用慈爱而不是用威严来统治的人。当然，这些承认或奉承主要归功于他稳健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他向世界清楚表明，印度积极参与世界事务不仅因为它有切身的利益，而且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尼赫鲁凭借外交原则与技巧的结合，使印度在苏伊士危机和匈牙利危机期间有引人注目的出色表现。

当然不喜欢尼赫鲁的大有人在。杜勒斯反感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他们

两人的观点总是发生冲突。他俩都是固执己见的

牛士，但相比之下尼赫鲁的努力更有成效，这对世界是幸运的。

但他的努力并非总是成功。例如，他未能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达成协议，他无法让世界相信印度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公正。一种经常性的批评是，印度用和平主义和以善待人的面貌对待世界，对其邻邦的态度却是另一码事。甚至印度的不结盟看起来也并不是严格的等距离外交，“与一切人友好”的信条有时更像是“与一些人友好”。当印苏关系日趋转热时，这一倾向更为明显了。某些观点认为，“如果印度要使中立对世界有所裨益，就必须防止那种过分中立的倾向，它应该更多地从与它基本观点相同者那里找岔子，而不是老去非难那些它不了解或不想了解的人。”当然，这些批评也并非全对。在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上，在一意孤行诉诸战争的问题上，尼赫鲁的确认为西方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受到谴责。虽然他经常用“极权主义”来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但也在众多的讲话中流露出对这些国家的感激和友情。

十九、联合国使命

随着世界非殖民化运动的加速，尼赫鲁的反帝反殖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又面临一次引人触目的重大考验。

1960年的夏天，随着比属刚果在6月30日获得独立，世界的紧张扩展到了新的地区。刚果地域广阔，大小相当于西欧，矿产资源丰富，人口却不足1300万。它从独立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得积弱不振。比利时殖民者多年来未做过任何促进刚果进步的好事，现在他们却想让独立形同虚设。他们大多数住在南方富饶的加丹加省，该省经济是刚果的物产、税收和外贸的命脉，但完全控制在外国公司之手。7月11日，比利时鼓动本地一位富有的商人莫瓦泽·冲伯宣布加丹加省“独立”，实质上是使这一地区恢复成比利时“殖民地”。同时比利时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派军队进入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美其名曰保护比利时侨民。不到半月，比利时便使刚果的独立化为泡影。刚果独立运动领袖，政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坚决抵抗，请求美国、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呼吁联合国协助维持秩序。

卢蒙巴不是单独求助一方，而是同时向美、苏和联合国三方发出呼吁，在尼赫鲁看来他显然不希望刚果涉嫌冷战。美国当时不可能对比利时采取行动，苏联对卢蒙巴的呼吁也未立即作出反应。哈马舍尔德却迅速促成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派联合国部队开赴刚果进行干预，要求比利时军队撤退。尼赫鲁欢迎这一决定，讲话赞扬哈马舍尔德的眼光和明智。尼赫鲁认为，刚果虽然已获得独立，但要完全处理好自己的事务还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他希望联合国能为刚果的局势找到平衡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外部势力利用危机满足霸权野心。出于支持，他应邀派出一支非战斗部队，负责发放物资，执行通讯任务和建立一所医院。

哈马舍尔德尽力想控制刚果的局势，但他发现美、苏等大国正将刚果事件引入世界冷战的范围。起初，艾森豪威尔打算与卢蒙巴站在一边，在后者访问华盛顿时表现得非常友好，而当刚果被扯入大国对抗的背景后，美国出于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便开始支持冲伯在加丹加的分离主义行动。美国料定卢蒙巴会鼓励苏联在刚果扩大影响，正如一位记者所言：“冲伯事实上是亲西方的，而卢蒙巴却不是，假如少年气盛的卢蒙巴控制了全刚果，非洲中部就将变成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美国转而支持冲伯，苏联却敦促哈马舍尔德动用联合国部队恢复刚果中央政权对加丹加省的控制，哈氏往加丹加省派驻了联合国官员，确保比利时人撤离，但不干涉加丹加省的分离问题，因为他觉得那属于刚果的内政。他的做法得罪了卢蒙巴，刚果问题这下因卢蒙巴与哈马舍尔德之间的互不相容进一步复杂化了。在哈马舍尔德眼里，卢蒙巴是一位爱国者，但善于诡辩，反复无常，谈起话来口若悬河，不切实际，哈马舍尔德私下称他是“颠倒过来的种族主义者”。

哈氏指定一位印度高级外交官达雅尔作他处理刚果问题的特别代表。达雅尔1960年9月抵达利奥波德维尔，径直步入危机之中。卢蒙巴直到此时一直谋求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总统卡萨武布却按美国的旨意行事。卡萨武布相信自己的行为与哈马舍尔德不谋而合，宣布解除卢蒙巴的总理职务。但卢蒙巴也不示弱，反指控总统犯有重大叛国罪。当时正在刚果的联合国官员柯蒂尔在达雅尔到达之前就命令关闭机场，这一招显然是想阻止卢蒙巴计划用飞机调动军队进入首都驱逐卡萨武布。大多数非洲国家和苏联都批评柯蒂尔

的偏心，这也使它们陷入必须在哈氏与卢蒙巴之间作选择的为难处境。尼赫鲁却愿相信联合国是无辜的，关闭机场只是出于限制外国的军事行动。

柯蒂尔接着关闭了广播电台，这一手甚至比关闭机场更明显地表现出对卢蒙巴的敌意，因为卡萨武布能充分利用刚果河对岸布拉柴维尔的电台。哈马舍尔德怀疑柯蒂尔这些行动的必要性，但他没有公开批评，这无疑削弱了联合国在刚果的地位。

卢蒙巴与卡萨武布都不能压服对方，于是刚果陆军参谋长蒙博托上校介入进来，发动政变，接管了政权，而左右局势的却是外部势力。尼赫鲁质问哈马舍尔德：联合国部队怎能允许宪法政府轻而易举遭到颠覆呢？达雅尔也指出蒙博托的政权不具备宪法依据。哈马舍尔德的特别代表与军事顾问都是印度人，这一情况无疑增添了尼赫鲁对联合国的信任和支持，也使他比其它亚非国家及不结盟国家更少批评哈马舍尔德的偏心。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提议直接向卢蒙巴提供军事援助，尼赫鲁没有作出响应。尼赫鲁指示印度驻联合国使团不要在重大问题上表态，凡事等到第十五届联大会议时再说。他又说，印度应尽量避免与大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对立，但如情况紧急，印度将投票反对向卢蒙巴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提案。

9月20日，第十五届联大开幕，尼赫鲁与许多国家首脑出席会议。他一到纽约便宣布，他对哈马舍尔德深表钦佩和赞赏，支持安理会有关刚果的决定。这为他的态度定了基调。在当时遍布冷战危机的世界，刚果问题只是大会的议题之一。两大阵营的冲突，霸权主义相互威胁，地区不稳定，空气中处处充满着对立和怀疑，几乎能感到刀光剑影。尽管世界渴望和平，人们普遍意识到核武器的威胁，但战争仿佛随时都会出现。这一气氛令尼赫鲁心情忧郁。但他鼓励自己站稳立场，帮助从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找到出路。他不久再次表示，不结盟不是一种骑墙中庸的伎俩，而是根除对立情绪的努力。在刚果问题上，联合国总的来说干得不错，如促成刚果召开议会，制止冲伯集团的分裂，减弱已重返加丹加的比利时人的影响。但尼赫鲁显然希望把这一摊子留给哈马舍尔德，避免印度进一步卷入刚果冲突。

哈氏想做到不偏不倚，达雅尔也已到了利奥波德维尔，但尼赫鲁开始认为，由于柯蒂尔继续担任哈氏的首席顾问，他的整个背景和想法与西方如出一辙，联合国的影响被削弱了。这并不是哈氏故意偏袒一方，只是他无能为力。尼赫鲁指出：“我们只能做到刻意努力地不偏不倚，但我们的想法应体现在行动上，我们可能是正直之士，但我们对某一问题的态度不能背离我们的思想。”他的含蓄批评并不全错。况且，作为联合国首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大败着是他未能与苏联处好关系。哈氏感激尼赫鲁拒绝在亚非国家中领头附和赫鲁晓夫对他的攻击，但对尼赫鲁支持卢蒙巴感到遗憾。他很清楚，尼赫鲁忠于联合国，明确表态支持每一项对刚果人民有利的政策，在此事上毫无任何私利可循，这些事实正赋予他一种关键的影响力。尼赫鲁后来谦逊地把自己说成是联合国上“一位谦卑的朝觐者，在强壮的重甲骑兵队列之中蹒跚步行。”事实则并非如此。哈马舍尔德感慨地对达雅尔说：“在危难之际，亚非阵线顶了上来，尼赫鲁的作用现在将是决定性的，如果他一动摇，国际亚非阵线就可能崩溃，这将对联合国和我个人的态度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大概是为了挽留尼赫鲁的支持，无疑也是受达雅尔影响，并且比利时顾问又纷纷回到刚果政府中，哈马舍尔德这时决定迫使冲伯束手就范，尽量限制或消除比利时的影响。现在轮到美国和比利时为首的西方出面阻挠联合国

的努力了。蒙博托在刚果的地位得到巩固，卡萨武布被送往纽约，坐进联合国大厅，印度和其它国家的极力阻止不起作用。卢蒙巴则被“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加以软禁。可尼赫鲁没有采取极端立场抵制这些错误。他拒绝了赫鲁晓夫向他提出在联合国部队之外另建一支非洲军队的建议。此外，他留意不要无原则地支持恩克鲁玛，他认为后者在支持卢蒙巴的问题上缺乏自知之明。非洲各国对刚果的政策莫衷一是也使尼赫鲁加倍小心。

本届联大期间，赫鲁晓夫坚持主张改组联合国机构，撤消哈马舍尔德的秘书长职务，由东、西、中立三方代表组成“三人团”取代秘书处。由于尼赫鲁在联大会议召开之初对联合国在刚果的偏颇政策颇有微词，加深了他与赫鲁晓夫在改组联合国机构的问题上的同感。不过与苏联不同，他不直接抨击秘书长本人，而是怀疑联合国的大多数高级官员公开偏向西方，哈氏肩负各种其他职责也暴露了联合国秘书处的机能不全。他赞同苏联的提法：联合国的机制应充分反映亚非成员国的迅速崛起的现实。因而他私下表示可考虑成立赫鲁晓夫建议的东、西、中立三方组成的“三人团”，但不削弱秘书长的权限，认为这将表明秘书长可以经常听取世界各方的意见。

哈马舍尔德原想主要依靠亚非国家、特别是印度来抵制赫鲁晓夫，他这时看上去无法掩饰对尼赫鲁的失望。在埃及和某些西方国家的劝阻下，尼赫鲁没有正式提出建立顾问团的建议。其实尼赫鲁也很顾全大局，不希望这一问题的争论将联合国推到分裂的地步。较量的各方都在搪塞尼赫鲁，赫鲁晓夫举止粗鲁，言辞好斗，对哈马舍尔德加以人身攻击，结果断送了有利形势；西方国家在辩论中表现得更有风度，实际上却更加顽固。目睹此景的尼赫鲁写道：“在这个恐慌的时代，各国都想通过展示自己强健的肌肉、宽阔的下颚和紧绷的上唇来保护自己。这种集中展示力量的做法难道不是内心深处虚弱和疑神疑鬼的反应吗？”

联大会上最令人不安的冷战现象是裁军谈判的冻结。尼赫鲁赞成分阶段裁军，印度与加纳、印尼、南斯拉夫等国提出一项议案，建议苏美双方重订协议。尼赫鲁说，这样做至少可表达出一种愿望，尽可能使国与国之间的坚冰稍稍消融，也便于将来某个适当的时候举行实质性谈判。但西方提出修正案并强制进行表决，实际使不结盟国家的意图化为乌有。尼赫鲁不满地撤回原先的提案。西方国家代表下来表示，他们提出修正案的目的是“打掉尼赫鲁的神气”。在尼赫鲁看来，赫鲁晓夫尽管有毛病，但至少懂得如何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而美国却犯了严重错误，它藐视不结盟运动，顽固以为与美国友好的国家非得加入冷战。

由此看来，世界危机的严重程度完全没有减小，反而随时都可能走向恶化。由于刚果局势的紧迫性和苏联改组联合国机构的提议，十五届联大未能认真考虑裁军问题。赫鲁晓夫在纽约与尼赫鲁的单独谈话中，极力主张次年初召开联大特别会议专门讨论裁军的问题，地点最好在日内瓦。尼赫鲁赞同他的想法，可是觉得裁军会议比联大会议更有效，因为后者也还得讨论其它问题。赫鲁晓夫坚持联大会议具有更高权威性，能吸引更广泛的注意力和兴趣。

正当本届联大会议结束之时，刚果的局势再次升温，卡萨武布政权受到了基赞加的挑战。基赞加忠于卢蒙巴，宣布在卢蒙巴被绑架期间代行总理职务，同时将首都迁往斯坦列维尔城。加丹加省等地已宣布独立，卢蒙巴不久逃出联合国的“保护性”软禁，几天后却被卡萨武布的军队捕获，局势进一

步趋于紧张，西方国家竭力阻挠联合国在促成刚果议会开会和减少外部势力干涉等问题上的努力。蒙博托的话转述了西方的基本态度：“这些操纵联合国的印度人在此做的每件事不过是想让卢蒙巴重新掌权，将刚果变成一个苏维埃国家。”南斯拉夫和一些亚非国家指责联合国存有偏心，办事不力，纷纷打算撤走联合国部队中的本国人员和应联合国之邀派往刚果的其他人员。

尼赫鲁也想到退出刚果，反印度的口号和印度派驻人员在刚果的尴尬处境激起了印度的强烈不满。但他很快改变主意，决定暂不从驻刚果的“联合国军”中撤出印度军事人员，也反对其他国家要求联合国撤军的主张。他希望这将有助于联合国摆脱孤立无助的处境。铁托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刚果维和人员不应接受联合国的制约，而应向本国报告情况，尼赫鲁却认为这既不高明也不实际，它将意味着“联合国军”的瓦解，从而为外国军队介入刚果各派冲突制造机会。他也不同意支援卢蒙巴，认为那样可能导致与联合国关系破裂，削弱致力刚果独立的政治力量，为外部干涉势力制造真空。要想刚果不走向分裂，除加强联合国指挥和权威外别无选择。联合国的责任是抛弃以前的歧视性态度，确保各方释放战俘，敦促召开刚果议会。尼赫鲁也召见美国驻印大使，申明印度决不会参与重建改头换面的比利时殖民帝国，而西方国家如奉行这一政策只会使世界目睹一次极大的灾难。他希望表明，如果联合国的努力不作改进，西方国家继续一意孤行，他就只得修改印度的政策，停止向刚果派驻印方人员。

刚果危机已到失控边缘。为了给哈马舍尔德机会调整他的政策，尼赫鲁没有出席摩洛哥国王召集、许多亚非国家参加的讨论刚果局势的会议。会议声明，如果蒙博托的军队不解除武装，外国顾问不迅速撤离，刚果国会不尽快开会，这些国家就自行采取行动。这不啻是对联合国的最后通牒。尼赫鲁没赶去凑热闹，而是建议哈氏寻求在东西两大集团间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只要能劝说西方撤出全部比利时人员，促使卡萨武布召开国会，下令蒙博托的部队缴械，苏联和非洲国家就会答应将刚果排除在冷战格局以外，从而就可使联合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哈氏未同意卡萨武布的要求撤换达雅尔，但他未能控制蒙博托并保证释放卢蒙巴等政治犯，这大大毁损了联合国的威信。普遍认为联合国是各国压力的牺牲品，正因为如此，如果非洲军队脱离联合国的指挥，印度也不可能接替他们。尼赫鲁致电求助英首相麦克米伦，也希望新上台的肯尼迪政府重订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在肯尼迪当政后的确有了变化，比艾森豪威尔时期更接近印度的立场，但麦克米伦的答复并未表明英国的政策有何变化。就在这时，尼赫鲁接到卢蒙巴遇害的消息，他向哈氏表达了印度的关切，希望尽一切可能查明真相。

未能拯救卢蒙巴的生命再次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也给哈马舍尔德的个人声誉蒙上一层永久的阴影。尼赫鲁在德里对记者们说：“发生的是谋杀，很可能是身居高位的人干的。”他对这一“十恶不赦的国际性犯罪”极为愤慨，警告哈马舍尔德说：如果联合国不回击这种挑衅，采取强硬果断的措施惩治犯罪，印度将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他也请求肯尼迪政府站出来反击那些企图削弱联合国在刚果的作用的国家，确保比利时殖民者及其他外国势力撤出。

由于苏联正在集中攻击哈马舍尔德，大国之间不可能提出一项协调一致的政策，于是尼赫鲁只得寄希望亚非国家团结一致，共同采取一种美苏难以

反对的立场。他反对任何单方面行动，如苏联主张的撤消对哈马舍尔德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承认。埃及和几内亚提出的承认基赞加政权，或塞古·杜尔建议的从“联合国军”中撤出非洲部队，他认为这些做法只会为大国冲突打开大门。他宁愿继续依赖联合国平息刚果内战，控制反叛各派，确保撤出除联合国管辖以外的全部外国武装人员。他甚至暗示，只要安理会愿这样做，印度就愿意派出战斗部队帮助，一旦实现上述目标，就可考虑重新召开国会，成立新政府。他指出：必须果断地处理刚果危机，因为它正在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给整个非洲大陆投下深重的阴影，使人们觉得老殖民主义的虚墟上又建起新的帝国，从而对联合国的前途产生根本的怀疑。尼赫鲁认为，卢蒙巴遇害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死去的他比活着的他更重要，他将作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而联合国现在却成了刚果的唯一希望。

安理会 1961 年 2 月的决议满足了尼赫鲁的要求。事实上，安理会成员国中的亚非国家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征求了他的意见。决议要求比利时和某些特殊类别的外国人员撤离刚果；授权联合国秘书长采取积极措施，使刚果领导人能实施政治方案恢复国内的秩序。赫鲁晓夫请求尼赫鲁支持苏联对刚果问题的态度，即承认基赞加的政权为卢蒙巴政权的合法继承者，要求联合国军队撤出刚果，由非洲有关国家自行解决问题。但尼赫鲁没有同意，他也要求赫鲁晓夫不要将刚果问题与改组联合国和秘书长的职务等问题扯在一起。假如赫鲁晓夫同意，就可能劝说肯尼迪清除比利时在刚果的影响，甚至使刚果免除联合国授权以外的一切外来干涉。一旦成功，刚果就能再演 1956 年苏伊士的奇迹，由不结盟国家来促成美苏两国协调一致。苏联推迟承认基赞加政府能够增强肯尼迪对局势的把握，此时此刻需要的是世界性的政治眼光和大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各支持一方。

在刚果国内，卡萨武布及其支持者顽固地抵制联合国决议，尤其是指责印度，大骂尼赫鲁和达雅尔，并造谣说卢蒙巴与尼赫鲁达成秘密协议，答应接收 200 万印度移民以换取印度的政治支持。尼赫鲁继续赞同联合国的行动，拒绝恩克鲁玛提

议的组建一支由印度军官指挥的非洲部队。与此同时，哈氏从尼赫鲁在印度议会的讲话中得到鼓励，请求印度派出一支 4700 人的部队。尼赫鲁知道，联合国的行动在刚果成功与否

的重要性现在已超出刚果本身的意义，他马上表示同意。但他提出，如果全数派出这一部队，最好是能单独行动的一旅，印度军队不应分散行动，更不能用来镇压人民运动或支持与联合国作对的任何党派。尼赫鲁在许多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的行动，同时又相信他代表着一个国际性组织，希望他随着新增兵力的到达能更有效地使用联合国部队。这时，苏联正指责哈氏是犯罪的组织者，非洲国家试图排开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再加上刚果本身乱糟糟的局势以及印度内阁部分成员反对支持哈马舍尔德，这都需要尼赫鲁有相当大的勇气做出这一决定，也表明了他此时对联合国的充分信任。对刚果来说，除依靠联合国以外就只能选择各大势力支持下的内战；对世界来说，联合国既已决心在刚果扮演积极角色，那通过正当方式获得成功就至关重要，印度不应该逃避积极的参与。在此关键时刻，哈马舍尔德为一支印度部队赶赴刚果而大受鼓舞，他满怀感激，称这是一次

信守诺言的伟大之举，将作为一次了不起的决定性事件而载入联合国史册。

印度的先遣部队由美国军用飞机运抵刚果，时为 1961 年 3 月中旬，受到的迎接并不友好，卡萨武布的政府扬言要“血

肉横飞”，冲伯还挑衅地说印度的行动无异于宣战。尼赫鲁觉得英美大使仿佛在鼓励这类恶意中伤，他甚至认为他们的行为像是得到他们本国政府的旨意。无论英美政府对安理会决议嘴

上如何支持，暗地里他们却命令拼命抵制。尼赫鲁坚决主张安理会和西方国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执行两种相互矛盾的政策，两面派手法不仅会使联合国行动在刚果受挫，也会大大削弱联合国机构。因此，局势的关键仍是让比利时人撤离，让刚果自愿在联合国的帮助下解决自己的内部争端。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一一直举棋不定或乱来一气，或继续言行不一，那印度只得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

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又使尼赫鲁想起它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过去，他对此深感失望，对英联邦的看法也在经受考验。1960 年他还满意地说：“从印度角度看，作为一个英联邦国家是值得的，一是尽管存在问题，但相互友好相待；二是共同的民主组织形式；三是不带种族歧视。”刚果事态表明第一点已站不住脚，第二点已被巴基斯坦的军人统治削弱，第三点则因英联邦容忍南非的种族歧视而不复存在。他极为看重后一个问题，认为它“完全可能动摇英联邦的根基”。因此他坚持主张，尽管英联邦有不讨论各国内政事务的惯例，但不能不管南非的种族主义问题。尼赫鲁谈论这一问题时显得礼貌而温和，但人人都注意到他语言中潜藏的激烈感情。1961 年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是否将保留南非的英联邦成员国资格的问题提了出来，麦克米伦等人力争达成妥协，但亚非成员国在尼赫鲁的率领下决不迎合。尼赫鲁警告说，如果纵容种族隔离，英联邦组织就有瓦解的危险。南非意识到麻烦，主动撤回了申请。在尼赫鲁的坚持下，英联邦国家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明确提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这一外交胜利使尼赫鲁相信英联邦能够生存下去，但并不表明印英关系有所改善。对刚果问题，西欧国家异常强烈地指责达雅尔“丧心病狂地反对比利时人”。尼赫鲁严正声明，他坚决反对撤换达雅尔，并暗示如果达雅尔解职，印度可能撤回在刚果的军队。但对达雅尔的刺耳批评持续不断，哈马舍尔德无奈中只得让步，1961 年 5 月撤换了达雅尔，尼赫鲁事先得到了通知。

印度军队行动迅速，未放一枪一弹就控制了加丹加北部城市，许多外国雇佣官员匆匆离开了那个地区，但此后形势变得更乱了，联合国从加丹加清除外国雇佣军的努力受到西方的阻挠。尼赫鲁谴责后者恬不知耻地支持冲伯集团：“我认为整个事情简直让人震惊，无耻之尤。”他也意识到殖民主义虽已毫无前途，但依然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不久哈马舍尔德飞往加丹加视察的途中死于空难，印度国内的反英情绪再次上升，连尼赫鲁也相信，哈氏遇难虽不是被谋杀，但肯定是西方的刚果政策的不幸结果。不过尼赫鲁并不希望这一事件使印度的政策脱离正道。他在联合国拒绝支持苏联关于不再推选联合国秘书长、而将世界按联合国功能分为三大区域的建议；他也应美国之求，指示梅农不要率先提出任何调解动议，以免妨碍美苏之间直接磋商。

1961 年 7 月底，在美国和联合国策动下召开了刚果议会会议，组成以阿

杜拉为总理、基赞加为副总理的刚果新政府。尼赫鲁在贺电中答应完全支持刚果巩固统一和维护独立，并且表示，在刚果的努力决不可半途而废，除非外国势力撤出，否则刚果将分崩离析，联合国也会遭到不必要的严重挫折。在他心目中，刚果依然是联合国取得成功的象征和试金石。与此同时，独立的印度面对葡萄牙当局继续不放弃果阿殖民地的顽固立场，已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正考虑用武力收复果阿。西方国家表示反对，劝阻尼赫鲁继续忍耐等待。联合国的讨论也对印度不利。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说：有人一方面分裂联合国支持刚果加丹加的右翼政权，另一方面又在指责印度抗拒联合国的旨意坚持收复果阿，这是分裂联合国的险恶用心。“我们想起这一切事情，真是气愤之至。我谈的不是我的看法，而是亚非人民的普遍看法。”尼赫鲁看来，西方在刚果、果阿等问题上的最大毛病，在于他们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区分世界舆论，价值观和判断标准明显不同，说穿了，他们是害怕亚非国家的重要性上升。

当年年底印度军队强行开入果阿等三个葡属殖民地后，尼赫鲁决心比过去更无保留地支持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在结束加丹加分裂派的军事行动中，印度提供的军力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印度部队1962年全年中一直在这一地区积极执行任务。当时中印边界已经紧张，印度的兵员压力并不轻松，但尼赫鲁打算只有当印度部队在不能适当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将其撤出。10月里印度在与中国的大规模边境冲突中吃了败仗，尼赫鲁通知联合国说：印度希望尽快从刚果撤回军队，但不确定具体时间，也表示不希望打乱联合国的部署或影响印度的国际承诺。最后印度军队完成了任务，使刚果全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他们于1963年3月返回印度。

刚果危机危害到尼赫鲁两大道义原则，也危害到非洲的利益和联合国的最高宗旨。他从来相信，新兴的独立国家应该得到尽量多的支持，它们才有充分的自由行使主权，同时也帮助了那些比它们更加不幸的民族实现同一目标。他指出：非洲的情况特别典型，帝国主义在那里犯下的罪恶尤大，非洲人民的苦难也最为深重。“印度独立前发生过一次外界称为‘加尔各答的黑牢’的血腥事件，而非洲人民直至今今天仍挣扎在黑牢之中。”他看到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已在非洲大陆展开，非洲大部分地区已以惊人的速度摆脱殖民地地位，它们在这一进程中所需的任何援助都不应遭到回绝。因此他将帮助刚果实现自主、统一和独立看成是印度的义务。联合国如果无法完成既定任务、就将大大削弱其维持国际和平的能力。尼赫鲁并不一定喜欢哈马舍尔德的行为方式，但赞赏他力争联合国在国际义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决心，因此尽管他在具体事情上不无保留，却能在关键时刻充分支持哈马舍尔德，一次又一次地不顾苏联、南斯拉夫或一些非洲国家提出的其他方案，甚至不惜冒印度在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事情上遭受孤立的风险。人们这下理解了哈马舍尔德的评语：“感谢上帝有了印度！”

1961年下半年，刚果争端和柏林危机是使尼赫鲁最为不安的不祥之兆，他给潘迪特夫人的信中说：“很高兴你能马上回到印度，当世界行将爆炸以前，让我们共同站在一起。”在尼赫鲁不时充满悲观的心中，世界正在走近灾难，人们无时无刻不感到某种可怕的厄运正在降临。尼赫鲁看到，东西两大阵营都在一意孤行，他甚至担心和平光景捱不过年底。印度和其它不结盟国家是否能阻止这场日益逼近的大冲突是很让人怀疑的。

然而，铁托与纳赛尔却热衷于不久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

议。这些会议的目的是要成立一个“不结盟集团”或至少达成一项共同纲领。印度对这次会议没有太大的热情，不过尼赫鲁认为，既然举行就应参加。他指示印度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要对具体的行动纲领或建立不结盟集团表态。他致信铁托说：“不结盟既指与西方或苏联保持距离，也指不与其它国家订立条约，除非只是总体政策达成一致，否则结成多国集团会限制一国抉择和行动的自由；如果召开会议，邀请参加的国家应尽可能广泛。”埃及、南斯拉夫表示同意。尼赫鲁的勉强明显感觉得出来，当听说某些受邀国正提前开会协调政策时，他再次写信告诉铁托：如果小集团已开始相互结盟，会议将面对困难，他本人也会对出席会议感到踌躇。

9月初，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第一次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南斯拉夫、印度、埃及、古巴、阿尔及利亚等25国代表参加会议。开会前一天，苏联恢复进行核试验。可能部分因为尼赫鲁不久前对核试验的指责，肯尼迪没有采取相应的报复。一开始就表明，尼赫鲁的出席使这次不结盟国家的盛会有了强大的影响力。他不失时机地将各国的关注重点转向日益严重的核军备竞赛。开始大多数国家反对，苏加诺强调殖民主义问题，铁托支持苏联的政策，但尼赫鲁申明，旧殖民主义已寿终正寝，当前最突出的危险是世界战争，这是首先值得考虑的头等大事。他几乎是强使话题摆脱了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老一套议程，要求大会正视核战争的危险。最后的宣言和关于《战争的危險和呼吁和平》的声明采纳了他的建议。声明强调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结盟国家决定共同努力，制止这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表现和帝国主义统治。与会国还呼吁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立即举行直接会谈，阻止战争爆发和停止军备竞赛。针对当时的全球热点柏林危机，会议强调有关大国进行谈判，不要纠缠问题的是非曲直。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会议可算是尼赫鲁外交生涯中最后一次凯歌高奏。

会后，尼赫鲁接受苏联邀请从贝尔格莱德飞往莫斯科，他也负有向苏联政府递交不结盟会议决议声明的任务。这一次没有了以前那种盛大欢迎的场面。在克里姆林宫的晚宴上，他热情洋溢地讲到印度珍视与苏联的友谊胜过任何礼物和援助。出于回报，赫鲁晓夫也首次使用“牢不可破”一词来形容印苏友谊。但显而易见，这次老朋友的会晤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完全一致。赫鲁晓夫有关苏联恢复核试验的冗长解释未能让尼赫鲁信服。尼赫鲁争论说：苏联这一行为不仅本身不对，也使本已糟糕的局势更加恶化。赫鲁晓夫强调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的必要性，指责阿登纳和戴高乐正制造世界的总危机。尼赫鲁得出一个印象：影响苏联政策的基本因素是它对西德感到日益不安。赫鲁晓夫欢迎会谈，但坚持西方必须承认民主德国，而尼赫鲁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尼赫鲁来访对苏联有某种积极影响，至少从外表看苏联后来使用的语调缓和多了。会晤尼赫鲁之前，赫鲁晓夫对一位来访的美国记者说，苏联试验了一颗百万吨级核弹，没必要再与肯尼迪会谈。一天后他与尼赫鲁见了面，便将与美国记者的谈话记录改成他只提起试验起爆装置而不是核弹本身，并说他随时乐意与肯尼迪会晤。

访问莫斯科后，尼赫鲁又于11月上旬再次出访华盛顿，头两次见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这次是见肯尼迪。他第一次见肯尼迪是在1951年，那是肯尼迪与他在德里共进晚餐，当时尼赫鲁除对潘迪特夫人说话外很少开口。后来肯尼迪作为一名年轻的参议员尽力说服美国向印度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指出它符合美国的利益，尼赫鲁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尼赫鲁对肯尼迪当选

美国总统深表欢迎，肯尼迪也不迟钝，特地在其就职演说中以赞美的口吻提到尼赫鲁“崇高的理想主义”。才智、风度、人情味、机敏，这些是肯尼迪与尼赫鲁共同拥有的特征。肯尼迪给尼赫鲁热情致信，介绍新任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教授，尼赫鲁复函也充满热忱。尽管尼赫鲁不高兴美国支持猪湾冒险和干涉古巴，也不满美国驻刚果大使未阻止刚果的反印活动，但他仍承认印美两国在刚果问题上意见一致。他应肯尼迪之求，去河内和莫斯科干预确保在老挝实现停火，肯尼迪极为感谢：“我希望你知道，我是何等感激你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肯尼迪本人承诺援助印度发展本国经济，尼赫鲁在表达感激上唯恐落后，回信肯尼迪：“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但因美国对印度的友好情谊和慷慨援助而大大减轻。我们对美国人民，特别是对您——总统先生，表示深切谢意。”他声明，肯尼迪政府虽然也向巴基斯坦提供军援，但它对印度比往届美国政府更加友好。

然而，友情与经援并不是印美关系的全部。肯尼迪想让印度充当南亚、东南亚反华活动的领头羊。尼赫鲁却不可能赞成，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结成军事同盟。况且印度与中国间本来就有麻烦，他决不愿自己与南越的美国傀儡吴庭艳搅到一起。所以他接到肯尼迪希望他在不结盟会议和莫斯科之行后访美的邀请时，没有表示出太大的兴趣。他向旁人推托说，这次出国的时间太久了，国内还有许多事等着处理。他甚至坦言：“还有更深的原因，这类首脑政治和国际会议对我的吸引力已越来越小。”

大家都认为尼赫鲁此次访美并不成功。肯尼迪后来称它是“我所接待过最糟的一次首脑来访”。他觉得同尼赫鲁谈话就像是千方百计想占对方好处似的，双方捉迷藏、兜圈子，到头来只是一片迷惑茫然。尼赫鲁对苏联恢复核试验的严厉批评也无助于调节气氛。美国人的评语是：尼赫鲁老了，他已是一位操劳过度而疲惫不堪的老人。资深外交官哈里曼几个月前曾在德里见过他，他根本不觉得尼赫鲁有什么真正的政策，并相信印度国内围绕接班的斗争已经开始。

开始，肯尼迪差不多完全谈老挝和越南。尼赫鲁已尽力促成了老挝的独立和中立，但当肯尼迪要尼赫鲁在美国军事卷入越南和让越南落人共产党人之手两者之间提出一种中间立场时，尼赫鲁的主张笼统含糊，只是要求美国命令吴庭艳政府进行改革。他们没有讨论与胡志明打交道、派出联合国观察小组，或由印度领头在东南亚建立一条中立地带的计划。他们认为，除了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根据日内瓦协议正确行使职能以外，印度不可能在越南发挥积极影响。双方不愿提出任何积极建议是在情理之中的。今天已经知道，肯尼迪政府当时已在忙于加强对越南的军事卷入，而且尼赫鲁尚在华盛顿之时，肯尼迪已决定扩大在越南的美军顾问团，授权驻越美军参加作战。

肯尼迪在会谈中也提出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解释了印度的立场，但并不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就在数月前阿尤布·汗访美期间，美巴联合公报并未提到双方结盟的反共目的，可却提到巴基斯坦利用美国的军援维护其自身安全。据悉肯尼迪已答应向阿尤布·汗提供一中队最先进的军用飞机。肯尼迪略感歉意地对尼赫鲁说：军援比经援在美国国会更容易获准。他见尼赫鲁无言以对，又补充道，他将尽力使对巴援助限制于经济领域内。他俩随后又泛泛讨论了印度与中国的争端、中美关系以及柏林危机。果阿只是顺带提到，尼赫鲁说：在世界范围内，果阿只是件次要小事，但它对印度却是一个重大问题，会影响印度对国际事务中诸多问题的看法。

这次访问中，尼赫鲁如往常一样在政治和政府圈子之外得到人们的喝彩。例如，一位著名作家激动异常：“当我第一次见到尼赫鲁时，完全被他的伟大征服了。他像一位苛厉的老姨妈，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谈起话来就像教训他淘气的小外甥，希望他们不要争吵打斗。”不过尼赫鲁与肯尼迪的交往失败某种程度上是他们之间存在代沟的结果。在尼赫鲁眼中，肯尼迪固然出类拔萃，但他浮躁鲁莽，咄咄逼人和缺少经验。肯尼迪却觉得尼赫鲁消极保守，性格阴沉，对与印度国界不直接相关的问题似乎都没有兴趣。最难说服人的是他反复强调他耿耿于怀的地缘条件，强调各国即使在理智上承认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重要性，但从感情上说应关注它们自己的问题。也许他本人是一个破例，因为他承认防止核战争是首要问题，这就使聆听他言论的美国人批评他在外交事务中过分关心印度的具体问题。对华盛顿的掌权者们来说，尼赫鲁似乎已远离世界的现实，他宣称和平是印度的心之所系，强国不要以为行事温和就会丧失实力，这些话在肯尼迪等人听来不过是空话连篇，不着边际，对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没有多大的实际帮助。

尼赫鲁见过的几届美国总统中，艾森豪威尔与他相处最佳。杜鲁门的趾高气扬、粗俗不堪令他反感，肯尼迪周身散发出的富家子弟气和好大喜功也让他不悦，他对林登·约翰逊知之甚少。而艾森豪威尔的诚挚和善意，尤其与杜勒斯的喜欢不顾事实信口开河相比，更能触动他的心弦。

二十、克什米尔顽症

克什米尔一直是尼赫鲁的一块心病。1956年这一地区再次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提案，主张克什米尔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全民公决决定其归属。

话得从印度独立说起。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成了印度最特别的邻邦。它们之间的关系特殊而复杂，表现在各自对对方的政策既属内政又属外交。独立初血腥的教派冲突和旁遮普与孟加拉的难民潮致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两国领导人相互攻讦，怀疑和敌意愈来愈深。1947年10月，巴基斯坦的部落民武装进攻克什米尔，印度向克什米尔空运军队，双方爆发大规模战斗。印度不久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在联合国调解下，两国在1949年宣布停火并划定临时分界线。在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印度利用自己对印度河水源的控制，停止向巴基斯坦供水长达三周。以后，两国关系再没有恢复正常，克什米尔一直成为影响印巴两国关系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印巴之间独立之初主要有三大矛盾：其一，克什米尔争端；其二，难民财产处理；其三，河水资源的分享。财产问题因难民迁移而引起，它的解决取决于在另两个问题上的进展。对克什米尔问题，不少人认为巴基斯坦是行使民族自决的原则，而印度则以该地统治者愿意并入印度为其法律依据，坚持认为部落民的进入是巴基斯坦的侵略行为。由于尼赫鲁不同意在克什米尔举行他原则上接受的公民投票，联合国的斡旋归于破产。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

人们禁不住会问：印度的这一态度究竟理由何在，改变立场难道会使印度在尊严、资源和外交行动的自由上付出昂贵代价吗？显然，尼赫鲁出身克什米尔这件事并非印度立场的重要因素。战略上的考虑也许更重要，但也不是决定性原因。关键性因素在于，如果克什米尔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归属，很可能招致印度国内印度教徒的强烈反应，从而引起对印度现有的2500万穆斯林的种族仇杀。当然也许尼赫鲁头脑中还有这样一个念头：如果一个穆斯林地区能自愿与印度合并，他珍视的“世俗化印度”的观念就更有说服力。反正一句话，假如印度放弃克什米尔，印度国内印度教徒的愤怒情绪必会达到无法抑制的顶点。

就在尼赫鲁对印巴两国之间的对立和争端感到头痛之时，克什米尔内部又生出了新的危机。尼赫鲁一度满口答应考虑举行公民投票，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把宝押在了谢赫·阿卜杜拉和他所领导的印控克什米尔地方政府身上。

阿卜杜拉是执政的克什米尔国民会议党主席，印度独立前长期参加独立运动，在克什米尔享有很高声望。他也是尼赫鲁多年的朋友，曾热心支持尼赫鲁的世俗主义反教派政策，他的党与印度国大党在重大问题上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在克什米尔何去何从问题上，尼赫鲁曾一度认为，只要稳住阿卜杜拉，就能争取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最终实现克什米尔并入印度的计划。印度独立后，在印度国大党和尼赫鲁本人的帮助下，阿卜杜拉的国民议会党顺利地掌握了邦政权。但尼赫鲁失算了，情况起了变化。尼赫鲁可能并未注意到阿卜杜拉也许一开始就有克什米尔独立的想法。阿卜杜拉访美时曾对美政府高级官员讲过独立的好处，并暗示希望美英给予援助，1949年他在斯利那加会见美国驻印大使时仿佛又得到一种印象：美英会支持克什米尔的独

立，并提供国际保证。这时起他显然已在考虑这一方案，并打算与巴控克什米尔方面进行协商。他的观点与活动令印度政府、特别是尼赫鲁大为苦恼。尼赫鲁难过地说：“一生中最好过的日子就是非得与朋友对着干。”

当阿卜杜拉表示对印度政府在克什米尔有关的事务上发号施令不满时，尼赫鲁直接去信向他表露出关切，重申双方关系的基础是友谊和目标一致，保证印度对克什米尔的任何行动都肯定与他充分磋商，但阿卜杜拉仍抱怨不已。显而易见，阿卜杜拉不仅在从克什米尔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独立，也开始以有损印度的方式比较印度与巴基斯坦。尽管分离主义已见端倪，尼赫鲁仍指望阿卜杜拉领导下的克什米尔制宪会议制定一部与印度主权相符的新宪法。阿卜杜拉在议会的首次讲话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他强调克什米尔将对印度非教派力量的加强发挥积极作用。不过他 1952 年 4 月以后讲话的日吻明显变了，他不加区别地指责印度与巴基斯坦双方的教派政策，这充分表明他与尼赫鲁之间的裂隙已经扩大。尼赫鲁认为阿卜杜拉对印度教派势力的夸大瓦解了克什米尔人民对他本人及其政策的广泛支持。他感到十分沮丧，不仅因为他的讲话本身加重了教派情绪，而且当联合国安理会正磋商克什米尔问题之时，它也鼓励了国外对印度的批评。

1952 年，尼赫鲁与阿卜杜拉在德里举行会谈，就印度与克什米尔关系的某些总体原则达成协议，主要规定：克什米尔享有自治权，有限加入印度联邦；印度中央政府在克什米尔的国防、外交、通讯三方面行使职权，其余权力授予地方政府；克什米尔居民属印度国民，但邦议会解释和规范永久性居民的权益；中央政府只有在得到邦政府的请求或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干预该邦事务。

显然，克什米尔作为一个国际性问题需要一个特殊的地位，而《德里协议》的内容大都含糊其辞。尼赫鲁为避免在国内引起麻烦，提议明确解释克什米尔与印度的关系。阿表示赞同，但却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绝去德里与尼赫鲁见面。特别是当他与 1953 年 5 月到访的美国特使秘密会谈后，更开始津津乐道“独立的克什米尔”的新打算。

阿卜杜拉执政后在印控克什米尔实行的某些过激政策也成为内部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在印度招来强烈的指责。阿卜杜拉的“新克什米尔计划”包括推行土改，将印度教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穆斯林农民，结束土邦世袭制。邦内印度教徒较集中的查谟地区受到的影响尤大。尼赫鲁写信建议他慢慢来：“我们是一个法制国家，我们应该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他还说：印度近来对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争端已创造出一种极为友好的气氛，千万不要再惹出乱子，引起新的矛盾和干扰。

然而，阿卜杜拉对克什米尔地位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和激进的内部政策引起印度国内印度教教派势力的不满，随时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教派冲突。这一潜在的危机要求印度政府采取迅速而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但尼赫鲁未能成功，危机有失控之虞。尼赫鲁命令内政部采取行动，而一些官员显然同情印度教徒。他急切希望访问克什米尔，以便打消克什米尔邦政府的顾虑，由于阿卜杜拉对此表现得很不热情，于是他只得呼吁他妥善处理此事，以免酿出事端。尼赫鲁认为，只有阿卜杜拉严格遵循他俩共同签署的德里协定中的所有条款，马上设立部门调查该邦印度教居民的怨情，在几处主要地点同时悬挂印度国旗和克什米尔邦旗，暂停没收原封建主的地产，并在土改过程中顾及查谟地区上地贫瘠的实情，整个形势才可能缓解。

阿卜杜拉不愿服从，印度教派日益增长的对抗更印证了他的担心。他既不成立答应过的调查委员会，也不打算执行《德里协定》，仅表示关切克什米尔穆斯林对印度教教派鼓噪的强烈反应。他的态度反过来又激起查谟及印度其他地区本已低落的印度教教派情绪高涨。北印度等地甚至已开始策划一次联合大示威。尼赫鲁想说服对立中任何一方，可是毫无效果，阿卜杜拉心里对印度教教派主义谈虎色变，正一心做着独立的美梦，而印度教政治势力则存心要与尼赫鲁为难，两方都没有心情听尼赫鲁说话。尼赫鲁没有办法，只得再次催促他来德里讨论解决办法，阿却既不回信，也拒绝了尼赫鲁的邀请。

尼赫鲁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显出少有的沮丧。他能面对巴基斯坦、联合国的责难，甚至战争的前景，但却难以面对印控克什米尔内部这场错综复杂的争执。他的办法只能是坚决镇压印度教教派主义活动，然后给阿卜杜拉时间恢复镇静。他下令逮捕所有在德里和旁遮普参加教派闹事的人，命令内政部阻止其它地区的印度志愿人员进入闹事地区，禁止印度教教派组织活动。

但是内政部并未认真有效地执行尼赫鲁的命令，部长卡特尤不理睬总理的建议，最高法院则宣布开释已逮捕的教派领袖莫克吉。后者越过邦界进入查谟，那里的印度教抗议活动顿时再次演成高潮。阿卜杜拉立即宣布扣押莫克吉，同时请尼赫鲁和卡特尤去斯利那加。尼赫鲁很不情愿地去了，阿卜杜拉对他明言：在彻底合并和彻底自治（独立的委婉说法）间没有中道可走，由于克什米尔大多数人民不接受前种选择，因此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后者。尼赫鲁回答说：依然存在不少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阿卜杜拉都听不进去。不过尼赫鲁看得出来，阿的政策并未深得人心，他正逐渐失去国民会议党多数的支持，譬如他有关重新考虑克什米尔在印度的地位的建议遭到绝大多数议员的反对。尼赫鲁要求他们大家尽可能不使局势不可收拾，至少等他从英国参加英联邦首脑会议回来后再说。

戏剧性的是，正当克什米尔内部局势开始恶化的时候，印巴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自分治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转机。1953年4月上台的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的亲美倾向很强，艾森豪威尔比过去更热心促成印巴的双边协商。杜勒斯5月访问德里时说，谈论公民投票没有太大意义，这类搞法在其它国家都不成功，带来的只是流血，更好的办法是在分割或别的特殊安排的基础上解决问题。除了美国的影响，巴基斯坦国内也开始普遍出现一种情绪，认为巴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局势的糟糕，并不能都归罪于印度，不能永远把敌视印度作为本国的政策。

尼赫鲁急于对巴基斯坦新近显示出的友好姿态作出反应。还在巴政府换届之前，他已下令印方对印度河河水分享问题的态度尽量灵活一些，并威胁要惩处那些拒不执行命令或知情不报的官员。然而主要问题仍是克什米尔。在伦敦的英联邦首脑会议期间，穆罕默德·阿里一面对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就显得焦急，同时也借口自己在国内地位脆弱，希望由尼赫鲁主动提出建议。但这次尼赫鲁却无能为力，也许这是他手握大权时期的一次例外。查谟的骚乱在其它地区印度教徒的支持下愈演愈烈，破坏了印度世俗化国家的形象。尼赫鲁对此也只能老生常谈，强调需要更多的谨慎和善意，他反复对阿卜杜拉保证说：决不存在外来干涉，每一步都会征求克什米尔人民和政府的意见。

在这一时候，又出了节外生枝的事。尼赫鲁刚返回德里，就听说被阿卜杜拉囚禁的印度教领袖在狱中病死。他的死被指控为监狱当局玩忽职守甚至

谋杀，于是在北印度掀起了大规模抗议风暴，连许多在政治上不支持死者的人都纷纷起来尖锐批评尼赫鲁和阿卜杜拉。尼赫鲁保持住镇静，但这一死亡事件却堵死了达成妥协的道路，克什米尔的分裂再度扩大，而且也充分反映到地方政府内部。尼赫鲁只得再度邀请阿卜杜拉来德里一晤，但阿又拒绝了。后者不仅指责骚乱者和印度传媒的教派性诽谤，而且抨击印度政府有意拖延对克什米尔地位的认可。现在要想阻止阿卜杜拉改变他要让克什米尔“完全独立”的思路为时已晚。阿卜杜拉也许相信他能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并看出就连尼赫鲁也无法制服印度国内的教派势力，于是他公开表明克什米尔应该独立。事情已经明朗化，尼赫鲁与阿的会谈不可能再得到更多的东西。摆在尼赫鲁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承认阿卜杜拉正代表克什米尔讲话，印度从那里撤军；要么就是证明他仅代表小部分人的意见。

根据印巴两国总理年初在伦敦的安排，尼赫鲁在7月里访问卡拉奇，受到令他难以置信的热烈欢迎，他甚至感到有如访问一座印度城市那样自在，过去几年中的悲剧色彩仿佛淡化了。巴基斯坦当局宣布，在他们看来，克什米尔是唯一真正麻烦的问题。由于印度与克什米尔内部存在的麻烦，尼赫鲁只能重申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略加变动。穆罕默德·阿里排除了克什米尔的独立，赞成划地区举行投票，尼赫鲁关心的却是巴基斯坦放弃在克什米尔的军政权力。

就在此时，克什米尔的事态已到了危急关头。阿卜杜拉及其支持者在邦政府中成了少教派，这一事实表明执政的国民会议党并不赞同独立，阿尽管仍是邦首席部长，实际却成了反对派领袖。事后全部文件记录证明，尼赫鲁并未插手干预，没有按个人喜好进行暗示，一切都在自然而然地发展。这时，民主的作法显然是反对阿卜杜拉的人从邦政府辞职，如果他们占大多数，就会被授权组织新的邦政府。尼赫鲁知道，如果阿拒绝辞职，就会被撤职。他进行的唯一干预只是，当听说内阁多数人要求当地军事指挥官调动部队时，他命令印度军队不要介入。

1953年8月尼赫鲁决定将阿卜杜拉撤职，并任命了新长官。新任邦长官担心阿卜杜拉的存在使他难以维系邦政府的运作，便下令逮捕他。尼赫鲁后来说：“直到他们已经抓人，我们才知道这些事情。”他承认这样做留给他的印象很糟，但又称当事人更了解情况。他作为中央政府的总理，也承认对此负有最后责任，尽管有些事事先他确不了解。

克什米尔的危机总算度过了，可对尼赫鲁来说犹如一场悲剧。一位他亲密的朋友和同志，投身自由运动20余载的老战士，一旦开始怀疑尼赫鲁和他的政府的诚意，就丢掉官职，进了监狱，这既是一次对他个人的打击，也是他的国内、国际政策的一次失败。

印巴关系 1953年中期出现的“解冻”迹象一度唤起过尼赫鲁的希望。他与穆罕默德·阿里在伦敦、德里和卡拉奇就克什米尔问题连续举行了多次协商，特别在1953年8月达成的“卡拉奇协议”中，双方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尼赫鲁也原则上同意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克什米尔的归属。但好景不长，乐观气氛很快便烟消云散。

这一年中在德里拜会了尼赫鲁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评论说：“尼赫鲁念念不忘克什米尔。他祖上同克什米尔有联系，这也许至少是他后来老是抓住克什米尔问题不放的原因之一：他坚定不移地决心把克什米尔纳入印度版图，还同样坚决地反对让克什米尔人民自己来决定如何解决这问题，因为一

且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作决定，结果肯定是有利于巴基斯坦而不利印度的。”

1954年，巴基斯坦放弃独立初期的不结盟立场，开始与美国结盟，双方签署了《美巴共同防御协定》。由于巴基斯坦答应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接受美国提供的大量军援，并加入亲西方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印巴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尼赫鲁不至于那么幼稚，会相信美国向巴提供进攻性武器是为了遏制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的保证。

尼赫鲁1956年底的华盛顿之行并没有为克什米尔问题带来福音。在那年整个夏天，印巴关系一直处于隐蔽地位，尼赫鲁也不愿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讨论克什米尔问题。10月中，印巴两国总理做的只是交换备忘录和信函，指责对方国家中出现的对少数民族的骚扰。11月，印占克什米尔制宪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印度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件事使得巴基斯坦总理突然回到克什米尔问题上来，对克什米尔的新宪法提出抗议，并误传克什米尔最近将并入印度。尼赫鲁认为，制宪议会已开了6年，有权决定与地区政权有关的任何事务，况且自印度向联合国表态以来形势已发生大变，克什米尔与印度关系必须寻求最后解决。

新上任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和外长努恩比他们的前任表现得更加强硬，他们再一次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克什米尔问题。梅农当时已到纽约任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他提议印度予以反驳，要求联合国结束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继续侵略。尼赫鲁表示同意。这是展现梅农辩才的大好机会，他的马拉松式的发言详细谈到印度自1947年以来的立场，但听客们无动于衷，其中包括巴基斯坦的6个军事结盟国的代表。梅农后来对尼赫鲁说，克什米尔已同冷战搅到一起，这桩公案印度没有希望取胜。英国的政客们普遍讨厌尼赫鲁的政策，甚至工党领袖们也拼命批评。印度国庆时在伦敦举行的官方招待会冷冷清清，潘迪特夫人报告说：“显然是我们因对苏伊士危机的立场正受到惩罚。”美国也是如此。虽然尼赫鲁不久前访问了美国，艾森豪威尔也表明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态度开明，但这时美国觉得巴基斯坦的基地更重要，印美友谊自然放到了次要地位。杜勒斯径直对尼赫鲁说：美国不得不支持克什米尔的公民投票，除非印巴两国共同找出另一种方案。尼赫鲁对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与英国一鼻孔出气早有思想准备，不过没料到它会公开支持巴基斯坦。英美两国舆论在这件事上都不同情印度，所以印度在安理会上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事情辩个水落石出。梅农因为在纽约的出色表现，首次在国内受到极高的赞赏。

1957年1月24日，克什米尔新宪法将在两天后正式实施，安理会结束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讨论，通过一项英美等国的提案。提案主张克什米尔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同时强调克什米尔制宪会议的任何决议都无法决定该地区的未来。提案否决了印度的一贯立场，把克什米尔的事态说成是争端而不是问题。苏联投了弃权票，表面理由是克什米尔议会做出决定后已没有什么问题再可讨论。梅农接受了这一解释，但尼赫鲁和梅农心里明白苏联的态度无疑是想表达他们不高兴尼赫鲁对匈牙利事件的政策。尼赫鲁悲愤地说：“我们简直是两头受气。”

安理会明显指责印度之后又继续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梅农经尼赫鲁同意，非正式地告知安理会：印度唯一能接受的建议是要求印巴双方兑现联合国的全部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尼赫鲁并打算必要时再进一步，同意由联合国秘书长全权处理此事，以便实现和平解决。他

嘴上说不排除举行公民投票，实际却绝无可能，因为那肯定会引起严重后果。梅农不愿联合国秘书长插手此事，英国则主张尼赫鲁在大选后作出某种新姿态，以便减轻巴基斯坦的受挫感。实际上英国是在争取一个让巴基斯坦满意的决议。尼赫鲁认为英国的立场是偏袒巴基斯坦而歧视印度，他暗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英国明显的不友好态度可能会对印度留在英联邦产生副作用。

随着安理会决议的通过，争议暂时告一段落。的确，安理会上的争论和通过的决议与其说是损害了印巴关系，不如说是损害了印度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尼赫鲁公开表示完全不喜欢安理会决议，认为它“就同联合侵略或是联合赞同侵略一样危险”。他指责西方国家故意给印度制造麻烦，让印度丢脸。“哪怕是面对世界上最强大势力的压力我也决不会出卖印度的荣誉和自由。”与苏伊士危机期间相比，印度这时更强烈地感到英联邦纽带毫无价值，只要尼赫鲁稍一动摇，全国上下必会齐声赞成与之一刀两断。然而，尼赫鲁无意鼓励批评英联邦，认为这件事上不应感情用事。他对议会说，世界上的破坏性因素已如此之多，他不愿再去破坏一种并不阻挠印度的独立的关系。但他补充说道：自独立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与英联邦的关系有必要重新考虑。

根据安理会决议，安理会主席雅尔林分别访问了卡拉奇和新德里。他当然不能抱任何希望让印度作出重大让步，尼赫鲁在他来访之前就已表明了态度。巴基斯坦的语气也没有一丁点儿松动。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做得够好了，责任都在对方。雅尔林的报告自然意义不大。不过从印度的角度看，雅尔林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它并未不顾其他事态的发展只提公民投票，并且它承认公民投票会引起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不断在谈论战争，公开讲巴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是为了获取武器对抗印度。事实也是如此。美国通过一项军援计划将武器源源不断运入巴基斯坦，回报则是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建立一个空军基地。美国答应让印度了解对巴军援的种类和数量，提供的资料却很不确切。印度获悉，巴基斯坦的机械化部队现已装备了最新式的坦克，许多方面比印度的装甲师都毫不逊色，而且规模更大，火力更强。两国的空军力量也开始出现悬殊，巴基斯坦获得大量新型战斗机和轰炸机。印度被迫从其发展计划中抽出大量资金用于军备，但它没有与巴基斯坦争着从美国得到武器援助，而是转向其它可能的武器来源地。印度也不打算向苏联购买武器或军事装备，尼赫鲁担心会给印度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及印度的基本对外政策带来影响，况且美国人也会以此作借口，更无限制地向巴提供武器。如苏联政府主动提出时可不置可否。苏联当局足够聪明，绝不会主动招来回绝。赫鲁晓夫对一个印度军事代表团说，他理解印度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微妙位置，不希望印度政府为难，但任何合作总得由印方主动提出。当印度建议由苏联帮助培训部分印军军官时，赫鲁晓夫和苏国防部长朱可夫马上同意了。

克什米尔问题 1957年再次提到英联邦首脑会议桌面上。苏拉瓦底对尼赫鲁进行拼命攻击，明说巴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势不两立，印巴关系的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症。尼赫鲁在会上有几分孤立，班达拉奈克没有到会，加拿大的迪芬贝克尽管友好，可相对来说是个外人，不能自动承接他的前任圣-劳伦特与尼赫鲁的亲密关系，恩克鲁玛没有开这类会议的经验，麦克米伦和孟席斯则仍对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事情耿耿于怀。所以，当尼赫鲁为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辩解时，大家反响甚微。甚至在印度需要大量贷款的问

题上，其它代表也权表示同情而无具体承诺。印度对克什米尔的立场看来也不可能得到支持。不过苏拉瓦底也因表演过头而失去市场，会议对他的主张几乎毫无兴趣。麦克米伦分别约见印巴两国总理，他仍能明显感觉到尼赫鲁对英国不久前在联合国上的态度的反感，不便多谈克什米尔问题，只叫两国在印度河水分享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

直到 1958 年，尼赫鲁心里老放不下的仍是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他对继续关押阿卜杜拉感到心烦，后者 1958 年 1 月获释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他希望阿卜杜拉发泄完长久积怨后能坐下来与他讨论未来。不出所料，阿卜杜拉公开批评印度政府和克什米尔地方政府，这很可能再次激发教派主义情绪。他派几位同事来见尼赫鲁，试图将他的某些讲话解释为过于激动。尼赫鲁告诫他应在一段时间内避免这类讲演，而与阿卜杜拉本人的会晤最好等到后者本人和局势平静下来再说。但阿卜杜拉不听劝告，继续批评尼赫鲁走的是一条“错误和危险的道路”，结果他出狱不到 4 个月又被送回监狱。尼赫鲁要求克什米尔政府按法律程序办事，但内政部长潘特和克什米尔首席部长反对开庭审理。

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仍没有明显好转。尼赫鲁无可奈何地说，这是一个冤家争斗的世界，没有那个国家敢说它没有自己的冤家。对印度来说，冤家就是巴基斯坦。这种冤家间的纠葛不仅是过去十年的事，也有独立前很久的历史，印巴间的关系仿佛永远无法摆脱过去那场教派冲突的阴影，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除非两国人民观念上的根本冲突得到缓解。他又认为，印度虽未完全摆脱教派倾向，但并不像巴基斯坦那样是教派主宰一切。只要巴基斯坦的政策以敌视印度为前提，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或两国间的其他问题都毫无希望。他对来访的麦克米伦说：“我和巴基斯坦没法打交道——他们的政府总是维持不了几个月，他们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什么协议也没人作主决定——我实际上对此根本不抱希望。”不过他也不推卸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未能赢得巴基斯坦政府的善意。巴基斯坦方面也确实对尼赫鲁的诚意满腹狐疑，努恩对访印后访巴的麦克米伦说：印度用心险恶，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希望不大。

不断发生的事件都表明印巴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联合国的插手和调解也无济于事。正是在这种相持不下的背景下，巴基斯坦以阿卜杜拉再次被捕为理由重向安理会投诉。在克什米尔，邦政府没有立即开庭审判他们大谈特谈的阴谋案。拖延审判阿卜杜拉对印度很不利，尼赫鲁担心它会严重损害印度的国际形象，他催促尽快开庭审判，给被告充分的机会辩护。对外他则重振旗鼓，宣布印度不会诉诸武力，他愿意与巴基斯坦总理会晤，要求巴基斯坦放弃好斗政策，接受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基本立场。艾森豪威尔表示愿“伸出友谊之手”，促使印巴两国总理坐到一起，但尼赫鲁婉言谢绝了，理由是第三方不应干预一个最后必须由印巴两国直接解决的问题。他也向艾森豪威尔表示，面对 1947 年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敌视政策，面对军事结盟鼓动下咄咄逼人的不妥协立场和西方国家在安理会

上的强硬态度，他本人看不到希望所在。

尼赫鲁对这件事信心不足，可能跟他藐视巴基斯坦领导人苏拉瓦底和努恩有关。他总觉得巴基斯坦的精神正在崩溃，它的政治也很腐败。努恩取代苏拉瓦底成为总理并没有什么两样。努恩愿意来德里与尼赫鲁讨论边界问题，尼赫鲁当然表示欢迎，认为解决边界问题有利于推倒“暴力仇恨的坚固

围墙”，为讨论其它主要问题创造更好的气氛。9月间，两国总理在新德里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尼赫鲁甚至设想出一个分配印度河河水的新办法。但这一些努力都因巴基斯坦实行军法管制而告吹。

1958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与许多其他国家

一样，尼赫鲁立即承认了米尔扎和阿尤布·汗政权。巴基斯坦人民早已对官场腐败和政治阴谋深感厌倦，他们从政权更替中明显得到一丝安慰。但尼赫鲁并不掩饰他在理智和感情上对军人政权的反感，总是向人们指出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差异：印度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巴基斯坦天生就对印度民族主义怀有敌视态度，巴无根无基，即使独立后仍缺乏积极的内涵。他对梅农说：“我们必须保持戒备警惕，但我认为巴基斯坦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崩溃。甚至连巴基斯坦的盟友也看出了这点，尽管它们不会说出来。”他预言说：“军人统治除了能在狭隘意义上维系法律和秩序，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他的结论是：军人统治不会长久，也许不会超出一年。但后来事实证明他错了。

阿尤布·汗不出几周就把米尔札赶下台，建立起不折不扣的巴基斯坦军人政权。这样一来英联邦组织又冒出怪事：成员国中居然有一独裁政权。虽然英联邦组织的灵活性足以适应这一情况，巴基斯坦却为其他成员国开了先例。尼赫鲁看来，在外交政策上不能指望阿尤布的政变能带来变化；巴基斯坦的政变肯定得到美国支使，它近来一直是美国的被保护国，如果华盛顿不喜欢让军人掌权，军队是不敢这么做的。米尔札的下台对尼赫鲁不是一个好信号，因为从印度立场看，他本来可以起某种制约作用。尼赫鲁的担忧流露在他与美国大使的谈话中：当巴基斯坦的人民意识到军人政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时，统治者就会挺而走险，转移人民的视线。美国对他保证说，他们事先并不知道阿尤布要采取行动，并表示要竭尽全力约束他的对外冒险活动。尼赫鲁还是不放心，一个靠军法来统治的国家，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威，拥有国外提供的大量武器，它对印度的威胁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艾森豪威尔对印度的心态比杜勒斯摸得更准，他对印度大使道出他本人的苦衷：巴基斯坦是美国的盟国，他不得不帮助它，但他又知道向巴提供军援会危及印美关系。然而尼赫鲁认为必须再次严正声明，对克什米尔的任何进攻都是对印度的侵略，将遭到有力的回击。

1959年1月巴基斯坦与美国再次订约，条约规定美向巴提供“非常规性”武器和援建导弹发射基地。尼赫鲁为此向美国提出口头抗议，美国大使又照常对尼赫鲁保证，新条约中并未考虑大规模增加对巴的军事援助，美国决不允许巴基斯坦进攻印度。他还补充说：巴基斯坦新政权虽由军人执政，但肯定对这类冒险更加小心谨慎。然而尼赫鲁却认为事实上危险比过去更大了，因为掌握政权的军人惯于从军事角度去考虑处理问题。巴基斯坦官员将巴美条约说成是防御性的，而并非仅针对印度。但尼赫鲁仍不放心，在他的头脑里，防御与侵略的区别仅看你如何解释。很明显，美国并不能阻止巴基斯坦动用这些武器进攻印度，尼赫鲁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一份书面保证。

尼赫鲁对美国政府的提醒某种程度上说是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前奏。1959年，中印边界争端上升为印度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巴基斯坦的兴趣转向利用已经明显恶化的中印关系为自身谋求好处。中印关系日趋紧张之际，阿尤布·汗主动提出与尼赫鲁会晤，并以颇为夸张的口吻表示：“我的确把他看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我为尼赫鲁先生愿做任何事，请转达我对他的保证，转告他我作为一名军人和诚实的人说过的话，我诚挚地盼望与印度建立可能

的最好关系。”他设想印巴改善关系会产生共同防御计划，并凭借巴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趁中印两国关系失和迫使印度改变不结盟态度，引诱尼赫鲁为对抗中国而在军事上与巴结盟，从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阿尤布后来也承认他心目中的共同防御只为解决一个问题：克什米尔。他提出，如果印巴某一方与第三方发生战争，另一方就应保持中立。不过尼赫鲁并不轻易动心，他依然不放弃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的希望，所以几句话便拒绝了阿尤布的提议。他依旧认为，放弃不结盟等于拔掉了印度的根基，印度会随波逐流，失掉自尊，将本国的命运交给另一个国家。如谈共同防御计划，那它究竟针对谁？这样做必定会马上使印度成为军事同盟中的一员，走向反苏反华的立场。他现在需要的是更现实、更积极的立场。

尼赫鲁不相信中印之间近期会发生大的对抗，认为没必要给巴基斯坦可乘之机。他态度坚决地通知阿尤布：只是从权宜之计出发，他才打算与巴基斯坦共同寻找一个逐步解决争端的方案，减轻印度的军事负担，但这决不能通过与印度的总体政策相违的共同防御协议来实现；只要美国还在增加对巴军事援助，只要巴基斯坦领导人还在发表针对印度的好战言论，只要巴方还在破坏克什米尔停火线，他就绝不会受私下传来的好话引诱与阿尤布会晤。单独会谈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除非现有局势及其他全部因素能促成产生效果。

尽管中印关系在1959年已经趋冷，并出现对抗迹象，尼赫鲁仍不相信印度会与中国发生实质性冲突。他一方面不愿加速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摊牌，另一方面也不愿对巴基斯坦示弱。当他得知巴基斯坦已从美国获得大量可供水陆两栖作战的装甲车时，认定显然是用来跨越印巴之间的界河，他更加坚定了对巴基斯坦的强硬态度。战争阴云出现了。不过阿尤布表现出的和解态度值得赞赏，他主动提出前往东巴视察途中在德里逗留几小时，尼赫鲁无法拒绝与他会晤。1959年9月1日，尼赫鲁与阿尤布·汗在德里帕拉姆机场会晤，双方谈了大约一小时，都表示要在“理智和计划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屏弃过去处理相互关系的老办法。尼赫鲁感兴趣的是改善双边关系，阿尤布却急于马上取得结果；尼赫鲁强调发表非战宣言和创造两国间相互理解的气氛的重要性，阿尤布则寻求建立某种机制解决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并未因中印关系的危机而改变。当美国建议印巴有必要建立统一的防御体系时，尼赫鲁不予理会；在听说美国散布印度对美向巴提供军援的反对并不认真的言论后，他命令驻美大使马上反驳。事实上，由于印度当时将中国和巴基斯坦均视为明显或可能的敌人，反对美对巴提供军援的呼声只会更加强烈。尼赫鲁毫不怀疑，阿尤布提出的共同防御并不是想增加印度对抗中国的筹码，不过是想乘人之危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捞取便利。

二十一、中印边境冲突

直到 1958 年为止，尼赫鲁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作用耀人眼目，这既给印度和他本人带来荣耀，也使整个世界的进步事业受益。到处对他都是一派赞辞，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尼赫鲁的印度已站在众所公认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前列，对和平、民族独立及消除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冷战拥有巨大影响力。他的好友蒙巴顿后来说：假如尼赫鲁死在 1958 年，那他就会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而名垂青史。蒙巴顿的评价尽管夸张，但他把 1958 年看作尼赫鲁事业的顶峰和走下坡路的开始，这倒不无道理。毕竟，从此时起，尼赫鲁遇到他外交生涯中最棘手的问题：中印之间的边界争端。争端最后演成大规模军事冲突。冲突对中印两国的关系发展是极为不幸的，也给尼赫鲁的政治生命带来致命的影响。

中印两国间的边界存在相当长的未划定部分，涉及广阔的领土范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边界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殖民统治留下的后果，如果中印双方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相互信任和友好协商，本来完全可能消除误会和化解矛盾，创造条件最后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遗留问题。遗憾的是，边界问题却在友好邻邦之间发展成了一场战争。

1958 年 1 月，周恩来向尼赫鲁转交达赖喇嘛给他的访问西藏邀请，并表示中国政府欢迎他访问西藏，他本人也将亲自陪同尼赫鲁。尼赫鲁接受了邀请，建议时间定为 9 月上旬。他这时仍希望维持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他想方设法禁止流亡藏人在印度境内的政治活动。中国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尼赫鲁这时发现，一度友好密切的中苏关系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问题上站在苏联一边，但中苏间的裂痕仍日益加深。他对来访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说，他有自己的一种看法，认为中俄两国在精神上、甚至传统上并不是朋友，一直有种种摩擦，所以早晚可能会分裂。这一看法给麦克米伦特别深的印象。尼赫鲁也注意到，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虽还讲话赞扬赫鲁晓夫，但于同一年中国已下决心将自力更生放在首位。赫鲁晓夫为解决西亚危机提议召开的五大国会议加进印度而排开了中国，中国不可能没有看法。中国从 1958 年起已明确奉行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尼赫鲁比他的大多数同行和外交官显得更有经验，一当中苏关系转冷，他马上意识到其中可资利用的价值，打算在不放弃不结盟原则的同时尽可能拉近与苏联的关系。他不顾财政部长德赛等许多高级官员的反对，同意苏联建议的改用卢布结算印苏双方贸易余额。他知道印度为此将损失外汇，但将换来苏联更多的实质性援助和支持。他也打算重新考虑一年前作出的不从苏联进口武器的决定。尼赫鲁这时对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已不像过去那么热心，因为美国老是要求印度不能向别国转卖这些武器。印度并不打算转卖武器，本可以接受美国的附加条件，实际上以前也接受过这类条件，而现在尼赫鲁却觉得再提条件令人讨厌。

印苏关系的密切与中印争端日益加深几乎是同时的。在公开场合，尼赫鲁并不谈论他对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看法，讲话中他总将中苏两国相提并论，可他却不能无视中印之间矛盾的加深。他催促中国政府为他的西藏之行确定日期，但中国鉴于西藏上层势力的分裂主义活动，况且中印的边界分歧已逐渐明朗化，建议他推迟访问。尼赫鲁访问西藏的计划最后被中国取消。

尼赫鲁还是决定去一趟与西藏邻近的不丹。在此时访问不丹的政治意义显然与中国有关，不过他的旅行也是一次有趣的探险经历，有5天他都徒步或骑着马沿羊肠小道跋涉，翻越海拔5000多米高的山口通道，有生以来第一次钻进睡袋过夜。他感到无忧无虑，逍遥自在，暂时忘记了公务中的烦恼。不过，即使在这时，他头脑里仍萦绕着核军备的梦魇：“说不清什么原因，喜马拉雅雪峰给人的感觉不仅是宁静，而且也是永恒，你感到它高高在上，远离人类的愚蠢行为。如果我们能获得某种内心的宁静，或许我们就能面对据说其能量超过上千个太阳的核弹的威胁。”喜马拉雅山壮丽的山川与不丹之行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他离开这里时甚至说：“不丹现在已成了我心灵中活生生的一部分。”

尼赫鲁从不丹回来后又陷入了对眼前棘手的现实问题的苦苦思索。在广泛的外交政策上，尼赫鲁的确不打算破坏他的不结盟形象而考虑与西方结盟，正如尼赫鲁颇为得意的说法：印度因独特的外交政策而声誉鹊起。但还有极为现实的原因，就是借苏联的支持来对抗中国。他对议会公开说：“找寻盟友的模糊念头表明了一个国家性格上的软弱。完全可能，印度不能避免战争，但对此最好的准备是自力更生和增强工业实力，使它在国防上反映出来。不结盟的必不可少还在于它保持了苏联对印度的友谊，这从政治或经济援助的角度看都是值得的。”他甚至更看重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苏联塔斯社9月9日发表一篇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全文肯定并赞扬尼赫鲁信守不结盟的准则。这篇声明非同寻常，明显是苏联政府授意写的，它在尼赫鲁看来是公正的，但却激怒了中印，因为声明并非泛泛而谈，而显然针对中印间日益加深的争端。表面看，苏联领导人对中印边界事件表示遗憾，拒绝站在中印两方任何一边，用他们的话说：一边是与中国的“牢不可破的兄弟般友好关系”，一边是与印度正在成功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事实上，苏联真正偏袒和支持的是印度。

这项声明出笼的背景值得注意。苏联曾建议中国不要使中印争端演成大规模军事冲突，中国则想方设法阻止苏联发表这一声明，认为它明显袒护印度而指责中国。苏联政府未听劝止，一意孤行。中国自然认为，苏联的声明等于是将中苏分歧第一次公开向全世界披露。赫鲁晓夫后来还说：毛泽东本人对中印之间的麻烦负有责任，“因为他有某种病态的念头”，并且还想把苏联也扯进去。赫鲁晓夫9月底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陈毅代表中国政府批评了塔斯社的声明。陈毅诘问赫鲁晓夫：“难道你们会不知道尼赫鲁已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吗？难道你们会不知一旦印度的进步力量发展起来，尼赫鲁就必定倒台吗？”赫鲁晓夫回答说：“苏联对尼赫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难以接受他的说法。

1959年10月，中印两国的边防部队在西段边界的阿克赛钦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的军队越境进行武装挑衅，但整个说来中国方面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严正声明，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建议就边界问题举行总理级会谈。尼赫鲁的内心这时也很矛盾。他1954年访华后，曾意味深长地对印度内阁说：印度不用害怕中国的共产主义，如果说有来自中国的威胁，很可能是它的民族主义。现在他力图证明他的预言是对的。他一面大谈中国的威胁，同时又说：“我们也要记住中国是我们的永久邻邦，从中国招惹麻烦无论现在、将来都不明智。即使从最实际的眼光看，情况也是如此。”尼赫鲁不仅担心中国的坚定立场，而且也怕他的国际

形象可能因此受到贬损。美国《时代》周刊讥讽地评论说，“印度——中国巴依巴依”（是兄弟）现在该改成“印度——中国拜拜”了。当时美苏正在谋求改善关系。这一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联大提出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会谈，高唱有利于改变国际环境的“戴维营精神”，可恰恰在这时，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却日趋紧张。当冷战的阴云正从西方的地平线慢慢消散，印度正可为一种她一直倡导的全球政策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之时，命运却阴差阳错地出现奇怪的转折，印度竟在走向与昔日友好邻邦中国的敌对。这对尼赫鲁来说绝对不是件好事，他仿佛觉得这是历史上的一次关键时刻，需要三思而后行，克服轻举妄动，其结果不仅对印度，而且对亚洲乃至对世界都可能产生出意义深远的影响。从长远利益着眼，印度自身需要维系与一个强大的邻邦的和平友好关系，因此要尽力阻止与中国的关系走向反面。他对强硬派人士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我爱中国，而是因为我爱印度和爱和平。”11月6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就中印边界问题批评中国，同时又在提交的白皮书中表示印度愿避免边境冲突，谋求和平解决争端。

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明显不利。印度、苏联与美国都把遏制中国看作共同的任务，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每一方又得按自己的路子来实施。1959年6月，苏联背约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技术资料，撤回在华的大批专家，中止众多援建项目，致使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此后赫鲁晓夫等领导人不断表达他们对印度的同情和对中国的不满。但形势的微妙在于，假如印度急于与美国结盟，苏联将不得不回过头来拉住中国，这一来便增加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因此尼赫鲁清楚地知道，印度最好靠自己处理与中国的争端，以便稳稳地保住苏联的同情和友谊。这一政策其实也符合美国的需要。美国认为最恰当的做法不是亲自出面排斥中国和扶持巴基斯坦，而是从经济上帮助印度，减轻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威胁，以便印度能腾出手对付中国，同时又不致严重削弱印度国内发展经济所需的能力。

艾森豪威尔1959年12月访问印度，受到他预料之外的热烈欢迎。尼赫鲁对他的感情显然与中印日趋紧张的关系有关。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尼赫鲁甚至恭维他是“高举世界和平大旗的伟大人物”。无数印度人自发集合在街道两旁列队向他高声欢呼，德里群众集会的人数有50万人之多。尼赫鲁在盛大的欢迎集会上忘情地说：印度馈赠给艾森豪威尔的礼物是一份无价之宝——她的心灵。他俩的单独会谈中，艾否认自己与美国国内对印度的“中立”政策的批评有何联系，赞赏印度不加入军事联盟的立场。他向尼赫鲁保证，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不会妨碍美印两国成为密切的朋友。他还表示愿与尼赫鲁之间建立直接的个人通信联系，此前得此殊荣的只有赫鲁晓夫一人。他俩也讨论了印度的“二五”计划和“三五”计划，虽然没有提到经济援助，但承认了加快步伐完成计划的必要性。尼赫鲁提出两国在原子能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尤其是建设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电站，艾称他不知道印度已在这一领域取得巨大进步，主动表示将派一些专家来讨论此事。

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尼赫鲁向他分析了中印两国的边界纠纷。艾得出的印象是：尼赫鲁几乎已被中国对边界问题的坚定立场搞得乱了方寸，他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也很少怨气和愤怒，只反复表示印度决心抵抗。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恐怕是他这次访印受到热烈欢迎的主要原因，但他圆滑地避免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只是表示希望看到争端能够和平解决。艾谈得更多的

是巴基斯坦。到德里之前他刚会晤了阿尤布·汗，对后者的印象不坏。阿尤布·汗谈到克什米尔时情绪激动，反对任何以停火线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艾森豪威尔向尼赫鲁讲这些，主要是想知道印巴两国有无可能共同对抗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但尼赫鲁明确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表示只希望巴基斯坦在中印发生大规模冲突时不要从印度背上插一刀。艾森豪威尔又保证说，假如巴基斯坦敢做这种事，美国必定会对它严加惩处。他还故意向尼赫鲁透露：巴基斯坦实际上还不能有效地使用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因为大量弹药还未到位。尼赫鲁说：巴基斯坦的真正麻烦是其国内的问题，苏联或中国都不会进攻巴基斯坦，但其国内的变化可能导致一个亲共产主义的政权上台，促使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让步，而印度绝不愿冒这种风险，克什米尔问题与之的联系也不能忽略。尼赫鲁发觉，这虽然是一个他自己突然间冒出的怪论，却居然说服了艾森豪威尔。艾命令美驻巴大使敦促阿尤布·汗响应印度提出的建议，发表一个“非战”宣言。尼赫鲁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印度将单方面承诺不进攻巴基斯坦，除非是进行自卫。艾森豪威尔希望巴基斯坦也作同样表态，要么与印度发表联合声明，要么单独发表声明，这样印巴两国间的各种问题就能通过协商得到解决，不需诉诸武力。

尼赫鲁巧妙避免美国的全力拉拢，也顶住了国内的右翼势力借口中印关系紧张而怂恿与西方结盟的压力，与其说这是坚持不结盟立场，不如说是着眼于更有利的实际目的。最明显的就是印苏关系的加强。苏联的支持对印度在这一关键时期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性。随着中印边界争端加剧，苏联对中国的指责更强烈了。中国尽力劝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要以“完全中立”之名，行袒护印度攻击中国之实，但苏联当局拒绝这一批评。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说，没有人会真心相信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不如中国的印度会进攻中国。苏联还不公平地说：“中国并不是要解决突然间发生的有限领土之争，而是想扩张领土和削弱印度，阻挠苏联同美国之间谋求缓和与和平共处。”

不过，印度当时并不完全了解中苏矛盾的内幕详情。尼赫鲁虽然看重与苏联的友谊，却没指望苏联能够并愿意明显地向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2月，赫鲁晓夫出访印尼途中来回两次到印度短留，他与尼赫鲁在公开场合都没提到中印争端。但当赫鲁晓夫访问德里期间，尼赫鲁在议会讲话中声称印度与中国没有谈判的余地。赫鲁晓夫仅不失时机地表明印度与苏联是“好邻邦和亲密朋友”，赞扬印度的外交政策，表示苏联决不会减少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即使在他俩的单独会谈中，尼赫鲁也很少提及中印边界的问题其实就在赫鲁晓夫来访的前一周，尼赫鲁还写信给周恩来，称后者提出的两人会晤可能有助于找到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的办法。他邀请周恩来4月来新德里尼赫鲁也在议会重申，他将尽力争取和平解决争端，为此愿同任何人磋商。但他同时又表示：中印两国立场无法沟通。

1960年1至3月，中国与缅甸、尼泊尔等国通过友好协商，相继签署了边界协议，这对推动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本是件好事，但却对尼赫鲁刺激很大，他认为中国是想孤立印度。他想起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向他说过的格言：“争取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在这样一种印度对中国解决边界争端的诚意缺乏理解和信任的情况下，周恩来又一次去印度与尼赫鲁磋商，结果可想而知。

4月间的新德里已进入季风前炎热难耐的天气，周恩来和陈毅走下飞机

舷梯，机场上再也见不到过去那种欢迎的人群和绚丽的玫瑰花环，甚至连简单的寒暄也没有，有的却是冷冰冰的面孔。简单的仪式沉闷得出奇，尼赫鲁用他不常用的印地语结结巴巴地发了一通冷谈的讲话，周恩来的随身译员译得非常吃力。在印度的一周时间里，中国领导人总觉得印方的礼宾安排是在存心为难。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很艰难，双方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这是两位总理的最后一次会面。他们身上确有一些共同之处：良好的知识素养，敏锐的判断力，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深刻洞察，强烈的自尊心和个性，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不妥协态度，以及他俩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的崇高声望。但此时此刻这一切相似之处不但无助使他们的观点更加接近，反而更突出地强化了他们之间的不相容。英国作家韩素音这一时期与尼赫鲁和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她的评论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像通常两个杰出人物会面时一样，周和尼赫鲁从未真正地相互了解过，更不可能达到心灵相通。很显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竞争。周力求准确无误，厌恶杂乱无章。他有时中断自己的谈话，起身离开座位，从屋子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抽掉台布或挪挪花瓶。他看不惯东西摆得不是地方。尼赫鲁恰恰相反，擅长朦胧的艺术。他常常故意把问题搞得模糊不清，因为这样正好有利于达到他的目的。周煞费苦心地把事实摆出，标出题目，力求取得成果，而尼赫鲁却根本不在乎细节，他用浮华的抽象概念掩盖事实。尼赫鲁是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对他来说文字是用来撇开、歪曲、篡改事实的工具。使用语言不是为了阐明，而是为了模糊与己不利的事实。周作为思维严密的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不明白故弄玄虚、不求精确会有什么好处。”

谈判不顺利，中国代表团也受到不友好的接待。周恩来与陈毅拜访了一些印度领导人，但其中大多数人都表现得粗暴无礼，对中国横加指责，周恩来尽最大努力做到彬彬有礼，得体而不失尊严地回答一些故意带有侮辱性的问题。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激动地问：“与4亿印度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算得了什么？”周恩来却很平静：“与6亿中国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又算得了什么？”印度的反对党在中国使馆外组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高呼反华口号，报刊漫画把周恩来画成一条眼镜蛇。周恩来对这一切不友好的元礼举动十分气愤，甚至开始流鼻血。返回北京途中在加德满都停留时，他再也无法克制了，高声对采访他的各国记者喊道：“我告诉你们，中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很不公正！”

从当时的正式报道看，谈判似乎并没有显出多少火药味，结束访问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两位总理就两国边界问题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就边界问题说明了各自的立场。双方认为，应该对两国政府所有的事实材料做进一步的审查。事实上，边界问题的磋商毫无结果，在裁军等世界热点问题上也找不到共同语言。当然，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不久后当周恩来在北京再次接见韩素音时对她说：“我能做的都做了，可对尼赫鲁一点也不起作用。”韩的评论是：“印度正受到美国的夸奖和宠爱，并从美苏双方都得到了慷慨的援助而向中国施加压力，尼赫鲁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他为什么非要解决边界问题不可呢？”新德里的磋商成了无言的结局，确认了

中印之间围绕边界问题的进一步冲突在所难免。

1962 年来临了，最初几个月中，中印双方不断交换外交照会。中国外交部公布了自 1961 年年底至 1962 年 3 月期间交换的 22 件照会和中印两国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同时多次强烈抗议印度军队不断在东西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巡逻和设立军事据点，要求停止军事挑衅。缅甸总理吴努从北京带话给尼赫鲁：只要印度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中国现在会更讲情面。他建议尼赫鲁亲自访问北京，尼赫鲁拒绝了，解释说：面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只会引起印度舆论的强烈愤慨。他反提出与中国谈判的先决条件是中国表态从边境地区撤离军队。吴努又向北京传话，中国未作答复。

边境地区的空气继续紧张，印军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和东部的朗久地区不断增设军事据点，并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的扯东地区巡逻，中国的严重抗议被置若罔闻。与此同时，中印双方口气都变得强硬起来，印度提出的建议始终以争议地区是印度领土作为前提，中国当然不可能接受。尼赫鲁的态度变得好斗也与印度国内的局势有关，他这时正为国大党角逐第三次大选而焦虑不安，他在竞选演说中谈到中印关系现状时的强硬语气减少了来自右翼反对党的压力。中国获悉，印度军方已开始制订在边境地区向前武力推进的计划，周恩来请韩素音对尼赫鲁传话说：“尼赫鲁现在要是重新考虑他的计划还不算太晚。我们不要战争，但是我们不怕恐吓。”接着他又看似漫不经心地补充了一句有份量的话：“有时稍微打一打也是必要的，能使一些人开窍。”

中国政府发言人 7 月中旬宣布，印度军队进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普地区，并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边界战争已达一触即发的地步。尼赫鲁无法确定这份措词强硬的讲话是否是中国决定反击的前兆，但他仍认为不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时陈毅到日内瓦出席关于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他对也来开会的梅农提议举行谈判，梅农由于没与德里及时联系上，双方未能发表联合公报，但尼赫鲁在议会讲演中明确拒绝谈判。7 月 21 日，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境巡逻的印军进行还击。这段时间，尽管中印双方都在不同场合提过边界谈判的建议，但附加条件都是对方不可能接受的。

9 月中旬中印边界发生了一系列交火事件，但仍没有迹象将会发生大规模冲突。身为国防部长的梅农甚至又离开岗位去了联合国。正在国外访问的尼赫鲁对记者说，他更关心国内的洪灾而不是中印间的小冲突。10 月初，尼赫鲁和梅农都回到印度。作为一种强硬的姿态，考尔被正式任命为东线最高指挥，根据考尔的回忆录《没有公开的故事》的说法，当他 10 月 3 日那大见到尼赫鲁时，总理对他说：印度对中国的忍耐时间已太长了，不计后果的采取强硬立场的时候终于到了。此话的意义很明确，印度准备动武了，而且是别无选择的行动。尼赫鲁还对考尔说，如果政府不采取这一行动，就会完全失去国民的信任。不过尼赫鲁此时还是无法设想会发生大规模冲突，他以为印度只要摆出强硬的样子就足以镇住中国。他也承认在喜马拉雅高原地带军事行动的困难，只能要求印军尽力而为。尽管他已决定或同意了基本对策，但明显未让军队采取实际行动。至于梅农，则正忙着考虑那些有关巴基斯坦军力调动的似是而作的报告。

但是印军指挥官们却没有根据尼赫鲁制订的政策框架采取适当行动，也未妥当使用他赋予他们的权限。指挥官之间相互不信任，各自为阵地制定军事行动计划。10 月 9 日，考尔命令印军在东线发动进攻，遭到中国边防部队

的迎头反击。当考尔发现中国军队的实力比他预想的强大得多时，他建议实施印度政府已经排除的空中攻击。他飞回德里汇报情况，尼赫鲁却让他的将军们自行决定以后的行动。根据印军总参谋长塔帕尔、印军东线总指挥舍恩、陆军总指挥考尔在 10 月 11 日的决定，实施既不进攻也不后撤呆在原地的计划。

尼赫鲁第二天赴科伦坡前在德里机场对记者说，他不能确定印军进攻的时间，它完全取决于军队。他的讲话招来不少称他是好战分子的指责。尼赫鲁随后又在科伦坡表示，没有强制军队仓促行动。给人印象是战争的決定权完全操在军方手里。他说，喜马拉雅的冬季已经开始，中国军队在后勤保障方面占有比势其言外之意是他并不希望过早采取行动。尼赫鲁的言谈中毫无乐观情绪可言，他注意到东线的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他终于意识到大规模的冲突迫在眉睫。

关键时刻终于出现在 10 月 20 日那天。印度军队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全线反击，击溃了印军的进攻。

尼赫鲁被印军的出师不利弄得不知所措，中国却在战场反击的同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尼赫鲁提出解决边界争端的三项建议，其中包括两国总理会晤谋求和平解决，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双方军队各后撤 20 公里等内容。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致信亚、非领导人，呼吁他们主持公道，在中印直接谈判中扮演积极角色。但尼赫鲁顽固地反对中国提出的“实际控制线”一说，拒绝中国的建议。

与此同时，印度在外交上开始遇到困难。尽管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一直有明显地亲印倾向，但尼赫鲁显然过高估计了对苏联支持的期望值，古巴危机的爆发此时正让赫鲁晓夫焦头烂额，他不希望再过多介入中印之间的争端，他一面继续批评中国反击的正当行为，同时又指责尼赫鲁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和解决心”，催促他无条件地接受中国提出的三项建议。尼赫鲁这时已顾不得其他，成立了以自己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印度总统也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印军从 11 月 15 日起又在中印边界东段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很快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印军的溃败甚至引发了在阿萨姆、孟加拉地区进行大疏散和引爆阿萨姆地区大油井的恐慌。

赫鲁晓夫继续给尼赫鲁去信，希望他表现勇气和克服冲动，立即接受停火。尼赫鲁原以为与中国的严重冲突会扩大成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但古巴导弹危机使这一可能化解了。他在赫鲁晓夫那里碰了钉子后，一时间仿佛觉得自己受到孤立，甚至在不结盟国家内部，除了纳赛尔和铁托以外，很少有人轻易向他表示同情。他急不可待地将希望转向美国，两次致信肯尼迪，称形势已变得“实在不可收拾”，恳求美国立即提供至少 12 个中队的战斗机和雷达通讯系统。他还要求美国直接派空军加入印方作战。肯尼迪没有明确答复，但表示愿考虑派第七舰队驶入孟加拉湾水域游弋。可以看出，尽管尼赫鲁还声声不忘提到印度的不结盟政策，而他的行动已表明这种“不结盟”已实在脆弱不堪。

尼赫鲁不得不承认以前没有充分认识到更新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他对梅农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向议会解释装备会如此匾缺，我们对这种指责难辞其咎。”印度开始争取从任何来源，特别是西方国家获取武器，从英、法、比利时等国购买的武器很快运回。美国也马上作出提供军援的表示，肯尼迪居然还在信中高度赞赏尼赫鲁在中印冲突中表现的克制和忍耐。可梅农忘了

及时告诉美国人印度究竟需要哪些武器，他这时的精神仿佛已经崩溃了，竟惊慌失措地对记者们说，中国人只要愿意就能打到加尔各答。尼赫鲁发现梅农的失常表现，改派他留在内阁负责国防生产，几天后又同意他辞职，任命恰范接替国防部长。

面对严峻的战况，尼赫鲁慢慢镇定下来，相信自己能对付形势。他一面表示绝不对中国示弱，同时也决定不将事态扩大。他拒绝对中国正式宣战或断绝外交关系，打消了将问题提交联合国的念头，也没有匆匆忙忙与其他国家缔结军事同盟。他也寄希望苏联能在古巴危机结束后恢复对印度的支持。他没算错，苏联的确又公开表明对印度的同情和支持，赫鲁晓夫要尼赫鲁相信苏印是最好的朋友，他虽不能向印度提供武器，却可根据已订协议提供运输机、零部件和帮印度培训机组人员。不过事实上赫鲁晓夫慷慨得多：苏联答应向印度派送米格—21 型战斗机和援建米格飞机制造厂。

中国军队成功收复边境地区之后，并未像尼赫鲁担心的那样长驱直入进军印度。11 月 21 日，中国宣布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表示将主动从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周恩来再次致信尼赫鲁，呼吁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12 月 10 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表示印度将接受停火并赞成安排双方军队脱离接触。4 个月后中国全部释放了 3000 余名印度战俘。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没有解决，而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却结束了。

二十二、英雄未途

人们注意到，在1962年以后，尼赫鲁的意志日渐消沉，威信也开始减弱，这显然同印度在对中国的边境战争中的惨败密切相关。他继续行使总理职权，因为他既不可能让自己退休，旁人又不好坚持请他离职。这时的他已是心力交瘁，病疾缠身，以前在公共活动中表现出的那种热情和开朗也不见了。不过，他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也未看出大多数人民有更换他们的领袖的意思。教派主义组织支持议会反对党的少数议员对尼赫鲁恶意贬损，除此以外，其他各方仍认为他在印度当时所处的内外危机中是最合适的领导人。

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失利令全国上下一片混乱，人们感到耻辱和悲观。尼赫鲁十分沮丧，但逐渐开始恢复过来，痛定思痛。从印度看来，这次战争中除去其它因素，国防落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照尼赫鲁的话说是“物资和心理都准备不足”。经过这场有失体面的短兵相接，他开始切身认识到，工业进步和发展军备极为紧迫和重要，真正的实力还在于建立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一旦需要，就可将它转向服务于战争。他要求在备战的同时充分重视刚开始实施的“三五”计划，继续强调利用外援必须首先保证本国经济的适度发展，不能依赖源源不断从国外获取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也算是他的教训之一。

边界战争也强化了他对提高生产水平和实现印度式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他看来，印度要想改善自身处境与中国一争高低，就非得如此。但他也称印度需要看到更远的未来，“一个远见失误的国家会走下坡路，而一个毫无远见的国家则会逐渐失去其生命力，最后坐以待毙。”他好像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强调远景，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在眼下困难的时候保持住乐观。

尼赫鲁，这位已步入垂暮之年的智者，这位为自己国家的发展壮大殚精竭虑的总理，这位在中印冲突中碰得头破血流的政治家，这时仍不忘为他自己的印度勾画他已无法印证的宏伟蓝图。他开始更关心国内的经济问题。

除了继续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意义外，尼赫鲁现在也承认必须优先考虑农业。他在“三五”计划关键的1963年指出：“我完全赞同发展工业，完全赞同发展钢铁厂等等，但我必须说，农业比任何工业都更加重要。”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失误。的确，仅有农业的发展国家并不能迅速前进，可是他终于认识到必须将农业放在工业化之前优先考虑。新的发展战略是优先、重点发展农业，同时奠定工业化结构的基础。

尼赫鲁极力要求各邦尽量提高粮食亩产，而不是只满足于粗放耕作新增土地。要想长期稳定地增加农业产量，答案仍还在于合作农业。说到头这还是一个改变印度人民的基本观念的问题。尼赫鲁怀着一种远离现实的乐观情绪，依然指望乡村发展计划和乡村管理制度出现奇迹，继续把它们看作是全国范围内最有希望的发展，正在形成中的革命化运动。尽管实际成果还不到预期目标的四分之一，但对他而言已是“令人惊喜的成功”，从根本上增强了印度的国力，动员了千千万万人民肩负起自力更生的责任。他告诉来访外宾，“我对它的成功深信不疑，我充分相信印度人民。”他似乎觉得对成功的主要威胁不在其它而在官员们过度干预，因而反复强调官员不应用领导权去压制其他人，而应鼓励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主动性。

他注意到印度只求经济高速增长而牺牲公平分配的倾向。从经济发展中

获益的基本上是那些有经济实力利用新机会的富人，结果富人更富了，穷人则一无改变。尼赫鲁相信，这一现象虽然无法完全避免，但需要尽一切办法减少贫富悬殊，必须阻止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我喜欢大工厂，喜欢感受到机械化，喜欢看到它们，我感到它们对国家发展计划的必不可少，但我们不能无视一个现实：今天印度某些地区的人民甚至连干净水都喝不上。”他警告官员们：人民大众不可能仅靠期望和诺言永远等待下去，如果对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无所作为，不出十年，他们就会对和平的变革方式彻底厌倦。

也正是出于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不忘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尼赫鲁再次想到实行土地改革的迫切性。国际福特基金会的拉德金斯基教授催促他立即采取措施，逐渐控制无土地农民的数量上升，具体措施包括：授予土地所有权；保证租佃权；坚持实行合理公道的地租；修改各邦的土地法规，以便保证法规服务对象真正受益。这些措施不仅在道义上绝对必要，而且从生产增长看来也十分紧迫。尼赫鲁大张旗鼓地呼吁国大党贯彻现行法律的正确精神，争取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但他的的话迟迟未能兑现，也许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身心劳累，已是烈士暮年，根本就没精力和工夫坚持到底。

印度的自信心由于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失利而大受打击。作为恢复印度元气的一项政策，尼赫鲁努力想纠正国大党和政府内部的风气。他认为，国大党过去尽管曾面对许多破坏性因素，仍然保持住印度的团结统一，它今天必须再次肩负这一重任。他反复讲，国大党不只是一个赢得选举胜利的组织，也必须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为自身理想而奋斗的政党。当看到一些反对党正利用战争引起的国内危机捞取选票时，他号召国大党奋起反击。但国大党的情况令人担忧，邦和区一级党组织掌握领导权的人既无经验又无热情，仅热衷于追名逐利，自我膨胀。尼赫鲁认为内部的缺陷和弱点甚至比外部的挑战更加危险。国大党的状况与印度生死攸关，他必须要求国大党人维护印度的团结和稳定，这本身也符合国大党的利益。他对青年国大党人谆谆寄语：“强调国大党所代表的原则，不应强调个人的作用和利益，因为即使最优秀的国大党人也是在国大党的旗帜下培养出来的。”

但告诫归告诫，国大党机构的状况没有多大改观，明显的反映是它在三次补差选举中败北，尼赫鲁个人也为此招来严厉的批评。获胜的反对党领导人得意地说：失败仿佛已打懵了尼赫鲁，他现在比过去更不敢掉以轻心了。尼赫鲁指责反对党难当大任，不负责任，“最近的表现极不得体”，令人想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但他认为问题出在国大党内部，党内和国内的确存在着“停滞不前的作风”，国大党需要彻底救治才能兴旺发达，国大党重新恢复活力才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著名的“卡马拉季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笼的。

卡马拉季是同大党内的权势人物，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他公开提议他本人与另一些邦的首席部长辞去政府职务，以便全力投入党的工作。不久这一计划自动扩大了范围，提出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一些主要部长辞职。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卡马拉季自己的想法还是他在秉承他人的旨意行事，尼赫鲁多次否认他与卡马拉季计划的关系，表白他不是一个喜欢耍花招的人。当然没有理由不相信尼赫鲁，不过该计划肯定在许多方面满足了他的需要。最能干的邦政府领导人带头辞职，足以证明建议可行，难怪尼赫鲁对卡马拉季的赞赏溢于言表：“他的名字已刻入印度的历史。”像是一种回报，卡马

拉季在尼赫鲁的帮助下当选为下届国大党主席。

国大党核心机构和全国委员会批准了卡马拉季计划，却有一个附带条件：计划不适用于尼赫鲁本人。于是，所有部长的辞呈现在都交到总理的手里，由他来随意挑选对象。他利用这个机会打发了不少他认为能力低下、腐化堕落或明显在基本政策上与他过不去的官员。交出部长职务的也有后来继尼赫鲁担任总理的拉尔·夏斯特里，他以对尼赫鲁本人的忠诚著称，办事兢兢业业，处处与人为善。不过，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不过是一个引蛇出洞的诱饵，用他引出尼赫鲁并非因个人原因想除去的人物，尤其是财政部长莫拉吉·德赛。潘特死后，德赛成了资格仅次于尼赫鲁的国大党前辈，他不仅政治上保守右倾，其它方面也是出了名的守旧派人物，他顽固地反对种牛痘和打预防针，却把每天喝自己的晨尿奉为养生之法，尼赫鲁对他可说是没一点好感，早就想将他赶出政府。这一时期，还没有充分理由可说明尼赫鲁的接班问题已迫在眉睫。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本总理眼下活得正好哩！”但正由于卡马拉季计划的实施，几个月后当尼赫鲁去世时，德赛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总理职务的宝座与自己无缘。尼赫鲁当时恐怕也没意识到，是他插手决定了德赛后来的命运。

除了个人因素外，尼赫鲁认为卡马拉季计划还有其他一些优点他承认，惹人注目地干出某件颇为离奇的事，并不能改变世界的整体面貌，也无法扭转印度的主要趋势，但它却能使人民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醒悟过来，促使他们思考，摆脱成规陋习的束缚，从而有助于造就一种使他们奋发向上的良好风气。它抑制了迷恋权位、官官相护的坏习气，巩固了国大党的组织，也符合甘地的传统，即甘地号召的国大党人不仅放弃官价，而且不做坏事。尼赫鲁客气地说：经验丰富的能人从政府中辞职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像失去了人的右臂”，但它带来的长远利益将弥补一切损失，因为该计划的宗旨在于恢复国大党和政府、党组织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从而使两方面受益。

印度政界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卡马拉季计划的政治意义，只把它看作是操纵权力的把戏。并且，卡马拉季计划从短期看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政治大扫除，但长远看来却削弱了尼赫鲁操纵国大党的基础。它并不能加深总理及其内阁成员在中央和邦一级同大党内的权威，反而增强了国大党组织中重要人物的势力，他们从各邦进入德里，继而削弱了中央政府。这在尼赫鲁之后的时期引出许多麻烦和混乱。

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权势正在迅速上升。甘地夫人 1955 年进入国大党核心机构，向权力迈出关键一步。她逐渐从父亲的生活中走向前台，成为公众瞩目的人物，4 年后她相当顺利地被选为国大党主席。由于她的特殊背景，她明显比前几任主席更有实力，更加上她处理几个棘手问题时表现出勇气和果断，她很快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不过几乎无人怀疑尼赫鲁对她仕途鸿达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他做得非常得体高明，甚至表面看去他也制造些小障碍，并且甘地夫人本人也矢口否认。但正如一位作者对尼赫鲁的评论：“有关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女儿的政治前途，父亲有什么不会做的呢？”无论怎样，英迪拉在尼赫鲁时期的从政经历从哪一方面都对她在父亲死后不久登上总理宝座不无帮助。

尼赫鲁总理任内的后期，政府部门的主要问题是腐败风行，它逐渐成了层层官僚的通病。显然人们都在众口一词地议论需要打击和根除腐败，但尼赫鲁却始终认为反对派夸大了政府腐败的程度。他公开断言：“大体而论，

我们的政府属世界上最少腐败的政府之一。”大概这是因为他担心追究和防止腐败活动可能助长印度人动辄喜欢的人格毁损。“我们的政治正逐渐陷入困境，大多数人都在相互攻讦对方腐化和犯有其它罪过，这表明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宜提倡的心态。”要在反腐败和防止诽谤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却并不容易。尼赫鲁经常说：含糊的指控毫无用处，反会给调查带来困难。而他总希望查明腐败和滥用职权的具体事例，承认“在涉及部长和官员的案子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件十分头痛的事。”他发现瑞典式的“专职廉政机构”很不错，却又担心它在印度这样一个大国会演化成一个与政府平起平坐的官僚部门。他任内从没建起过这类机构。他本人对金钱没有兴趣，因此也对追查和惩处政客中的腐败行为缺乏应有的重视。他对部长们的标准是：只要工作成效好，观念进步，可以弥补在经济问题上不拘小节或利用公职之便让朋友牟利的错误。

1962年内发生了两起最突出的公案，清楚地表明尼赫鲁在处理政府高级官员舞弊行为上的难堪处境。两件事的当事人在政府内官居要职。一位是内阁部长德夫·马拉维亚，此人十分能干，特别是他在发展印度的石油工业方面摆脱了外国公司的控制，为此深得尼赫鲁赏识。后来查明他曾强求一家私营公司在选举中赞助某位国大党候选人。金钱数目不大，尼赫鲁也相信那家公司其实并未因赞助而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好处，但问题毕竟检举出来，证据也对马拉维亚不利。尼赫鲁很勉强地接受了他的辞呈，但依然相信他的清白和诚实。为了让公众舆论满意，尼赫鲁答应进行一次极不正规的开庭审理，马拉维亚出于忠诚，只得忍受了审理程序上的对他的不公正。

另一起事的主角是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辛格·凯隆，对他腐败的指控要广泛和严重得多。尼赫鲁极为赞赏他的领导能力和个人威望，对他的营私舞弊却不多言，只是在私下曾提醒过他注意，公开场合总是对他一味支持。当反对党以确凿证据指控凯隆时，最高法院打算审理他的案子，但尼赫鲁表示不愿他辞职。尼赫鲁很不情愿地同意对指控他的所有问题进行司法调查，却坚持要他在提出报告以前继续留任。结果调查报告直到尼赫鲁去世都没有写出来。

在尼赫鲁后期，外部的形势依然严峻，麻烦很多。印度在中印战后准备与中国进行长期对抗。从表面上看，印度的外交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但出于安定国内情绪和增强防御能力的需要，印度实质上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尼赫鲁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适应美国的需要。

边界战争停火后，印度主动提议与美国签订协约，考虑如

果中印再度开战，印度将派战术飞机投入战斗，美国方面负责承担印度主要城市的防空任务，印度为此将动用机场和雷达设施。但美国方积极性不高，没有忙着表态，只想让英联邦来牵头。美国只给印度派去一个军事使团。几周后当肯尼迪与麦克米伦见面时，英国方面也没有更多的表示。

西方认为，利用中印冲突将印度绑上西方集团战车的机会就是在这时溜掉的。美国只答应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军援，此外什么也没做，这对印度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鉴于美国已向巴基斯坦提供8亿美元的军援物资，印度要求在5年内得到5亿美元的军援本来也不算过份。这时接替加尔布雷思再次出任美驻印大使的鲍尔斯敦促美国政府考虑满足印度的要求，让印度取代巴基斯坦的位置成为美国在南亚的主要伙伴。肯尼迪同意，但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却劝他不要招惹巴基斯坦。于是，印度不仅只得到了它指望获得的

援助的半数，而且还得考虑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再作让步。

尼赫鲁这时降低了要美国提供“空中掩护”的调门。他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如遇中国空袭，印度等不及美国空军投入战斗就会遭到严重打击；况且，那样做会使印度完全依靠他国。无论尼赫鲁心里作何感想，可他在公开场合表示：印度不能放弃自力更生，不能失去道义力量；不能丢掉独立自主和自甘地时代以来印度始终坚持的基本价值，否则后果比战场上失利更可怕。他一方面强调美国帮助印度国防的重要性，同时又坚持印度仍然信守不结盟的立场。12月里，南斯拉夫的卡德尔未访，向尼赫鲁保证中苏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赫鲁晓夫历来在评论中印冲突时一面催促中印双方缔结协议，另一面却公开保证苏联决不会支持中国对抗印度，而实质上却是完全偏袒印度。换句话说，自中苏关系出现危机以来，苏联一直刻意向印度表示友好情谊。在尼赫鲁看来，印度对这种友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和不屑一顾。

就连西方国家舆论界都发现，在全球危机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从世界和平的观点看，印度坚持不结盟的立场更有利。但肯尼迪却希望借中印之争进一步拉拢印度。他公开宣称：印度的安全和独立与亚洲各国的自由生死攸关，用印度对抗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美国应该援助印度的防御和发展，以便使它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来对抗中国。肯尼迪通知麦克米伦说，假如英国不愿介入，那么美国就要自己单独干。他又问当时访美的印度官员，从政治角度考虑，印度是否同意美国和英联邦同家的飞机到印度训练演习。如果可行，他们将与印度空军合作操作机动雷达和通讯设施，最后将物资留送印度，固定安装使用。印度官员向他保证，只要重点在于训练印度飞行技术人员，肯定不会有任何阻力。结果印度与美英就提供雷达及相关通讯设备、训练印度安装使用设施的技术人员、实施联合防空训练演习达成协议。演习于1962年11月举行，美国还想再搞一次，可尼赫鲁不干了。他明确通知议会，不能由任何外国军舰、军队或飞机参与印度国内的防御，印度国防要靠自己军队承担。肯尼迪还准备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但就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向印度提供军援的前几天，肯尼迪遇刺身亡，接任的约翰逊受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影响，将这件事搁置下来。

尽管从美国得到的军事援助不多，尼赫鲁仍对加强印美两国的政治关系深表兴趣。他公开承认印美两国关系从未像这时一样亲密，承诺印度将尽其所能支持美国在亚洲的政策。不过肯尼迪对此并不完全相信。尼赫鲁也答应：印度愿与美签订一项由美向印提供高功率无线电发射器，允许“美国之音”从印度向东南亚进行播音的协定。他的许诺在国内招来强烈的批评，他这才细看了协议全文，马上改口让内阁加以拒绝。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自我解嘲他说：“就是齐心协力的家庭内部也难免不出差错。”

同一时候，尼赫鲁面对美国国会的反对，也出于避免肯尼迪为难，撤回了要美国援助印度建立一座大型钢铁厂的提议。肯尼迪用许诺来表达感谢：“请放心，无论有任何起伏波折，美国将继续充当印度发展和安全的后盾。”一些人以为，尼赫鲁放弃“美国之音”协议和撤销援建钢铁厂的要求再次表明印度倡导不结盟原则。但显然印美两国并不会这样看。事实上，尼赫鲁这时已在另两项后果重要得多的事情上提议积极配合美国的政策。他同意美国U—2型高空侦察机侵犯中国西藏领空途中在印度降落和加油，允许美国1964年初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安装由核电池带动的遥感设施，以便获取中国的导弹发射情报。一句话，尼赫鲁对中印之间的长期对抗和印度对美国援助的依赖

深信不疑，他不顾一切地让印度卷入了不久前还让人难以置信的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他历来坚持的不结盟原则的悲剧。

印美关系与印巴关系密切相关。1962年秋，阿尤布·汗更强调通过与中国加强关系来向印度施加压力，同时要求美国向印施加影响。尼赫鲁再次重申印度的观点：克什米尔问题不能根据宗教原则决定。

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巴基斯坦站在中国一边，批评尼赫鲁拒不接受中国的条件，奉行“扩张主义和倒行逆施的政策”。巴国内一些重要人物也讲要利用这一形势。尼赫鲁听到的传闻是中巴已达成协议，巴基斯坦的领土要求已不止是克什米尔。尼赫鲁在美国的劝说下表示：只要巴基斯坦保证不进攻印度，印度将立即作出积极反应。阿尤布未按他的意思作出保证，不过也未趁此良机向印度开战，阿尤布向尼赫鲁提出：印巴次大陆“存在重新开战的潜在危险”，必须解决印巴之间的重大争端。肯尼迪分别回信给他们两人，希望他们停战和解，找出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方法，以便共同对付中国。尼赫鲁也致信阿尤布称中国是目前最主要的威胁，并向他保证其它国家的援助只用于对抗中国。他极力笼络巴基斯坦：“我们完全不想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印方绝不会主动挑衅。我相信，印巴的前途在于为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友好合作。”中印停火之后，美英两国特使穿梭于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之间，督促尼赫鲁和阿尤布两人同意开始谈判，争取就克什米尔及其它相关问题的明显分歧达成体面公平的妥协。似乎人人都认为这时是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好时机，尼赫鲁也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印度依赖美英的军事援助，也是它很难拒绝与巴基斯坦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美英特使明言：美英两国的公众舆论赞同向印提供慷慨援助的前提，是印度同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美英也担心阿尤布被更亲近中国的人物赶下台。

尼赫鲁确实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但他向外界表示对谈判成功不抱太多希望。尼赫鲁从来就相信，克什米尔不是巴基斯坦敌对印度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即使在此问题上达成协议，对方的进一步要求也会接踵而至，何况他认为，公民投票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重新煽起教派主义情绪。印度也

407

个工厂担心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会使它在与中国的对抗中处于不利、特别是在靠近中印边界西段的克什米尔河谷地带。所以尼赫鲁反对将河谷转交巴基斯坦，也反对由大国保证河谷地区独立或联合国对这一地区实行监管。尼赫鲁觉得巴在利用印度对中国敲诈，西方则装聋作哑。他对肯尼迪说：只有巴方通过外交努力而不是讹诈，会谈才有成功的希望。

谈判一开始就不顺利，尼赫鲁明确宣布不作更多的让步。他发现阿尤布好像也不给他让步的机会。就在印巴部长级第一轮谈判即将开始时，印度获悉，中国与巴基斯坦就两国边界划定达成基本共识，准备在此基础上尽快签订边界临时协议，待克什米尔问题最后解决就签署正式条约。尼赫鲁正指望巴在中印冲突和对抗期间不支持中国，自然不能容忍巴方对他的藐视。

尼赫鲁看来这简直是一个不祥的开端，他强压怨气，没有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他开宗明义地说：准备讨论巴方提出的任何问题、但对克什米尔问题只能修改停火线，在印度稍稍退后的基础上划定国际边界。这当然不能令阿尤布满足。从国际关系看，巴在谈判中的地位比印度有利，除了得到美国

的同情和已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外，巴也在与苏联改善关系。印度谈判中的处境则不如过去。巴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长佐·布托，这位巴基斯坦政坛行情看涨的人物私下奚落印方说：“你们不过是一个败国罢了。”

由于尼赫鲁排除了全民公决或其他任何可能加重教派骚动的解决方式，谈判的余地大大减小。阿尤布谴责尼赫鲁搞阴谋诡计，目光短浅，既急于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达成交易，却又缺乏政治家的气魄和慷慨大度。他坚持要求尼赫鲁答应一年之内在克什米尔搞公民投票。肯尼迪建议尼赫鲁主动作出某种高姿态，表明印度希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并愿为印巴次大陆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与巴基斯坦取得和解。他提示重要的是印度在考虑巴方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某些具体操作性建议。由于从综合国力看巴基斯坦不如印度，他建议印度应先走一步。如果解决了克什米尔问题，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就会重新增强，影响印美关系的一大麻烦也会随之消除。

美国原相信印度将部分河谷地区让给巴基斯坦是公平的，但随着政治气候愈益对巴基斯坦有利，当1963年2月在卡拉奇举行会谈时，布托提出巴基斯坦应获得整个克什米尔，仅把靠近印度喜马拉雅邦的一小块留给印度。这时尼赫鲁沉不住气了，他抱怨巴基斯坦完全没有诚意，觉得谈判已失去意义。但他又怀疑退出谈判正中巴方下怀，因为一旦这样，巴就有理由当中印再次交战时乘机进攻印度。同年2月底，布托访问北京，中巴签订边界协定并发表联合公报，尼赫鲁更加深了这种猜忌，为了防止意外，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参加漫无目标的谈判。

第二轮谈判在加尔各答举行。英国突然提出国际共管克什米尔河谷的建议，美国却认为这样做不现实，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可能对有关亚非国家施加影响。但英国的建议却加强了巴基斯坦不计步的理由。印巴双方僵持不下，尼赫鲁则将僵持局面归为第三方的不适当干预，他致信肯尼迪说：“我相信这些倡议无论意图多么良好，但考虑欠佳，至少目前不可能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谈来谈去，印巴两国的分歧还是无法消除。布托又提出修正性协议，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对河谷实行国际托管，随后举行公民投票；西方则继续催双方对巴获得部分克什米尔河谷地区的问题达成协议。但尼赫鲁此时疑心很重，老觉得巴并不真的希望解决问题，而是想利用中印之间的敌对为自己谋利。他顽固地相信中巴两国在共同对付印度，因此绝不能对巴让步。巴基斯坦也拒绝签署非战宣言，拒绝撤退军队和在停火线脱离接触。印巴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谈判只得收场。

即使这一时期，尼赫鲁心里也不无矛盾。一方面，他急于与巴基斯坦达成协议，认为巴基斯坦过去一直是印度的一部分，尽管政治上已经分治，但在感情、语言、文化每方面都与印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亲和力应超过其他任何两国；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容忍将克什米尔河谷地区交给巴基斯坦。在他观念深处，克什米尔只能是印度的，巴基斯坦或任何第三方休得问津。印巴谈判破裂一月后，布托曾向报界透露中巴之间已有军事上的共同安排，他说：“假如与印度之间发生战争，巴基斯坦并不孤立，巴将得到亚洲最强大国家的支持。印巴之间的战争涉及到亚洲最大国家的领土利益和观念。”尼赫鲁听到后更加不安，将这些话指责为“讹诈”，并又加强了他反对对克什米尔实行国际托管的态度。

当美英两国再次提出居间斡旋时，尼赫鲁表示，只要巴基斯坦同意，印

度就愿意成立专门机构讨论印巴两国全部有争议的问题，争取建立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尼赫鲁的让步，一年前他绝不至于如此，但现在不甚情愿地接受了，为此不能低估西方的影响。但巴基斯坦却规定了印度不能接受的调停条件：讨论只限于克什米尔问题，确定最后解决的时间表，西方在调停成功前停止对印提供援助。因此，尼赫鲁有理由认为，巴基斯坦是在刁难印度，显然不希望谈判成功，这样它便能使用其他手段。

尼赫鲁对英美敦促的调停越来越失去兴趣，表示只要不存在和平气候的重要先决条件，调停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还认为，调停提出的建议只会削弱印度的国防实力，如果西方国家想要帮助营造印巴之间改善关系的适宜气氛，就应通过悄悄的外交努力。肯尼迪并不赞同尼赫鲁对中印再次开战的看法，他认为并不存在中、巴共同进攻印度的可能。他对尼赫鲁的消极态度感到惊讶，直截了当告诉后者说：印巴关系的僵局的确增加了他说服国会援助印度的困难。尼赫鲁却坚持认为，恢复谈判或接受西方调停对印度都没有好处，只是一种“自杀行为”，因为印度的公众舆论会认为这是屈服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第一步，也是在政治上向中国认输的前兆。因此，只有西方劝说巴基斯坦在中印对抗中保持中立，印度才可能考虑调停。尼赫鲁始终怀疑中巴已私下达成共同对付印度的协议，印度可能腹背受敌，因此他坚持说，只要巴基斯坦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共同敌视印度，印巴之间就不可能在达成协议上取得进展。

也许他此时对中国的顾忌太深，也许他真的迫切想在晚年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尼赫鲁的确希望从总体上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在寻找一种不仅包括克什米尔，也涉及所有问题在内的长远解决办法，其表现是他再次认真思考了在南亚建立邦联的构想。就在印巴第一轮部长级谈判前夕，尼赫鲁在德里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说：印度与克什米尔间的联邦关系可以同样用于东巴和西巴，一旦将来时机成熟就可组成印度、巴基斯坦及其他邻国的大邦联。它对巴基斯坦的好处是既可保持与克什米尔的联系，又可作为减弱东巴日益上升的分离主义情绪的安全阀；对印度的吸引力则在于抹去教派主义色彩，摆脱“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理论，重新打开印度和巴基斯坦和平与合作的大门。他晚年对人们说：“邦联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看看欧洲，看看共同市场，各处都在表达这一类强烈愿望。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那么近，然而巴基斯坦却惊恐不安，总以为我们想要吞掉它。”

尼赫鲁希望他的这些话不要公开。不出他所料，他的谈话一发表就遭到巴基斯坦的强烈批评，巴指责他的话暴露了印度主宰整个南亚的野心。问题明摆着，印度在这类组合中显而易见是控制力量。所以，尼赫鲁虽然向往印度与巴基斯坦在保留相当自主的同时齐心协力，他只能将这种一厢情愿藏在心底。他仿佛预感到世界正朝着有利于各国走向区域化的方向发展，但他怕激怒巴基斯坦，因此不可能认真考虑在南亚实现这种组合的可能性。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都被这两个相互矛盾冲突的观念紧紧困扰：巴基斯坦正与中国共同将印度作为主要对手；印度与巴基斯坦应该携手合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种难以法除的矛盾心态大概是影响他后期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巴基斯坦的谈判失败后，尼赫鲁又将目光转向克什米尔内部问题。那里的形势一直没有好转，阿卜杜拉及主要助手仍在狱中，指控他搞阴谋活动

的审判却漫无止境地拖延着。克什米尔邦政府不坚持民主政治的正常准则，1962年的选举显然是在权力操纵下进行的，结果执政党获得差不多全部席位。尼赫鲁冷冰冰地对首席部长说：“事实上，你在真正的对手面前失去一些席位，你的地位反而会稳固得多。”他甚至承认，克什米尔邦政府比独立前的王公专制政权好不了多少。

阿卜杜拉在1962年致信尼赫鲁，希望首先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然后共同对付外部挑战。但当时尼赫鲁麻烦重重，无暇考虑。印巴谈判失败后，尼赫鲁将眼光重新转向阿卜杜拉。他后来多次表示逮捕阿卜杜拉没有任何理由，并叹息他没有勇气促成释放他。1962年他曾设法让阿卜杜拉获释，但受到克什米尔邦政府和印度国家安全署的阻碍。下一年尼赫鲁有了采取主动的机会，他先利用卡马拉季计划撤换了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接着又施加中央政府的影响。1964年初他大病发作后不久，力争撤销了对阿卜杜拉阴谋案的指控，他解释说：“假如罪责数年内都无法证明，显然就是莫须有的罪名。”

不久阿卜杜拉获释，尼赫鲁邀请他来德里作客，阿卜杜拉接受邀请，与尼赫鲁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对尼赫鲁允许逮捕并长期拘押他满腹怨言，指出现在克什米尔几乎人人都不喜欢印度而倾向巴基斯坦。如果印巴冲突继续下去，克什米尔不仅难有正常的生活，也会加剧印度其他地区和东巴的教派紧张关系，从而产生影响深远的恶果。尼赫鲁称阿卜杜拉是“老朋友、老同事和亲兄弟”，表示理解他的立场。阿卜杜拉赞成尼赫鲁与巴基斯坦达成某种增进和平和合作信心的协议，为最后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创造条件。

尼赫鲁没有向阿卜杜拉提任何建议，只催促他讲出头脑中的具体方案。阿卜杜拉的答复并不明确，称他赞成非教派化的观点，也认为克什米尔并入印度的决定并非不可更改。尼赫鲁未讨论邦联的想法，但阿卜杜拉想必知道他在这种想法，所以主动提出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组成邦联的可能性。不过他设想的范围比尼赫鲁小，没有考虑东巴的自治问题。尼赫鲁感到不大高兴，认为他的想法既不成熟也缺少公平。不过他同意阿卜杜拉在应邀访巴时向阿尤布提出此事。尼赫鲁这时对阿卜杜拉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因允许长期关押他而有所负疚，又对他的活动产生的后果感到担心。好在阿尤布不同意这项他认为“甚为荒唐”的建议，他通过这份建议马上认定尼赫鲁又在搞什么鬼。但阿卜杜拉访巴一定意义上也富有成果，他劝说阿尤布答应去新德里与尼赫鲁讨论印巴关系。尼赫鲁得到消息后向阿尤布发出正式邀请。遗憾的是，当印度驻巴外交官接到这份邀请准备转交时，已是尼赫鲁去世当天的上午。

一定程度上说，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整个穆斯林问题的一部分。1964年，东巴爆发了暴力冲突，大量难民涌入印度，从而又引发了印度加尔各答等地的教派骚乱。尼赫鲁建议阿尤布举行部长级磋商，他也对教派暴力卷土重来痛心疾首。形势清楚表明，教派主义的毒素远没有从印度清除，暴力事件特别在尼赫鲁去世那一年又陡然上升。人们甚至觉得印度又回到了印巴分治初期那段令人悲哀的时期。

印度不断发生教派冲突和血腥事件的一大政治后果，就是大大削弱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积极交往的能力。尼赫鲁对人民院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极力主张印度坚持甘地式的态度，主动表示友好和善意，以正确的行为作出典范，从“心理上”迫使巴基斯坦对印度友好。他坦诚地说：印度并非没干坏事，她不应自以为公正善良，无懈可击。反对派还讽刺他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尼克松的评论也许正确：“尼赫鲁的最大弱点是：过多地把他那无可否认的出众天才和精力用于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冲突。如果他还活着，完全能够而且也有力量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忍痛作出牺牲，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未能使自己做到这一点。”1964年教派暴力事件的回升给尼赫鲁生命的最后时分蒙上厚厚的阴影，他直至临终也未能看到他坚信不移和毕生坚持的这项事业有成功的迹象。他死后的第二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和教派抗争等问题再次兵戎相见。

正是在这种内外处境艰难而又希望复苏，失落与向往，挫折与信心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境中，尼赫鲁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

长期以来，尼赫鲁总喜欢炫耀自己与病疾无缘的健康，红润的面容和从不用药的体魄。直到满70岁时，他仍夸口自己好多年没生过病了。但在1962年春季，一次尿道病毒感染引起间歇性低烧，长期积劳影响了完全康复，大量服用抗菌素又加重了他的体质虚弱。尼赫鲁4月里几乎一直卧床不起，承受着肾痛的折磨，他极不情愿地接受医生警告，被迫承认自己的体能已开始逐渐衰竭。他让自己顺从于一种懒散松弛，没精打采的养生疗法：中午午睡，晚上11点上床，频繁休养。他也更严格地限制自己的饮食，实际上不再吃肉食和牛奶，而主要吃些水果和蔬菜，再加上少量的鱼和鸡蛋。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未能完全驱除疾病的侵染。从这时起，他眼角周围稍微一点的虚肿也会非常明显，他的面容用一位密友委婉的话形容：终于开始与他的实际年龄相符了。

随后在1964年初的国大党布瓦勒斯瓦尔年会上，尼赫鲁的身体左侧严重中风。经短期休息后，他还想像过去那样继续自己的工作，听说苏联医生建议他长期疗养恢复，他终于爆发了：“让他们见鬼去吧，如果我躺在床上哪怕一周，我知道我就不会再起得来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看上去腰弯背驼，面部浮肿，深陷的双眼呈现暗晕，显得老态龙钟，反应迟缓，他周围几乎每个人都明白他的日子不多了。他绝不会怕死，很多年前当他在监狱里忍受伤病的煎熬时，他曾写道他并不特别渴望长寿：“当生命临近它的终点，无论它姗姗而至，还是突然降临，我想不会看到我骇然恐惧或毫无准备。”不过他向往的是：“一旦那一时刻到来，我准备为自己打上一个完整的句号。”现在他知道，最后的日子已离自己不远，只要他还有时间，就逼着自己如往常一样工作。新闻界老是向他提出人人关心的接班问题，他回答说：“我的生命还不会太快了结。”这一申明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决心。他全文抄下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随时带在身边，一有空便摸出来诵读，这位美国诗人的诗句也同样表达了尼赫鲁本人的疲惫不堪、安之若素和对他的人民的责任感：森林如此壮美，幽暗，深邃/但我要信守诺言/路走到尽头再去沉睡/走到尽头再去沉睡/

在这种心境下，他每周有一、两小时与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起度过，他不仅与这位他信得过的朋友讨论国家大事，也听后者谈论哲学。尼赫鲁不信奉宗教，也没有宗教信仰，但他怀有某种特殊的宗教情感。随着漫长时光的过去，他越来越对吠檀多、《薄伽梵歌》和佛教的教义产生出心灵上的共鸣。热衷于传播政治流言蜚语的人不知道他俩定期见面，造谣说总理与总统之间关系紧张。拉达克里希南是一位非党派人士，也是一位置身于政治喧闹之外的哲学家，他认为作为总统应该私下向总理提出忠告和公开讲明自己的观点，哪怕这意味着批评政府。尼赫鲁的心胸决不至于狭隘到对他的坦诚直言

大为不满的地步。况且他的确赞同总统的许多看法。在他们的共同关系中，现在又溶入了哲学交谈的新因素。他俩的关系数 1964 年初期几月中最密切。

30 多年前，当莫蒂拉尔患病临终前，尼赫鲁曾将他的父亲形容为一只“受了致命伤的狮子”。接近生命终点的尼赫鲁现在也处于这一境地了。在他生前最后几个月中，他常常想起印度，想起她的人民、她的未来，想起他所一直扮演的角色。他常对他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和女儿英迪拉说，他最幸福的时候，是右派攻击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软弱”，而左派又攻击他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代理人”的时候。他想说的意思是：这样会使他感到自己走的是一条正路。

还在早年，尼赫鲁已警觉到生命慢慢消逝的“可怕前景”，经常宣布一旦那个时刻来临，他渴望迅速离开人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希望我不要病倒、衰弱和躺在床上忍受病痛的煎熬，我希望能一直劳作直到突然了结生命。”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清理完手边全部需要处理的文件，处理完自己的信件，他准备卧床休息，这时已是 5 月 27 日的凌晨，他的腹部主动脉突发性破裂，疼痛难忍，只有注射镇痛剂才能使他入睡。但他再也没有从睡眠中醒过来。他曾写道：“我们大家都不得面对死亡，而能高傲着去死的人却不多见。”他自己的死亡印证了他的希望，他替自己免去了旷日持久病疾的慢慢折磨，没有作悲凄惨痛的告别，在完成一整天的工作之后便突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尼赫鲁永远离去了，印度举国上下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赶来新德里参加葬礼的不仅有各国政要高官，也有全世界不抱意识形态偏见的普通人。正如著名画家维基描绘的主题，人类因他的去世而感到渺茫无助。在一个充满偏执、狂热与暴力的世界，他毕竟一直代表着人道和理性。

最为悲痛的当然是印度。自 16 年前甘地遇刺身亡以来，这个国家从未目睹过如此因失去全民族的亲人而产生的震撼。无数成群结队的人们自发涌入德里，只为了最后再看一眼这位将印度社会各阶层的抱负聚于一身的人。政府不得不从首都以外派来大批军队阻止前来表达深切哀悼的人流，以至于首都出现了对军事政变的担心。人民的哀痛因尼赫鲁遗嘱的发表而变得更为强烈。遗嘱草拟于 1954 年，其中流溢出的丰富情感与对他的人民的深切关怀震颤和打动着每一位普通男女。他感谢他们奉献给他的厚爱，要求将火葬后的大部分骨灰从空中撒向辽阔的乡村，让它溶入尘埃和土壤，变成印度国土不可析离的一部分。他希望留下少部分骨灰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并用文笔优美的散文道出了原委：

“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深受她的人民的热爱，在她周围交织着民族的记忆，希望和忧患，凯旋之歌和胜败荣辱。她从来是印度悠久文化和文明的象征，永远嬗变无形，奔流不止，可始终还是同一条恒河。她让我想起我深深热爱的喜马拉雅山那白雪覆盖的峰峦和深不可测的涧谷，想起她下游富饶广袤的平原，我的生活和事业就在那里生根开花。她在耀眼晨曦中含颌微笑，翩跹起舞，当黄昏低暮时她阴沉朦胧，充满神秘幽奥。冬季她是一条缓缓流淌和情状优雅的溪流，夏日雨季她浩浩森森，奔腾咆哮。她有大海一般广阔的胸怀，有大海一般摧毁一切的力量。恒河对于我宛如过去历史的象征和回忆，她奔往现在，又流向未来的大洋。我尽管厌弃许多过去的传统和陋习，急于从印度身上除去镣铐桎梏，因为它们使她饱受束缚，难享安宁，分裂她的人民，压抑她的灵魂，阻碍肉体 and 精神的自由发展；我想做到这一切，可

是我不愿将自己

完全与过去割裂。我对属于我们的伟大传统深感骄傲，我知道我也如我们大家一样是那只永不断裂的链条的一环，顺着它可回溯到印度遥远古代历史的黎明时分。我不会割断那条链环，我珍视它，从它那里汲取灵感和营养。为了替我的这种渴求作证，也作为我向印度的文化遗产表达的最后敬意，我提出这一请求：将我的一撮骨灰撒入紧靠阿拉哈巴德的恒河之中，让河水将它送入永远冲洗印度海岸的浩瀚大洋。”

尼赫鲁在遗嘱中明示，不要为他举行宗教葬礼，只搞一个普通的小规模火葬仪式。这头衰老的狮子直至临终都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对宗教礼俗不屑一顾。但英迪拉没有遵从父亲的遗愿，为他安排了一个肃穆盛大的传统印度教葬礼。缓步而行的送葬队伍将尼赫鲁的遗体运到恒河边的火葬场地，移放在高高垒筑起的檀香木柴堆上，在一帮印度教僧侣的朗朗诵经声中，尼赫鲁的小外孙桑贾伊点燃了柴堆，英迪拉和尼赫鲁家族的其他成员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排，后面和周围的人们挤满河岸两旁，最远一直排到市区，一眼望不到尽头。一股青烟袅袅升起，在圣河上空缓缓飘散。

二十三、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有些人之所以在历史上重要，是因为他们展现给我们与众不同或令我们深受鼓舞的价值。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明显属于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他身上融入了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生命力。

他是一个具有性格魅力的人，他的个性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与赞美。尤其是他的与人为善。很早以前，他就已认定“生活中最根本的是人际关系，其他一切都是派生物”。对他性格的这一方面，世界知名和平人士、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的印象颇有代表性：“他完全不拘礼节，风度翩翩，外表极有吸引力；他的气质非常迷人，总带那么点腼腆的微笑。他是那种性格开朗，轻松愉快的人。我喜欢他这点。他决不摆架子，相当友好。”

那些对他知之甚少的人也难抗拒他的个

性魅力。著名专栏作家莫吉雷奇曾对尼赫鲁的政策极尽挖苦之词，但当他们见面后，他才发现他光辉逼人的一面，对他的超凡脱俗、曲高和寡大加赞赏：“我们越来越厌恶地审视那追逐权力的场面，真好比是妓院中的钢琴师。这时一位顾客走了进来，面带几乎与我们自己同样的厌烦环顾打量这里的一切。我们自然被他吸引住了。这位顾客就是尼赫鲁先生。”

伊利亚·爱伦堡将他个性中的美好一面与印度的博大传统

和人性的永恒划上等号：“要看懂一篇作品，必须理解它的潜台词。我们时代这位主要人物的复杂性格，与古老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在印度，这些传统由每一层阶梯垒成，它不仅存在于罗摩神庙中。从五年计划的统计表，充满现代精神的油画以及卧躺在加尔各答街头那些穷人的眼神中，都能发现这一传统。

它使你想起某种悠远、伟大和永恒的东西。有人说他是一位怀疑论者，甚至是悲观主义者。我似乎觉得，从他言辞中偶尔露

出的酸楚和微笑显现出的哀愁只不过是形势的需要。我暂时忘掉国务活动对他的影响，冒昧地将他性格中的酸楚感与人性永恒的探索联系起来。”

当然，批评他的性格的人也不少。除了某些是偏见以外，

也有相当真实的部分。作为总理，他常常怠慢冷落那些急于与他拉近关系的人，表现得孤芳自赏，旁若无人，甚至不顾通常的客套。例如，著名诗人聂鲁达描述过他们间的一次谈话，尼赫鲁当时在他眼里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他站起来与我握手，脸上没有一丝欢迎的笑容，他极其简短地回答我说到的每一件事，用他那从容、冷淡的目光审视着我。他显得有些高高在上，神气活现，也有点呆板生硬，仿佛他惯于发号施令，但又缺少一位领导者所具有的力量。”英国工党领袖盖茨克尔完全不喜欢他，称他是“颇为自负的二流人物”：“他是一位心高气傲的人，我想那就是为何他讲话总是长篇大论的原因。他真地以为人人都想听这些讲话。他是一位十足的贵族，虽然接受了民主机制，毫无疑问是真心的，可他肯定不会按你想象的民主方法行事，当他开始与其他人一道相处时，他的态度极为冷淡，几乎可说是不友好。”

美国符名记者苏兹贝格曾多次采访尼赫鲁，对他的印象也是如此。他讲起1950年他们在新德里的会面：“他谈话的方式很特别，词意模棱两可，转

弯抹角。你向他提个问题，他开始回答时用他那著名的‘自言自语’的方式滔滔不绝地往下说；但刚刚开始到了关键地方，他就住了口。我对他的谈话印象并不好。”两年后他再次访问尼赫鲁，对他的看法仍然没好起来：“他虽然待我很亲热，但我始终感觉到他内心很高傲。他是一个头脑不清的人，无疑地他被自高自大的思想蒙蔽着头脑，而周围的人们的阿谀奉承显然地使他的这种思想越来越发展。”尼克松曾到德里访问，他对尼赫鲁某些个性特征的挑剔更直截了当：“尼赫鲁才华出众，目空一切，贵族气息浓，脾气暴躁，高傲自负，他有时还很傲慢，刻薄，自以为是，咄咄逼人，他还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优越感。”

评价一位名人，个性固然重要，但对一位政治领袖人物的最终评价，应是他对他的人民和对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影响和贡献。尼赫鲁通过这一考试毫无问题。从20年代中期直到他去世的近40年中，他始终受到印度大众的充分爱戴，他们从不动摇地相信：这位在富有、舒适的家族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人，愿意为他们的目标舍弃一切，为他们的幸福尽心尽力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于是他们很容易便被他的个性、精神与行动征服了。如果说他的名字总被传奇色彩所渲染，那是因为他的身上总具有熠熠生辉的传奇成分。1943年他在亚马那加要塞坐牢，当时是印度民族自由运动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他在日记中录下佛陀的一句话：“我愿跳入熊熊烈焰的火海而决不返回家门，除非我的目标最后实现。”他说，当他偶然读到这句话时，“激动得周身震颤，仿佛就如同电击一般。”他与圣人的思想感情产生出强烈的共鸣，使命感和献身欲望重重撞击着心扉。

尼赫鲁并非生来就喜好政治，他早年并没有为自己定下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只是一个爱好广博、不求甚解的富家子弟，从他身上看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1919年印度发生了阿姆利则大屠杀，那时他刚满30岁，这一事件给他的生活带来决定性的转折，他说他自己从此获得了思想解放，头脑清醒，情绪激奋，多了“行动的紧迫感和性格的鲜明”。稍后他深受民族主义的感召，民族解放的思想赋予他一种英雄主义的表率力量。他一面积极投身独立斗争，从不逃避铁窗之苦，同时，他也开始关心和探索未来，苦苦思索将来的自由印度应当奉行的纲领他的政治声望稳步提高，思想从温和单纯的民族主义发展到关注社会经济制度和国际形势的高度。20年代后期起，在所有站于前列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中，他对自由独立运动需要某种经济纲领这点理解得最为深刻。英国殖民当局特别畏惧他，正在于他身上汇聚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成分。圣雄甘地号召农民参与政治斗争，却并没有疏远印度社会的其他阶级，从而他将国大党这个社会精英组织转变成由众多阶层组成的联合阵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尼赫鲁继承了这点，但他却又使民族运动更转向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是解决印度贫困问题的唯一良方，而且也能为民族运动争取或挽留农民阶级，并使民族运动与世界其他进步力量步调一致。

30年代是尼赫鲁思想成熟和政治声望陡然上升的时期。他信奉社会主义，关心整个世界的命运和前途，由此得到印度国内外大部分知识界和左派的舆论的认同与支持。革命的激情一面和理性一面在他身上达到和谐。他充满热情和自信，持之以恒地探索一种适合于印度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共产党人批评他喜欢“小资产阶级的夸夸其谈”，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他的国大党侵占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地盘。事实上，尼赫鲁既置身于现实，也着眼于将来，

他将民族运动变成一场社会各界参加的反帝斗争，让被统治阶级扮演了其中最重要的角色，至少从理论上赋予运动一种社会主义的目标，使它溶入世界背景，成为人类为改善自身处境的普遍斗争的组成部分。许多人认为尼赫鲁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看出他同情、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苏联代表的新兴事业，强烈反对法西斯主义，这替他的名望大大打了一分。难怪人们说，30年代是尼赫鲁的黄金时代。

可以肯定，争取独立自由的那段岁月是他的社会生活中最情绪振奋、心境明朗的时期。他沉浸在一种因献身崇高事业而带来的强烈欢悦之中，他将抽象的政治问题自动转换成为民众熟悉的语言和行动。但在经历了无私的共同奋斗和勇敢地面对牺牲之后，一个新时期到来了，他必须领导他的人民进行另一场艰苦平凡的努力，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开放，自力更生的社会结构。这要求他在英雄业绩和创造性思考之后还必须具有建设性的治国才能。这方面的明显例子是他亲自制定了

印度的外交政策：密切关注世界的重大问题，发挥印度的独立作用，不与冷战中的任何一方结盟，不从属任何一方大国。提出不结盟的概念旨在维护民族独立，让有理性的人有权利和义务进行批评，用长远的价值观抵制眼前利益，实际上也就是要人们努力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求与其它国家友好相处，相互合作，即使是与自己意见相左也不例外。作为一位总理，尼赫鲁不得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1962年中印发生大规模边界冲突，印度为了获取援助，急需与西方国家发展密切关系，他的不结盟失去了说服力。但即使这时，印度并没有抛弃不结盟最有生命力的内核，即一种精神风貌，一种独特的看待世界问题的态度。在尼赫鲁对国际事务作出的众多贡献中，最深远的是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印度始终不受大国观点的左右，坚持自己的自主权利，自行制订政策，从而捍卫了国家的独立，维护、促进了本国利益。他也致力于反帝反殖、反种族歧视、裁军等进步事业。不结盟不可能在真空

中发生作用，它需要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不结盟运动发展到今天，其中许多内容无疑会使尼赫鲁及这一运动的其他奠基人感到陌生，大刀阔斧的变革几乎使它已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运动早期确定的准则，如反对在冷战环境下的军事结盟，不得

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等，现在不时被增加成员国热情所淡化。当尼赫鲁去世时，不结盟已被普遍公认为世界格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它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

普遍信念，并且也渗入部分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之中。

反对帝国主义，谴责法西斯主义，促成某种亚洲性格的形成，为印度和其他国家指出避开冷战的道路，同时又关注世界上出现的重人问题，确定并维护本国的特定利益，这一切对尼赫鲁可谓功莫大焉。然而，他的外交政策在实践中的挫折甚至比它为印度带来的利益更大：印度未能实现与其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正常化；边界纠纷致使中印关系恶化；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被形势捆住了手脚。

尼赫鲁始终努力想通过共同义务的认可来建立统一的印度意识，对宗教认同不屑一顾，因此他不可能承认克什米尔因它的大多数居民是穆斯林就应

该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企图使用武力解决，结果妨碍双方心平气和地协商这一问题。尼赫鲁的理想主义态度促使他将问题提交联合国，但他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这一问题陷进了大国权利政治的泥沼。几年后阿卜杜拉解职和遭捕，尼赫鲁对大多数克什米尔人民宁要世俗主义的印度不要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的自信大受挫折，他甚至打算在公民投票基础上将克什米尔河谷移交巴基斯坦，但克什米尔因美巴军事结盟而成为冷战政治的俎上之物。第一次机会丧失了。第二次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机会是在 1963 年，当时人到晚年的尼赫鲁心急如焚，不愿把这一问题留给他的接班人。但由于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失利，巴基斯坦认定印度的处境不妙，坚持谋求整个克什米尔、结果印巴间再次坐失平等解决问题的良机。尼赫鲁直到临终还在进行新一轮努力，但问题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至少在尼赫鲁时代，巴基斯坦历届政府，无论是文官掌权还是军人执政，仿佛并不热心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这问题是个综合症，并非只是因印巴双方的糟糕关系所致，还有复杂的民族文化历史因素，冲突的祸根早在独立以前就已埋下，要想改善形势谈何容易。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尼赫鲁对克什米尔自治政府抱有很深成见，但对克什米尔人民怀有特殊的感情，而且他们也将尼赫鲁当作自己的民族英雄，对他的死去感到莫大伤悲。

如果说历史的积怨是影响印巴之间改善关系的难逾障碍，中印关系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尼赫鲁反复强调亚洲两大民族之间数千年来存在着的密切关系，但鼓舞他与新中国加强友好合作的绝非肤浅的怀古之情。他属于最先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都会在世界的力量天秤上单独发挥重要作用的少数政治家之一，因此他相信孤立中国是错误的和不现实的。他极力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权益，率先承认新中国。然而他对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却存有偏见。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化了中国传统的扩张主义。他看重后来亨利·基辛格称为“地缘政治传统”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构成世界的并非是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而是明确无误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力。他知道，与他国间其实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尤其是在 50 年代后期，许多国家都奉行

一种缺少灵活性的外交政策，强烈渲染民族主义的骄傲，指望通过削弱其他国家而获取政治利益。但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会遇到不少国内问题，它们需要花很多精力去解决，因此它们不可能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他相信，只要其他国家对中国友好相待，给他提供一个有利环境，中国就能在国际和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基于这一观念，他自然认为印度的注意力应集中发展国内经济，国防力量只能慢慢加强，而不应将巨额开支花在军备和防御上。他希望奉行一种宽容、坚定和务实的方针，维持来之不易的和平。他在 1955 年曾向纳赛尔讲述他的外交政策：“总是先走第一步，再走第二步，然后才是第三步。”然而事实最后证明，这是理性的政策，却不是成功的政策。

在国内事务中，尼赫鲁长期苦苦求索独立的印度自己的发展道路，最终得出坚定不移的结论。民族主义思想，西方自由主义观点，后来时期又是向反物质主义的印度哲学的回归，这些因素在尼赫鲁的头脑中交织，共同构成他信奉的民主价值的坚固内核。对他而言，民主就是目标本身，而不是达此目标的工具。他讨厌形形色色强制实行的单一化，极其看重人的个性。他访问美国时讲：“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剥夺一个人的个人自由更糟

糕了。”这不能仅看成是他对美国大众心理的简单迎合。尽管他不信奉印度教，但他对古老的印度教观念的魅力感受至深：“假如世界上有神性，那每个人都占有其中一份。”民主是他看来最能被接受的政府形式，因为它毕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他也是一项原则，公民的安全在正常情况下不应受到侵犯。在印度国内，他要求政府机构保证有限、审慎地行使权力。他能在自己临死前促成阿卜杜拉的释放，这多少令他感到安慰。

当他的声誉如日中天的时期，他在国外的作用犹如大赦国际，不过他单枪匹马，孤军作战。应国际笔会的请求，他敦促匈牙利当局对作家和知识分子提供宽松的环境。当尼赫鲁从德热拉斯夫人那里得知她的丈夫因持不同政见在狱中受到粗暴对待时，他要求他的大使在适当时候非正式向南斯拉夫当局提出此事，直言这样做对它名声不利，他也劝告铁托不要单独囚禁德热拉斯。

1958年，苏联政府拒绝允许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尼赫鲁这次以印度文学院主席而不是印度总理的身份非正式向苏联政府表示：不公正地对待帕斯捷尔纳克将有损苏联的威望。无论尼赫鲁以哪种身份出场，他的话都具有相当分量。苏联向他保证，完全不必为帕斯捷尔纳克担心，他是自由的，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自由地离开苏联，“去体会资本主义天堂的欢乐。”事后尼赫鲁宣布：苏联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令我们有点寒心”，“它完全与印度的观念对立。”他坦率指出：一位知名作家，即使他表达的观点与他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左，也应该受到尊重，而不应遭到任何一种限制。尼赫鲁的关心传到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耳中，后者用他蹩脚的英语表达了谢意：“正在流行一种传闻，说尼赫鲁总理在我遭受不幸期间进行了干预，听说并了解我的情况。即使是一种传闻，我仍要表达我由衷的深深谢意。”帕斯捷尔纳克也听到谣传：尼赫鲁愿意为他提供政治庇难，作家个人正计划离开苏联，依靠尼赫鲁来争取释放他的同伴奥尔迦·依文斯卡娅。他后来放弃了流亡的念头，但尼赫鲁与帕斯捷尔纳克之间的友谊却始终保持下来。帕斯捷尔纳克临终几月前曾表示：“尼赫鲁先生身上表现出不为教条约束和特征鲜明的崇高品质，我窃以为我们志趣相投，但对我来说他的精神更难能可贵。他懂得，就精神世界而言，个人的喜怒哀乐和通情达理比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更为真实。”尼赫鲁在帕斯捷尔纳克70周岁生日之际，公开蔑视苏联官方使他名誉扫地的态度，送去一只闹钟作为礼物。

还有一件事：60年代初，印度虽然急于拉拢其北方小邻国尼泊尔，但尼赫鲁还是不得不私人写信给马亨德拉国王，为被后者拘押在狱的尼泊尔前首相科依拉纳说情。他对国王说，鉴于人道主义立场，科依拉纳现已身患重疾，应受到充分医疗护理，如果必要愿派他自己的医生来进行护理。不出尼赫鲁所料，他的干预完全没有效果。可无论是马亨德拉国王的坚持，还是当时印度在国内外所处的巨大压力，都没有阻止尼赫鲁把自己的话讲出来。

从制度上看，印度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奉行的民主原则明显表现为内阁政府和议会机制。众所周知，英国人留下的代议制政府形式缺乏生命力，尼赫鲁喜欢戏称自己是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位英国人，其实他很容易继续过去那种独裁统治的传统，让立法机构名存实亡。在许多其他新兴国家中，第一代民族主义领袖要么本人变成独裁者，要么被迫让权给军人统治的情况比比皆

是，它们的经验表明民主制在印度牢固扎根是个例外而不是常规。当尼赫鲁1957年首次见到加纳总理恩克鲁玛时，他甚至不顾外交礼仪，马上就非难恩克鲁玛正在自己国家推行个人崇拜：“你将绳子套在自己头上，究竟是何苦呢？”后来恩克鲁玛虽与尼赫鲁交情很深，但据说从未原谅尼赫鲁的这一斥责。就像有些人常常指责的那样，尼赫鲁骨子里面确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矜持，而在公开场合，他却顺从一种严谨规范和自我克制的惯例，他并不突出自己是权力一统的代表，也不允许自己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制度。他在印度独立后发起了全方位革命，其中数政治革命最为成功而且旷日持久。尼赫鲁利用独立运动时期完成的政治动员实行了成人选举权，他以总理身份不知疲倦地频繁奔走全国各地，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教会他的人民珍视并且有责任感地行使这一权利。他将教育和领导权看作民主政府的核心，他的讲演把晦涩难懂的问题变得生动浅显，使其中大多数仍是文盲的印度国民都能听懂。他把自己比作一位中学老师，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向他的听众讲解事情，帮助他们思考和理解。一次有人问他将给印度留下什么遗产，他答道：“很有希望，那就是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四亿民众。”

尼赫鲁实行政治民主化的努力获得显著成功。选举的价值赢得赞赏，选举体制深入扎根，印度向世界证明了政治意识并非就是读、写能力的同义词。直至尼赫鲁去世之时，印度已稳固确立起相对成熟的宪政意识。专家们对印度的宪政意识是现代的、传统的还是掺杂各半的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但对它的广泛性和持久性却没有人怀疑。

议会主权可与宪政意识媲美。尽管尼赫鲁为竞选而奔走全国，努力让选举权的重大意义在全体国民中深入人心，但他也小心翼翼不使民选立法机构的尊严黯然失色。印度议会通过非正式议案只在尼赫鲁时代才确有其事。甚至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体质衰弱不堪，他却从不耽误出席会议。在不得不回答某个问题或插话时，主持人和议会各派都多次建议他坐着讲话，他每次总挣扎着站起来，用他的话说是为了维护议会的尊严。有一个令人伤心的巧合：尼赫鲁逝世那天，议会两院原定应他的提议开会讨论一项宪法修正案，在此之前一直想设法通过这项议案，但不足三分之二多数未获成功，尼赫鲁反对将议案搁置起来，坚持要求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一位他的政治对手评论道：“甚至在他临死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还在向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石——议会致敬。”尼赫鲁敢于面对令人生畏的不利环境，在印度实现了民主：成人选举、议会主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等，这是一座经久不衰的丰碑。国际上普遍承认，印度从一个传统社会转变成国民积极参政的现代社会是世界政治生活中一个重大进步。印度从此也自诩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

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况且内部存在诸多分裂因素的国家建立民主体制，它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成就，而且它也是维持印度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尼赫鲁对此有清醒认识。尽管独立后政治实现了统一，但因不能依靠经济一体化来维护国家的团结，要是尼赫鲁不最终通过自己的国大党连续的一党专政来强制推行议会民主，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分庭抗礼的各种宗教、语言、地区、种姓和部落就可能搅得国家四分五裂。

在尼赫鲁时代，右派政党从没有机会上台当政，左派政党基本上信任他，他因而能在不脱离国大党的情况下发挥全国性领袖的作用。事实上，为了加强国大党并增强其凝聚力，他一直允许党的左、右两翼公开活动，使党获得

更广泛的支持。左右两翼间的中间地带便成了尼赫鲁的根基。

尽管有健全的议会体制，印度全国的团结统一仍显得脆弱，国家的一体化始终是普遍担心的问题。继续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按语言划邦和反对中央政府过分依赖各邦，排除了语言纠纷。他允许任何人只要获得邦议会多数党内大多数的支持，就可担任该邦首席部长。对行政事务，他很少超过规劝的限度。在他的允许下邦省自治成为现实，甚至这危及到至关重要的普及教育等计划。

影响国家凝聚力的一个更大障碍，是印度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尼赫鲁曾经问自己：“我们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而回答是：“我们完全没有平等的观念。”他指望通过传播他理解中的社会主义来逐步消除阶级差异。种姓在他看来比阶级还要糟糕，是一种“僵化的阶级”。他乐观地相信种姓制度将被政治普选权削弱，最后必将彻底消灭。他承认种姓意识在政治上还未销声匿迹，但相信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当 1955 年的“不可接触为犯罪行为”的法令实施一年后，尼赫鲁乐观地宣布，贱民制度已经打破，无法继续生存，除一些零星的边远地区以外，它已经消失殆尽。这虽不能说成他有意地自欺欺人，但肯定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幻觉。他低估了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阻力，过分相信理性、法律和选举的力量和影响。从他那里我们看到一种过于天真的现代化理论，忽视了传统的强大惯性、保守主义的冥顽不化和崇尚暴力的倾向。尼赫鲁时代的印度与今天一样，法律、信念和现实相互背道而驰。一边是天衣无缝的法令和无所不包的信条，另一边却是最狭隘、保守、偏执冥顽的社会行为方式。

最明显的表现，也许是尼赫鲁认为影响印度团结统一的首要问题——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尼赫鲁需要在穆斯林心中唤起他们不是印度二等公民的感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将世俗主义定为国家政策，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一道立为新印度的“三大旗帜”。根据这一思想，不存在任何国家宗教，信仰只是个人的私事；印度教信仰中强调的宽容虽然在实践中并非总是如此，它却有可能在印度形成西方政教分离观念的基础。世俗主义将成为新型社会的粘合剂，能将各阶层人民集合到一起结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实体，使宗教信仰成为与公民权利无关的东西。这是 20 世纪任何文明国家唯一正确的作法。尼赫鲁坚持不懈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提供保证。例如，他始终关心应征聘充足数量的非印度教徒在文官系统中任职，他对“好穆斯林绝不可能是好印度人”这种蛮横武断的命题嗤之以鼻。反教派立场在他的外交政策上也有反映，它坚定了他不将克什米尔交给巴基斯坦的决心。但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世俗主义社会仍没有成为无可争辩的现实。直到今天，教派冲突和骚乱仍是影响印度社会发展的一大顽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赫鲁为了竭力让穆斯林感觉印度就是自己的家园，他拒绝实行一部通用的民法典，反对坚持全体印度人不分宗教信仰同样实行一夫一妻制，拥有离婚权、财产权和继承权。他对他在妇女解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感到骄傲，将它看作是对文明的考验，可他却不得不甘于现实，拒绝给穆斯林妇女宪法赋予她们的平等权利。社会改革的这一方面得到尼赫鲁的高度重视，但他出于团结和统一的大局不得不故意打了折扣，难得尽善。

民主机制的运作中也存在某些弱点。尼赫鲁认为，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印度的政治家们基本上都具有正直、真诚、一心为公等美德，但随着独立后环境的改变，许多人变得自私狭隘，他们牢牢控制着政府和党的机构。由于

未进行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社会不平等往往易使成人选举权为私利服务。马克思曾经指出，普选制赋予人民管理政府的权利，却没有赋予管理政府的权力。尽管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但就如今天一样，印度民主的主要受益人仍是社会中最富裕的阶层，他们能够利用传统的种姓、宗亲和经济联系获得巨大的影响。尼赫鲁试图通过鼓励民主参政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从而加固议会制度的根基。这也不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新观念。马克思曾笼统地谈到工人自我组织的社团，约翰·穆勒也寄希望于生产者的合作以引发社会的道德革命。西方在现代又重新强调减少政府干预、注重社团规划的必要性。尼赫鲁与这些思想不谋而合，他怀着对人的天性的信任、指望在这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中通过地方的积极性减轻社会机制的变形。说他是一位依赖社会机制的革命家，不如说他是一位道德家，他力图在自发自愿的努力、议会机制和政府干预行为三者间找出正确的结合点。

但是政客们的野心加上官僚主义窒息了他尝试的各种形式“权利下放的民主”，致使开明政治承诺的一劳永逸、太平盛世逐渐烟消云散。要不是尼赫鲁拖到 60 年代才真正重视推广初级教育的话，印度农民本可能拥有更充分的自信和知识水平，从而保证民主机制的最低一级“乡村议会”能更好发挥作用。另一件值得做但未做的事是，假如尼赫鲁政府鼓励无地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就会使地主及乡村地区有影响的其他社会阶层感到更大压力。本来还应更多地注意培养造就适应乡村发展计划和能充实地方机构的干部队伍。行政改革总的来说被忽视了。由于未能拆除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继承下来的文官体制，用适合独立后印度发展目标的行政体制取而代之，便设置起了不必要的障碍。甚至更严重的是，留用保守的官僚机构助长了赞成维持现状的不良风气。

尼赫鲁的另一个希望是：一旦计划发挥影响，经济生产足够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政治民主就将平稳巩固起来。显而易见，工业化、特别是国营企业的工业化，需要由中央政府、邦政府和计划当局进行决策，但在其他领域，他却希望得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赞同。他喜欢引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说过的一句

话：你不能指望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方法来建成计划经济。他的目的在于使印度能自力更生，以重工业中的国营部门为强大基础，调整理顺私营部门和合作农业。这样做除了能增加生产和实现公正分配外，还可通过劝导来营造出现代化的气氛和避免社会革命，贫富悬殊应该缩小，社会公正程度应该提高，这些可以通过公众压力和友好协商加以实现，尽管因此可能减缓变革步伐，整个进程将贯通某种民主的方式。“我需要改革

‘既得利益集团’，我并不想摧毁它们。”他正在回到甘地的观点上来：革命不一定是断裂，剧烈变革而又不失去发展的连续性，可以靠冲突各方之间建立联系来实现。

还在 30 年代初期，尼赫鲁就赞成对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实行根本性变革。独立后，他决心运用和平手段实现这些变革。30 年代他相信必须诉诸某种强制性措施，40 年代中期他变成两种想法：如果冲突无法避免，就应该勇敢面对；而避免冲突或化解冲突却有明显的好处。在担任总理后，他开始

话：你不能指望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方法来建成计划经济。他的目的在于使印度能自力更生，以重工业中的国营部门为强大基础，调整理顺私营部门和合作农业。这样做除了能增加生产和实现公正分配外，还可通过劝导来营造出现代化的气氛和避免社会革命，贫富悬殊应该缩小，社会公正程度应该提高，这些可以通过公众压力和友好协商加以实现，尽管因此可能减缓变革步伐，整个进程将贯通某种民主的方式。“我需要改革

‘既得利益集团’，我并不想摧毁它们。”他正在回到甘地的观点上来：革命不一定是断裂，剧烈变革而又不失去发展的连续性，可以靠冲突各方之间建立联系来实现。

还在 30 年代初期，尼赫鲁就赞成对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实行根本性变革。独立后，他决心运用和平手段实现这些变革。30 年代他相信必须诉诸某种强制性措施，40 年代中期他变成两种想法：如果冲突无法避免，就应该勇敢面对；而避免冲突或化解冲突却有明显的好处。在担任总理后，他开始

绝对相信劝导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他这时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主义者，不会再考虑其他手段。他也受到印度传统哲学思想的诱惑。独立前夕在亚马那加狱中，他觉得他受的教育尚不能解开他心中的所有疑团，于是，“差不多不知不觉地有一种朦胧的唯心论的想法潜入了我的心中，一种宁可说是类似吠檀多哲学的想法。它并非是精神和物质的差别，而是精神以外的东西。”首先他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支持甘地的非暴力，当总理后他继续承认“非暴力”的伦理原则，由于这时世界面对核武器的可怕威胁，他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他并不认为暴力斗争是彻底改造社会必不可少的工具，阶级斗争肯定存在，但至少印度可以不用武力加以解决。尼赫鲁预言：印度已合并了土邦，废除了大地主制度，并没有招来多少怨言，因而有产阶级必会接受那些不可回避的现实，包括生产增长使人人丰衣足食，分配变得更公平，国家朝现代化稳步迈进，众多人民有充分自由参加选举。尼赫鲁早年曾认为人民与统治者合作取得权力的想法是愚蠢的，但他后来明显改变了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不适合独立后的印度，社会主义的定义和实践并非一成不变，它可以改头换面适应印度的环境，这是民主符合逻辑的后果。只要摒弃意识形态的桎梏，印度肯定就能沿着自己的道路迈向一种机会平等、阶级和每个人的经济权力受到制约的社会，印度就会在某天早晨醒来时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到来。这就是尼赫鲁的印度式社会主义。他在风调雨顺、万象俱新的 1956 年宣布，新印度有能力获得人民的拥护，而不会与他们对立，劝导的方式在政治上的效果已得到证明，它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即使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可以获取高技术和工业化带来的好处。

在尼赫鲁头脑中，这是一个现代化、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新印度的伟大梦想，实现它的手段和目的同等重要。他希望看到一个按民意和理性探讨进行决策的社会，一个以教育来实现人的改造的社会，一个通过普遍认同促进进步的社会。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要摒弃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他的政治和经济战略都一脉相承地出自他对自由的根本信念。他的社会观强调和谐，认为印度可以在不压制个性自由的前提下找到自身抵达现代化之途。它们之间可以协调一致，向往进步与忠于传统并不必然导致紧张，“我们正致力在印度文化的框架内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他在逝世的前两天曾为《印度计划中的社会主义》一书作序，序中强调印度应从现代技术发展进程和生产增长中受益，“但这样做时，决不能忘记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个人的素质。”

不少人认为，尼赫鲁式民主社会主义哲学的前提大错而特错，议会制度只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尼赫鲁的观点形成于 30 年代，自由民主主义在当时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外的唯一选择，但这种观念后来却不适合印度国情，只不过是使资本主义保持稳定和中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地久天长的借口。相信贫困与财产之间绝无冲突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神话，一个阶级粉碎另一个阶级只能通过从下而上的剥夺或从上而下的没收，绝不可能通过劝导和自觉的缴械投降。在某些情况下，正义的行动也就是残酷的行动。卢卡契说过：“从法国革命的最终人性结局和自由动力来看，许多刺耳的插曲不可避免。”阶级社会不能靠理性的方式进行重建。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必然迅速丧失它的推动力，只会走下坡路。由此看来，无论尼赫鲁说得如何动听，他都只能被看成是一位牢牢依靠自己所属阶级、行动谨小慎微的政治和道德改革家。他想方设法表现两面性：既给特权阶级甜头，同时又在思想意识上反对他们。

这些批评确有一定道理，但尼赫鲁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它确有某些超越道德说教和甜言蜜语之上的重要内容。他相信，印度的弱点并不是生来固有的，也并非不可克服。每个人都享有发展自身才能的权利，这并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专利，也不应染上种族主义偏见，只相信欧美才有这种机会。因此，他信心十足地将这个欧美特有的传统移植到印度。虽然他青年时代深受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可他基本上走的是欧洲激进派思想家的路子，这批人看不惯资本主义的鄙俗肮脏，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纯粹理性的社会观，最后必然剪除一切愚昧和罪恶；革命不可能靠暴力来加速，只有当人民的思想通过选举和教育的训练后依然愿意如此，革命才应该来临。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很像法国式社会主义，它首先是“人道主义的信条，主要强调实现个人自我”。不过与欧洲的激进派不同，后者贬低民族主义，他却认为爱国能够鼓动革命性变迁，激励政权当局旨尾一贯地行动，保持群众释放出的积极能量。

但这种崇高的观念是否适用于那个对贫困与饥饿习以为常的印度呢？发展中国家把法律、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仿佛总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个人权利则退居其次。公正有两大原则：一是基本的自由权利，二是分配平等。尼赫鲁承认第二项原则，但认为在经济增长达到相当程度以前应该允许贫富悬殊，而公民自由却必须兑现。他并不认为，民主的代价必然是忽略印度人民的真正利益，相反，民主将给人民带来更稳定的利益，尽管等待的时间可能更久。比较本世纪中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得失，尼赫鲁为印度制订的模式基本上是务实的。

为了实现计划中工农业的迅速增长，尼赫鲁将希望放在科学技术上。他深受罗素、贝尔纳、霍尔丹和 30 年代那些激进科学家的著作的影响，把科学看作是进步的催化剂和社会主义的忠实奴仆，在他看来，只要恰当地利用世界上的资源和工具，短缺经济学的法则就不再适用，就会有完全充足的产品分配给每一个人。知识将给人带来真正的解放，科学的观点有助于理性的决策，科学的充分发展和其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当然这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意义狭小得多的实践。科学是改造世界的能力，它能避开暴力而将社会引入一个繁荣昌盛和充分控制资源的时代。这些观念其实在二次大战后已在西方失去市场，但幸亏尼赫鲁把它捡了起来，使之改头换面变成印度现代思想的一部分。1958 年印度政府在尼赫鲁首倡下提出：除了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外，国家繁荣昌盛的关键是将科学技术、原料和资本有效地结合起来，而三者中头等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因为现代科技能够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减少对资本的需求。因此，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科普教育都将受到鼓励。实际上，用于发展科技的公共开支从独立初到 1964 年增加近 30 倍。印度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是在尼赫鲁死之前不久完工的特罗姆湾核原料加工基地，它由印度科学家和工程师自行设计和建设。虽然印度实际上并未制造原子弹，但普遍承认印度确有这一能力。

尼赫鲁坚持科学家应受到特殊的尊重。他除了鼓励本国科学家外，也对国外的著名科学家伸出友谊之手。当美国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他的国家蒙受诬陷时，尼赫鲁邀请他前往印度，表示只要他愿意，可以选择短暂访问、长期居住或永久性移民。奥本海默谢绝了，因为他感到他应呆在美国，直到宣布他无罪。他担心前往印度的申请不仅会遭美国政府拒绝，并且这一做法本身就会增加对他的怀疑。不过霍尔丹热心来印度工作，印度

政府欢迎他来印度，为他配备了科学工作所需的设备。

尼赫鲁希望对科学和科学家的鼓励不仅能有助于改善物质环境，而且也能够影响社会普遍的心理气氛。科学知识的普及强化了人们的科学态度，揭露了愚昧与荒谬。一个文明的社会在正确价值观的规范下应该努力通过实验探索真理。尼赫鲁虽对科学技术能巩固理性的世界观，并使印度变成发达国家满怀热情，但他从未忘记科学是人类的仆人而不是主子，科学家的见识应超越他们在专业方面的成就，“逐渐培养出某种圣哲的智慧，甚至是某种圣人的同情心。”他尤其关心科学的进步不应以印度世代发展形成的基本价值观作为代价，而应是“以精神取向为基础的古代印度思想和以实验探索真理为基础的科学态度两者间的联姻”。他对一位著名科学家的评论深感振奋：“政治和宗教的时代过去了，科学和精神的时代已经到来。”科学是条理化的知识，缺少它便不能解决印度的问题，但是科学应接受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制约，以便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样才能在现代化和印度特色之间，在过去的宝贵遗产和今天的物质优势之间找到结合点。特罗姆湾的原子能反应堆和坐落在孟买象鼻崖洞中的三面神特里姆提的巨像仅隔一条狭长的海道相望，尼赫鲁觉得这象征的仿佛不仅是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对比，也象征着科学和信仰两者共同作用，缺一不可。

尼赫鲁看来，世界上的科学和工业并非能拯救或帮助一个国家，除非它们不背离某些基本准则和人类的价值观。当代人的重大任务是使这两者和谐一致，并行不悖。因此只能选择逐步稳健发展的道路。这种认识使尼赫鲁与当代世界著名学者与和平人士爱因斯坦、罗素等人找到共同语言，成为相互尊重、崇敬的挚友。

尼赫鲁坚信，应迅速大规模地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印度的工业化。英国曾把印度当作一个农业附属国进行剥削，这在尼赫鲁看来是帝国主义最糟糕的一个侧面。他不赞同甘地对工业化的反感，相信工业化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他曾对甘他说：如果你压制自己的大规模工业化，其它国家就会压制你。他看到，印度如果不实现工业化，就毫无希望发展壮大和巩固自身的独立。今天已很少有人对这一政策的正确性表示怀疑。印度幅员辽阔，市场广大，各类自然资源丰富，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资源极为充裕，在此基础上的工业化的发展是必然的，也为印度的自力更生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在尼赫鲁时代，冶金、机械，化工、动力和运输部门取得的成就为印度现代化经济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尼赫鲁的政策，印度今天拥有几乎每一现代工业门类所需的基础设施以及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951至1964年间，工业生产指数的年平均增加率达到7%左右，即使用世界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也很可观。在当时第三世界各国中，印度的工业基础是最强的。

尼赫鲁并不认为国家必须负责整个生产过程。独立以前他曾提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与主要的企业界人士一道制订国民经济的蓝图，在1944年提出了加速国家工业化的“孟买计划”。他认为同一方针在独立的印度也能行通。公私营企业齐头并进的“混合经济”是一个主要模式，它能带来各个领域的增长和发展。显而易见，国家必须负责发展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和“母体”工业。在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国家控制这类企业确有必然性，但也有务实的一面。印度的资产阶级与西方相比弱小得多，不可能用大量资本进行投入，也不能长期提供这些工业所需的先进技术，而国家则能从长计

议，放弃垄断利润，确保公营成份在关键部门中的重要地位。公营部门的增长本身虽不是社会主义的增长，却创造出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物质条件。

只要国家控制了基础工业，尼赫鲁就甘愿让私营企业继续保留下来。他看不出公、私营企业间存在任何内在冲突，不愿在它们孰重孰轻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在担任总理期间，他宁愿把财政部长、商业部长的高位拱手交给那些公开表露右倾观点的人，认为这样做并不妨碍印度奔向社会主义目标。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不是一种教条，而是实现产量更高、分配更公平、机会更均等的一套实用主义战略。尼赫鲁从大学时代起就深受肖伯纳的影响，多年后他致信肖伯纳：“我和许多我的同时代人都是在您的著作陪伴下成长起来的，我想今天我自我的一部分是受你思想熏陶的结果。”他的社会主义观与肖伯纳相似：人人都有充分的谋生手段，有平等的机会；财富是件好事，只有贫困才是罪恶，应该加以攻击和消除。他经常引用肖伯纳对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经济学家憎恨浪费和无序，美学家憎恨丑陋和肮脏，律师憎恨不公正，医生憎恨病痛，圣人憎恨天国不可宽恕的罪行。”

尼赫鲁相信，只要靠“混合经济”营造出融洽和睦的氛围，不墨守某种刻板的教条，上述理想就会更快变为现实，也会更少引起暴力和冲突。他甚至承认“混合经济”的基础是“混合意识形态”，极为欣赏一种费边主义式的进步理论，坚信可以间接用它处理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他在《印度的发现》中引用了一段话：“我们不仅仅想着目的，而且也去想着接近这目的的方法。要避免对那久已建立的阵地作正面的攻击，而应设法利用迂回侧击的战术，这样，较为脆弱的一面就被暴露出来让真理插进去了。”他认为，由于印度的不发达现状，“混合经济”正是这种间接迂回迈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尽管它不符合任何经典理论。只要国家基本控制了经济，公营部门直接由国家掌管，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逐渐转变成社会主义经济。他设想，私营企业有助于增加国民财富，而公营企业的逐渐扩张将迭盖并最终压倒私营部门。与此同时，印度将实施现代化，生产完全满足需求，达到自力更生，全社会实现丰衣足食。

我们知道，他所企盼的这一切实际上从未发生。公营部门的产量确实在稳步增长，特别是在石油、钢铁、运输、动力和重型化工等部门，但这些增长并不能使国家获取主动性。公营企业的总体成就给人印象深刻，但它开工不足，效率低下，根本不可能成功地将私营部门排挤出局，反而它却在为私营部门服务，帮助后者生存下去。假如尼赫鲁对国有化更执著些的话，私有化的发展本会受到更多阻碍。当然，仅就“混合经济”中不同经济成份的实际表现而论，似乎没有充分理由破坏原有平衡，彻底向公营部门倾斜。由于存在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尼赫鲁政府打消了全面公有化的意图。尽管如此，在 90 年代初开始的印度以私有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改革”中，尼赫鲁的“混合经济”纲领受到全面检讨，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措施也遭猛烈批评。

重工业的发展也指望为农业带来相应的好处。尼赫鲁到 50 年代中期开始懂得，除非农业生产实现增长，否则经济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起飞，但他认为农业增长可以靠机械化来实现。在农业中采用科学方法致使农业大量增产，即使保证农业增长达到 4%，也需要高速增长的工业为其提供电力、化肥和其他必需的投入。先进技术肯定有助于提高产量。甚至直到 1964 年，印度的粮食亩产仍居世界最低水平，因而农业投入的范围极大。

农业产量的提高尽管不尽人意，但仍十分可观。从 50 年代初到 1964 年，

粮食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大约为 3% ,仅 1961 年至 1965 年间就提高了 65%。尼赫鲁时期的三个五年计划中，不包括对支农工业的投资，国营部门总投入的近五分之一用于发展农业。尼赫鲁的发展战略决不是单一的，他一贯奉行的折衷主义导致他孜孜以求经济中各部门齐头并进，因而各个五年计划并不能为农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他相信工业化将成为农业增长的杠杆，因此不必对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直接投入。但实际上对印度这样一个国家，工农业两方面显然需要同等重视。

还有更令人忧虑的一面。尽管农业实现了增长，却未带来农产品的普遍分配，国家的政治民主、地方的自发措施以及农业增产本身三者都不能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由于未彻底实行土改，印度民族主义胜利基本上只局限于政治领域。印度独立后并没有真正消灭地主阶级，随着中等地主和富农阶层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施条件，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实际上已在农村发展形成。少数人占有土地和农业生产技术方法的改进带来的却是贫苦农民的处境愈加恶化。到 1964 年，由于农业连年歉收，以及更加强调加强灌溉和集约耕作来提高产量，土地改革只得退居次要地位。

今天印度国内经常批评尼赫鲁选错了发展重点，指责他对经济一窍不通，太执迷工业化和科学，对农业重视不够，对农业的畸形发展听之任之。还有人认为，尼赫鲁对农村的第一手经验来自有小农土地所有制传统的奥德，因此他总以为废除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就等于扫除了乡村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进步也就有了自身的推动力。他不能敏锐意识到农民阶级的内部分化，只强调富有的地主和贫困的农民两大类。1959 年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上，当时有关合作农业的决议草案提到将多余土地授予无地农民和小农，尼赫鲁删去“小农”一词。当然也不应全怪尼赫鲁一人，“二五”计划并不是他个人的闭门之作，除了其主要高参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外，计划的起草还从西欧、东欧和苏联不少著名经济学家的意见中获益匪浅，他们全都赞同工业化计划应是印度经济计划的主要推动力。

颇具讽刺的是，不平等加剧并非经济停滞的产物，而是由经济快速增长引起的。这一现象到 50 年代后期逐渐明朗化。尼赫鲁固然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缩小阶级差别，但他相信差别即使不能迅速消除，也会逐渐淡化，社会主义只能分阶段实现，经济发展必须超前于社会公正。他知道，社会主义强调的是再分配的增长，不是资本主义追求的自身积累，如果没有可供充分分配的商品，分配就只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达到社会主义目标，印度必须实施一项大型的资本积累计划，往能源、运输等领域内投入大量资金建起一个庞大的基础产业，消除出口贸易中对少数农产品的依赖，改良农作物和开发技术劳动力。可他并不完全懂得生产和分配必须相辅相存，生产率提高与社会结构变化必须同步，增长和平等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印度在计划中的两重性最后引起持续增长与明显不平等的尖锐对立。在尼赫鲁的总理期内，从年增长率、投资率、储蓄率、国民生产总值、物价等技术指标衡量，五年计划都取得显著的成绩。

然而计划的发展未能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而是促进了工农业领域内的资本主义发展。增长导致经济权力更加集中。土地没有分配，农村大多数人的需求受到忽视，土地仅用来满足少数所有者的利益，导致无地农民的贫困程度持续加重。尼赫鲁曾寄希望通过合作农业扭转这一局面，他早在 1936 年就讲“集体和合作农业”是改革土地制度的显著办法，但担任总理后他放

弃了集体农业的观念，因为这涉及到复杂的组织管理。他只是极力主张拥有小土地的农民进行自愿合作。合作农业并不能解决大量无地劳动者的问题。甚至仅就提高生产力而言，土地改革走在前面本来会使合作农业更加顺利，道理很简单，合作不可能稳固建立在不平等的土地占有上。农村地区建立的其他机制也不见得更有成效。

更何况合作农业实施得太晚，力量过弱，不能产生出决定性影响。农民虽然从地主那里接管了土地，却不愿用他们新分得的土地加入任何联合性组织。直到1964年底，接受合作农业“试点”的农户仅占很小比例。假如尼赫鲁在他拥有充分权威影响之初就废除大地主制度，大刀阔斧地分配土地并保证佃户的安全，而不是让中小地主和富农取代过去的大土地所有者，情况就会大为改观。1954年，形势开始向土地改革的方向发展，原以为土改一旦起步就不可阻挡，但乐观的希望落了空。尼赫鲁完全了解这些措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显著改进农业生产力，而且更在于“打破社会中僵滞不变的旧有阶级结构”。他说：必须将农民放在中心位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共产党人就会这样做。”但他却未充分强调土地改革的紧迫性，各邦关于限制农业土地占有规模的法令很难推行，结果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下层阶级仍未发生太大变化，他们的现状反而由于增长而更加定形。尼赫鲁未能使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齐头并进，仅是希望一旦有充足的产品可供公平分配，成人选举就可成为影响革命性改革的工具。他并未意识到这种政治推动经济的战略在印度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注定是不现实的。他不断强调政治参与的根本重要性，热衷于将代议制政府看成是对穷人的保护和对富人的防范，对它实际上代表特权者利益的事实却视而不见。

尼赫鲁的这条路并没有走通。由于公民自由不能靠普遍分配财产而得到加强，尼赫鲁希望分阶段建立的社会主义其实只是一个乌托邦，它只能保证企业家大获其利，新兴地主阶级维持自己的财产和社会等级制度。获得社会各阶层支持的从上至下的变革，结果扭曲变形为保守主义的卫道工具，它虽然挂满社会主义的装饰，可从未带来对下层阶级一劳永逸、不可逆转的有利变化。中小土地所有者始终能利用他们对选举者的控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大党成了“社会主义的脑袋，保守主义的躯体”。经过多年计划以后，印度的发展既带来稳定增长，也带来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的全面加剧。尼赫鲁实行的所有措施到头来只起到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保护中产阶级统治地位的作用。他所代表的只能算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只适应了日益扩大的阶级分化和新权贵阶层控制的加强。尼赫鲁是聪明人，不可能看不出他的大部分努力适得其反，他在晚年曾悲哀他说：也许除了某些局部以外，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从未在印度出现。

在尼赫鲁时代，农业无论取得何等成就，但与人口的增长相比却显得黯然失色。当然情况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产量的年增长率高于人口年增长率，但在“三五”计划中，粮食增产停滞不前，人口增长却超出预计指标。尼赫鲁对这一问题注意较少，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而不是计划生育。他在50年代中期还相信，除了小范围地区以外，印度算不上人口过多。他的乐观看法又得到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附和，但该委员会在估算方面缺乏精确性早就名声在外。根据1951年的推算，印度人口在1976年将达到5亿，但后来证明少算了1亿2000万。按1956年的计算，人口每年增长760万，而实际数字却是每年950万。尼赫鲁对这些误差负有重

大责任。因为他将卫生部交给甘地保守思想的忠实信徒，他们把避孕堕胎视为洪水猛兽和道德堕落，因此不愿费一点力去推行计划生育。尼赫鲁在 1958 年命令，采用各种办法鼓励开发口服避孕药物，教导乡村发展区域实行计划生育。次年印度政府又公开支持各种认可的节育方法。但即使这时，尼赫鲁仍继续相信印度总的来讲并不存在人口过量的问题，计划生育只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运动的组成部分。

尼赫鲁在几年后承认，不论印度的人口是否过多，人口增长的压力都可能严重危害经济发展的全部努力。他警告人民，假如不限制人口增长，就无法改善生活条件。他也承认在控制出生率方面从未能取得显著的成绩。不过直到最终他也未能理解问题的严重性，老是一厢情愿地相信人口增长是经济进步、死亡率减小和寿命延长的结果。他还相信，随着教育传播和发展加速，生育率会自动下降，而仅靠服避孕药决不是什么好事，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总结：“它是想象的可能性，有些人总是拿它来威胁我们，说人口增长会使我们不知所措，打乱我们的预测。但这只是种可能性。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必然性，而是种可能性。”然而事实证明他乐观过头了，计划生育不力和人口不断上升成为印度发展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这是尼赫鲁对本应优先考虑之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例子。

尼赫鲁死后多年，他的影响仍然是印度发展的主要动力，他的希望仍在鼓舞这个国家，他的不结盟和和平主义思想依然受到整个世界的高度评价和珍视，围绕他的个性、工作、思想、著作和计划的争论长盛不衰，他去世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不断影响对他的重新评价。然而无人否认，他是一位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的历史人物。

批评尼赫鲁的人总说他是一位软弱无能、不务实际的总理，在内政、外交上失败多于成功，苦劳大于功劳。他们指责说，他长期操纵政治权力，不受任何挑战，但他却未利用这一杠杆为千百万印度贫困大众带来持久的利益；在国外，他劳而无功，事倍功半，积极活跃最后换来的却是丢人现眼。一种情绪色彩很浓的偏见甚至认为他是一个伪君子，再不就是个野心勃勃的政客，当然对此偏见不必认真看待。也有不失客观之处的评论：他长期担任的总理“从许多方面看只能说个性鲜明，但绝非成就斐然”。作为一位地位不受挑战的总理，他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可实际上却巩固了资本主义，因而他是政治上的成功者，同时又是历史上的失败者。

尼赫鲁担任总理时表现得有棱有角、个性鲜明。他的特殊重要性既表现于他的个性，也在于他毕生努力的事业。他八方奔走游说，希望证明政治并非尽是卑鄙龌龊，其中也不乏某种健康有益的动机，在尼赫鲁魅力之光四射的年代生活过的每一位印度人，都能记起他那积极向上、宽宏大度的情操，高雅得体的风度，精力充沛和热情冲动的好奇感，一阵大发雷霆之后又是温和的懊悔和抱歉，幽默诙谐，妙语连珠，而与这一切相得益彰的是他始终不怠的责任感，对重大问题的敏捷反应，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深刻洞察，强烈而非排他的爱国热情，而最重要的是他那明净如水的正直。如果说甘地使民族独立运动富于道德情操，那尼赫鲁则第一次赋予自由的印度一个崇高的目标。对整整一代他的同胞来说，他与其说是他们的领袖，不如说是一位能清楚表达他们对现实和未来看法的同路人。这种集知识和道德之大成在他那个时代确实不多见。

尼赫鲁 50 年代初期驾驭巴特尔、力克坦东以及在他最后一年任内促成卡马拉季计划，都足以证明他娴熟在行的政治技巧。但他也有另外一面，就是他卓尔不群和出类拔萃的知识素养。他不允许别人侵入他的私人精神领地，可他却能敏锐地关注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与新闻界关系融洽，相安无事，这主要归功于相互理解和他过人的幽默感，他每月一次的新闻发布会总是德里社交生活中的大事，文学和玩词弄句是他持之以恒的兴趣，他的英语文章写得优美雅致，他悉心注意印度国内外的文学潮流，留意在政治以外的其它圈子中间发现才华出众的能人。在尼赫鲁时代的印度各界人士都能通过他与公务活动发生有意义的关系。尼赫鲁其他方面的兴趣仿佛给予他本人一种恢复政治元气的能量，超凡脱俗，醉心于其他活动更增添了他作为一位领袖人物的魅力。

尼赫鲁的力量在于他的思想，这不是指他有创造性或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指他广泛阅读，努力思考，认真倾听所有有益的意见，致力找寻出目标和手段，以便能体现他所信奉并适合印度的价值观和原则。他曾说：“在我们今天这个难以理喻的世界，一个人能做的事只是提出问题，只有极聪明或极愚蠢之人才去解答问题。我不算太聪明，我希望我也不算太愚蠢。”他的思想绝不缺少普遍原则性，他的政策实际上正是在某些坚定的伦理信条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少人认为，他太容易轻信华而不实的想法，例如乡村发展计划、“乡村议会”体制、经济发展的“起飞”、东西方文化的联姻等等。他的思想好像也常受到陈腐观念的左右，有些西方学者曾不失公正地责备他“树立了某些不良的思想风气”。但他极为成功地制订了各个领域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它们的方法，他知道印度需要什么和如何做。他既是空想家又是计划者，两种资质的合成为他的幻想注入了某种现实主义成份，使他的计划表现出更广阔的眼界。

沉溺于思考，想象力丰富，加上他一些明显的弱点：在公开场合对大事小事表现得忧心忡忡，客观公正走到极端，兼容并蓄的民主天性发展过头，太注重教养引起某种自疑倾向，这一切都使尼赫鲁作为一位治国者黯然失色。如他自己所说、疑虑也许永远不会消除，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在权衡利弊大小之后进行选择。但即使面对这种艰难的选择，他也老是多思寡断，犹豫不决，退缩规避。“好吧！如果你们愿意尽可说我软弱。我不反对你们说我软弱，我不喜欢任何人或任何政府的独裁倾向。”正因为如此，使他在诸如语言划邦，喀拉拉邦的印共地方政权和结束果阿的殖民统治这类如此重大、棘手的问题上长期观望，放任自流。

甚至当尼赫鲁的想法无懈可击，偶尔果断作出决定时、它们也很少照他本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有效实施。例如，他反复提醒印度中央政府的部长、各邦首席部长和国大党的领导成员，需要尽力在全国范围内更换旧式犁耙，为农民提供效率更高的新式农具。他要求在乡村发展区组织推广，必要时将新犁赊销给农民。看起来这是件极简单的事，但结果什么也没做。尼赫鲁对此只能唉声叹气，郁郁不乐。他即使对政治工作的每一方面都有兴趣，但鉴于印度地域广阔，情况复杂，他的积极干预也不可能一贯坚持。尼赫鲁的思维机敏活跃，但跳动性强，转瞬即逝，或许这种素质并不适合实施他的决定并持之以恒地监督实行情况。他的一位朋友认为他遇事总喜“动太多脑筋”，结果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他只知道谈，他喜欢空泛地谈论世界大事。当我担任外籍国防部顾问时，我与他呆在一起，他只是清谈。真是难以理解。我

很惊讶，他就是清谈。”

政府工作又因尼赫鲁经常在他想干的事情上用人不当而进一步受到妨碍。甚至当他已发现或本人向他提出他们不胜任时，他也未及时罢免他们。他特别喜欢作招人注意的豪行壮举，经常将不正当的权力滥用看成是锐气和进取心的体现。譬如，他不辞辛劳为一系列可疑的银行家组建一家航运公司争取政府的资助，结果此人的活动让印度政府损失数千万卢比。即使当他的被保护人劣迹败露时，他仍不愿抛弃或惩处他们。与他在选人上缺乏审慎不相上下的是他在罢免官员时的犹豫不决。他对朋友的真诚不容怀疑。出于无可奈何，他解除了滥用职权的机要秘书马泰的职务，也接受了密友梅农的辞呈，但他全然不顾证据，顽固相信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涉及许多其他人的案子里，只要揭露出的事还不致完全对当事人不利，他总是为他们辩解开脱，认为他们是无辜的。

尼赫鲁尽管有这些缺点，但他成就斐然。他制定了概念全新的外交政策，既适合印度本国利益，又有利于国际社会。仅此就足以使他跻身伟人的行列。除此之外，他领导了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让民主在印度扎根，保持政治生活健康发展，他关注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以及如他本人恰如其分的说法，“推动经济和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尼赫鲁在他总理任期的最后阶段能自豪地宣布：五年计划已使国民收入、粮食产量、工业产值出现大幅度增长。只是到了尼赫鲁时代已告结束的60年代中期，印度的增长过程才出现明显减速。最重要的是，尼赫鲁使一些特定目标成为印度总体精神的一部分，尽管它们今天尚未实现，但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就是团结、民主、自由、世俗主义、科学化和国际化观念、实现社会主义远景的计划。他赋予他的印度一个内容丰富的多元化社会道德观。

随着尼赫鲁的离去，自由印度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他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已使今天人们与他那个时代相距越来越远。当他去世时，仿佛他将与整个世纪共存。但尼赫鲁时代的那些充满自信的向往，那些崇高动人的抱负和那些斐然瞩目的成就，今天看起来犹如一个日渐式微，荣光褪尽的世界。今天人们有一种理想幻灭和机遇不再的失落感，尼赫鲁曾指给他的人民那些富有挑战性的目标，已变得残破不全，面目全非，甚至连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仿佛也元气丧尽，成了一具僵死的历史残骸。

综观尼赫鲁的一生，仿佛又一次证明了一个伤感的真理：在国家事务中，仅有诚挚、正派、品格高尚是不够的，有高尚德行而缺少权谋，有安邦济世之才而不辅以实力，只会招致灾难。尼赫鲁并不相信全方位革命会很快进行到底，今天看来，尽管它已失去了一些光辉，但仍未夭折流产。一个人的成就总是有限的，甚至一代人的成就也很有限。尼赫鲁喜欢引用一则古老的印度谚语：大象站起身来总是从容不迫。尼赫鲁事业上的转折如此明显，他的成就又是如此巨大，生活在他所改变的世界上的人们很容易苛评他的是非功过。他的成就决定了人们不应用对一位普通总理的标准来衡量他、评价他，否则我们就会从期望中生出生失望。

他坚信富有远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中是切实可行的，并设计出一个模式使之付诸实施；他避免了权力集中，让政治选举发挥合适作用，正确制定了第一阶段的发展重点。可是计划并未得到切实执行，政府当局未能充分施展影响，政治意愿常常显得力度不够。不过来自人民的压力也是微弱的。如果印度的左派势力能促使甚至于迫使他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

如果他们不是去抵消他的努力，而是协助他动员群众，打退保守势力的抵抗，他的成就本来无疑会更为显著。尼赫鲁本人充分意识到行使权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妥协和复杂性，也完全知道会因此减慢发展的步子，“我们继续向前，每次走出一步，尽其所能。”然而他使印度在正确的道路上起步，他留下的印度犹如一个尚未完工的半成品，但不会注定永远如此。他毕竟为他这一杰作的完成定下了详尽的检测标准。尼赫鲁生前在印度某地主持一座大坝的开工典礼时，一名工人走过来用泰卢古语对他说：“请点亮这盏灯吧！”尼赫鲁当时深为感动，因为这仿佛是对他个人的专门考试。“在我们生命的里程中，难道我们不正是在点亮灯盏或扑灭亮着的灯盏或蜡烛吗？”在尼赫鲁时代的印度，无以数计的灯点亮了，而她的地域是如此辽阔，大量地区还仍然处于茫茫黑暗之中，尼赫鲁的未竟事业需要他的后辈人沿着他指引的道路继续完成。

他集合起一个民族，培育她适应民主，建立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使印度走上发展进步的道路，他永恒不朽的成就直到他去世后才更清晰地凸现出来。他曾尽心竭诚为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服务，而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满动荡、暴力和战争，他的毕生追求和梦想有待成为现实。尼赫鲁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是印度和整个世界值得记住的杰出政治人物和大写的人。

后 记

说起本书的撰写，也许该提到一件往事。若干年前，我在英国的牛津学习，专业是现代国际关系，重点放在亚洲。一天，我与朋友乔德哈里教授在圣安东尼学院静寂的校园小聚，一边品一种味儿很特别的印度红茶，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这在学究云集的牛津是不可多得的休憩方式。教授是研究尼赫鲁的专家，著述颇丰，我们的话题自然也涉及了这一人物。他对中国的尼赫鲁研究知道得不多，但饶有兴趣，毕竟他了解中印两国在尼赫鲁当政时期有过的亲密友谊和恩恩怨怨。其实就我所知，自 60 年代初中印关系交恶以来，国内对尼赫鲁的注意与兴趣大大减弱，后来尽管两国关系改善，这方面的工作仍不尽人意。记得一位坚持探究尼赫鲁的学界朋友竟对我戏称他是在孤军作战。这次校园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从此开始悉心搜集资料，指望将来某时能为尼赫鲁写一部传记。所以，当我得知四川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世界名总理传记丛书”，约我写名列其中的尼赫鲁时，我欣然答应了。

名人传记应该既是一篇有血有肉的故事，也是一部严肃的研究著作，本书的写作基本上本着这一宗旨。写作花去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付出的努力显然要多得多。不过，为尼赫鲁这样一位勋绩辉煌、经历曲折、个性复杂、思维与感情世界丰富、既属于历史又仍影响着当今世界的人物作传，无论怎样我总嫌自己力不从心。好在我为本书定下一个最低水准：让人们熟悉一下这位曾在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光芒耀眼的明星。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袁玉霞小姐，她为本书的及时完成做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胡务先生，他以严谨的态度和广博的学识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也对许多我的同事表达诚挚的谢意，我从与他们的经常交流中获益非浅。

张 力

一九九七年五月于四川大学

主要参考资料

英文：

- (1) J·尼赫鲁：《尼赫鲁著作选》第一—4卷，（新德里，1981）
 - (2) J·尼赫鲁：《尼赫鲁讲演集》第4卷（德里，1961）；第5卷（德里，1968）
 - (3) J·尼赫鲁：《外交政策讲演集》，（德里，1961）
 - (4) J·尼赫鲁：《尼赫鲁早年书信选》，（孟买，1958）
 - (5) J·尼赫鲁：《世界历史一瞥》，（牛津，1988）
 - (6) S·迪克舍特(编)：《尼赫鲁诞辰百年纪念专集》，（牛津，1989）
 - (7) R·札卡里亚：《尼赫鲁研究专辑》，（德里，1989）
 - (8) 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伦敦，1979）；第3卷（伦敦，1984）
 - (9) P·N·潘迪：《尼赫鲁》，（伦敦，1976）
 - (10) A·德夫：《争取自由年代的尼赫鲁》，（德里，1989）
 - (11) T·阿里：《尼赫鲁家庭秘史》，（纽约，1985）
 - (12) B·南达：《圣雄甘地传》，（牛津，1958）
 - (13) E·雷德：《出使尼赫鲁》，（牛津，1981）
 - (14) M·布列契尔：《尼赫鲁政治传记》，（牛津，1961）
 - (15) M·布列契尔：《印度与世界政治》，（伦敦，1968）
 - (16) M·布列契尔：《面临考验的不结盟：西方与中印边界战争》，（纽约，1980）
 - (17) T·乔德哈里：《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与实践》，（牛津，1985）
 - (18) V·舍思：《尼赫鲁的集权时代》，（伦敦，1960）
 - (19) R·卡兰杰尔：《采访录：尼赫鲁的思想与哲学》，（伦敦，1966）
 - (20) M·达斯：《尼赫鲁的政治哲学》，（伦敦，1961）
 - (21) B·穆里克：《与尼赫鲁相处的日子》，（伦敦，1971）
 - (22) R·C·杜特：《尼赫鲁式社会主义》，（新德里，1981）
 - (23) K·卡鲁纳卡兰：《尼赫鲁现象》，（新德里，1979）
 - (24) T·蒙德：《尼赫鲁谈话录》，（孟买，1958）
 - (25) S·哈里森：《尼赫鲁的和平计划》，（多伦多，1978）
 - (26) D·莫勒斯：《英迪拉·甘地夫人》，（波士顿，1980）
 - (27) 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麦克米伦、艾登、赫鲁晓夫、C·鲍尔斯、J·加尔布雷思、阿尤布·汗、达雅尔、韩素音等人的自传、回忆录。
- 中文：
- (1) J·尼赫鲁：《尼赫鲁自传》（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 (2) J·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 (3) 《人民日报》1954—1962年有关文章、报道。

